

# 知情者访谈录

中央文献出版社

# 话说

刘少奇



# 话说毛泽东

## ——知情者访谈录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说毛泽东 /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编. —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1

ISBN 7 - 5073 - 0711 - 5

I. 话… II. 中… III. 毛泽东 - 研究 IV. A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75397号

## 话说毛泽东——知情者访谈录

编 著 /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

责任编辑 / 张 宁

封面设计 / 李书英

版式设计 / 郑 刚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1号

邮 编 / 100017

销售热线 / 63097018

经 销 / 新华书店

排 版 / 金剑排版厂

印 刷 / 安泰印刷厂

装 订 / 广增装订厂

850 × 1168mm 32开 17印张 420千字

2000年2月第1版 200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册

ISBN7 - 5073 - 0711 - 5/K · 316 定价: 26.00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 目 录

### 访薄一波——

我们怎样纪念毛泽东 ..... (1)

### 访陆定一——

毛泽东和中国的过去与今天 ..... (8)

### 访逢先知——

关于毛泽东研究的几个问题 ..... (18)

### 访龚育之——

两场革命·两次飞跃·两大理论成果 ..... (39)

### 访张静如——

宏观把握毛泽东 ..... (61)

### 访石仲泉——

毛泽东邓小平：理代中国的  
两位历史伟人 ..... (70)

### 访汪裕尧——



换一个视角：毛泽东怎样看待他自己 .....	(86)
<b>访王蒙——</b>	
我看毛泽东 .....	(101)
<b>访陈晋——</b>	
我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 .....	(114)
<b>访汪澍白——</b>	
建国后毛泽东的文化观发生了变化 .....	(127)
<b>访臧克家——</b>	
毛泽东的诗有“三新” .....	(135)
<b>访任继愈——</b>	
不研究神学，就写不好哲学史 .....	(141)
<b>访袁德金——</b>	
毛泽东和《孙子兵法》 .....	(149)
<b>访侯宝林——</b>	
毛泽东听我说相声 .....	(158)
<b>访林克——</b>	
毛泽东读英文，读外国书 .....	(164)

**访高菊村——**

毛泽东和韶山“情结” ..... (176)

**访王兴国——**

杨昌济的得意学生 ..... (187)

**访萧超然——**

青年毛泽东和北京大学 ..... (197)

**访黄允升——**

三十年代初：毛泽东的坎坷与挫折 ..... (204)

**访郭洪涛——**

迎接毛泽东到陕北 ..... (218)

**访宋一秀——**

《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  
发表和流传 ..... (225)

**访林默涵——**

毛泽东三篇著作对我人生道路的影响 ..... (235)

**访温济泽——**

听毛主席的整风报告 ..... (245)

**访吴亮平——**

学个唐三藏 实是功德无量 ..... (256)

**访刘炽——**

《东方红》出了新作者 ..... (262)

**访李希凡——**

毛泽东与《红楼梦》 ..... (269)

**访杜润生——**

1955 年前后毛泽东的变化并非突然 ..... (283)

**访卢文——**

毛泽东、邓子恢关于合作化问题的  
三次争论 ..... (295)

**访卢之超——**

探索中的三个突破和三个悲剧 ..... (305)

**访林蕴晖——**

探索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成与失 ..... (320)

**访李超然——**

毛泽东说，涉及主权的问题不能谈 ..... (330)

**访邓力群——**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前后 ..... (338)

**访廖盖隆——**

毛泽东晚年的失误 ..... (354)

**访金春明——**

“文革”起因十说 ..... (366)

**访王年一——**

毛泽东晚年的一个侧面 ..... (382)

**访于南——**

从毛泽东处理“九一三”事件说开去 ..... (393)

**访金冲及——**

毛泽东和周恩来 ..... (404)

**访张培廖——**

毛泽东和张闻天 ..... (424)

**访吴正裕——**

毛泽东和鲁迅 ..... (440)

**访薛明、贺晓明——**

毛泽东和贺龙 ..... (451)

**访吴克斌——**

毛泽东和陈毅 ..... (463)

**访黄瑶——**

毛泽东和罗荣桓 ..... (480)

**访陈明——**

毛泽东和丁玲 ..... (495)

**访王行娟——**

毛泽东的三次婚恋 ..... (511)

# 访薄一波——

## 我们怎样纪念毛泽东

薄一波

薄一波，1908年生，山西定襄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任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华北军区政委、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1956年5月起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9年7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和1987年，两度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在纪念毛泽东一百华诞的时候，中央党校《党校论坛》的记者访问了薄一波同志。本来，采访薄老，也在我们的计划之列，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如愿。评说毛泽东，少了薄老，党得不圆满。今天本书再版，我们将《党校论坛》记者的访问录收编，也算了了一桩心愿。为此，还要感谢《党校论坛》的记者，感谢薄老同志。

**访问者：**在毛泽东同志诞辰 100 周年之际，请您谈谈我们应该怎样纪念这位世纪伟人。

**薄一波：**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1921 年出席党的一大，成为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他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创建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 1935 年遵义会议开始，成为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我们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伟大领袖。他一生的功过，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作过全面、精辟的论述。《决议》指出的他为我国人民所建树的不朽功勋，我体会，最主要的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第一，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英勇奋斗的精神，开辟了一条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经过 22 年的人民革命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创建了新中国，开辟了我国历史的新纪元。小平同志曾高度评价：“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48 页）

第二，他和他的战友们，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为我国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我想，一个人的一生，如果能为人民办成一件大事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毛主席却起码办成了足以影响中国或世界历史进程的两件大事，他的伟大就可想而知了。是的，毛泽东同志的晚年，的确犯了严重的错误，但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不是完人，却是一代伟人，他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历史功勋、他的科学著作、他的正确思想已深深扎根于亿万人民的心中。今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隆重纪念他诞辰100周年，正是党心、军心、民心的反映。纪念除了表达对他的崇敬之情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联系现实的情况，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这才有助于我们的事业。

**访问者：**您谈的这一点对我们很有启迪，请再专门谈谈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好吗？

**薄一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这里需要强调的，一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谈不上什么毛泽东思想。二是，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是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三是，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小平同志多次讲：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主席在延安整顿三风的报告中，讲的话很多，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的理解，这就是告诉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力求做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避免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几千年来对实事求是没有人解释得比他那样好，那样透彻。他的这个解释是精辟的，代表他的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小平同志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这讲得非常好，今天我们就应该抱这种态度来纪念毛泽东同志。

**访问者：**1956年初，您曾组织过工交战线向毛主席汇报，您能谈谈毛泽东同志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情况吗？

**薄一波：**小平同志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讲了一段很深刻的话，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如同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经历过许多曲折一样，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建国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后，随

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和经验的积累，随着苏联在经济建设中暴露出来的一些缺点错误和走过的弯路，毛主席根据中国的情况和我们党一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经验，勇敢地提出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1956年初，他从调查研究入手，认真地听取了34个部委的汇报，集全党智慧之大成，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提出了正确处理十种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1957年春，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1958年，他又提出了要把工作重心转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上来，这里讲的文化革命是指提高全国人民的文化水平而言。毛泽东同志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他认为，对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应该说，探索的起步是正确的，提出这些思想是宝贵的，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但可惜从1957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对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影响估计过分，也由于在连续的巨大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情绪和急于求成，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这次探索的实践并不成功，甚至走偏了方向，因而是失败了。党和人民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但错误和挫折又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变得聪明起来了，因而又孕育着新的更大的成功，从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失败

是成功之母”。

**访问者：**最后，请再谈谈毛主席的探索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

**薄一波：**我认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产物，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中，当然有继承的关系，但更主要的是创新、发展。

粉碎“四人帮”后，如何正确地评价毛主席和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是个非常重大而又复杂、敏感的问题。有的过于褒，把毛主席说得完美无缺，搞“两个凡是”；有的过于贬，把毛主席正确的东西也说成是“左”。小平同志既充分肯定毛主席的伟大历史功绩，又实事求是地指出和改正毛主席晚年所犯的错误。以此来统一全党思想，意义非常深远。正如他所说的，“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这里，既谈到了“继承”，又说到了“扬弃”，还讲到了“发展”，恰当地说清了两者的关系。这是一。

二是，我认为，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小平同志的新贡献。他在实事求是地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实践经验，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明确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提出了改革开放等一系列的新方针、大政策，并概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终于找到了毛泽东当年要找而没有找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

一条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必由之路，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路。党的十四大把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14 年来的构想，命名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他是当之无愧的。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按照“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的战略部署，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使我国逐步地步入发达国家之列。

三是，毛主席曾经讲过，“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许多老同志都还记得，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并为全党所掌握，曾经产生了何等巨大的“物质力量”，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因此，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首先是武装各级领导干部，就成为关系到我们党、我们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的大事。我相信全党同志一定会自觉地学习这一理论，掌握这一理论，并使之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去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我想，这也是对毛主席诞辰 100 周年的最好的纪念。

1993 年 10 月 20 日

# 访陆定一——

## 毛泽东和中国的过去与今天

陆定一

陆定一，(1906~1996)，江苏无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红军长征，1942年任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1945年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59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79年恢复工作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曾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届十中全会增选)、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还担任过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的著述编有《陆定一文集》。

好事多磨，能采访到陆定一，着实让我们费了一番周折，还要感谢他的秘书宋广为同志。老人已八十有六了，但依然精神矍铄，风趣健谈，反复对我们说，中国革命缺了毛泽东不能成功，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没有邓小平。邓小平，大好人啊！讲到这，他还拍拍我们的肩膀说，你们有福气，赶上了好时候！

访问者：陆老，明年，即1993年，是毛泽东同志一百周

年诞辰，我们想请您谈谈您对毛泽东的认识。

陆定一：1983年毛泽东同志九十诞辰时，我曾写文作为纪念，不觉一晃又10年了。这10年，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又取得了巨大成绩。回首往事，感慨万千，给你们谈些什么呢？还是从毛泽东和共产党说起。

毛泽东同志是我们的领导者，他又是党的一个党员。要了解他的生平，需要了解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像世界上一切存在的事物一样，有她的幼年时期和成熟时期。革命时期，在革命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上，我们党有一个从幼年到成熟的过程。这一点是容易懂得的，因为事情已经完成了，回顾一下就看得很清楚。但是，以为我们党既然在革命问题上是个成熟的党，到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也是成熟的党了，不会再有一个由幼年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或者这个过程不会像革命时期那样曲折，可以迅速取得成绩。这是幼稚的想法。虽然我们曾经试图较早或较快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照搬了一些过去在革命时期的经验，如大搞群众运动，以大抓阶级斗争带动生产等等，实践证明那是错误的，走了许多弯路，给革命和建设带来一些曲折。

这些曲折，归根结底，是由于没有认识到，虽然党在革命问题上已经完成了由幼年到成熟的过程，但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还要重新经过由幼年到成熟的过程。

这是我们党的发展的第二个过程。这个过程也要从头来过。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幼年时期的党还要经过胜利与失败，然后才能成熟。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要犯些错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幼年的党，只要是工人阶级的党，马克思主义的党，她的前程总是光明的，她不会衰败下来，而能以自己的力量，克服幼年时期所犯的 error，取得教训，发展

马克思主义，变为成熟的党，走向新的胜利。这是由于我们党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访问者：**党的第一个由幼年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是不是就是十三大讲的“第一次飞跃”？

**陆定一：**党的十三大上提出的“第一次飞跃”，也是这次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第一次革命。无论用个什么概念概括，实际上就是讲的这个问题。第一次飞跃也好，第一次革命也好，无疑是和毛泽东同志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和王明的教条主义分歧在哪里呢？在实际经验吗？从实际经验看，王明一伙当然不能和毛泽东比，毛泽东同志自始至终在军队里，在苏区，亲身经历过胜利与失败，深深了解军情与民情，他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参悟是如此深透。王明在这方面是无知的。在理论方面吗？过去有一种传闻，说王明会背马列语录，他只不过会背面已，借以唬人。他背的那些教条，从概念到概念。“凡是马恩列斯讲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照办”，这是博古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写的自我检讨中说的。你看，教条主义就是“两个凡是”。博古做了这样的检讨，说出他的心里话，能认识到这一点，也就点出了王明路线的根源所在，他就变成了好同志。王明有功劳么？没有。王明有威信么？也没有，在王明的宗派中也有人认为他并不高明。这样的人居然能登台，是因为他对一个俄国人叫米夫的阿谀奉承，和向他“告密”，诽谤和陷害许多中国同志，取得米夫的信任。米夫当了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1931年初秘密来到中国，召开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强迫“选”王明为政治局委员。这是料想不到的，出乎意料，突如其来的。但问题是这又是合法的，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纪律上要服从共产国际。这又是毛泽东

同志和王明斗争所以时间那么长，造成那么大灾难的原因所在。

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我们党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才使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到成熟。“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清楚地划了一道界限。它的意义相比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王明路线统治了4年，革命眼看将被断送，干部中怨声载道。遵义会议还是在“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内部起了分化的时候开的。他们之间分化了，于是会议上出现了一个多数，赞成毛泽东起来领导。要记得，即使广大干部不满，但不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内部分化的时候，王明路线也不会倒。

遵义会议没有请示共产国际，也没有向它报告，因为无线电联络已因电台丢失而没有了。如果不是这样，共产国际出来干预，那结果可能不同。遵义会议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候开的。不是生，就是死，没有中间可循。

**访问者：**但遵义会议之后，中央还是派人去国际汇报了，还是否说明我们党还是没有摆脱共产国际？

**陆定一：**不能仅看它的形式，要看到实质。我们的组织关系没有变嘛，还是国际的一个支部。向上级汇报是要征得它的支持（包括谅解）。1938年王稼祥从苏联回延安，带回共产国际书记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口信，说：“中国党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领导下，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同志。全党应该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王明同志不要再玩花样。”这样，就把王明路线所以能够存在的一个原因——共产国际的支持——取消了。

**访问者：**是否可以说遵义会议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从幼年到成熟的标志？



陆定一：不仅是可以说，而且是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以前，党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还是幼稚的，如同一个人的幼年，天真、朦胧，朝气是有朝气，不免常犯错误。在这以后，党在革命的问题上是成熟了，如同一个人的成年时期，对认识和实践的把握比较恰当。从1935年1月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15年，其间经历了长征的胜利结束，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战争，反对顽固派的斗争，重庆谈判，人民解放战争，到全国解放的胜利，这样一个非常艰难曲折的过程。每一个关键时刻，全党都得到党中央的及时的正确的指示，当然也是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下，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这15年，党内也不是没有斗争，不是没有错误东西的干扰的。主要有：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逃跑主义，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土改中侵犯中农的错误以及延安整风中所谓的“抢救失足者”等等错误干扰。也正是因为我们的党成熟了，能够及时认识和排除这些干扰，走向胜利。

辩证唯物主义把真理分为两种：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认为“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所以，人类只能无限地接近它，而不能达到它。而“相对真理”则是人类能够达到的，而且可以讲得出来的。譬如中国革命的真理，是可以认识并能达到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讲出了中国革命的真理，而且用事实证明它的真理性。这个真理就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是相对真理还不是绝对真理，只能趋于绝对真理，所以不可以把它全盘搬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相对真理又包含着绝对真理，我们今天可以照搬的，只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她的思想方法：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访问者：**我们党在民主革命中有那么丰富的经历，经过多少成功与失败的磨难，人们本来设想，在建设社会主义上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可历史实践的结果，曲折仍然没有避免，这是为什么？

**陆定一：**懂不懂、会不会、坚持不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曾是革命时期党是否成熟的分界线，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有党成熟不成熟的界限。1957年，当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我国转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曾说：“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你看，毛泽东同志那时候是清醒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取得经验的时间那么长（21年，比14年还多），所花的代价那么大（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呢？为什么首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毛泽东同志，忘记了自己所倡导的思想，直到他身后才由十一届三中全会来恢复呢？

搞清这些问题，我认为有这么几点：首先是由于全党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经验的获得，归根结底要靠自己的摸索和积累，别人的经验再好也是在人家的环境中适用的，何况那些经验我们党较早就觉察到它的缺陷。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党犯错误是在摸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经验中走了弯路，教训极大。反过来，它又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反面经验。再则，由于毛泽东同志骄傲了，自以为是了，听不进反面意见了。他对斯诺的谈话，竟主张需要个

人崇拜。三则，因为他老了，人一老，就受到精力及观察能力的限制，即使想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也已经力不从心了。以上三个原因，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作了恰当分析，直到今天，我认为都是对的，很中肯的。

**访问者：**是否还有另外的原因呢？您作为老一辈革命家，参与了党和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又熟悉毛泽东的生平和实践，能否谈一谈？

**陆定一：**我不揣冒昧，提供几点供参考研究。旧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也是从那时起，多少志士仁人怀着振兴中华的愿望奋起抗争。要振兴中华，就要建设，或者说，要发展生产力。但是，要发展生产力，就须要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资本的统治，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在清朝，有个“洋务派”，想在清朝统治之下进行建设，失败了。在北洋军阀统治的时候，“实业救国”高唱入云，又失败了。在蒋介石统治之下，又有一批人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以为中国从此可以统一，因而可以建设了。这个幻想被国民党新军阀的不断内战，特别是被“九·一八”的炮声所毁灭。只有共产党主张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才能建设。共产党的主张是对的，已被事实所证明。但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一切剥削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没有了的时候，是不是还要革命呢？还要革命的。《共产党宣言》说，在工人阶级专政建立起来之后，还要“不断革命”。这个“不断革命”，指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要对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进行改革，这种改革是工人阶级自党的改革，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自觉地进行的。我们今天的改革就是这种情况。但是1957年反右以后，随着对国际国内形势的

错误判断，改变了八大对“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左”倾思想逐步积累，升级为对各个领域进行“革命”。最后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怎样一个“革命”呢？是主观上臆造出一个“党内资产阶级”（或称“走资派”），对它实行“一个阶级打倒一个阶级”的革命，这就违反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马列主义认为资产阶级是最后一个剥削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之后，虽然还有“不断革命”，但是再没有一个阶级打倒一个阶级的革命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之后的“不断革命”，用不着由“造反派”来进行，而是由工人阶级自觉地进行，这将是和平地经过合法手段进行的，而不是用急风暴雨、群众斗争的方式进行的。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建立起来之后，“一个阶级打倒一个阶级的革命”是无理的，“造反”是有罪的，“天下大乱”是不容许的。不顾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建立起来这个事实，提倡“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天下大乱，越乱越好”等等，就与社会主义建设背道而驰，而且给林彪、江青这些反革命分子以可乘之机。在这些口号之下，不能不付出非常大的代价，也不能不延长我们学会经济建设的时间。

还有一点，就是个人崇拜和终身制。这是制度问题，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政党需要有领袖，没有领袖是不行的。全党还要尊重自己的领袖，不尊重自己的领袖，党没有战斗力，终究会散的。但是不能搞个人崇拜。不管怎么好的领袖，甚至像毛泽东这样领导我国人民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的杰出领袖，对他的敬重是应当的，对他崇拜就不对，就要犯错误，甚至付出极大的代价。敬重和崇拜怎么把握呢？这实在是个很难的问题，恐怕除了教育全党提高思想觉悟，就是真正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也同废除终

身制相关的。终身制也是不对的。学习马列主义，调查研究中国的具体情况，这要付出极大的精力。年岁大了，要三天三夜不睡觉，要一天走路二百里，究竟是办不到了。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看得很准，他提出了很多解决的办法，令人钦佩。

**访问者：**您认为，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是什么？

**陆定一：**就是我在前面说的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形成之后，马克思主义还在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真马克思主义同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假马克思主义的特征，是教条主义和迷信。真马克思主义的特征，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是调查研究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靠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不可能做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实际的具体的情况相结合。

我是够得上“四人帮”所说的“臭老九”资格的人。但是，我对于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长期并不懂得。多谢毛泽东同志，他说出了这就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我也很久不懂得教条主义同迷信的害处，不大清楚学习理论同教条主义的区别，服从党的纪律同迷信的区别，是经过了长期的实际经验和思考才懂得的。现在我把自己的认识，郑重地告诉同志们，希望今后少走弯路。

**访问者：**今年春天，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作了重要谈话，以他的谈话为契机，我国的改革开放又出现了一个蓬蓬勃勃的新局面。党的十四大以小平同志的讲话为指导，并肯定下来。所有这些您是怎么看的？

**陆定一：**小平同志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及时。在党的

历史上，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全国的指导地位，这是关系中国命运的两件大事情。十四大表明，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成熟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形成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完成这条路线，我们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到今年的十四大，用了14年。七大、十四大，二七一十四，很有意思的数字。有了这条路线，我们就可以把握前进的方向了。也许以后还有补充，还会有些改正，甚至还可能会出现曲折与反复，但根本的路线就是这些了。小平说，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依我看，一百年以后还要以它为依据，坚定地走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就大有希望。我是赶不上啦，你们好福气呀！这也是全国人民的福气。你们赶上了好时候，好好干吧！

1992年12月24日于北京医院

## 访逢先知——

### 关于毛泽东研究的几个问题

逢先知

逢先知，1929年生，山东胶县人。1950年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前后16年。“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8年后，到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工作，1980年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历任毛泽东研究组副组长、室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从事毛泽东生平、思想的研究和编辑工作。主编或参与主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毛泽东年谱》、《邓小平文选》等。发表的主要著作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等。

这篇谈话虽然长一些，但并不难读，因为都是毛泽东研究中的重大问题，相信读者会喜欢的。

### 如何评价中国 20 世纪的两场革命

访问者：江泽民同志1993年11月出访美洲国家时，多次向各国领导人讲到这样一个观点：我们为下一个世纪做点什么。关于世纪问题，将是今后一个时期人们谈论的热点。看

待这个问题固然要展望未来，但历史的进程是连续的，也就是说，新世纪总是从前一个世纪而来，正是前人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给开辟未来打下了基础。

中国的 20 世纪，至少有两件大事是和毛泽东联系在一起，一个是创建新中国，一个是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您如何评价在毛泽东领导下完成的这两件大事？

**逢先知：**创建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两件大事，分别是两种不同性质革命的结果：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由于这两种革命紧密相连，相隔时间很短，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一次革命，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的报告，实际上就是这样说的。这次革命的意义，我把它概括为三个结束、一个奠定。这就是：结束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受屈辱、受压迫、受剥削的历史；结束了旧中国四分五裂、贫困落后、民不聊生的黑暗历史；如果更长远地看，则是结束了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开辟了中国的新纪元。一个奠定，就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基础。

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站起来了，是一件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使世界力量对比起了很大变化。

**访问者：**那么，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指的什么？

**逢先知：**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点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第二次革命。关于两次革命，十四大报告是这样说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



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始的又一次伟大革命，是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过长期奋斗，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中国充分体现出来。”

两次革命代表了不同的时代，完成不同时代的任务。第一次革命，使中国变成一个独立、自由、统一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并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过艰苦的探索。这个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也发生过失误甚至严重错误。不论是积极的成果，还是严重的错误，都为第二次革命做了准备。邓小平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探索。他根据新时期的新情况，结合新的国际条件，成功地实现了第二次飞跃，指导第二次革命。毛泽东的探索虽然没有成功，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在探索中提出的许多有价值的、富有远见的思想以及这种探索精神的自身，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显得可贵。为什么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包括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变质了、解体了、演变了，而社会主义中国却屹立于世界东方，岿然不动？就是因为我们党不论是第一次革命还是第二次革命，都是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没有亦步亦趋地跟着苏联走，并且有自己正确的理论作指导，这是我们成功的重要条件和保证。

**访问者：**这两次革命，是不是有一个贯通在一起的东西呢？

**逢先知：**这就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把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两次革命的成功都充分证明了，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原理作指导，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制定自己的方针和政策，并形成新的理论。

就是说，它是马列主义的，又是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中国特色的，今天的改革开放更是具有中国特色。如果说有贯通的东西，我认为就在这里。

## 成功的秘诀

**访问者：**毛泽东的一生，无疑是伟大的，既有辉煌的成功，也有他晚年遗憾的失误。在您看来，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失误的原因又出在哪里？

**逢先知：**这个问题很大，也很重要。先谈他的成功，如果一般地讲，可以举出很多条，但最主要的是什么，就不能泛泛地罗列了。我认为有这么几条：

第一，是他能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是比较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人的领导而显出的最突出的特点。应当说，这几位早期领导人都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就出了名，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李立三也是优秀的。他们为什么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除了其他原因，主要是他们不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是囿于一般经验，就是从本本出发。王明更是如此。你们知道党的历史，在党的二大上就确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政策，还提出了革命分两步走。但确定了革命目标，并不等于就找到了革命道路。提出并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是毛泽东完成的。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注意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他思考问题的角度总是立足于中国，特别是当他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之后，更使他的这种个性特质发生了一个飞跃，这就是扎根中国实际，靠调查研究，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国情。

第二，善于听取党内外各种意见，择善而从之，也就是毛泽东的民主作风。在毛泽东身上的确充分体现了民主作风，或者说大部分时间是民主的。最显著的表现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什么只用了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打败了比我们的兵力强大得多的蒋介石？除了人心的向背等因素而外，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是关键。而他的正确领导同他的民主作风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善于吸收正确的意见，更善于根据各种不同的意见作出正确的决断。他的很多正确决策，包括一些重大决策，是吸收了下面指挥员的意见。比如，1948年初，解放战争将由相持阶段转变为进攻阶段，为了调动中原敌军回防江南，便于我军各个歼灭江北之敌，毛泽东决定由粟裕率三个纵队渡江南下，打到京沪杭地区。粟裕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和中央吸收了他的意见，仍留在中原作战。然后，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打了豫东战役，后来又打了济南战役，为淮海战役的大决战创造了条件。打淮海战役，毛泽东也是吸收了刘伯承、邓小平、粟裕等人一些意见，由小到大，取得了基本消灭蒋军主力于长江以北的大胜利。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期间写的一些电报中，经常询问下而的情况，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往往要征询下面的意见。

**访问者：**对错误的意见和主意，毛泽东是如何对待呢？

**逢先知：**对错误的意见，毛泽东主张也要听。你们都读过《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那里而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下而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对下而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提一下，就是毛泽东还

善于从群众的不满言论中吸取合理的内容，著名的例子，就是延安时期有雷击打死人的故事。当时一个农民发怨言，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毛泽东没有怪罪这个农民，反而从这里发现问题——农民的公粮负担过重，于是发动机关、部队搞生产，叫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小平同志非常称赞毛主席这一点，几十年后还用这个例子教育干部。

第三，是他善于团结人，包括团结那些反对他而反对错了的人。中国共产党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形成了许多山头。要把各个山头的人都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坚如钢铁，团结一致的党，是很不容易的。毛泽东做到了，做得非常出色。之所以能够如此，除了靠他的正确的思想、理论、政策作为统一全党思想的基础而外，在处理党内关系方面，他提出并实行了一整套正确的原则和方法，如团结——批评——团结，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等。经过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全党都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真是像第一个历史决议所说的那样，“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毛泽东不但善于团结党内的同志，也善于团结党外人士，作为共产党的领袖，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和个人，而把最主要的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毛泽东具有宽阔的胸怀和宏大的气度，这是他善于团结人，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重要的个人气质。

第四，是他具有科学远见。“预则立，不预则废”。毛泽东比别人高明的一点就是，他每走一步棋，还要看到第二步棋、第三步棋，甚至看得更远。军事上如此，政治上更是如此。抗日战争快要胜利了，他就想到城市工作问题，为筹划

下一步开辟的工作局面做准备。1945年1月，他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文中说：“我们要打击日本侵略者，并且还要准备攻入城市，收复失地。……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城市工作了。”

**访问者：**看来1944年8月他给秦邦宪的信不是偶然的。在那封信中，他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这个问题。

**逢先知：**绝不是偶然的。他还说：“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这些话讲得多好，多么富有远见，其理论价值也是很高的。1948年的九月会议，他就开始筹划新中国的蓝图，提出了关于国家体制、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等等问题。这是很不简单的，因为这时三大战役还没有开始。到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把建国纲领提出来了，还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问题、经济政策问题以及干部作风问题等等。所以我们在建国后的各项工作是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因为我们的建国纲领上都有了，从大政方针到具体政策，规定得很具体。这种科学的预见性，在毛泽东身上是很突出的。

**访问者：**你觉得，毛泽东的这个特点，是能学得来的吗？

**逢先知：**这里确有他个人的天分甚至说是天才的原因，但也不能把这个问题绝对化，那就陷入历史唯心主义了。我认为，他之所以能够做到，主要与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和掌握的丰富的历史知识、革命经验有关。比如，提出防止骄傲自满、警惕“糖衣炮弹”，不当李自成，这是从中国历史中汲取的经验，他对各个朝代的兴衰成败的历史非常熟悉。当然对这些经验，别人或许也知道，也懂得它的对与错，但提出

的时机和表达的方法会有大的不同，这又是他比常人高明的地方。“文化大革命”尽管根本错了，但他预见到社会主义国家会有和平演变，提出资本主义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一点是很有历史眼光的。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也曾讲到法国的历史，复辟反复辟，演了几百年，新的制度才定下来。毛泽东的这个预见现在应验了，苏联解体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了，而他讲这些话的时候苏联还那么强大，社会主义制度看起来还比较巩固。他还是看到了历史的反复，预见到了这种反复。

第五，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提出行动纲领和口号。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要取得成功，必须有正确的纲领和口号，不然就没有号召力，没有凝聚力，没有团结力。每到一个历史关头，毛泽东总能及时提出吸引全党奋斗的口号，如大革命刚刚失败，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后来又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工农革命”。抗战一开始，就提出“持久战”，他论述的持久战的三个阶段，几乎像自然科学家进行计算一样准确，为鼓舞全国人民团结抗战起了重大作用。在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进行斗争中，及时地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给人们指明了方向。抗战接近胜利的时候，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对于联合中间力量，孤立国民党主要当权派起了重要作用。解放战争时期，什么时候提打倒蒋介石也是一个非常策略的问题，提早了，由于人民特别是中间力量对蒋介石的真面目还不清楚，会脱离群众。到1947年10月才明确提出这个口号，时机抓得非常好，对于团结人民、动员人民起了很大的作用。

**访问者：**像“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样的口号，不仅内容深刻、明确，而且形式也

很好，至今还常常为人们所传诵。

**逢先知：**他使用的语言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又很容易记。内容则概括得非常准确、科学。

建国以后也是如此。在不同的时期，根据不同的任务，提出过许多很好很正确的口号和概念。我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是我亲身感受的。1961年毛泽东组织三个调查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广东做农村调查，我也参加了。毛泽东根据大家提供的大量调查材料，在广州会议上概括出反对两个平均主义（即反对人与人之间、队与队之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使人们的思路豁然开朗。当时，那么多人到农村调查，谁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我们看问题不能离开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毛泽东确有这个本领，一下子就能抓到问题的实质，打开人们的思想。他的高度概括能力和善于抓住事物本质的洞察能力不能不使人钦佩。

**访问者：**前面我们在讨论他的科学预见性时，您谈到天分问题，他的这种高度概括能力和洞察能力，也不应仅仅看作是天分。

**逢先知：**这就涉及我要说的第六点，毛泽东的刻苦勤奋精神。从青年时代起，一直到他的晚年，他工作起来常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问题不解决总是放不下。刻苦的读书生活也伴随了他的一生。他不但勤于学习，更勤于思索。他常说“多想出智慧”。古语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是又学又思。他的刻苦精神一般人比不上。而且他还会读书，会用脑筋。读文件累了，就换本书读，当作休息。他说，从脑力劳动到体力活动是休息，从读这本书到读另一本书也是休息。他的概括能力、抽象能力，就是从勤于读书，特别

是读哲学书，从勤于思考，锻炼出来的。所以不要简单地认为毛泽东就是天才，岂不知他的渊博学识和智慧是从刻苦勤奋中得来的。

**访问者：**就是说，有天赋，再加上后天的勤奋努力，包括在革命实践中的磨练，才成就了毛泽东。

**逢先知：**应该这样看。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都有体会，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有一次，周恩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报告，陈赓坐在边上，当周副主席讲到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贡献时，陈赓插话，问：“毛主席记忆力那么好的秘密是什么？”这时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想听周恩来的回答，停了停，周恩来说了两个字：“死记。”我想，这就是勤奋。毛泽东的超人的记忆力，既有先天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后天努力的结果。

以上是我个人的看法，所谓毛泽东成功的秘诀，这六点也不一定概括得完全、准确，各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会有不同的角度。总之我相信邓小平的话：“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的成功，不应简单地看作他个人事业的成功，而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事业的成功。

## 晚年失误的原因

**访问者：**那么，毛泽东晚年的失误都有哪些原因？

**逢先知：**毛泽东晚年的失误的确是使人痛心的，但又不是偶然的。我认为最主要的是三条。

第一，他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脱离了他创立和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及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十分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且身体力行，



亲自做调查，因此，他才获得了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但从50年代末期以后，这个优点在他身上渐渐减少了，甚至违反了这些东西。1958年的“大跃进”为什么犯那么大的错误，虽与他思想上的空想成分有关，但脱离实际是主要原因，如果他能到农村去了解真实情况，是不会作出那样的决策的。当时他派我们下去，我们亲眼看到农村里，生产是大兵团作战，通宵达旦地干，生活是吃大锅饭，男女分开住，这怎么行？但这些实际情况毛泽东看不到，他只要一下去就被人群包围了。到天津视察时就被人群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在这种情况下，他搞调查研究确实受到很大限制。

**访问者：**是不是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比如保卫制度不允许？

**逢先知：**制度是一个方面，关键还是他有没有决心。他自己讲过，进城后，官做大了，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做那样的调查没有了。1962年派我们到韶山调查，他是准备去的，但终究没有去。解放以后他就没有到农村中做过直接调查，更没有在农村住过。他每次下去，都是省委书记陪着，听汇报、调查的对象不是地委书记，就是县委书记，这怎么能了解到真实情况？不脱离实际才怪。所以，造成那么大的损失，出现那么大的失误，脱离实际是主要的。

有人写这段历史，把他说成是空想主义者，我不赞成。搞人民公社，确实带有空想的成分。对这个问题也要作点分析。当年提倡农村人民公社办工业、办商业，搞工农商学兵于一体，不能说没有一点合理的成分。我们今天的农村乡镇也是工农商学兵一起搞，不光有农业，还搞工业、商业、第三产业，办学校等等。现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苏南，许多乡镇企业，就是由过去的社队企业转化而发展起来的。但

那时脱离了生产力水平，搞的是政社合一的公社体制。特别是在开始搞公社化那阵子，搞一大二公，的确吃了苦头。“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甚至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确实完全是空想的。但从1958年冬，毛泽东即发现错误，并且费很大力气，去纠正错误。从1959年起，不断提出下放核算单位，先是下放到一个乡范围的生产大队，再下放到一个行政村、一个自然村范围的生产大队，最后是二三十户规模的生产队。广州会议时，他曾经批了一个主张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材料，但是没有引起注意，为此，他很不高兴。

另外，到他的晚年，年龄大了，很多人又都是顺着他讲，这也是脱离实际的一个原因。

**访问者：**陆定一同志讲，能不能坚持调查研究，确实也和年龄有关系，至少年纪大了，跑路也跑不动了。

**逢先知：**那时我们到南方去调查，天气很冷，有时住草棚子，这种条件，让毛泽东去他会吃不消，组织上也不会那样安排。因此，他在早年曾经用过的，很自然地找几个农民，像拉家常那样的形式，很难做到了。他了解情况，不是看报告，就是听汇报，而这些又有相当成分是在看他的脸色行事，喜欢什么给什么，强调阶级斗争了，马上就来阶级斗争的材料，强调生产了，又报来关于生产的材料。长此以往，不出问题才怪。这是第一点。

第二，是专断，听不得不同意见。前而我在讲他成功的第二条，是尊重各种意见，善于从群众的呼声中找出我们政策的出发点，这本是他的好作风，后来走向了反而，破坏了党内民主，一言堂而不是群言堂，最后导致犯错误。

**访问者：**他的专断和民主作风的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开

始的？

**逢先知：**按胡乔木同志讲，是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批评“反冒进”开始。但这不是一下子形成的，有一个过程，1958年南宁会议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3月的成都会议还算开得生动活泼，但到1959年庐山会议又来了一个升级，以后专断就占了主导地位。因此，他脱离实际是一步一步发展的，听不得不同意见而导致专断也是一步一步发展的。

**访问者：**有人认为，庐山会议彭老总那种提意见的方式也有不好的一面，如果换一种较为和缓的方式，后来的结果可能不一样，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逢先知：**过去乔木同志也讲过，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用那样一种态度提意见，确有不妥之处，如果是当面的心平气和地讲，不用赌气，情况也许不同一些。我看有一定的道理。当然，这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那时党内很多人对“三面红旗”有意见，持不同意见的材料也陆续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彭德怀只是一个代表，即使不是他出来讲，总会有人出来讲，当然不至于出现那样尖锐的形式。另外，国际上出现的赫鲁晓夫全而否定斯大林以及引起的一股反共思潮，对毛泽东走向“左”的方面影响很大。在那种环境下，他不能不想到我们党，不能不维护他提出的一套在他看来是正确的东西，因此，出现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的那种结局也是必然的了。

尽管如此，还要看到，毛泽东晚年的指导思想是在一定范围内偏离了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全部，如果是全部，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那还不把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搞垮了？特别是在国际斗争中，他维护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并利用国际形势变化的时机，打开了中美、

中日关系，创造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这一点要充分估计到。

**访问者：**我们想再问一个问题，毛泽东的失误，从他的思维方式角度看，是不是也有什么原因呢？

**逢先知：**在回答你们的提问之前，我再补充一点，讲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又一个原因。毛泽东在晚年不能很好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和应该团结的人，像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那样，相反，在几次政治运动中（最突出的是1957年的反右和1959年的反右倾），伤害和打击了许多人，或看是反右扩大化了，或者是根本不该反右面反右。在党内如此，对党外也是如此。以后搞“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更发展到了极端。我认为，不能很好地团结越来越多的人，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失误，又是失误的一个原因。你们看，以上讲的三个失误的原因，恰恰是他三个成功秘诀的反面。他的失误，正是违反了他过去一贯坚持的一些正确的东西。

现在，回过头来，回答你们提的问题。毛泽东的晚年，在思想方法上有极端化的倾向，极端化也是思想僵化的一种表现。他原来的辩证法讲得多么好，不仅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这样的著作，而且把唯物辩证法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运用得非常精当，非常纯熟。例如，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又联合又斗争”的总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反顽斗争中，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军事斗争中，提出“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的战略方针。在一般的斗争策略上，提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他独创的。另外，不知你们注意到没有，延安时期他曾肯定过孔子的“中庸”的概念。

**访问者：**这是他在1939年给张闻天等人的信中讲的，认

为中庸的“过犹不及”“不偏不倚”是“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不是折衷主义。

**逢先知：**是这样。但到了晚年，他的思想方法确实出现了极端化，不大讲统一，过分强调斗争，强调斗争是绝对的，以至于说出“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一类的话。有人提出“合二而一”的哲学概念，就说是“阶级调和论”。这种倾向的产生，从深处说，有思想惯性的作用。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长期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使他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建国后，他从理论到实践，正确地实行过由阶级斗争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是不牢固的，一遇风吹草动，他马上警觉起来，过分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把阶级斗争这个弦绷得很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曲折，1957年虽然讲了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到1958年又提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技术革命，提出超英赶美。“大跃进”失败了，党内出现分歧，他又回到阶级斗争的思路。最后终于导致错误趋向压倒正确趋向，晚年的悲剧就发生了。

##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 理解上的相同和差异

**访问者：**上而您给我们谈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上的成功和失误，以及成功和失误的原因，很受启发。那么，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以及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毛泽东和邓小平有区别和差异吗？

**逢先知：**首先应当肯定，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应当是生产力高度发达，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全民的共

同富裕，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不能说毛泽东不重视发展生产。早在延安时期他就非常重视革命根据地的生产建设，在1942年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他作了《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把生产事业看作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之一。特别是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把“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作为判断“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的标志。这就是生产力标准。到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工作重心转移，由农村到城市，在城市工作中又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建国以后，尽快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他提出并努力为之奋斗的。直到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还明确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但是从1957年夏季起，他的这个思想骤然起了变化，由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转到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放到次要地位。这中间尽管有些反复，总的趋势就是这么个趋势。搞“文化大革命”就到了极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领导全党实行拨乱反正，是根本的一条就是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说，我们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主要是指五十年代末期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而否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要说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什么不同，这应当是最重要的一条。其次，在社会经济形态问题上，毛泽

东强调实行单一的公有制；邓小平则强调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适当发展个体的、私营的、中外合资的多种经济成分以为补充。在经济体制方面，毛泽东基本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同苏联有某些区别）；邓小平主张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而又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毛泽东还不够开放，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封闭；邓小平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

这里，我想着重谈谈他们怎样对待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对于毛泽东来说，如果把发展生产和实现社会公平比作天平上的两端的话，那么，他的砝码总是更多地加在后一方面。就是说，在处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的时候，毛泽东更强调公平，有时为了社会公平，甚至可以牺牲效率。拿包产到户来说，这种形式明显对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但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他尖锐批评包产到户，认为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不到一年，就可以看出阶级分化很厉害。他希望什么呢？希望大多数人都过着较为平均的生活，不要贫富悬殊，大家同步达到富裕。这个愿望是无可非议的。但事实证明，同步富裕和平均发展都不可能，结果是平均主义，这是一条发展缓慢的道路。

**访问者：**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同毛泽东有什么侧重的不同吗？

**逢先知：**小平同志也强调共同富裕。他把共同富裕有时叫做社会主义的目的，有时叫做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有时叫做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他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他在南方谈话中还讲到：“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

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那么，怎样达到共同富裕呢？小平同志提出一个新路子、新办法，这就是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人、其他地区达到共同富裕。小平同志把这个叫做大政策。的确，这个政策一实行，经济就活了，被平均主义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压抑的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调动起来了，被发挥出来了，人们的聪明才智也显露出来了。当然，实行这个政策，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贫富差距会有暂时拉大的趋势，但它终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共同富裕。

**访问者：**毛泽东在对待公平和效率问题上的态度，是不是有他自身经历的或其他方面的原因呢？

**逢先知：**当然有。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耳闻目睹广大贫苦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苦难生活，从小就对贫苦农民给予极大的同情，产生对贫苦农民的深厚感情，对土豪劣绅，对剥削制度和一切不公正的社会现象深恶痛绝。他17岁那年，长沙饥民造反惨遭镇压，曾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他一生就是要追求一个公平的、人人完全平等的理想社会。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他曾说：“完全不要一点平均主义，比方说，不要基本口粮，不要照顾，光搞按劳分配，光争取富裕阶层，可是把农村的五保户、困难户、军工烈属这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人，丢开不管，也是不行的。这些人在农村中是我们的依靠。”毛泽东在他的晚年，一方面反对平均主义，主张实行按劳分配，以便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而又不彻底反对平均主义，甚至主张搞点平均主义，不彻底实行按劳分配，甚至批判或者限制按劳分配，怕的是发生“阶级分化”。他是想寻找一个既能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以利于



发展生产，又能防止“阶级分化”，保证“社会公平”、人人完全平等的结合点。

**访问者：**这个结合点他始终没有找到，甚至可以说，为了找到这个结合点，走入了歧途。

**逢先知：**他主观上是要找到这样一个结合点，但实际上走上了平均主义的道路，影响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带领下，首先在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进而确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同时，又强调国家的宏观调控，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目的。这样，既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同时又避免无政府状态、避免两极分化。尽管现实生活中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只要全面地准确地遵照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去做，去认真地贯彻落实，毛泽东所希望的、也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一个富裕的民主的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定能够实现。

## 把毛泽东思想研究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访问者：**1993年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有关毛泽东的研究、宣传与纪念活动也走向了高潮。以后将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会不会出现低潮？

**逢先知：**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不仅影响中国，也影响世界。在他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对他的纪念，是空前的。高潮的结束，决不意味着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随着高潮的过去而进入低潮，应把这次纪念活动（包括全国毛泽东生平思想研讨会的举行）看作是一个新起点。当然，对他的宣传，不一定也不会总是保持在这么一个规模上，但对他的研

究会延续下去、深入下去。毛泽东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是大有研究的。有人说，近代中国有三个为解放和振兴中华民族做出巨大贡献的最伟大的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也有人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有两个划时代的大思想家，这就是孔夫子和毛泽东。这两种说法我认为都很有见地。不管是从中国近代史这个角度，还是从中国几千年历史这个角度，毛泽东都占有突出的历史地位。孔夫子到现在已有两千四百多年，他的思想至今还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影响着人们。毛泽东这样一个人物，他的思想也会深远地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大量文稿，是一个大宝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陆续公布了一些，在纪念他诞辰百周年期间更集中地出版和公布了他的大量著作和其他材料。

**访问者：**光近期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年谱》等就有好几百万字。

**逢先知：**这就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材料。消化这些材料要有一个过程，消化的结果可能会在半年、一年之后表现出来。学术界对孔子的研究经久不衰，对他的思想至今还没有完全研究透彻。对孔子的研究尚且如此，对毛泽东的研究难道会冷落下来、会中断下来吗？显然不会的，我想，同样会经久不衰地继续研究下去。另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我们对小平同志的理论越是进行深入研究，越感到有必要研究毛泽东。在对邓小平的不断研究中，人们必然会追溯到毛泽东那里。反过来说，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也必须研究邓小平，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能只停留在毛泽东那里，这是因为邓小平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所以，我一

直主张把他们联系起来研究。

**访问者：**如果说对毛泽东的研究不会中断，那么对毛泽东的宣传势头会不会减弱呢？

**逢先知：**前面我已经说过，宣传活动不一定总像百周年纪念那样。我想，今后的宣传，一定要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没有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厚的研究基础，宣传就没有力量，就比较肤浅。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才能用活它，宣传才能深入人心。这同样对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我们大家都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对毛泽东思想总是常学常新，常研常新。毛泽东的科学著作，理论水平高，又很管用，特别是关于方法论的部分。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积累了新经验，大家的眼界开阔了，进入了新的思想境界，这样，再去阅读那些科学著作，一定会有新的认识、新的见解，受到新的启发。我想，你们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吧。

1994年1月7日于北京前毛家湾

# 访龚育之——

## 两场革命·两次飞跃· 两大理论成果

龚育之

龚育之，籍贯湖南长沙，1929年生于湘潭。曾任中共中央毛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现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常委、中央文献研究室兼任研究员，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党的文献编辑工作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工作。主持编著《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出版的著作有《在历史的转折中》、《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解放的新起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读邓小平著作的笔记》等。

这样一个题目找谁呢？我们找了龚育之，他欣然应允，话匣子一打开，洋洋洒洒，感慨万千。这时离小平同志南巡后不到半年，听说十四大报告正在起草中……

**访问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邓小平同志的带领下，努力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一套新的理论，这套新的理论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开创的理论之间是什么关系？请就您的研究和体会给我们谈一谈。

**龚育之：**我们现在讲中国共产党历史，讲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史，通常都是把它划分为两大段，一个是民主革命时期，一个是社会主义时期。民主革命时期又分为五小段：五四运动和党的成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社会主义时期又分为四小段：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文革”结束以后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就是按这个划分来写的，相应地写了九章。

在这本书写作过程中，胡绳同志同我们一起议论，提出过这样一种意见，即在党的历史时期的划分上，应该更加突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就是说，如果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可以考虑把党的整个历史划分为三大时期，党史教科书分为三大篇：第一篇为民主革命篇，写党领导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其间经历两次大的曲折，遵义会议以后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最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胜利而告结束。第二篇为社会主义前篇，写建国以后党领导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中间又经历两次大的曲折，最后以粉碎“四人帮”、终止“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而告结束。第三篇为社会主义新篇，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现在还很难说。也许是到本世纪末，也许要到下世纪20年代建党100周年的时

候。小平同志今年初在南方谈话中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也许要到下世纪中建国 100 周年的时候，那时，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比较发达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伟大国家。

**访问者：**这就是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历史时期，是一个全新的、很重要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龚育之：**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应当被看作党史上一个大阶段、一个新时期的开始，而不只是建国以后这个大阶段里的第四个小阶段。《七十年》一书还没有分三篇来写，但在后记中讲了这个观点。去年我在中国现代史学会在遵义召开的讨论会上也讲了这个观点。

现在，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考虑从“第二次革命”的观点来观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小平同志曾经多次讲过：“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直接提出这个命题，是在 1985 年。从思路来说，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里已经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小平同志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其中也讲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这次全会前夕，他在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也讲了：“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

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可见，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小平同志，我们党中央，就从现代化和改革相统一的视角，提出了新的革命、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问题。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起点。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更高、更大的跨度上来概括我们党71年的历史：两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了两次伟大的革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国的第一次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开始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即为了实现现代化而进行深刻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访问者：**这套理论现在还不好说完全成熟了吧？

**龚育之：**是的。但是，应当承认，这套理论已经开始形成。十三大报告的估价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提出一系列科学的理论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轮廓”已经构成，这个估价是有分量、有分寸的。今年初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又进一步用新的观点、新的发挥把这个理论提高到新的水平。

**访问者：**“两”代领导，“两”场革命，“两”次飞跃，

“两”大理论成果，这样几个“两”，是不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总体进程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同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

**龚育之：**还要进一步分析一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和实践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呢？我强调要讲三条，即纠正、继承和发展。讲一条不行，讲两条也不行，必须讲三条。第一条是纠正，纠正毛泽东晚年理论和实践的错误。

**访问者：**您最近发表的《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在说到这个关系时，是先讲继承这一条。

**龚育之：**那也是一种写法。那种写法的目的，是强调我们党领导的事业的连续性和继承性。而从历史转折进程的实感来讲，第一条当然是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因为这里有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我国人民遭到那么大的伤害，党和国家陷入困境和危难。从“文革”的错误中走出来，是进入新时期的前提。粉碎“四人帮”，开始了历史的转折。但是，最初两年，历史转折的进程遇到了困难。关键就在于有没有勇气、魄力和本领正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处理好既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又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两个“凡是”，出现“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归根结底，就因为那时的中央领导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缺乏扭转和把握历史舵轮的魄力和本领。你说他当时就不想解决一点问题？还是想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被抓的那些人还是放了嘛。但是要给由毛泽东定性的天安门事件平反，说它不是反革命的，而是革命的，那就没有这个勇气和魄力了。还有，在“落实干



部政策”的题目下，解放干部，多少改善一点被打击的干部的处境，还是可以做的，但是，碰到由毛泽东定案的大的问题，要作为冤假错案来平反，就没有这个勇气和魄力了。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看来，如果指出和纠正这些大的错误，毛泽东的旗子就丢了，刀子就丢了。就是说，在纠正错误和高举旗子之间搞了个简单化的对立——要高举旗子就不能纠正错误，纠正错误就会丢掉旗子。

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魄力和本领就显示出来了。小平同志敢于明确地指出和坚决地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且强调只有纠正这些错误才能真正举起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旗帜。当然，讲错误，什么时候讲到什么程度，这要看情况。一开始讲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片言只语不代表毛泽东思想；后来才讲“文革”的理论和实践根本上是错误的，这就不只是片言只语的问题了。这里既有认识的过程，也有引导的艺术。遵义会议纠正当时中央领导的错误，最初也只讲军事路线错了，后来才逐渐指出王明的整个路线错了。我这样说，只是为了说明清理错误要有个过程，决不是把王明同毛泽东相比。王明根本不能同毛泽东相比，且不说王明后来的演变，在历史上他也说不上有什么功绩。毛泽东就不同了，他对党、对中国革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有那么大的历史功绩，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的结合有那么大的创造，他的问题是在晚年发动“文革”，离开了他自己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路线。所以，新时期要从纠正“文革”的错误开始，从“拨乱”开始。小平同志给“拨乱反正”下的定义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第二条，就是继承。“反正”就是继承。拨乱，纠正错误，决不是全盘推翻过去，决不能否定已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东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小平同志就提出我们党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第四项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中国革命实践证明为科学原理的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所积累的一切积极的思想成果，今天都必须继承和坚持。没有这个继承的关系，就否定和割断了历史，就会丧失我们的基本立足点，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

**访问者：**我们看到一些材料，说当时有一股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思潮，后来黄克诚同志出来讲话，发表了文章。小平同志主持起草历史决议，要求全面评价毛泽东，要求在历史决议中专门写一章“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当时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是有那么厉害吗？

**龚育之：**要分几个层次、几个范围。一个是来自国外、来自港台、来自社会上的某些议论，那是很强烈的，就是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以至于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另一个是党内的某些议论，尽管有的语言也很偏激，有的意见也很错误，究竟同前面那种性质不同。不过，对待历史问题不是采取分析的态度，而是采取激愤的、绝对化的态度，那是不足取的。小平同志在主持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中讲了许多话，批评和拒绝了某些观点，是有针对性的。此外，有些搞理论的人主张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认为如果用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一种思想，就应当把毛泽东的“左”的错误也算在内，如果错的不算，只算正确的，他们认为讲不通。这种观点，我是不赞成的。我认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我们党用了这么多年，现在一笔勾销，政治上不利，也

不合乎历史。而又合乎历史，又合乎科学的态度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科学的理论成果。难道能够否认这个事实吗？至于这个理论成果用什么名称来称呼，倒是第二位的问题。既然过去已经用毛泽东思想来称呼这个理论成果，而毛泽东的确在创造这个理论成果中做出了最大贡献，现在就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取消这个称呼。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根据实践来检验过去的许多观点，看哪些是被实践证明为科学的，哪些是被实践证明为错误的，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所创造的科学的理论成果称之为毛泽东思想，把它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当然，在讨论历史问题的过程中，有同志提出那样的意见和主张，不好说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可能是在斟酌怎么处理这个复杂问题时的一种不成熟的思考，而在处理复杂问题时作种种思考，是正常的。在历史决议通过后，遵守历史决议，不再宣传那样的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就不是什么问题。

这些说的是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在我们明确指出和坚决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时候，的确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即是不是能够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成果和科学理论成果。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把握不住，坚持不住，发生动摇，那么，我们党的整个历史就可能被否定，我们党的整个立足点就可能被动摇。苏联出现的情况不就是前车之鉴吗？全盘否定斯大林，我们党历来不赞成；进一步否定列宁，否定整个苏联历史和十月革命，结果如何，不是很清楚了吗？毛泽东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的地位，相当于苏联历史上的列宁加斯大林。斯大林的错误和黑暗必须否定，但是斯大林也有功绩，也有光明，不能全盘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更不能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必须否定，

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成果决不能否定。对待党的历史，人民革命的历史，必须采取科学的分析的态度，决不可以一笔抹煞，决不可以因为要纠正这个历史进程中发生的错误而全盘否定它的基本成果，当然也不能因为要维护它的基本成果而没有魄力去纠正错误。必须看清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是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也就全盘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现在国外有些人就是整个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国内也不是没有这种思潮的影响。而且有些人不光否定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也否定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不光否定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否定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这也是毫不足怪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本来就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继承和推进。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座谈会，一位年轻人说，中国搞现代化，最有希望的时候是慈禧太后、袁世凯那个时候，坏就坏在辛亥革命把中国搞乱了。我听了，真是大吃一惊。

**访问者：**他们认为洋务派是对的。

**龚育之：**对洋务派的历史评价，也许还有需要讨论的地方，过去可能有评价不足的方面。但是，认为只有慈禧太后加袁世凯，中国才能搞成现代化，这真是匪夷所思！否定革命在历史上的作用，这是一股世界性的思潮。他们认为革命不好，革命只能造成动乱，动乱只能造成破坏。他们不了解革命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不可避免性，不承认革命为历史进步打开闸门的伟大推动力。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政党，当然拒绝这种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了解近代中国人民的深重

苦难、尊重近代中国人民的革命选择的人们，也当然拒绝这种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而要肯定、要坚持中国人民革命的基本成果，就必须肯定作为中国人民革命领袖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和坚持为中国革命实践证明为科学真理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

1983年《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时候，我给《人民日报》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其中写道：“在如何对待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我们党的政治勇气和领导能力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在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经过“文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还在坚持“两个凡是”的情况下，小平同志毅然出来说：“两个凡是”不合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而且是重大错误。这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很大的政治勇气。在纠正这种错误的时候，出现了怀疑和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小平同志又站出来，“力排众议”（“力排众议”这个词我没有写进文章中去），要求全党必须旗帜鲜明地肯定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成果，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所谓“力排众议”这个“众”，当然不是“大众”，不是广大人民群众，也不是党员的大多数。党内的大多数和人民的大多数是赞成小平同志这种主张的，这种主张并不孤立。但是，也的确是“众”，是“小众”，因为当时确实有相当一些人不赞成，或不很赞成、不全赞成，并不只是个别人的无足轻重的意见。所以要“力排”。“力排”这样的“众议”，也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很大的政治勇气。这两个方面的政治勇气是在巨大的历史转折的环境中显示出来的。由于小平同志在这两个方面的政治勇气，使我们党在这样巨大的历史转

折中转得比较顺当，比较平稳，比较健康。没有第一条，就无所谓历史转折，或许还是在原路上徘徊；没有第二条，转折就可能转不好，转成混乱，那些完全离开革命轨道的东西就会泛滥起来。这两方面又都面对一种相当强烈的潮流，都需要有很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需要有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掌握住历史的舵轮。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我们的确感觉到了掌舵是什么意思和分量。

**访问者：**这就是伟人的魅力，寻常人做不到的。

**龚育之：**面且还要说出道理。魅力、威信，加上道理，道理就是理论。小平同志处在有影响的地位，又有这样的魄力和魅力，又讲出了一番道理，同全党一起讨论，集中全党智慧，不仅破除了“两个凡是”的禁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且对毛泽东思想加以科学的解释，对历史是非作出科学的判断，对今后的道路作出科学的规划。这就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历史背景。

**访问者：**《历史决议》是在邓小平领导下制定和通过的，集中了我们全党的智慧。但有种观点认为，《历史决议》是一时需要的产物，政治妥协的产物。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龚育之：**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这个决议是科学研究的产物，是全党讨论、民主集中的产物。当然不是说这个历史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科学认识已经达到绝对完善，不需要也不能够发展了，那样的东西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但是我的确认为这个决议是认真的，是根据事实努力用科学态度来对待历史问题的，决不是简单的一时的需要和政治妥协的产物。我认为，宣传这种观点就为两种思潮开了门。一种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在这种思潮下，把历史决

议说成是一时需要和政治妥协的产物，就是为了动摇这个决议，以便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成果。另一种是“左”的思潮，认为作决议时的那种情况，困难甚多，积怨甚多，所以着重讲错误，光注意“病理解剖”，结果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说重了，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说重了，现在看来否定过多，主张要恢复。恢复什么呢？说到底，就是想恢复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东西。这两种思潮来自不同的方向，却走到一个共同点，即认为《历史决议》不是科学认识的产物，因此都想动摇决议。

**访问者：**这就是您在马鞍山会议（第五次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上提出要维护《历史决议》的权威性的由来吧？

**龚育之：**我认为，讲《历史决议》的权威性包括两条，一条是组织权威，一条是科学权威，这两种权威相结合，才是最大的权威。光讲组织权威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的党是追求和服从科学真理的党，党的每个决议都具有组织权威，决议通过以后，如果发现有不妥当的地方，不合乎科学真理的地方终归还是要加以改正。

**访问者：**改正也要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

**龚育之：**对，组织权威就包含这个意思。组织权威并不能保证党的决议必定是科学的、正确的。但是，党的决议所确定的观点，即使错了，或者你认为它错了，也得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由党组织作出新的决议，才能改变。不通过组织程序，随便讲一通违背党的决议的观点，就破坏了纪律，破坏了组织权威。当然，归根到底，组织权威应该是由科学权威来支持的权威。如果没有科学权威的支持，不合乎科学真理，组织权威终归站不住脚，组织决议终究要改变。而《历史决议》，我认为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决议，是有科学权威支

持的组织权威，有组织权威支持的科学权威。动摇这个决议，既违背组织纪律，又违背科学真理。

**访问者：**前不久我们访问金春明教授，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特别提到您的这个观点。

**龚育之：**当时为什么非作历史决议不可？就是需要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是非作结论嘛。要把“文革”在根本上是错误的这个结论，判断下来，确定下来，在党内取得一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两个凡是”首先和主要的是三件事：一个天安门事件，一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文化大革命”，宣布这三件事情不能动，因为都是毛主席定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两个凡是”，把头两件事情解决了，但第三件事情，“文革”的是非，当时还搁着，没有解决。后来作《历史决议》解决了第三件事情，明确指出了“文革”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根本错误，分析了导致“文革”的“左”的错误的由来和发展。这样，可以说基本问题都解决了。剩下一些比较次要的，没有那么大的全国影响的问题，比如说电影《武训传》批判这样的问题，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和方式去解决。

所以，《历史决议》一是拨乱，就是明确判断和彻底纠正“文革”的错误；一是反正，就是在纠正错误的同时，肯定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基本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历史决议》通过后，党中央宣布：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任务，基本完成。

**访问者：**从新时期党的事业的发展来说，只有这两条似乎还不够。

**龚育之：**只有拨乱、反正这两条，还是在毛泽东的理论



和实践的范围之内，无非是根据实践检验，将其中的错误的东西改过来，正确的东西坚持下来。新时期还要创新。

**访问者：**这就是您讲的第三条，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这层关系？

**龚育之：**纠正，继承，发展，这三条，头两条的组合，就是拨乱反正，后两条的组合，就是继往开来。全面改革，就是开来，就是开拓，创新，发展。新时期遇到许多新问题。所谓新问题，就是毛泽东的时候没有面对过的新形势、新需要所产生的许多问题，或是毛泽东的时候已经接触到但是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从内政到外交，改革开放遇到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创造性地去加以解决。开拓、创新的问题，这不止是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范围内分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就能解决。正确地认识和创造性地解决新形势下的新问题，需要使毛泽东思想得到新发展。

**访问者：**经过近十年的探索，到十三大时，对理论上的新发展概括了十几条。

**龚育之：**十三大概括了十二个科学理论观点。当然还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归纳和概括方法。总之理论上确实有许多新的东西。十三大已经讲了，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访问者：**现在理论界有人主张把这些新发展称为邓小平思想。

**龚育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理论上的确有了新的发展。如实地了解和承认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它既是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又是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继承，同时又在新时期面对新形势解决新问题有了新发展。

**访问者：**即是说已经形成一个新的理论的框架了。

龚育之：或者说，已经开始形成。至于用个什么概念、语言来概括，这要中央下决断。十三大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提法。今年初小平同志的谈话中，我看到的党中央的文献，有提“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的，有提“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进一步突出了小平同志在这个理论的创立中的地位。我看，这样的提法很好。缺点是作为一个术语，长了一点。好处是突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主要内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为什么要单独用一个概念来概括它？就是因为它不只是在毛泽东同志已有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增加了几点枝节的东西，而是相当的重大阶段的前进，有一系列新的探索，新的开拓，新的创造，开始形成了一整套新的理论，所以要有新的概括。

党的七大时候，确认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用它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那时产生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同志当时接受了这个提法，又说明，只是把他做个代表，并不是说他都正确。后来有人建议提“毛泽东主义”，他不同意，为此专门有一个电报给吴玉章同志，《毛泽东书信选集》上登了这个电报。建国初期，由于一些原因，一度规定不再提“毛泽东思想”。党的三十周年纪念时的一篇文章，原来题为《论毛泽东思想》，后来重版后改题为《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八大党章也没有用“毛泽东思想”。再以后，中央决定还是提毛泽东思想，在那时确定的毛泽东思想的定义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它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总之，这样的事要由中央从政治上考虑和决策，不单

纯是理论问题、学术问题。

我觉得，一方面，的确需要有一个新概括，因为开始形成了新理论。另一方面，同“七大”时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新概括，并不是不要马列主义一样，现在提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新概括，也并不是不要毛泽东思想。从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中可以找到新理论的根源和准备，存在着贯通起来的精神，这些贯通起来的精神表明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同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继承和发展。

**访问者：**刚才您谈到贯通起来的精神，这是不是说，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身上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呢？

**龚育之：**对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一番历史的比较的研究，我看是很有意思、很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强调“实事求是”是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小平同志讲毛泽东思想，讲得最多的就是实事求是。他认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自己说，我就是实事求是派。这次他在南方谈话中又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就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有人不大赞成这个提法，认为毛泽东的著作好几本，讲了那么多政治理论、军事理论、文化思想……，怎么可以只讲“实事求是”四个字呢？其实，毛泽东思想其所以在政治、军事、文化……方面有那么多适合中国情况的创造，根源就在于他能够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结合起来，而不是照搬本本和外国。小平同志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要我们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根据新的情况，自己去创造新的理论。

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渊源，当然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他们当年得出了许多具体结论，从那时到现在，经过了一百几十年，情况的变化是很大的。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的，不能要求马克思提供具体结论解决他去世之后成百年、成千年所产生的问题。列宁也同样不能承担他不在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出现的事情。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扬马列主义。这是他在1989年5月的一次谈话中说的。如果后人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只限在前人的具体结论的框子里，就会束缚住自己的头脑和手脚。还是当年毛泽东批评教条主义时讲的，不是照搬具体结论，而是要掌握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这个方法面对中国实际，解决新问题。前人的科学成果要学习，也要研究，不能没有知识。归根结底，要拿到今天的客观实际中去运用，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关于社会主义的具体结论，一是苏联提供的模式，一是毛泽东后期的设想。小平同志不因袭这些，而是抓住实事求是的精神，把所有过去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具体结论，重新拿到实践、拿到时代发展中去检验，这样他才能有创新，才能有突破思想樊笼的巨大的政治勇气 and 理论勇气，从而开创出这十几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又比如，邓小平和毛泽东，作为战略家，也有很大的共同点。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到农村去建立革命的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开辟这样一条道路，是非常艰难的，首先就难在它是一条新路，不是传统的路，不是俄国革命已经走过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走到农村去，似乎脱离了工人阶级，脱离了马

克思主义。其实，恰恰是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反动统治力量较为薄弱的农村找到了突破口，开辟了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农民结成同盟以发展自己的力量道路。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农村和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始终占有中心地位。今天邓小平领导中国的改革，在他的战略思想中，农村和农民在中国改革中也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不大赞同沿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提法来形容今天的改革，因为革命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是两种政权、两种敌对力量，现在当然不是这种情况。但从战略上讲，从选择改革的突破口来讲，邓小平也是首先把目光放到农村。中国的人口80%在农村，农村是否稳定，生活是否改善，关系中国大局。某种意义上，农民的改革要求也最迫切，而中国农村的经济关系比较简单，改革起来不像城市那么复杂。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从农村着手，取得了成功。先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突破和推广，然后又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可以说，80年代解决温饱问题，吃的是农村改革这碗饭，80年代市场经济的酝酿和发展，也是由农村改革启动的。

**访问者：**我们的市场，首先还是靠农产品丰富。通过这个问题，是否能说明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呢？

**龚育之：**我看，在中国革命战略和中国改革战略中，抓住农村和农民这一点，就抓住了中国特色。不理解中国国情的人，不能理解这个战略基点。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历史有透彻的了解，他们和占中国最大多数人口的农村有血肉联系，因此知道农民在中国的地位，知道怎样把握住这个基点去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点。

再比如，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时深刻阐明过的。他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犯革命急性病，急于实现全国革命高潮，是看不到中国这么大个国家，革命在不同时期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不同地区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这个不平衡源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小平同志又提出了中国建设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不同时期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增长速度在不同年份的不平衡，就属于这个方面；另一个是不同地区的不平衡，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开放从沿海逐步向内地推进，就属于这个方面。从战略思想上讲，这就是把握中国发展的不平衡，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地理环境等等的平衡，从这个基点出发，在不平衡发展的基础上寻找最有效的发展方式，通过不平衡发展带动共同发展，求得将来相对的平衡发展。

**访问者：**这是不是说要从总体上把握不平衡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小平同志说，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又说：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效颦吃“大锅饭”。

**龚育之：**如果过早设想拉平，不仅本来可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上不去，全国的发展也给拖住了。像这样重大战略的把握，毛泽东和邓小平有很多相近相通的地方。

**访问者：**您还能举几个别的例子吗？

**龚育之：**比如及时退出第一线的设想。毛泽东在1956年就提出过请党中央考虑让他不再当国家主席，甚至也不当党的主席，当时党内外不少人不同意。1957年黄炎培、陈叔通

两位党外人士还专门写信给刘少奇和周恩来,以为此议不可。毛泽东为此写了一封信,批了好几段话,说服党内的同志,又说服党外的朋友,最后在1958年初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就这个问题向广大党员吹了风,在1958年末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正式通过和公布了不再提名他为国家主席的决定。当时还为此而考虑了修改宪法限定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任期的问题。限任制最早是资产阶级提出的,应该说是资产阶级政府体制中的好东西,它比封建王朝的世袭制、终身制强。资产阶级一是通过选举,一是限定任期,限制连任。当然资产阶级也有不限连任的。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华盛顿是很开明的。

**访问者:**我觉得不光是开明,还有政治远见,没有华盛顿树立这个榜样,美国的政治不会稳定两百年。

**龚育之:**毛泽东1957年的信中还谈到退出第一线,不当国家主席,甚至不当党的主席,还是可以发挥政治作用。“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作主题报告。”应该说毛泽东这个设想是有远见的。发挥不发挥政治作用,不在于非要有什么样的职务,而在于是否拥有真理,是否能正确地分析形势,拿出正确的主张来。毛泽东不再当国家主席的设想,1959年照做了;不再当党的主席的设想,当时没有决定,后来也没有这样做。我觉得小平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当党的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同毛泽东50年代的设想是相通的。十三大他不再参加政治局常委,十三届五中全会他不再任中央军委主席,也是一个思路。

**访问者:**小平同志这次南方谈话,经中央讨论认为是正确的,并且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印发,发挥了很大的政治作用。您认为这个谈话在哪些方面发展了他的思想?

**龚育之:**这可是个大题目,今天不能多谈了。南方谈话,有

一系列重要的新观点、新论断，还有对过去讲过的观点、论断的新发挥。比如：“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是一场革命”，这是他讲过多次的，但是过去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这次谈话，以非常鲜明的方式，从改革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强调地提出了还要解放生产力的问题，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这就引起注意了，而且深刻地说明了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道理。

**访问者：**小平同志提出“改革是一场革命”，我们体会是从改革的深刻性以及它带来的广泛影响的角度提出的。

**龚育之：**还有改革的紧迫性、发展的紧迫性问题。他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也是坚持两点。一方面，他要求发展经济讲实事求是，实际上正是他强调要改变50年代以来的传统思维方式：一讲发展就是压指标、鼓虚劲的“大干快上”。另一方面，他又从观察世界发展的形势出发，别人在发展，我们周边的国家也在发展，而且发展得相当快，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不重视，不警醒，不按照实际可能实现有效益的较高速度，差距会越来越大。这个问题说穿了就是“球籍”问题。“球籍”问题其实也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的，在八大一次会议的预备会上提出的。但那时候提出这个问题还不是有太大的危机感，毋宁说，是用一种特殊强烈的方式来表达一种自信。现在提这个问题就有很实在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了。因此，小平同志认为老是慢



慢腾腾地发展不行,要抓住时机,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

**访问者:**过去讲发展是波浪式,您觉得台阶式和波浪式这两种提法哪一个更好?

**龚育之:**我觉得用台阶式比波浪式好。从物理学上讲,波有纵波和横波,纵波是疏密波,横波是起伏波。疏密波的比喻倒很不错,可惜人们不大熟悉,脑子里没有图像。人们熟悉的是横波,起伏波,而起伏波给人的图像是高上去,又落下来。而经济发展,总的说,应该都是向上,只是不同时候“上”的坡度不一,有时上得陡,有时上得平缓些,这就是台阶式,不应该是起伏式,不应该有落的阶段,特别是不应该有大落的阶段。

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使中国快一些富强起来,毛泽东、邓小平都有领导我们实现这个民族愿望的雄心壮志。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冒进了;这使小平同志能够总结经验,既注意不要冒进,不能搞得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又注意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还是要尽可能发展得快一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求实实在在的快一点,一百几十年来中国多少仁人志士奋斗牺牲、艰苦努力,也是希望实实在在的快一点。

总而言之,把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一番比较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这里边有共同的东西,有贯通起来的东西,有继承前人又超过前人的东西。后人继承了前人的遗产,又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教训,应当比前人看得更清楚,步履更矫健。

1992年6月21日于北京万寿路

## 访张静如——

### 宏观把握毛泽东

张静如

张静如，1933年生，北京人。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的研究，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中共党史学史》、《中国共产党思想史》、《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等。

从社会整体研究历史，从宏观上把握毛泽东——这是张教授近些年大力倡导的。当面听听他的宏论，是我们的夙愿。“因为家里有点事，我大半年不接受采访了，对你们是个例外。”教授见面如是说。于是跟着他的思路，我们上了一堂机会难得的课。只是先生说得兴致高，一个半小时竟未喝杯茶。

**访问者：**张教授，请您就如何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问题，谈谈您的看法。

**张静如：**这些年，我有一个总的观点，就是认为不论研究人物，还是研究历史，一定要从整个社会的总体上来看问题，因为不论一个政党，还是某个历史人物，都是在这个社会产生的，并且在这个社会中活动，他不可能离开社会。只有深入地去研究整个社会，才能够把政党（无论是它的人物还是它的实践）研究深透。

**访问者：**你觉得现在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状况如何？

**张静如：**从发表的文章以及论著看，在量上是很大的，你们不是有个统计：三中全会以来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论文有6 000篇，著作有400多部。但我不客气地认为，过去的研究相当程度上停留在宣传上，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开展研究是太差了。因为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是跟党史的研究联在一起的。而党史的研究又跟党史这门学科的历史发展有关系，民主革命时期不可能也没有条件进行这种研究，它需要适应直接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政治宣传。建国后条件有所变化，但也要一般地向群众灌输党史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也无需乎说什么研究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党史这门学科比较过早地进入教科书化。许多学科的发展都有一个规律，就是在它自身发展之后，进入教科书的模式，但这有个酝酿和发展过程。而中共党史这门学科比较早地进入了教科书化，这也不能赖谁。因为在建国初出于对形势的需要，对党员和知识分子的教育，需要有个教本，这就促使这门学科过早有了教科书。有了教科书就有了一定的模式，再深入就有了困难。我觉得，既然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那么回过头来，就应该研究它形成的弱点，尤其是展开对于社会的研究，这是深化党史研究的一个途径。

那么回到我们的题目上来，我们说应该宏观把握，这就是说，要研究人物，就一定要从他处的社会的各个方面来考虑。而所谓社会的各个方面也就是要从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一直到包括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社会意识、社会心理、思维方式等社会的侧面来研究。考察一个人物，还要考察包括他的家族的变迁、人物的变迁等等方面，只有从这些方面考察了这些问题，然后才能看出一个政党、一个人物，他

是怎样活动的，他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包括毛泽东这样的大人物，对他的研究也要从社会生活的诸方面因素去加以考察。我们现在的研究，还缺乏整体的考察。比如，毛泽东出生以后，整个社会和他的思想的产生是什么关系？他的思想的历史继承性是什么？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对他有哪些影响？在我的研究中，我比较强调社会心理的影响，就是说，社会心理对于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形成是什么关系，以及他接受马克思主义，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社会意识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社会意识形态，一个是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形态是属于系统化的社会意识，而社会心理则是一种非系统化的社会意识。社会上的质的属性，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等，它并不首先反映并形成社会意识形态，而是首先反映为社会心理，形成简单的东西，社会意识形态是高于社会心理的，它是从社会心理的基础上总结和升华上去的，成为一种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而社会存在反映到社会心理，又表现为社会的群体心理。

**访问者：**这是不是说，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或者说，他自觉不自觉地从事社会心理上认识和探索中国国情了？

**张静如：**我没有查到毛泽东是否曾用过“社会心理”这个词，但同时代的李大钊是用过这个词的，他说，要注意农民的意识，“此种基础社会之心理，实有以秘持真正舆论之权威”，故“不可漠视”。对毛泽东，我没有深入的研究，但从宏观上看，他是有这种基础的东西的。所以，要深化对毛泽东的研究，我想，一个是从整个社会去看，另一个是注意社会心理对他的影响。比如从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这一段，当

时的社会心态到底有怎么样的特色，这些特色跟毛泽东思想的转变有什么关系，如能进一步探讨，是很有意义的。

**访问者：**研究这些问题，实质上就是挖“源”。现在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毛泽东的思想之源，一个是从西方来的，包括马克思主义；一个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在相当程度上他又首先受湖湘文化的影响，因为毛泽东生在湖南。而你刚才讲的从社会心理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转变，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

**张静如：**我并不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作用，包括湖湘学风也是这样。问题是传统文化发展到近代，它也要跟整个世界的发展相联系，并跟随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传统文化的发展也是不断总结社会心态并使之升华。比如，中国近代工人运动的发展也要跟社会心态相联系。社会心态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愿望、要求、情感等等，这些都属于非系统化的意识，好、坏、美、丑，都是一些比较模糊的东西。

**访问者：**就是说，从它的表面看是初级的？

**张静如：**对。工人运动开始也是一些初级的东西，主要表现为反抗意识。

**访问者：**反抗意识能不能说已经包含有意识形态的层次呢？

**张静如：**仅仅是社会意识，还没有升华，升华就成了意识形态了。作为社会意识，从社会心理上讲，有民族的、阶级的、职业的。相同职业有相同职业的心态，相同阶级有相同阶级的心态，各阶层有各阶层的心态，整个民族有整个民族的心态。

**访问者：**到了近代，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社会心态是什么呢？它对毛泽东有什么样的影响？

**张静如：**我认为，从大的方面说，有两个：一个是接受和吸收了外来的文化，这主要是西方的东西，那时，不管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都介绍到中国来，都予以接收。另一个是传统文化中有用的东西。从社会心理方面具体说有以下几个：一个就是从鸦片战争以来慢慢在全民族中形成的反抗意识和救国意识。这两个是相通的，既是反抗侵略又是救国。但这种反抗意识还不是上升到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因为这是意识形态了。对外国的压迫我就反，这是普遍存在于群众中的意识。它们之间就差这么一格。不要小看差一格，这是客观的事实。假定没有这种普遍的群众性的东西，你那个意识形态或者思想体系，准是坐在屋子里脱离实际想出来的。这是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的东西。

第二个，是不满现实的情绪。这种情绪怎么来的呢？就是力图改变现实生活状况的愿望。当然，“不满现实”各阶级有各阶级的不同，各阶层有各阶层的不同，但从总体上看，都是要求改变现实，存在一个不满情绪，这种要求和愿望，也是在群众中普遍存在的。

由这两点，又决定了在社会心态上的一个特点，就是焦急情绪，焦急、迫切、赶快、急迫等等；和焦急情绪伴随的还有一方面，即失落感，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失落感非常强。为什么？因为干了一次革命仍然没有成功，社会还是那样，压迫被压迫照旧。在这种情绪下，有的人就沉沦下去了，而有上进心的人就产生了竞争意识，因此，失落和竞争又是焦急情绪的两个方面，既有失落，又有竞争。

**访问者：**知识分子中不甘沉沦的人们，或者说觉醒的人们，是不是就产生了要寻找真理、寻找图强自新的愿望？

**张静如：**这种东西在群众中也是普遍存在的，我这里讲

的不是哪个人，而是普遍的社会意义，当然社会性也要体现在个人身上。所以由这种民族心理、各阶级阶层心理决定了的特点，在总结上升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一种迫切性、焦急性、竞争性，再上升一步，也就产生了适用性、应用性、功利性、开放性和实践性。

**访问者：**要有用的？

**张静如：**对，只要有用，拿来就试。这是在社会心理基础上必然要达到并上升为社会意识形态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特点。

这些特点，就造成并决定了当时社会的基本心理基础。我想毛泽东在他青年时期，在接受各种思潮过程中也是首先遇到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要深入研究毛泽东，就要从客观上把握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和一般社会心理基础。我再重复说一下，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社会存在反映的社会意识，包括两个部分，即非系统化意识构成的社会心理和系统化意识构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在人们的相互交往范围内，存在着大量没有系统化的思想要素、某些片断，如关于“好”与“坏”、“公平”与“不公平”、“美”与“丑”等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半自觉”的模糊概念，种种生活习惯和风俗，有关社会生活的类似快乐或悲哀、赞赏和不满、渴望或绝望、期待或担心、支持和反抗等意向和念头。所有这些现象，在社会意义上称之为社会心理。当然，社会心理依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群体而不同。所以，社会心理有民族心理、阶级心理、集体心理、职业心理等等之别。简言之，社会心理是一定时期特定的民族、阶级或其他社会共同体中普遍流行的、共同的、典型的精神状态。它包括人们的要求、愿望、情感、情绪、习惯、风尚、情趣等等。作为

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的社会心理是另一种形式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想源泉，或称之为素材源泉。前者犹如一座文库，储存着大量没有经过加工的原材料，后者依不同需要任取一种或者若干种经过不同程序的加工而制出成品。所以，也可以说，意识形态是社会心理的凝聚物、结晶体。因此，我认为要深入研究毛泽东，也要从这个角度挖一挖。

**访问者：**那么，具体到毛泽东这个人，他有什么特点呢？

**张静如：**从毛泽东本身讲，他的个性特征或者说性格特色有以下几点：一个是求实，求实在毛泽东身上是很突出的，这同他生长在农村有关系，农民本来就是求实的。再一个是求异，所谓“求异者不苟同”。这里的求异不是说毫无根据的求异，毛泽东的求异是在求实基础上的求异。求异的特征就是发展起来不满足现状。农民很容易满足，毛泽东不满足，他一生中都有这个特征，是很突出的。同时他要创新，就必须实践，所以他总是经过实践之后加以总结，然后推广。从毛泽东的学风上说，在他的早期是求大本大源，他自己说：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所以，他又比较重视理论思辨，这跟湖湘学风以及清代汉学有关系，比较重视实践，这两个方面，既注重理论思辨，又重视实践，两种风格同时并存，交织在一起。

但单纯地求大本大源是要脱离实际的，容易陷入空想，在毛泽东的早年也曾经历过这个阶段，他就曾研究过克鲁泡特金的学说，认为应搞不流血的革命。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从当时的社会看，不只是他一个人，知识界就是不大喜欢暴力，这也是个传统，认为暴力是低下的东西，包括李大钊，开始也不主张暴力革命，他就搞了工会互助团。暴力总是简单的，如果革命能用和平的方式搞成功，何必去流血？所以，那个



阶段他们从思想上是拒绝的。那一代人，一开始是绝对不能接受马克思的暴力学说的，只能接受非暴力的社会主义的学说。这一点，不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特点，也要看到整个社会的共性的东西。后来经过争论，经过实践，才弄清暴力有两种，这才接受马克思主义。

**访问者：**那么，毛泽东的转变问题上，为什么他成功地转到马克思主义而没有转到无政府主义或其他方面去呢？

**张静如：**要回答这个问题，不仅要注意他个人的性格上的作用、个人学风上的作用，也要注意社会整体的作用。从毛泽东个人性格上讲，他注重社会实践，他善于在实践中做比较，他搞新村实验时是真心实意的，而且搞得很热闹，但经过实践总结，那样做是不成功的，行不通，还是走马克思的道路可行。1920年12月1日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有段话，说得中肯，表现了他那时的心境，他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论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封信可以说标志毛泽东已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封信中还是认为俄国式的道路是恐怖的，从心理上还是不能完全接受。

**访问者：**认为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张静如：**不仅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且是没有辙了。时隔不久，一个月后的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毛泽东发言说：“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陈书农）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说白了，这话的意思就是只有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最有用，别的没用。毛泽东没有往无政府主义道路去转变，我

觉得还跟他个人的性格特点有关。他求大本大源，这个大本大源求错了，再另求别的大本大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专门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也就是大本大源。别的方法、别的道路走不通了，自然也就选择了这条道路。那么这也就是实践性的，所谓“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就是他敢于去接受现实，别人不敢的他敢。所以，在毛泽东身上，“求实”、“求异”两个性格加在一起，就造就了他的历史作用。

1992年4月28日于北京师范大学

## 访石仲泉——

### 毛泽东邓小平：现代 中国的两位历史伟人

石 仲 泉

石仲泉，1938年生，湖北江陵人。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科研局局长。主编《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丛书和《毛泽东研究述评》等，主要著作有：《怎样认识我国的社会主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合著)、《〈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导论》、《毛泽东的艰辛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毛泽东思想方法导论》(合著)等。

他的工作、著述颇忙，或是室里，或是外出。忙归忙，还是爽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刚好是党的生日，我们围绕着毛泽东、邓小平开始了下面的谈话。

#### 毛泽东是如何探索社会主义的

**访问者：**关于毛泽东建国后的历史，是目前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各种观点都有，请问您是怎样看的？

**石仲泉：**首先要承认毛泽东伟大的一生是追求、探索社会主义的一生，尽管他晚年发生严重错误，偏离了科学社会

主义的理论，但从其主观愿望说，他还是想在中国大地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让社会主义这面红旗高高飘扬。关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如果放开视野，从宏观来看，我认为可以分为五个历史时期。

第一个时期：28年的民主革命是他对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里怎样进行革命的准备的探索时期。在我国当时不可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在我国搞民主革命，马列主义的书本上并没有现成的模式，要靠我们党去研究去探索，所以在这段历史中毛泽东大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经过22年的武装斗争，中国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民主革命阶段事实上是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准备的阶段，没有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以民主革命是为社会主义革命探索准备的时期。

第二个时期：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探索时期。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从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这个时期主要表现为建国后头七年，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4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和建国前后制定的一系列新民主主义政策，以及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许多思想和政策，对于这个时期的探索起了重要作用。尽管1955年后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有严重偏差，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取得的成功，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第三个时期：是八大前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探索时期，即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57年10月的八届三中

全会毛泽东否定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之前。这段时间是比较好的。这时是毛泽东建国后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时期，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也富有成效，有很多很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

第四个时期：从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有九年左右时间，这是对社会主义的曲折探索、发展的阶段。就是不断地犯错误，又不断地纠正错误，曲折地向前发展。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反复大，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交错发展，比较复杂。在我们研究他的思想的时候，不能采取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方法，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犯了错误当然不好，没有彻底纠正错误是个遗憾，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能发现错误，采取措施制定政策作某些纠正，使损失尽量减少，把错误的势头加以遏制，这还是应该肯定的。不能因为他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就认为他纠正错误的措施也不值得肯定，如果这样的话，我认为那就太简单了。正像救火一样，没有把大火扑灭，但火势越来越小，造成的损失就要少一些，就减少损失而言，也是应该肯定的。所以，这段时间包括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这九个月，尽管没有从根本指导思想上纠正路线问题，但是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肯定他一些好的思想，不要不加区别地和其他犯错误的时期一样看待。再如从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强调实事求是、通过八字调整方针，到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前也应采取基本肯定的态度。如果我们对在这九年左右时间的思想轨迹进行描述的话，大体是“S”形的曲线。1957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是他由指导思想的总体正确走向错误的一个关节点，这就是否定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

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第一次郑州会议后九个月纠正错误，庐山会议后期和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又犯更大错误，八届九中全会再纠正错误，八届十中全会后又犯错误。在这里，八届十中全会是他的思想变化的又一次关节点，其指导思想开始定型化，基本确立了在社会主义社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即认为通过十多年的摸索，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是要对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最后就搞“四清”，不仅农村搞，城市搞，还要搞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按照这个思路下去，发动“文革”也就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了。不过在这个时期，我们也应看到，尽管他错误的指导思想确立了，但在实际工作中他还是接受了“大跃进”、庐山会议的教训，把抓阶级斗争局限在县团以上干部层，没有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去冲击经济建设。这样也就保证了八字方针在“文革”前能够得到贯彻，使我国的经济能够在1965年、1966年把“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基本达到1957年的发展水平，在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1957年，使全国经济出现复苏这么一个比较好的势头。

**访问者：**我感到您的观点和有些学者不同，他们认为，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从1957年反右派时就确立了。

**石仲泉：**我认为这种观点讲的不准确。因为从毛泽东的思想情况来看，是一步一步地并且是有反复地向错误方向走去的。1957年他提出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涉及经济领域的建设，搞“大跃进”从主观愿望上说还是想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呢！只是由于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在抓经济建设的工作中犯了“大跃进”的大错误。后来在1958年底的武昌会议上，他才提出在思想上、政治上划分阶级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进而提出

路线斗争就是阶级斗争，但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又慢慢地纠正错误，对阶级斗争这根弦没有绷得那么紧了。由于在困难时期，政策放宽了，“休养生息”嘛，这本来是好事，但在毛泽东看来，是刮起了“单干风”、“翻案风”和“黑暗风”，是阶级斗争的严重表现。于是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才从总体上加以概括和抽象，随后在1963年的“四清”文件中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

**访问者：**“文革”大概就是第五时期了。

**石仲泉：**是的。这个时期也可以说他是在探索，但是不成功的探索，是失败的探索。

**访问者：**我感觉您这样概括问题，是首先肯定了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是好的。

**石仲泉：**这一点必须肯定。他还是想在中国搞社会主义的。特别是在他看来苏联等国已经发生了根本制度的变化之后，对于如何坚持社会主义，他思考的更多。不过他的思考、他的探索在理论上偏离了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上不符合中国国情，是在错误路线上进行的探索，所以造成的危害就比较大了。

**访问者：**从毛泽东投身革命到去世，您认为他的一生都是对社会主义追求探索的一生，并且提出不少好的思想。您是否归纳过他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大体有哪些？

**石仲泉：**我在去年底写的《当代毛泽东研究概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毛泽东研究述评》一文里，曾把他在这方面的好的思想归纳为十三条<sup>①</sup>。最近通过研究，我想还应该再加上：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

---

<sup>①</sup> 见199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研究述评》第29—30页。

准备的理论；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这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中介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这些都属于他对社会主义的寻求的理论贡献。因此，从理论上说，至少可以归纳出十六条。

**访问者：**这十六条是您概括的毛泽东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那么他在这方面的错误您能概括一下吗？

**石仲泉：**我认为主要有两大理论错误。一是经济建设上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空想论，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到“文革”时期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访问者：**您关于超越社会发展的空想论和有空想成分这两种提法有区别吗？

**石仲泉：**没什么区别。空想论是十三大提出的。空想论和空想社会主义是两回事。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是空想社会主义或乌托邦，对毛泽东基本持否定态度，我不同意。因为那是讲的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性质，而不是讲的错误部分。就整个思想体系而言，毛泽东还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思想，这有如前述。十三大讲的空想论是指他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犯的错误的而言的。比如说，在生产关系变革方面，他片面追求所有制的品位越公越纯越好。不仅个体所有制要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就是小集体所有制他也不满意，要搞大集体。所以初级社还没有巩固就要搞高级社，高级社没有巩固就要搞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还不行，还规划在若干年后要搞全民所有制。这一切都说明，他不断地要超越社会发展阶段，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孤立地要求改变所有制。他想通过这个办法来刺激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这是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要求的。因为我们国家从总体上说是落



后的生产力，需要有相应的所有制形式，太急了不行。在分配问题上也是这样。此外，不顾我国实际情况，过早地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权利，片面强调发扬风格和精神鼓励，否定物质利益的作用。这也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提出的要求。

## 邓小平实现了三个超越

**访问者：**我一直在想，毛泽东是一个伟大而又具有悲剧性的人物。说他伟大，是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取得了辉煌成绩，而这个成绩又是他同时代人都不能比拟的。说他具有悲剧性，是他在建国后没有取得人们所期望的成就。尤其1957年以后，“左”的思想不断上扬，到“文革”时期误入歧途，给党和国家造成很大损失。这使我想到邓小平。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他是按毛泽东的思路来考虑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经过“文化大革命”，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提出了一套崭新的观点，成为党在新时期的指导思想。这在实践中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因此有人说，当代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上下两篇，上篇是毛泽东唱的，下篇是邓小平唱的。您是否这样认为呢？

**石仲泉：**邓小平在新时期有很大的功绩。他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拨正了我们党前进的航向，开始了第二次伟大革命，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关系来讲，应该说他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具体说来，我认为邓小平在新时期实现了三个超越。

第一个超越，是超越了个人本位的“自我”。千百年来，“自我”都是以个人为本位来认识的，也是用其来审视历史的。小平同志在这一方面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他在处理和毛泽东的关系上完全把自己的荣辱置之度外，从党

和国家的利益、民族利益来考虑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问题。尽管在“文革”中，他本人受了那么大的冲击，几起几落，但他不计较个人的恩恩怨怨，更没有像赫鲁晓夫那样做什么“秘密报告”。相反在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比较厉害，否定毛泽东的舆论甚嚣尘上的时候，他挺身而出，捍卫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的领袖地位，捍卫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中的地位。他主持制定的《历史决议》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这样做的结果，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对国家起到了政治安定的作用。这对他个人来说是超凡脱俗，是思想的净化。这在国际共运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访问者：**从我们党当时的情况来看，小平本来可以当第一把手，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位置让给了年轻人，这在无产阶级政党史上，恐怕也是难于找到的。

**石仲泉：**老了就让位，率先传、帮、带，这是他的伟大风范。其实那时他的精力还很充沛，也不是不能胜任。他主要是从党的事业要后继有人这个伟大眼光出发，不希望把国家的命运完全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这很不容易。目前很多人对这点还认识不清楚，对它深远的历史意义还没有充分估计到。

**访问者：**请您谈谈第二个超越。

**石仲泉：**第二是超越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多少年才出一个的伟大人物。但他毕竟不是神仙，尤其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由于他的崇高威望，特别是“文革”树立起来的个人崇拜的绝对权威，如何克服他的错误，把全党引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冲破重重阻力，批判“两个凡是”，花了很大的气力来做这件事情。他号召全党解放思想，恢复实事求是

是的思想路线。他提出要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一方面要否定毛泽东的错误，一方面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不区别就不可能摆脱他的错误，也不可能坚持他的正确思想。过去我们是把毛泽东的错误和正确的思想搅和在一起的，一说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就感觉毛泽东思想没办法坚持，是邓小平把这个结解开了。他以一个全新的思路，一方面大胆、坚决、毫不留情地否定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一方面又理直气壮地坚持毛泽东思想，毫不动摇。但我们有些同志往往用外国的或历史上的一些旧的思想方法或思维定势来套，总是对这个问题理解不了。他们没有想到这是我国的特殊国情，是我党的特殊党情。这不完全是一个理论和学术问题，首先是政治的需要问题。因为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做学问的思想理论观点的简单总汇，而是把它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指导思想作为一面旗子，就不可能把错误的东西包括进来指导党，所以就只能是正确的东西。历史已经表明，由于否定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就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提供了前提条件，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奠定了理论认识基础。也只有否定了“文革”，才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才有十三四年这样生机勃勃空前繁荣的大好局面。

第三个超越，是超越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这一点应该大书特书。我们说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的，并不在于它提出了不可变更的三条五条原理、原则，而在于它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断地总结新的经验来修正过去的与实际情况不相适应的观点，包括一些重要的原理，来创造新的理论。作为一门科学，只有不断地发展、完善自己，才能具有活力，永葆其科学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科学体系，

就在于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没有说像中共这样以农民为主体成分的党能保证其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也没有说要以农村为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以夺取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解决了这个问题。小平也是继承了毛泽东的思路，总结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摒弃了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摒弃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完全扭曲了的认识，也摒弃了超越我国历史发展现阶段要求的不正确的思想和政策，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理论，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和两手抓、两手硬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特区的理论，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等等，这些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句话，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把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超越，有些人目前还没有接受下来，当然认识总是有个过程，应该允许看，但这个理论的价值不容忽视。如果我们要写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科书的话，就应该把小平的这些重大的理论都包括进去，否则就不完全。

**访问者：**那么您对南方谈话如何评价呢？

**石仲泉：**这是我正要讲的话题。南方谈话表明，小平的思想又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是对他过去思想的进一步概括和总结。南方谈话在指导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所发挥的理论作用，我在这里冒叫一声，相当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说是我们当代的《新民主主义论》。

**访问者：**60年代，一些省委的领导同志曾写报告给毛泽东，觉得社会主义如何搞无所遵循，建议毛泽东写一篇像《新民主主义论》一样的大文章。

**石仲泉：**对，毛泽东很想写。他1958年就提出过要发展马克思，超过马克思。这是在1958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讲的。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也说：不能躺在老祖宗的书本上，要总结新的经验，写出新的著作；现在是社会主义时期了，仅仅靠《实践论》、《矛盾论》，不写出新的著作是不行的。到60年代初，在一些小的范围里他讲得更多。当时全国掀起了学毛选的热潮，他说感到惭愧，这都是些老古董了，很想写点新东西，但自己老了，精力不济了。他始终想发展自己的思想。他不当国家主席，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想摆脱行政事务干扰，着重考虑理论问题。但他没有完成这个遗愿。他在晚年搞“大跃进”、搞“文革”，自以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主观和客观相脱离，实际上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他想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任务由小平同志接过来实现了。如果说小平在南方谈话以前的其他文章和谈话，对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阐述，谈的多是单个专题性的问题，那么南方谈话则是综合性的，是从总体上来把握和总结的。所以我认为它的理论价值，相当于《新民主主义论》。它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很多基本问题都解答清楚了。比如：从路线到重大方针，从经济到政治，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从抓重点到两手抓，从基本的方针政策到领导工作方法，比较全面地回答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此外，毛泽东在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之前，也发表了不少文章，谈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动力、革命的目标、革命的道路、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的前途等等，但还没有一篇完整的文章进行总结。毛泽东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阐述的。可以与此相类比。小平的南方谈话是新时期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总结。这些情况向我们表明，小平同志的思想确实已升华到新的高度，是对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最新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我想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历史将证明这个论断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同时，也要指出，正因为小平提出了许多新的观念，使一些同志一下子适应不了，接受不了。这需要加强理论宣传教育，帮助“换脑筋”。

**访问者：**根据我们的观察和体会，感觉人们对南方谈话不能接受的程度比对其他的话更多，困惑不解的程度也相对多一些，尤其在高速度和姓资姓社问题上，不少人表示担心。

**石仲泉：**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这几年小平同志的思想又向前迈进了，而我们的一些同志还在原来的框框里打转转，总是在姓资姓社问题上纠缠不清。为什么发生这样的问题？就是把毛泽东的思想和小平思想完全对立起来了。对毛泽东的思想不是把他一贯正确的东西和小平的主张进行比较，而往往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当成正确的思想来参照，或者说把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是正确和基本正确的某些思想，但由于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在现在看来就不再正确的思想来参照，所以形成对立。关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尽管《历史决议》已作了明确论断，但由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影响或一些

过了时的思想的影响在一些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所以一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就自觉不自觉地把那些东西当成正确的来看待。既然毛泽东的东西姓社，邓小平的思想就自然姓资了。这个情况必须改变，否则就不能正确认识小平的南方谈话。事实上这样理解问题是对小平南方谈话的曲解。

**访问者：**那么请您谈谈怎样理解小平的南方谈话才算正确呢？

**石仲泉：**首先应该肯定，小平的南方谈话的实质就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他的谈话，一方面重点在讲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也讲了要遏制腐朽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要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强调政权的作用，还谈到如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教育，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打击经济犯罪等等，这些都是为了保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如果说南方谈话的前三个问题是强调改革开放，那么后三个问题则是着重阐述四项基本原则的。因此，南方谈话既是鲜明的重点论，又是全面的两点论，不能搞这样那样的片面性。完全可以说，它是坚决捍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文献。

**访问者：**谈到这里，您是否能把毛泽东和邓小平再比较一下呢？

**石仲泉：**可以的。比如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大思路来看，撇开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谈，他们两人的大思路是完全一致的。这个大思路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提出正确的思想理论，并取得伟大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他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同中国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反对了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破除了一切条条框框的束缚和限制，才闯出了一条

全新的成功之路。同样，小平也是这样一个思路，不受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从现实的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一系列重要的基本理论。小平说得很清楚，他读书不是很多，但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四个字。过去打仗靠实事求是，现在搞建设和改革同样要靠实事求是。离开了实事求是，那就什么也不可能搞好。这也是毛泽东的基本思想。毛泽东当年参加革命也是这样，他读了《共产党宣言》，对别的印象不深，也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因为宣言里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他得到了“阶级斗争”这个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就老老实实地研究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结果找到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钥匙。这表明当年的毛泽东也不把马列主义看作玄奥的教条，而是抓住了它的精髓，抓住了“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当年的毛泽东讲的“阶级斗争”是怎样搞革命的具体方法，把它提高到思想理论上来认识，也是符合当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其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从这点说来，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大思路是一致的，不存在两人在思想路线上的对立问题（不包括毛泽东晚年犯错说时的情况）。

**访问者：**您的意见告诉我们，当人们对毛泽东和邓小平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不要只看到这样那样的具体问题，要注意从根本点上、从宏观上来把握分析，这样才能清醒地看到他们之间的联系，否则就容易目光短浅，陷入泥潭。说到这里，我再向您请教一个问题，邓小平提出的一些具体观点，能在毛泽东那里找到渊源吗？

**石仲泉：**从根本点上看是可以的。比如市场经济问题，这是南方谈话很重要的突破。这个观点，对毛泽东来说，当然没有直接谈到，他不可能产生这个思想观点。但是毛泽东在



1958年讲商品生产的那些话，认为商品生产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它和资本主义结合就是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的。我们应该乖乖地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思想是很好的。在这里，如果我们把商品生产换成市场经济来思考，同样的，它也不是某个社会形态所固有的，跟谁结合就为谁服务，其思路是完全相通的。计划问题也是一样。小平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毛泽东也曾批判过计划问题。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说计划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计划做得好是反映了客观的情况，计划不好是脱离了客观实际，会给国民经济造成很大损失。事实上也是这样，在1958年，整个国民经济都乱套了，没有任何计划可言。我们搞计划经济，其计划经常不符合客观市场的实际需要，这样长此以往，生产能高速高效地发展吗？这是旧体制的一个重要弊端。毛泽东并不迷信计划，这是可取的；但他有时有较大的随意性，这是导致“大跃进”犯错误的一个原因。小平是吸取了毛泽东的这些思想的积极的一面。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思想，如上台阶呀、要敢于试验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方法在新时期的具体体现。

**访问者：**最后，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关系，您能用几句话概括一下吗？

**石仲泉：**在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对南方谈话要有正确的认识，要把它放在新的高度上来认识。我们抓住了它的基本精神，就能正确把握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关系。邓小平的确是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是毛泽东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和发展者。我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处理好了，我们的国家就一定会兴旺发达。否则，出现某种反

复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理论工作者的任务，毛泽东思想研究者的任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阐述毛泽东思想和小平新时期思想的关系，包括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纪念也要做好这篇文章。只有这样，对毛泽东的纪念才能有新的思想高度，也才能达到新的高度。

1992 年 7 月 1 日于北京前毛家湾

## 访汪裕尧——

### 换一个视角：毛泽东怎样看待他自己

汪裕尧

汪裕尧，1933年生，江苏江阴人。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毛泽东研究组组长、编审。长期从事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和研究，参加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早期文稿》的编辑工作。是《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第二版、《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主编之一。

看文章如同吃饭一样，再好的食多了也会厌烦，我们换一个角度，倒开出一方新天地。

**访问者：**在前一段的采访中，接受我们采访的专家、学者都是谈他们对毛泽东的研究体会和看法。这次，我们想换一个角度，就是把审视的眼光倒过来，探讨一下毛泽东是怎样看待自己的。您搞了近20年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和研究，接触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一定有您的体会和看法。

**汪裕尧：**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深入了解和研究毛泽东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研究毛泽东的一

个重要方面。

## 如何看待毛泽东说的他一生干的两件事

**访问者：**毛泽东曾说的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个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一个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干两件事”的说法流传很广，您认为这能概括毛泽东的一生吗？

**汪裕尧：**有材料说，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他的病情加重时，曾把当时的一些中央领导人找去，对他们说了一段话，意思是：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八十多岁了。人老了往往要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现在虽然还没有盖棺，但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一群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就那么几个人在我耳旁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早点把这几个海岛收回来。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是发动“文革”，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还没完，这笔遗产要交给下一代，怎么交法，如果说和平交不成的话，那就在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要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对这段话怎么理解？我觉得毛泽东讲的这两件事，实际上是用他特有的表达方式概括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这两大课题。第一件事比较好理解。他领导人民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绝大多数人民都拥护的。讲到这件事还没有完，显然是指祖国统一的大业还没有最后完成。

第二件事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泽东把这件事看得很重，看作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大事。为什么？这里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国际的原因，还有现实的原因。

**访问者：**他在谈话中说到的“文革”的缺点，并不是我们现在认识到的“文革”错误，而是认为“文革”从整体上是对的，问题是别人不理解。

**汪裕尧：**当然讲这段话时，他对“文革”的问题是看到了一些，也有了一些认识，但他对问题的估计和我们现在的估计不一样。他认为对“文革”要三七开，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不足主要是指“全面内战”和“打倒一切”两件事。而这两件事也是违背他的意愿的，他也是反对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的，但事情的发展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控制。这又联系到邓小平的复出。为什么毛泽东让小平同志出来，而且把党政军的大权托付给他？就是想让邓小平来控制当时已经失控的局面；但当小平同志通过全面整顿，从根本上纠正“文革”的错误时，他又不能容忍了。

**访问者：**那么怎么看待毛泽东说的这件事呢？

**汪裕尧：**毛泽东把发动“文革”作为他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从他的思路进行分析，应该说是的道理的。在他看来，既然历史上有这样的经验教训，国际上已有前车之鉴，国内已存在现实的“危险”，当采用其他办法解决不了时，采取“文革”的办法来解决是理所当然的。毛泽东把他的一生说成只做了这两件大事，我认为这样的概括是不准确的，理由有三点：第一，这种说法至少把从建国到“文革”前十七年的历史忽略了。这十七年应该说是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我们通过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建立了独立的基本完整的国民经

济体系，综合国力也有很大的增强，并为我国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成就都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第二，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里曾讲到这样一个观点：只有“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但后来没有贯彻下去。毛泽东讲的两件事，显然没有包括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大事。后来他离开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仅从政治上、意识形态上考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结果无产阶级政权由于缺乏充分的物质基础而得不到充分的巩固，因为人民不会容忍长期地处于贫困状态，经济上的贫困容易引起政治上的动荡和社会的不安定。第三，从根本上看，他把发动“文革”看成一件大事，是建立在对我国现实状况的错误估计上的，因而是完全错误的。

**访问者：**毛泽东的讲法，我觉得是用他独特的语言和风格说出了他的意愿，其实，他一生干的事比这要多得多。别人也在概括两件事。前不久，薄一波答记者问时，也谈到毛泽东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创建新中国，一件是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他说：“一个人的一生，如果能为人民办成一件大事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毛主席却起码办成了足以影响中国或世界历史进程的两件大事，他的伟大就可想而知了。”

**汪裕尧：**薄老的概括更科学，也更符合实际。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历史功绩都可以归结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范畴中去。至于如何理解毛泽东的那段话，我想，我们还要注意他

说这段话时的处境，其实那段话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他重病在身，深感来日不多，回天乏力了，所以有“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的话。他在谈话中说到交班的两种可能，当时确实是存在的。就他的愿望来说当然是希望在和平中交班，但如果这样交不成的话，就要准备在动荡中交。他说这个话是不无忧虑的，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提醒。

## 毛泽东怎样谈他的人生经历

**访问者：**就我们知道的，毛泽东谈他个人经历的也不少，您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汪裕尧：**毛泽东谈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从我掌握的材料看，最早的是在1936年11月同斯诺的谈话。在谈话中，他把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成长过程、参加革命过程都真实地实事求是地摆出来，毫不隐讳，非常坦率。他说，他小时候信过佛，也接受过孔夫子的教育，后来又接受过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开始并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后经过反复比较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并不认为自己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把自己当作神，而是当作一个普通人，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这一点在谈话中很清晰。这样的谈话使外界觉得很可信，很真实，非常具有说服力。毛泽东还把自己的成长过程作了辩证的分析，他不仅谈到顺利发展的一面，也谈到自己的沉浮，而且谈这些的时候，他是把自己完全融合在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过程中了。这就给人的印象他是一个朴实的人，是一个真心实意为工农服务、为革命无私奉献的人，没有一点矫揉造作，也没有吹嘘自己，完全是敞开胸怀，让人们客观地看待和认识自己。在毛泽东的谈话中，我们也会感到他的意志很坚强，他能面对

那么多看来是难以克服的困难而不退缩，不怕任何挫折，坚持自己的信仰。我觉得这三点的确反映了毛泽东的崇高人格。

**访问者：**这是《西行漫记》中最漂亮的一篇，影响也最大。

**汪裕尧：**给人看了后，是活生生的，非常真实可信。为什么《西行漫记》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那么大的震动？一方面而是使人们了解了一处新天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使人们了解了在中国还有这么一批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批人在真心实意地为中国人民大众谋利益，他们廉洁无私、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国民党的腐败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所以有多少青年自觉奔向延安。毛泽东通过他自己的经历的确显示出了他的人格魅力。

### 毛泽东是如何做自我批评的？

**访问者：**毛泽东对斯诺谈他的个人经历的确使人印象很深刻，直到今天对广大青年说来还有教育意义。我们是否换个话题，毛泽东在谈他自己或其他问题时，做过自我批评吗？

**汪裕尧：**好的。毛泽东有没有自我批评，这方面的材料过去公开得少，人们对这方面的了解也不多，有时反倒使人有这样的印象：觉得他好像自我批评精神不够。我不这样看。就我接触的材料，我觉得可以这么说：毛泽东既是我党三大作风的倡导者，同时也是三大作风的力行者。他不是一个文过饰非的人，而是而对工作中的错误勇于承担责任，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方面，毛泽东仍然是我党的楷模。为了说明这一点，下面介绍一些材料。

最早的一篇是1921年1月28日给彭璜的信。其中说到：“弟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工夫破坏；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自省工夫几乎全废。”“吾兄高志有勇，体力



坚强，朋辈中所少。而有数缺点：一、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谦恭过多而真而过少。二、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三、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四、观察批判，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五、略有不服善之处。六、略有虚荣心。七、略骄气。八、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九、少条理而多大言。十、自视过高，看事过易。”在谈了这几条以后他说：“兄之缺点，弟观察未必得当。然除一、三两条及第五条弟自信所犯不多外，其余弟一概都有。”接着又说：“兄常谓我意志强，实则我有自知自明：知最弱莫如我之意志！”这封信是毛泽东由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进行自我教育的一个例证。像这样的自我批评在那时的年轻人当中真是不多见的。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做的，到他成为党的领袖人物后，是不是还能保持犀利的自我批评精神呢？我再举下而几个材料。

一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 1936 年同斯诺的谈话。他在谈自己的人生经历时，充满了自我剖析的精神。他还讲到他并不是常胜将军，也打过败仗，秋收起义就打了败仗，是受挫后才慢慢学会打仗的。1957 年 7 月他和尤金谈话也谈过这个问题，说：我自己也犯过错误，由于我的过错，在战争中也打过败仗，如土城战役就没打好。如果说我在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也很高兴了。

**访问者：**毛泽东这种诚恳对待自己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汪裕尧：**是的。毛泽东还讲过，他对孔夫子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说法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吹牛。他说世界

上不存在生而知之、不犯错误的圣人，只有学而知之、不犯或少犯大的错误的贤人。他从来不把自己看做圣人，最多把自己看成一个贤人。他在1971年11月接见武汉地区党政军领导人时说过，中国的第一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一个贤人，是圣人的学生。所以他在早年讲到要立圣贤之志，可能是从要做一个有作为的人这个一般意义上讲的。

**访问者：**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动做自我批评还有两个很生动的例子：一个是抢救运动中冤枉了一些同志，他主动出来承担了责任，还脱帽赔礼道歉。再一个是有一次雷击死了人，有人说怪话，“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追查，他制止了，并通过这件事了解到是公粮征多了，农民不满意，于是决定减轻农民负担，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因而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这些事例都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那么，建国以后毛泽东是否做过自我批评呢？

**汪裕尧：**建国后毛泽东做自我批评之所以为人们了解得少，是因为没有在较大的范围内传达。

1953年8月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就做了自我批评。他说，这次会议上许多同志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1）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2）统得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3）预算问题。去年十一月搞起，经过一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

了。预算中十六万亿是虚假数，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得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得早了，应该慢慢来（苏联今年预算现在才公布），我也有急躁冒进。”此外，他还就查田定产、扫盲和失业人员登记工作中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的纠正中。”作为中央主席在大庭广众面前这样坦率地解剖自己，不能不使人感动。

**访问者：**从上述讲话里还可以感觉到，毛泽东为自己对经济工作生疏、未钻进去而自责，这个问题他在建国初就意识到了，后来他做了哪些努力？

**汪裕尧：**他承认自己在经济工作方面的不足，也为弥补这种不足做了努力。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在9月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他不无感慨地说：我也是个甚为不足的人，很有些时候我自己不喜欢自己，马克思主义各门学科没学好，外国文没学通，经济工作刚开始学，但我决心学，不死不休，对于这些我也要赶超，要进取，那时见马克思时我的心情会舒畅些。从这年12月开始到第二年2月，毛泽东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我们从他在此期间给李讷的信中也能感觉到他的心情。信中说：“现在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毛泽东为什么在这时下那么大功夫读书，就是因为在“大跃进”中碰了钉子，他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没搞通，才下这个决心的。在读书中，毛泽东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进行思考，总结经验，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思想，提高了对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重要性的认识，这为后来他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探索适合中国

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了思想理论准备。

**访问者：**在这以后，毛泽东还做过哪些自我批评？

**汪裕尧：**比较集中的是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当年听传达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时，自己没有太注意毛泽东所做的自我批评，后来看到这篇讲话的记录整理稿，感到毛泽东当时的自我批评是很深刻的。他讲到：“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这样的自我批评是很诚恳的。他还讲到：“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毛泽东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这种态度是很感人的，值得全党同志学习。毛泽东非常推崇鲁迅，认为自己的心和鲁迅是相通的。他说：我喜欢他的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也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要人们相信确有个时间问题，过了多年之后，再回头看，人们会对毛泽东身上的这种崇高精神产生出敬佩之情。我想，对毛泽东有没有自我批评精神这一问题的回答，已尽在不言中了。

### **虎气、猴气：毛泽东谈自己的性格**

**访问者：**在毛泽东的谈话中，时不时也透露出对自己性格的话，您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汪裕尧：**直接的材料不很多，但从他的文章、谈话以及对一些问题的处理中可以看出他的性格特点和意志。毛泽东的一生经历过许多斗争和风浪，他总是以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去迎接风浪、迎接挑战，真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鬼也不怕。1915年9月，他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提出要结交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期间，他自觉锻炼体魄，进行日光浴、冷水浴、风浴、雨浴。他还发出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豪言壮语。这些都反映了他的坚强意志和性格特点。后来在“四一二”大屠杀那样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毫不低头，而是选择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除了由于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外，也同他的意志和性格分不开的。也因为这样，他几次沉浮，不论受到怎样的打击从不改初衷。

毛泽东的这种性格，从游泳中也反映了出来，他把游泳不仅看作是锻炼身体，而且看作是磨练意志，越是大风大浪他越要去游泳，他说人类就是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出来的。

**访问者：**这是毛泽东强的一面，也是人们能感觉到和看到的一面，他是否还有另外一面？

**汪裕尧：**所谓另一面，就是人们议论的虎气、猴气问题。这是他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给江青的信里谈到的一个问题。他说：“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理解，所谓“虎气”，是讲他的原则性以及坚持原则的斗争精神。所谓“猴气”主要是讲执行

原则时的策略上的灵活性。毛泽东为什么喜欢邓小平，赞赏邓小平，一个重要原因是邓小平在性格上有同他相似的特征，原则性很强。毛泽东曾对他说过，我赞成你那个钢铁公司，要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是棉花团，里面是钢铁公司。毛泽东的性格就是这样，意志如钢，性格坚强，但又柔情似水，感情丰富。在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身上也能体现这一点。他批评人时要求很严格，在原则上丝毫不让步；可一旦你诚心改正错误，他又很宽容，给人以改正的机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治病救人”就是他提出来的。

他所说的“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理解这里主要是指发动“文革”而言的。这里似可包含这样几层意思：（一）对于发动“文革”这件事，他自信是做得对的，是“完全必要的”和“非常及时的”，对于“文革”的大方向，他也自信是正确的；（二）对于“文革”发动阶段林彪把毛泽东著作吹得神乎其神不满意，但又不能不违心地同意那样做，因而担心“吹得越高，摔得越重”，在这方面又不那么自信。

**访问者：**“摔得越重”到底是说谁？是指他自己，还是指林彪？

**汪裕尧：**我理解两方面的含义都有，既有被吹的人，也有吹的人。他已经感觉到这件事会要走向反面。但处于当时的情况，他觉得他那套意见不被周围大多数同志理解和接受，所以又想要一点个人崇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可能不懂得个人崇拜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从他以后对林彪的“四个伟大”讨厌，批评“大树特树”等可以看出。但他觉得当时有这个需要，因而又“违心”地认可了。这正反映了当时他的一种矛盾心理。

他的不自信包含的第三层意思是：对于“文革”能否取

得成功没有十分的把握。他首先从许多领导干部对“文革”“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中感到了这一点，后来又从他借以发动“文革”的依靠力量“红卫兵”的“过火”行动中感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就谈到了“文革”有两种可能性，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还谈到要有几个月看眉目，一年见分晓。这种分析问题方法是他常用的方法，但也不能说不反映他当时的真实思想和心理状态。所谓“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的理解，基本的是自信。这是一个伟人成功所必不可少的品质，毛泽东在这方面是很突出的，正因为有这种自信，才能排除万难去争取革命的胜利。又有些不自信，是指在某个时候、某些问题上。这种情况也不只是“文革”时才有，过去也有过。比如，建国后经济工作上的几次挫折，使他感到自己对经济工作不熟悉，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缺乏认识，在这方面他没有底，尽管他一再下决心要搞通经济学，但这门学问要搞通并不容易，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往往把陈云同志请出来，这也可看出他的不自信。

**访问者：**在毛泽东身上的不自信恐怕还有另外一些，包括对彭德怀的批判，他曾说，可能真理在你手里，也包括他后来对“文革”的三七开，都表露出他对这些问题有另外的思考。

**汪裕尧：**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一下。过去流传过一种说法，说编《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派一个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高的同志来中国，因为在理论上没有把握，后来斯大林派尤金到了中国。尤金来中国确有其事，也确实看过一部分编入毛选的稿子。但内中的原因并非流传的那样。1958年7月他同尤金当面说过：斯大林派学者来看文

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也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了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假的马克思主义。你回去说了实话，说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

**访问者：**话说回来，毛泽东亲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并认为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他又说“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多少也说明了他对“文革”的不自信。

**汪裕尧：**这已是“文革”后期的事了，我们谈话开始时引用的那段话是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如果我们再深入地想一下，为什么毛泽东“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他的自信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我认为是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在相信群众力量的基础上，他不是盲目的。只要是认准了的事情他会坚持到底，不会随意改变的。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怎样的坚定和自信，这和他在实际斗争中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有很大关系。在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上，对中国农民的了解上，他比别人认识得都早，都深刻，他能找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和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切身的感受和体会，就不可能那样满腔热情地来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也很难说会摸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所以他的自信，他对革命前途的信心，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对解放全中国的气魄，都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论遇到多大的曲折，他本人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和挫折，都能使他自信心不减，坚持到底。

同样，他的不自信也是由于没有坚持调查研究，对真实情况缺乏深刻了解造成的。建国前夕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



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应当说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并为此付出许多的努力，也取得一定的成功。但是，由于国际国内许多复杂的原因，以及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某些认识和决策上的错误，加上在调查研究上受到的限制，使他这方面的努力未能一贯到底，失去了对实际情况的真切了解，因而尽管他的本意是好的，是为国为民的，但实践的结果却事与愿违，必然是一场悲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地总结了这些历史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借鉴了国际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面临的许多新的问题，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令人惊喜的变化。这是很可告慰于他老人家的。

1993年12月于北京前毛家湾

# 访王蒙——

## 我看毛泽东

王 蒙

王蒙，河北南皮人，1934年生于北平。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后因发表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受到错误批判，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得到平反。其间在新疆生活了16年。复出文坛后他的文学创作成绩斐然，多次获国内外各种奖。历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化部部长和中央委员等职务。

这是北京早春的一个下午，日光融融，春风和煦，我们访问了王蒙同志。王蒙作为一个中外知名的作家，我们与他的谈话自然也是从文学开始的。

### 三生有幸的一次关注

**访问者：**文学不能简单地裁决历史，只能反映人在历史中的命运、体验和感受。毛泽东已经成为历史人物了，但他又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和现代中国人的命运、历史及文学紧密联系着，您作为一个作家，怎么看毛泽东？

**王 蒙：**我无缘与毛泽东有直接的个人接触，50年代，只

是在大型会议上或“五一”“十一”群众游行集会时，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我在城楼下，作为一个青年团的干部，带领一批青年学生游行而过，算是能见到他一面。记得距离最近的一次，是在中央团校毕业时，受到他的接见。

**访问者：**哪一年？

**王 蒙：**1950年4月，中央团校第二期毕业。那次接见不光是我们，还有海军一个会议的代表。大家坐在下面，静候他的到来。毛泽东出来后，向大家招手，聚光灯打得很亮，然后由军队的同志和我们团校的学生代表分别上去讲话，向毛主席表决心。这算是最近的一次，所谓近，也有一二十米。

**访问者：**当时你有什么感受？

**王 蒙：**那时的年轻人都一样，见到自己的领袖，尤其是见到毛主席，都很激动，好像还喊了万岁。

**访问者：**除这种人数很多的集体会面外，你和毛泽东还有过什么关系吗？

**王 蒙：**说起来有趣，他对我唯一的一次具体关注，是对我的一篇小说给予了关心，对我来说真是三生有幸。这是1956年底1957年初的事情，当时全国对我的那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小说进行了争论，毛泽东知道了，并且讲了话，他的讲话虽然没有正式发表，但我还是听了他讲话的录音。

**访问者：**毛泽东是在什么场合讲的，讲了些什么内容？

**王 蒙：**他讲了多次，包括在颐年堂召开的新闻、出版、文艺座谈会上，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都讲了这个问题，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听了录音。几次讲的意思大致内容是这样：听说王蒙写了一篇小说，有赞成的，有不赞成的，争得很厉害，反对的人还写了文章对他进行“围剿”，要把他消灭。可能我这也是言过其词。我看了李希凡写的文章

(指李希凡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不大满意，李希凡也是新生力量嘛，现在写文章我看不懂，大概是当了政协委员的关系吧。毛说到李希凡时有点讽刺的意味，不过时过境迁，这些都没关系了。现在李希凡还是我的朋友。除李的一篇外，还有一篇，就是陈其通、陈亚丁、鲁勒、马寒冰四个人合写的准备在《人民日报》发的《是香花还是毒草》，要把我的那篇小说打成毒草。后来这篇文章的清样送到毛泽东那里，他看后非常不满意。

**访问者：**他们四人当时受到批评，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

**王 蒙：**可能跟这有关系，说他们是教条主义。因为在这之前，他们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谈整个文艺的形势，受到批评。他们后来写的这一篇也被毛泽东制止了，文章没有发出来。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说，反对王蒙的人提出北京没有这样的官僚主义，中央还出过王明、出过陈独秀，北京怎么就不能出官僚主义？王蒙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我也不认识王蒙，不是他的儿女亲家，但他反对官僚主义我就支持。他是共青团员吗？(别人回答说：不是，是党员。)是党员也很年轻嘛，王蒙有文才，就有希望。当然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也有缺点，正面人物写得不好，软弱无力，但不是毒草，就是毒草也不能采取压制的办法。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接下来，他还引了王勃《滕王阁序》中最有名的两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说：我们的政策是落霞与孤鹜齐飞，香花并毒草共放。毛泽东的讲话内容我记得就是这样。他讲这些，当然都是从最高意义上作为一个政治家讲的，我体会他是想通过这件事尽可能把空气搞得活跃一点，创造一个自由环境，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些讲话给了我

极大帮助，起码也有保护作用，使我的处境一下子变得很好。当然这些都发生在反右之前。

**访问者：**毛泽东保护了你，后来为什么还把你打成了右派呢？

**王 蒙：**现在有很多外国记者也这样问我。我说，不知道。我只知道反右派运动一起，各报刊对这篇小說还是予以否定，时间不长，我就被定为右派。定我为右派的过程和内情到现在也不知其详，我也不想知其详。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送到毛泽东那里，他借题发挥讲了那么多道理来开展鸣放，他是不满意苏联的教条主义，也不满意那四个人的文章。四个人的文章在苏联的《文学报》上转载了，钟惦斐的《电影的锣鼓》在南斯拉夫的报纸上也转载了，毛泽东说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认为钟惦斐的文章有点右，四个人的文章是“左”，当时他把苏联作为“左”的教条主义来批评，同后来我们批评苏联修正主义是不一样的。至于我自己定不定右派，我认为没必要报到他那里也不可能是经过他的过问的。

**访问者：**后来的整个形势都变了。

**王 蒙：**我当时顶多算副处级，根本用不着报到他那儿去，他也不会再有兴趣。再者他的整个思想有变化，我看他后来的思想是发生了重大变化。

**访问者：**你的小说要是放在1957年后发表，情况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王 蒙：**恐怕更糟了，幸亏他老人家说过那些话，虽然给我定为右派，讲老实话对我还是比较客气，对我的处理也是最轻的，报纸上也没有大张旗鼓地要把我批倒批臭。

**访问者：**这可能和毛泽东年初的讲话有关系？

**王 蒙：**我觉得有点关系，所以从我个人来说，我很感谢老人家，起码他对我的小说保护过。当然我无权也无法要求像他这样的党和国家的领袖不断地过问我的创作、个人的遭遇，我不能那样去要求，也不应该再去麻烦他。说你一次已经三生有幸了，还能等着再来？

## 浪漫主义的情怀

**访问者：**你如何看待毛泽东？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王 蒙：**1957年反右以后，我陷入那样一种处境，当然没有可能和毛泽东接触，但即使没有给他汇报工作或接受他的教育的机会，也总有一种感觉存在，这种感觉除去大家都知的他作为总体在历史上的作用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拥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他的诗歌是浪漫主义的，他的书法也是浪漫主义的。

**访问者：**就是说比较有气势。

**王 蒙：**有气势，不受约束。他的思想非常自由奔放，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也喜欢说些比较惊人的话，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有时他把一些大事说得很小，“天塌不下来”这是他喜欢说的，还有“文革”中也说过这样的话“无非是死几个人”。

**访问者：**50年代末他在提到不怕原子战争时，也曾说过无非死几个人，即使死一半，还有一半继续革命。

**王 蒙：**这个特点最突出。他批评王明教条主义，用的方式也是非常轻松的惊人的方式，说他们无非就是不知道几个事情：第一不知道人要吃饭，第二不知道打仗要死人，第三不知道路要一步步地走。（大意）你看他讲得多么轻松，好像是很小的事情，但实际上抓住了要害。教条主义搞了许多

高深的理论，反倒回避了生活，其实革命包括战争是最实际的东西。教条主义的要害不在于用理论比较理论，那很难鉴别，不容易驳倒，我在解放前就看过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光看书，王明也是一套一套的，不能看出他有什么错误。毛泽东用三件事来批驳王明，是抓住了他最要害的地方。

毛泽东的有些做法，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比如他最喜欢游泳，就进而在全国掀起了一个高潮，游泳本来是国家体委的任务，最多由荣高棠抓也就够了，可他亲自抓。

**访问者：**他给游泳赋予了政治方面的意义。

**王 蒙：**不仅是政治方面，还有哲学方面的意义，后来变成一条语录，“大风大浪并不可怕……”。“文革”中的红卫兵拉练，是最典型的毛泽东方式，既解决了实际问题，又给它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实际问题是红卫兵到处串连，都上火车，火车受不了，整个铁路的运行秩序已经一塌糊涂，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叫红卫兵不坐火车，徒步拉练，用这种浪漫的方式解决了实际问题。还有金门炮战中提出“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都是不可思议的，非常富有想象。

**访问者：**似乎像猫玩老鼠，给人一种游刃有余的感觉。

**王 蒙：**1958年“大跃进”中批评所谓右倾保守，他引用了枚乘《七发》，这个事例一方面说明了他的才气，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独树一帜，不能什么事情都从第三国际的条文里或《联共党史简明教程》里去找根据。

**访问者：**就是说，他有中国气派。

**王 蒙：**中国气派，非常独特的。这种浪漫主义和他作为一个革命家的自信、自负有关系，同时也和他的个人经历

有关系。他从一个很普通的山坳里出生的农民子弟，到一个师范学校的学生，再到一个最一般的图书管理员；在党内，一开始的地位也不高，可到最后，他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的领导人，并成功地领导了中国革命。这种浪漫主义，还和中国革命根据地所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军事共产主义是很平等的，顶多分为大灶、中灶、小灶，区别很小，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上下级关系都很密切，在人们中有种精神的力量，所以毛泽东实际上喜欢强调精神的作用。

**访问者：**他非常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

**王 蒙：**很注意精神，比如那段著名的吃苹果论，提出“不吃苹果是很高尚的”，多么形象、深刻。用这种浪漫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结合起来，在解决一些革命任务时他获得了非凡的成功。包括“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这种说法，也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因为这很难从理论上作出细致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出在山沟里，而是现代工业，起码是近代产业革命之后并且积累继承了一个长远的文化传统的产物。但他讲山沟里可以出马克思主义，因为中国革命的依据恰恰是在山沟里，所以他这样讲是有道理的，并且是反驳王明对山沟的不敬。在指导战争中他提出的许多军事思想，既是非常实际的又是很浪漫的，几大战役的策划，总体上的以少胜多具体上的以多胜少，都成功了。

但这种浪漫主义又有它的缺陷，毛泽东晚年的悲剧就在于他把在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经验照搬到经济工作与治理国家中，特别是用那种浪漫主义的办法来搞经济，遭受了挫折。

**访问者：**这就是说，当他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时，他



仍把他的浪漫主义运用到这个范围中就容易出毛病。

王 蒙：特别是搞经济建设，因为经济生活的很多规律并不浪漫，至少利益原则一点都不浪漫。但毛泽东不信这个利益原则，他动不动就讲我们在延安时如何，没有这套东西不是照样也成功了吗？完全忽略了在掌握政权前，当时还是一个比较小的根据地或革命队伍人数不太多的情况下，人们组成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关系，和后来掌握了政权以后，面对一个几亿、十几亿人口的国家把社会生活组织起来，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访问者：这恐怕是两个规律，也就是说革命的规律、战争的规律同搞建设的规律是不一样的，不能生硬地搬过来。

王 蒙：对。但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说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第一的，人怎样生活就怎样思考。延安时期，基本的一条是军事共产主义，顶多分大、中、小灶，胡宗南进攻延安，把中、小灶撤销，全部吃大灶，毛泽东也去吃大灶。但解放后能这样吗？当然了，就是在延安时毛泽东也不可能天天这样，但起码他可以走到农民那里，抱起一个娃娃，和农民随便说上几句话。建国后这些都不可能了，光保卫制度也受不了。所以军事共产主义可以用它来夺取政权，但不能用来巩固政权，特别是不可能发展生产力，因为政权一掌握，老百姓就要求你提高他的生活，否则他就不会拥护你。可见，你如果不能发展生产，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总是一个缺陷。

访问者：很多问题就会出现，不尖锐的也变得尖锐了。

王 蒙：所以他的浪漫主义必然要跌跟头，不重视经济规律，不重视物质利益原则，不重视市场价值，发展到“文革”，他的浪漫主义更达到顶峰，严重脱离了实际。他是想建

立一个和所有社会都完全不一样的理想国，可是这个理想国不但没建成，相反的，由于“文革”的发疯，严重破坏了生产，破坏了社会的安定。

**访问者：**“文革”的发动，有理想主义的因素，是不是还有别的动机？

**王 蒙：**原因很复杂，有他对社会的理想主义，但又有党内的斗争、人事的关系、国际环境的作用。这问题太复杂了，一时说不清。在经济生活上，毛泽东一直保留着许多他在革命战争中的习惯用语，所以1958年他提出的一些经济口号都是当年打仗的口号，什么“钢铁元帅升帐”，“电力、交通是先行官”，“打歼灭战”，砸铁钢也要把钢铁搞上来，一年翻一番等等，这些要用在战争中很可能是行之有效的，但搞经济建设不行。战争可以这样，为打下一座城市不惜一切代价，先控制了再说；经济建设不能为了钢铁产量其他一切都不管了，国民经济的均衡全部破坏，以后用了几年国民经济才慢慢恢复。我有个感觉，从1959年以后他已经不太爱大篇地讨论经济问题，他有点回避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问题。

**访问者：**是不是对于经济问题的心态很矛盾，一方面他从来就不想照苏联的模式走，但他自己搞了一次又不成功，找不到一条合适的路，心里很矛盾？

**王 蒙：**他对苏联的不满是由来已久的，1956年前后，他是想搞索出一套和苏联不同的路子，他先提出百花齐放，又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要树立一个比较灵活、务实的社会环境，建立一个实事求是的社会主义国家，走一个和苏联不一样的中国独特的道路。但他这样做的结果，在1957年后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个是他确实受到了某些知识分子给予他确实承受不了的批评的压力，另一个是他受

到了党内一些不赞成他的新思路的人的压力。所以 1957 年后，虽然走了和苏联不一样的道路，但恰恰是走了比苏联更“左”的道路，这又是他的悲剧所在。

## 中国的文人和政治

**访问者：**在文艺上，毛泽东有些什么特点呢？

**王 蒙：**在文艺上，毛泽东个人的创作是非常豪放的，他对艺术的爱好不俗，他喜欢庄子、孟子、屈原、三李，他的爱好也不是很一般的爱好。

**访问者：**比较大气。

**王 蒙：**很大气。他有时直接引用李贺的诗，很喜欢庄子“鲲鹏展翅九万里”的境界。但他在文艺上发动的思想批评运动太“左”、太厉害了。从建国初就一个接一个，几乎没有断过。

**访问者：**从一个因素说，中国的文人和政治好像总爱搅和在一起，脱离不开。

**王 蒙：**这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前不久一份报纸登载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其中有一段不管是真是假挺有意思：毛泽东让他的护士读史书，读完后讨论起“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段话，毛泽东说，这实际上说客气了，三十年也不成。然后问，你说为什么？护士不好回答。他接着说，因为秀才有两个特点，第一，光说不干，说完就完；第二，一个瞧不起一个，永远团结不起来。如果这话是毛泽东说的，那真是说对了。

**访问者：**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有些特性摸得很透。

**王 蒙：**他是一道一道收进去的，最后谁也跑不了。

**访问者：**中国文人和政治分不开，也不能简单说分开就

好？

**王 蒙：**这和历史的情况有关。抗日战争时期怎么能分开？大家都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解放战争时也分不开，全国人民都面临两个中国之命运。相反，社会越稳定，文艺反倒可以和政治适当分开。现在实际上已经分得很开了，起码很多歌舞、绘画不能说每个都和政治有密切关系，有的就是娱乐，所以，社会稳定反倒慢慢能分开。据我看毛泽东对文人有一定的蔑视，也有一定的不信任感。

**访问者：**他有时说，书读得越多人越蠢。

**王 蒙：**他喜欢举一些特别极端的例子。比如说青霉素是一个染坊老板偶然发现的，这作为科学发明的趣闻轶事可以讲，作为科学研究的普遍规律就离谱了。其实，讲到作家的趣闻就更多了，比如他批评大学教育时，说文学系的毕业生不会写小说。这也不合道理，写小说不是文学系的任务，作家的培养是另外的路子，文学系是研究文学、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培养文学教师和语文工作者，不是培养作家，不能用这个责备。

**访问者：**毛泽东的讲法表示一种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感，但有时他又表现出一种自信，比如他经常说，不要妄自菲薄，不要怕教授，小人物可以打倒大人物等等。

**王 蒙：**历史的规律是小人物打偶大人物，这话又对又不对。小人物打倒大人物是可能的，但小人物也要向大人物学习，如果否认学习和借鉴的作用，只看到打倒就不对了。我们经常说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还有三个来源，说明马克思也是向前人学习的，不能见一个大人物就打倒一个，这太可怕了。

## 毛泽东对现代的影响

**访问者：**小人物和大人物的关系，也应该看作是批判和继承的关系。我们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时代和毛泽东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至少思路不完全一样了，那么，毛泽东对我们现时代的意义何在？

**王 蒙：**我看它的意义就是一个革命党要完成从夺取政权到管理国家，特别是要组织好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转变。毛泽东在世时没有很好完成这个转变。这个任务实际是由邓小平完成的，邓小平恰恰是高明地把握了毛泽东失误的这一点，把党的工作重心从搞政治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所以邓小平提出现在不搞争论，因为对一个执政党来说，绝对不能是按照条条框框来执政，只能按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对发展生产有利这三条，这也是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才能努力地起一个国家管理者的作用。但我认为毛泽东的个人魅力仍然存在，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会感受到，因为他毕竟开辟并领导了一个时代，哪能一时半会儿就消失呢？至少他的才能是卓越的。

**访问者：**他的才能起了什么作用？

**王 蒙：**他的才能是超常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超常不见得都是好事。作为一个政治家特别是执政的政治家来说，有时想得太超常就脱离了凡人世界。比如他经常嘲笑，无非是打破一些坛坛罐罐，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不应该嘲笑，老百姓当然要保护他的坛坛罐罐，总嘲笑普通老百姓过安定生活，包括在经济上的安定富裕的要求，有什么好处呢？这和他的超常思维有关系，他的超常思维尤其表现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上，那道理太高明、太伟大了，连按劳取酬都是资

产阶级的。问题是那时中国连起码的按劳取酬还没做到。现在也没完全做到，脑体倒挂就不符合按劳取酬原则。把这些都批了就更空了，我们到底要干什么呢？所以他的超常，也就带来了悲剧性灾难性的后果。

**访问者：**他在群体中是不是有一种孤独的东西，还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

**王 蒙：**别人跟不上，但反过来造成晚年对群众利益的漠视，虽然他一辈子讲群众观点。到晚年时，包括党内的很多干部都有种跟不上的感觉，越喊紧跟越跟不上。他的思想在晚年仍然非常活跃，仍然不断有新东西冒出来，但有些又不完全符合实际。这个经验教训是非常重要的。

**访问者：**对他领导民主革命的成功有比较一致的共识，但他在领导建设中的曲折和教训，对我们今天可能更有用。

**王 蒙：**有些问题我无从了解，如他的个人性格，我没有资格胡说。现在追究这些已毫无意思，因为他这个人已经是历史人物了。但从考察历史这点上说，他没有从革命时期成功地完成向管理国家和组织经济生活的转变，包括我在前面说到的对群众一般利益和要求的漠视，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但另一方面，他的坚强的意志、乐观的精神、奔放的思路和对国家前途的憧憬都是好的，是我们这一代甚至包括下一代人都要学习的。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英雄，他是了不起的。

1993年2月1日于北京朝内北小街

## 访陈晋——

### 我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

陈 晋

陈晋，1958年生。籍贯四川。1982年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1986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后，曾工作于原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现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文艺评论与毛泽东研究。有《文艺的观念世界》、《当代中国的现代主义》、《悲患与风流——传统人格的道德美学》等专著。

陈晋近几年的研究颇受人注目。年龄的优势更使他的思维敏捷而活跃。由于我们和他挺熟，聊起来也就很随意。话题是从他新出版的《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毛泽东与传统文化》两本书开始的。

#### 打开另一扇窗户，你看到些什么？

访问者：最近看到了你的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一本是《毛泽东与传统文化》，都与“文化”这个概念有关。我们知道，你没到文献研究室以前，主要是搞文学评论的，从文化个性的角度研究毛泽东，在你除了“因地制宜”的原因外，还有对毛泽东研究本身的一些考虑吗？

**陈 晋**：如果说我来这里搞毛泽东研究是意料之外的事，那么，从文化个性的角度写毛泽东，正如你们所说，则在自己意料之内。熟悉党史、哲学史或经济学史的人往往都有自己固定的研究角度和模式，这是我们可以经常看到的。就我来说，选择文化个性这样的角度，有扬己之长避己之短的切实考虑，也有创新的愿望。从事毛泽东与中国文化传统研究较早的汪澍白教授取得的成果就是一个例证。

**访问者**：从文化个性的角度来剖析毛泽东，是不是也意味着可以避免成功或过的硬性定论？

**陈 晋**：可以这么说。取一个软性的视角，这对读者来说可能也会有新意，哪怕是同样的内容。比如，对于“大跃进”政治、经济诸方固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共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有明确的阐述。而我的研究视角是：毛泽东那个时候处在什么样的心态之下？举个例子，他那时喜欢读什么书呢？他喜欢读《楚辞》，喜欢读《离骚》，浪漫而又富于想象的作品，读了以后还给江青写封信，说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心中喜悦，有所领会之类的话。这就很值得玩味。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批评了“反冒进”，对发动“大跃进”运动举足轻重，这个时候毛泽东去读《离骚》，读得那么晚还要给江青写信，这么一个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他到底领会的是些什么东西呢？他又是怎样进入上天入地、纵横捭阖充满驰骋想象的那种诗境，与几千年前的诗人对话的呢？有人统计过，从1957年到1958年，毛泽东读过好几遍《离骚》。又比如这时期，他在与身边工作人员和外宾的谈话中也似乎不着边际地问道，我们到底是住在天上还是地上？这个问话，他还拿到中央的会议上说过。他读《光明日报》发表的介绍苏联火箭之父成长经历的文章时，在充满幻想的一段



文字描写之下画了很多的着重号。这都是很有意思，很耐人寻味的。我力争把这些描述出来，挖掘出来，归纳之后作这样的表述：在推动“大跃进”运动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伴随着毛泽东的始终是他的浪漫性格和丰富的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在一个诗人、哲学家身上，是充满魅力的，问题在于，毛泽东不单是诗人、哲学家，他还是一个政治家，一个国家管理者，优势扩大了范围，用错了范围，就变成了劣势。我就是这样从文化性格的角度接近毛泽东的主观心态，一方面有利于了解他的主体特征，另一方面对他在现实实践中的一些功过作新的层而的剖析。

**访问者：**研究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思想，就必然离不开研究毛泽东的社会实践和中共党史，这中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就我们现在的研究状况来看，比较习惯的思路是从重大的党史事件中看毛泽东的决策过程，或者从各个社会科学领域去研究毛泽东思想，这方面的成绩不小，研究起来也驾轻就熟，但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落入了某种研究模式呢？意味着忽略了毛泽东的性格本身的研究？

**陈 晋：**是存在这样一些问题。研究一个伟人，当然要和历史事件及其思想路线联系在一起，但在这之后，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毛泽东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上面；而且，通过事件折射出来的也是他的个性，因此，从文化性格的角度去看毛泽东，可能会更直接一些。打个比喻，如果毛泽东研究是个房间，大家都从这扇门进去从南往北看，那么我就绕到后面打开后面的一扇窗户从北往南看，这个角度不一定比从南往北看好多少，但至少弥补了从南往北看所看不到的东西。

**访问者：**这个比喻很有意思。看起来这样的窗户还不少。比如毛泽东的人际关系，他和他的战友、朋友、下级，甚至

他的对手、敌人的关系怎样？从这其中表现的毛泽东的性格又怎样？这样的研究恐怕还不够。缺少这种种角度，不打开这一扇扇窗户，就很难说是全面地走近了真的毛泽东，真正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去认识他，理解他。

**陈 晋：**可供研究的领域的确很多。举个例子，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1950年淮北地区发大水，受灾严重，毛泽东看到一份报告里说有些灾民为躲水爬到树上，有的被毒蛇咬死，他伤心地掉了眼泪，很感人。我又听说过这样一件事，1954年长江发大水，武汉地区受灾严重，淹了好些地方，毛泽东听后说：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觉得，这并不有损于毛泽东什么。恰恰这两个例子反映的是毛泽东性格的两个侧面，一个是同劳动人民的天然的感情联系，另一个是他那种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图画，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勇气和斗争精神。

**访问者：**也就是“不破不立”。

**陈 晋：**毛泽东叫好，有两层意思，一是不在自然灾害面前吓倒，这就毛泽东的个性来说，是很自然的反应；就像他1959年在关于福建沿海发生沉船事故的一个报告上批示的那样：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另外，他想得更远，旧的了，新的建设有待我们的加倍努力。这两个例子一个感伤，一个叫好，孤立起来看是对立的，但放在一起仔细琢磨，就可以发现，这两个方面互补起来，才是完整的毛泽东。

## 天然的现代型个性与中国传统文化

**访问者：**厦门大学的汪澍白教授也是研究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但似乎角度不一样。他主要从哲学、政治上探

寻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你是更着重于毛泽东的文化性格。那么，文化性格到底是指什么，你能不能作一个概要解释？

**陈 晋：**这很难说清。我在《毛泽东的文化性格》这本书的后记里，说自己写作的侧重点是：人格道德、社会理想、政治革命与文化变革的关系，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毛泽东的主体个性及诗文意气与他的实践活动的关系等等。所谓“文化性格”大体就包含了这些内容吧，不知道能不能表述准确？中国这片文化土地给了毛泽东什么？毛泽东从这片土壤中又吸收了些什么？他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吸收和表现出来的？前一个问题具体地说，就是中国传统思想渗透到毛泽东血液里的是哪些东西，中国社会当时的现实状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背景与社会环境又给了他哪些东西，这是文化；后两个问题，毛泽东怎样吸收以及吸收的方式，他有别于他人的表现，这就是个性。把“文化”和“性格”放在一起形成一个概念用得不多，也不一定规范，但它有两个好处，一是明确性，指明我研究的主题在文化与它的主体这两个范畴之内；二是含混性，用它来避我所短，扬我所长，使用材料能够说明他的个性特征的就用，反之不能说明的就不用，自由度更大些。

**访问者：**那么，就你的研究来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是怎样的？

**陈 晋：**我谈些随感吧。有些说法我过去没有表述过。单从个性的角度而言，我觉得，毛泽东是天然的现代型。换句通俗点的话说，是最时髦的人。他的眼光，他的追求，他的创造，都是往前看的。纵观他的青年时代到晚年岁月，他一生厌烦的就是陈词滥调，墨守成规，而对新生事物不但乐于

叫好而且乐于接受。可以说，毛泽东是现代文明的崇敬者、追求者、构想者乃至描绘者，但是（这里有个但是）由于客观因素——中国传统思想、中国社会现实状态乃至中国革命具有的特点的影响，以及他的知识背景的局限，又妨碍毛泽东成为具有彻底的科学理性的现代型人物。人，总是不能超越时代来塑造自己的。

**访问者：**那么，现代型个性与传统思想的影响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在毛泽东身上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

**陈 晋：**它们有的时候是一致的，有的时候是相背的，有的时候则显现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互相交织在一起，这就需要进行剥离。

比如说民主与革命。毛泽东从小就反抗父亲严厉的管教，求学时期较多地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想，后来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光辉成果，它的精髓之一就是反对阶级压迫，反对不平等的制度，求得全人类的解放。毛泽东自始至终是抱着这个信仰的，包括他晚年，看不得小人物受压制，总替他们说话。这既是他天性的表露，也是他后来接受现代文明发生的效应。追求民主，追求平等，是毛泽东一生中的相当核心的两个方面。以现代性的民主、平等来反对专制、压迫，这样的事在毛泽东一生奋斗的过程中是很多的。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由他来为中国革命掌舵时，他仍然没有放弃这个追求和目标，然而他最终所选择的方式都是以暂时的不平等不民主来实现永久的平等民主，以对一部分人的不平等不民主来实现大多数人的长远的平等与民主。这在革命战争时期是难以避免的，但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仍然用这个方式，就未必妥当了。这是从实行民主、平等的手段和方式上来说的。

另外，从毛泽东对民主、平等的勾画描述来看，他是过多地强调结果的平等。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包袱。“平等”两个字在中国不是新鲜词，哪一起农民起义没有提出劫富济贫的均贫富思想的口号？这类口号要求的是平等，但它和西方现代文明所讲的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平等不同，它不讲起点而要求同时到达的结果。如果说这在封建剥削制度下没法让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来追求平等的情况下，是势所必然的话，那么，在已经完成剥夺剥削者的革命进程以后，就不能这样了。毛泽东后来在民主、平等问题上有所失误，恐怕就在这里。

“五七指示”也是一个例子。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其实这种思路在延安时期他就有，他对劳动模范们讲话，说你们也应是军人；他对抗大学生讲话，说你们是军人，在这里读书，又能开荒生产。这种思路给人的感觉就是谁也不能比别人强，也不能比别人弱，每一个人都应该担当起社会的全角色，身分、能力都要一样。1958年和“文革”两次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权利），不是偶然的。

**访问者：**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积极影响在学术界多有讨论，没有对中国这片土地深刻的了解，就无法实现对它真正深刻的变革，这是无疑的。但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影响的负效应呢？传统的羁绊，是不是也限制了现代型个性毛泽东的眼光，限制了毛泽东向前迈进的步伐，甚至有的时候在拖后腿？

**陈 晋：**毛泽东是一直向前迈进的，但他有时却用传统的方式迈步，他对前景的勾画也有很深的传统的烙印。

**访问者：**可以说毛泽东改变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进程。现代型的个性与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同时作用在他身上，那么他把革命推向前进的时候，他更多地得益于自己性格的哪一方面呢？

**陈 晋：**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是需要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切实深刻的了解的。我觉得，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四个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有意思的是接受西方文化更多的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失败者。孙中山是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的，但他却无法驾驭辛亥革命，被袁世凯这个独夫民贼篡了权。蒋介石受中国传统思想熏陶很多，在军阀混战中他建立了自己的统一政权。周恩来很受西方文明熏陶，但他最终只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批“反冒进”以后，他很难旗帜鲜明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毛泽东成功了，他很明白，革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的中国搞起来的，要达到胜利的目的，不可能不借用传统的方式、传统的手段，“八七会议”后他带兵上井冈山，就是一个这样的选择。

**访问者：**毛泽东在与蒋介石的斗争与周旋中，也非常熟练地运用了中国的谋略。近代以来，有许多仁人志士从西方从苏联留学回来，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法，但最后的成功者却是从来没有留过洋的毛泽东，仔细想来，这里边的确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还是回到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的问题上来吧。

## 时刻可见的“对立统一”

**陈 晋：**我现在正构思写一篇文章，内容是写在毛泽东身上时时刻刻可见的既对立又统一的东西。这里借用毛泽东

常说的“对立统一”，表达的意思是说，在毛泽东身上时常同时存在融会了两种极端相反的气质。我们刚才所谈到的现代与传统是一个，此外，还有现实与浪漫、“虎气”和“猴气”、政治家与诗人、逞强与悯弱等等。

比如“猴气”，就是道家的灵活性，进于不得不进，退于不得不退，可进可退，追求人生与世界的最终价值。“虎气”，就是儒家的庄严，威武，统一。毛泽东一身兼具这两种气质。其实，不论是道家，还是儒家，对毛泽东的影响都存在。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提出过反儒反孔，但我认为，实际上他是在最深刻地接触儒学之后才反儒的。对儒家的那一套，他吃得最透，而且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溶化到血液之中去了。人常有这样的情形，最熟悉的东西往往是自己所瞧不起的，而对不熟悉的东西反而恭敬有加。毛泽东对自然科学一直是持很恭敬的态度，他反儒，但他的言谈之中，书信之中，却随处可见孔子孟子的原话。他熟悉诗子百家的著作，运用时随手拈来，炉火纯青。青年时代，他曾立志要做圣贤之人，探究人生的大本大源，崇尚运筹帷幄，而对纵横疆场，野战千里的人不以为然，认为只是豪杰而已。这都反映了他与儒学之间的联系。晚年的毛泽东为什么如此讨厌孔子，是很耐人寻味的。

**访问者：**五四时期，青年毛泽东发表过不少反对尊孔的文章。

**陈 晋：**是的。但那只是追随着时代的潮流，反对当时尊孔的思想气氛。他不是说过吗，我们反孔不为别的，单为他独霸中国的思想。至于反孔到底反些什么，他没能说出个所以然来，细读他的这些文章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我讲过，他是一个现代型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处在“五四”这样的时代，

他肯定会大喊反孔而不是去做别的。那时他大喊反孔，却没有触及儒学的实质性东西，他写反孔的文章，而不久前他还在谈圣贤之人与圣贤之事。他反对孔子，目的只在于促进思想自由，而不是反孔子本身。他所具有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强调主观意志的作用，这本身就带着儒家的色彩。

其实不仅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的东西在毛泽东身上都有反映，拿来为我所用，并且融为一体。墨家是与儒家反其道而行之的，强调务实、勤苦、节约、禁欲、集体主义与献身精神，这是从下往上走的小生产者的人生哲学。中国革命的力量是由农民为主体的小生产者组成的，因此，对于墨家学说的影响非常易于接受。毛泽东对墨子还说过这样的话：墨子是比较孔子更高明的圣人。

看上去相反的东西在毛泽东身上却是融为一体相辅相成的，还有做政治家又做诗人。做政治家与做诗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诗人当政治家往往是失败者，政治家写诗往往很干瘪乏味，但毛泽东既能当政治家还能是一个很好的诗人。他把这两个范畴的东西统一起来，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对既成建国大业又写诗的曹操评价很高，也很爱读他的诗。相反，他批评坐享其成做了帝王后来又丢了江山的李煜，说他只会写诗不懂政治。毛泽东是有资格说这话的，因为他自己作诗挥洒自如，政治上也驾轻就熟。这是他独具魅力的个性，也是天才的显露。

还有逞强与懦弱在毛泽东身上的统一。所谓逞强，就是不但不信神，不怕鬼，而且要打鬼捉鬼。看毛泽东的人生历程，往往是越处于逆境当中他的才华就发挥得越充分，他喜欢在压力下生活，日子过顺了，好像反而没意思，有时免不了人为地制造点压力。



**访问者：**说到这里，使人想起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的一次谈话。那次，毛泽东讲到自己时说：与其说我是写文章的，不如说我能同反对我的人打仗更合适些。不打仗了，有时候病也来了，出门不骑马，坐汽车、火车、飞机。……每天走10里路，骑20里马，非常舒服。他还说：简单的生活，对人反而好一些。这是毛泽东的生活态度，表现在宇宙观上，他就强调世界的不平衡的一面，动的一面，强调斗争的一面。

**陈 晋：**是这样。这是逞强的一面，他的另一面就是懦弱，非常同情、照顾、扶持、抬高那些小人物，有时甚至不太讲原则。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随处可见。

**访问者：**这大概多少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关，上学时，富家子弟看不起他这个农家子弟。革命初期，在党内留过洋的、学过军事的又看不起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土包子。在江西的时候，就曾有人针对他说，山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

**陈 晋：**他给小人物们做思想工作也是很有特点的。1959年时，他告诉农村的那些穷队，穷要有志气，王国藩不是靠三条半驴腿办起了合作社吗？搞出点样子来给富队看看。他就这么做工作。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性格是“对立的统一”，毛泽东的思维方法也是什么事情都习惯于一分为二。他的成名作，《毛泽东选集》的开卷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打头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富有个性的政治生活的开端，也是反映他政治思维方式的开篇。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他就是这么把世界劈成两半的，不属于这一半，就属于那一半，并且一旦作出选择，就一生以这一半去反对另一半。

**访问者：**这种思维方法是中国式的？

**陈 晋：**不是。中国人喜欢调和，搞中庸，不善于搞非此即彼。打倒一方树立自己是西方的思潮。就拿文学来说，最早是古典主义，是浪漫主义把古典主义打倒了才起来，后来是现实主义打倒浪漫主义以站稳脚跟，再后来又是现代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批判。中国人的思想具有包容性，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四书五经，就那么一点点，几千年来注家纷呈，把它们的内容越说越多，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反儒的人，也要借注解经书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从思想方法上应该说，西方和中国是不一样的。毛泽东习惯于把世界劈成两半更多的是从西方的文化思想中来的，但同时毛泽东本人又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所以我说他的思维方法是中西合璧。

这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是在什么起点上用什么方法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并没有读多少马恩著作的原文，他读的只是仅有的几本别人的翻译本，他抓到了其中的一条核心，这就是“阶级斗争”四个字。他最早理解的唯物史观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一大贡献，但毛泽东抓住了它后把世界劈成了两半，“一分为二”。毛泽东找到了这个方法之后，延伸到意志上来，便是他的目标是无穷尽的。他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吗？不到黄河不死心，到了黄河心也不死。不断革命，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共产主义，传统的表述是平等大同，仁。这是人类从来没有实现过的一个理想，但这种几乎永恒性的目标一旦被当作阶段性的目标来实现，最后就会出现像“大跃进”这样的失误。毛泽东给人的感觉是他的奋斗目标的无穷尽。把世界劈成两半又没有穷尽的目标，这使得毛泽东习惯于斗争，习惯于压力，如果一旦没有压力，他就会不自觉地人为造成一种压力，

去进入下一个阶段，去接近他的永恒目标。可以说这是造成“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错误的毛泽东性格上的原因，这就又回到他的个性分析上来了。

**访问者：**看来，对毛泽东真是有说不完的话题。时间不早了，今天就到这里？

**陈 晋：**好的。

1992年7月27日于北京前毛家湾

## 访汪澍白——

### 建国后毛泽东的文化观发生了变化

汪澍白

汪澍白，1923年生，湖南人。现为厦门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毛泽东早期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其《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源》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可称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其它的著作还有《艰难的转型》等。

我们是在北京一次会议上巧遇汪教授的。采访过后，便熟悉起来。那时，他正在写他的新著《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微》。他从厦门来信说，天热，只得在靠海边的林荫下工作。

**访问者：**近几年研究毛泽东的文化观成为一个热门课题。但是，很多人对它并不甚清楚，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请谈谈您研究毛泽东的文化观究竟想告诉人们些什么，这对研究毛泽东有何意义。

**汪澍白：**文化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总和。毛泽东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中国文化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之中。我们研究毛泽东的文化观和文化性格，首先就因为毛泽东是中国文化的产物，离开了中国文化，就没有办法了解毛泽东，更谈不上研究毛泽东。另一方面，毛泽

东是一代巨人，他的文化观及其演变对中国文化的转型起了很大的作用（有时是推动，有时是阻滞）。尽管毛泽东已经去世了，但他的巨大的身影仍然覆盖在中国的大地上，他的思想、性格还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中国的现实生活。要实现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我们就要认真研究毛泽东和超越毛泽东。否则，有可能让“死的拉住活的”，迈不开现代化的步伐。

**访问者：**毛泽东早期的文化观是主张在研究国情的基础上来融合中西文化，强调研究国情和改造现实。在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进一步结合实践发扬了这一特色，从而开辟了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道路。建国以后，您认为他的文化观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来说，恰恰是一种逆向选择。那么毛泽东的文化观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他的变化说明了什么？此外，文化观的变化和他以后的曲折演变以及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个什么关系？

**汪澍白：**1949年革命胜利了。从1946年算起，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打败了蒋介石，非常之快，以致他对主观能动性估计得过高。原先根据中国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情，准备在胜利以后搞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到条件成熟时再转向社会主义。现在看到苏联把东欧一片解放了，东欧国家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希望走在前面，改变了分两步走的战略方针，加快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伐。由于急于向社会主义转变，而又缺乏自己的一套经验，所以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口号和照搬苏联模式的做法。幸好当时党的领导班子是团结的，党同群众的联系也是密切的。所以在50年代初期还是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大胜利。缺点在于急于求成，重破轻立，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过分强调工人阶级

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念念不忘批判资产阶级，像对《武训传》的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对胡适、胡风的批判，一浪高过一浪。把批判资产阶级这浪弦绷得紧紧的，却放松了对传统文化中封建糟粕的警惕，特别是放松了对个人崇拜的警惕。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以后，毛泽东一方面对反对个人崇拜有抵触情绪，另一方面也看出了苏联模式的一些弱点，他确实想另辟蹊径，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于是作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讲话，还提出双百方针，显示出一种思想解放和文化开放的势头。然而，当一些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响应号召认真提出批评意见的时候，他又将“双百”的口号一变面为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阶级斗争的策略方针。“雹碎春红，霜凋夏绿”，1957年的百花园里顿呈一派萧条肃杀景象。

1958年毛泽东进而在全国城乡经济领域发动了一场基本上摒弃欧美模式与苏联模式，以“土法上马”为特色的“大跃进”运动。同时，在生产关系方面，又强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试行向共产主义实现“穷过渡”。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于日理万机之际，重读了《三国志》的《张鲁传》，并写了一段著名的批语。他用“吃饭不要钱”、“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之类的新创词汇来诠释《张鲁传》，将汉末的五斗米道与当代的人民公社相比照。这件事本身就清楚地表明，小农经济土壤中萌发出来的平均主义思想，正是他热衷于穷过渡的深刻原因。这种“左”倾狂热虽然在1959年遭到了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广大干部与群众的批评和抵制，但他却反面把这些批评和抵制当作阶级斗争加剧的证明。因此每一次反“左”的努力，反面带来“左”倾升级的恶性循环。到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他

更系统地提出以“四个存在”“一条纲”（阶级斗争为纲）为核心的基本路线。与此同时，在国际上发动了一场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从此关起门来批资批修，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独自摸索“建设社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终至演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曾经一度集中主要精力攻读马列原著以及苏联 30 年代的一批哲学著作。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提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进入古都北京以后，毛泽东似乎更喜欢读中国古籍，《四库备要》、《二十四史》以及诸子散文、诗骚歌赋、词曲戏文、演义小说等等，他对这些东西兴趣浓厚。可惜他沉浸于古典文化和奉行闭关锁国政策时，也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时候。这样中国和西方的距离就越拉越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文化观变化，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和世界的历史潮流是逆向的。

**访问者：**毛泽东急于把中国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按理他更应该向西方学习，从他的文化观来讲，他是讲求对中西文化采取批判与融合的，至少也应当学习苏联的经验。

**汪澍白：**他是主张过学习苏联。民主革命时期，他坚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但抵制了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自己拿不出一个模式来，结果也搬了一段苏联模式。1958 年在成都会议上说：“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模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

**访问者：**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他拿不出自己的模式来，就只能接受苏联的模式。从主观上说来，他一直是想批判与融合中西文化，但没有融合好。

**汪澍白：**是存在这个问题。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产生与实施，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它是30—40年代苏联所处的国内外各种历史条件的产物，并且，它也曾较好地适应了苏联社会主义初期尽快发展社会主义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的客观需要。但是，斯大林时期的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少弊病。特别是当它被神圣化、公式化、凝固化之后，这些弊病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尖锐化。建国初期，还看不到这些矛盾和弊病。那时苏联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形成一个阵营，人们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看不到阴暗面。待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开始有所省察，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要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落后的东西。”虽然在总体上没有否定斯大林模式，但提出了在经济上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在政治上强调要扩大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思想，基本方向是对的。问题在于1957年反右以后，他滋长了骄傲情绪与个人专断的作风，1958年的“大跃进”是“土法上马”，本来就割断了与欧美的联系，现在又摒弃了苏联的经验，随心所欲地办事，自然会乱套的。

**访问者：**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有利，对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有局限性。

**汪澍白：**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融合和发挥了传统文化的积



极因素。比如在首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他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正确地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口诀当然主要是从实际斗争中摸索出来的，但也的确融会了历代兵家韬略与农民战争中的丰富经验。曾国藩在《家书》中曾经描述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况：“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又进，顽钝诡诈，揉来揉去。”又谈到他与捻军作战的遭遇：“此贼故智，有时疾驰狂奔，日行百余里，连数日不停歇；有时盘于百余里内，如蚁旋磨，忽左忽右，贼中相传秘诀曰：‘多打几个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所谓“贼中相传秘诀”云云，实即太平军与捻军总结出来的经验。毛泽东早年就阅读过曾氏《家书》，十分留意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待到他亲自领兵进行反“围剿”战争时，太平军与湘军双方的经验自然都成为他作战艺术的参照系了。这些东西对他战胜蒋介石是很有用的。

1949年革命战争胜利结束以后，主要的任务是搞现代化建设。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仍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与经济，学习现代科学技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我们熟悉的东西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又说：“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都，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这些话说得非常好，可惜他事实上并没有照着做。1957年反右，提出了“外行领导内行”，把不少内行人打成“右派”。红专辩论，又把许多老老实实学经济工作的人插上了“白旗”。“大跃进”时，他用搞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建设，结果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访问者：**我总是想毛泽东为什么不那么喜欢读西方的书，这也许与他的知识结构有关。

**汪澍白：**毛泽东年轻时，对现代科学就不那么感兴趣。他所喜欢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他的意志非常坚强，笃信“心力”的作用。1919年7月，他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说：“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所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道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出来的。”这些话，把他的个性表现得很充分。

建党以后，当着几次错误路线统治党中央的时候，他的个性受到压抑，但他往往能以异乎寻常的韧性和遵守纪律的精神，充分圆满地克服了党内机会主义的错误，把党从极端危险的局面下挽救过来。遵义会议过后，特别是延安时期，逐步地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他那时在组织上能摆正个人与党的关系，坚持集体领导和维护党的团结。在理论上，能虚心学习，读了不少马列著作和苏联哲学著作。当年写的许多论著，内容都很深刻，至今读来，仍然感到很能启发人。

建国以后，他一方面号召向苏联“一边倒”，一边又感到斯大林模式对自己是一种束缚。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解除了苏联模式的束缚。1958年成都会议的讲话，势如破竹，痛快淋漓。痛快是痛快，但脑子有点发热，脱离客观规律，结果带来三年困难。刘少奇“大跃进”时也很热衷，到经济困难时，有所反省和改正，毛泽东就感到不合拍，担心要出中国的赫鲁晓夫，终于导致后来的十年内乱。

此外，毛泽东土生土长，没有出洋留学过，这自然影响

他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模式。但反过来问，为什么他组织那么多人赴法勤工俭学，他自己却没有出去，这又与他的个性有关，与他的文化性格有关。我们不能夸大个人文化性格的作用，但也不能小看它。历史的必然性总是通过偶然性来开辟道路的。毛泽东的文化观与文化性格之所以值得研究，其原因正在于此。

1992年4月18日于军事科学院

## 访臧克家——

### 毛泽东的诗有“三新”

臧克家

臧克家，1905年生。山东诸城人。1934年毕业于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1933年出版第一本诗集《烙印》。次年出版《罪恶的黑手》，闻名诗坛。60年来，先后出版了《淮上吟》、《古树的花朵》、《臧克家诗选》、《臧克家旧体诗稿》、《臧克家文集》（诗一至三卷）等60种著作。建国后历任人民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协书记、《诗刊》主编、中国写作学会会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四合院摆满花草，会客厅放着一尊诗人自己的塑像。这就是臧克家的寓所。他的名字人们都熟悉，他和周振甫合著的《毛泽东诗词讲解》，及他1990年主编的《毛泽东诗词鉴赏》读者也不陌生。今天，臧老兴致很好。

**访问者：**毛泽东是政治家、思想家，也是诗人。说他的诗好，好在哪里呢？您是诗人，和毛泽东又有过接触。我们想，您谈这个问题最合适。

**臧克家：**我已87岁，年龄大了。同时，我对毛主席诗词缺少研究。这不是客气。我很尊敬毛主席，他去世后，我多

次痛哭流涕。他是一代伟人啊！我看文章、写文章，有个特点，对一般化的、大而空的、人云亦云的、拖拖拉拉的东西不喜欢。我喜欢欣赏，高兴时手舞足蹈。搞研究就不同，要有科学性，要有材料，有分析，有观点，是很难的，这方面我太不够。我写的东西大半都是即兴走笔的。今天，我只能发表点个人感想。

**访问者：**您能不能先谈些对毛泽东诗词研究现状的看法呢？

**臧克家：**从现在对毛泽东诗词的研究来看，每首诗的写作背景大体清楚了。同一首诗，几个人介绍，背景都差不多，都在重复。过去见解不一样的，也统一了。比如《忆秦娥·娄山关》，原来郭沫若同志谈这首诗时，认为是写1934年秋和1935年初的事情，有人则认为是写一天的事情。现在报纸披露毛主席自己解释是一天的事情，情况也就清楚了。又比如《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的“枯木朽株齐努力”一句，是指我们自己，有人曾经就认为说不通，现在知道是反用司马相如的“枯木朽株尽为害矣”一句。60年代，叶君健同志翻译毛主席诗词，涉及对一些诗词中大家看法不一致的句子如何理解的问题，水拍就约了我和君健对毛主席诗词作了一番研究，把有异议的问题统计了一下，大概有17个问题。水拍写了个报告给毛主席。主席约他谈了，对每一句都做了解释。比如，“莫道君行早”，“君”指谁？毛主席说：是指作者。他从主席那里回来后，亲自到我这里来，口头传达毛主席的意见。当时，我把写着请示问题的三张绿字白纸拿出来，他传达的时候，我就在我们理解正确的一说后而打“○”，在不正确的一说后而打上“×”。现在我还珍藏着这三张纸，已经是海内“孤纸”了。回头再说这些年来对毛主席诗词的研究，

我认为是有很大进展的，出了许多有关的书。但我想，不能停留在一般的欣赏水平上，什么背景啦，字面解释啦，这些当然要讲，但总是重复不行。要鉴赏，就要深入地去体味。对毛主席的深刻了解和正确评价，有助于去深入地进行对他诗词的研究。过去有人认为，毛主席是革命领袖，似乎他的情绪就不能有起伏。这是不对的。离开了情感，怎么写诗？不体味诗中的情感，怎么评价诗？

**访问者：**现在毛泽东诗词研究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呢？

**臧克家：**现在一些研究毛主席诗词的文章，你这样写，我也这样写，有点重复。毛主席的伟大要讲，但套话太多，就没有新意了。我提倡研究毛主席诗词要有感而发。一般性的，长篇大论没有自己独特看法的路于快走到头了。对毛主席诗词作科学性的研究，就必须研究毛主席的思想、生活、性格和修养、情趣等等，还要和他的感情进行沟通，心心相印。在这个基础上对作品做出的评定，才会有价值，不一定非要写几万几十万字。要评论也要有风格，有趣味，不要太学院气。毛主席自己就一贯反对八股文章。毛主席的诗词意境很高，写评论他的诗词的文章，也应该是美文。去年，香港出了一本《毛泽东诗词全集》，是刘济昆编的。他把毛主席的诗词收得较全，又作了评点。他的评点，有时尽管三言两语，我以为还是中肯的。比如《沁园春·雪》，他认为是毛泽东最出色的作品，称赞它“登峰造极，炉火纯青，扫空万古，横绝六合之作”。我们评论毛主席的诗词，也需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倡凭对诗词本身的体会，写文章发表自己的看法，即使作者的原意与你的体会不完全相同，也不必强求一致。毛主席的诗词从总体上来看，水平是很高的，但不能因此就说每一

首、每一句都是高峰。如果全是高峰，也就没有高峰了。

**访问者：**我很赞同您的看法。您能具体一些谈谈吗？

**臧克家：**据我看，毛主席的诗与词比较，词写得比诗更好。毛主席的诗词气魄很大。表现手法是革命浪漫主义的，基本上可以这么讲。实际上，他的诗词的一部分，是革命的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都应该是植根于生活。革命浪漫主义不是空想的，随意发挥的。毛主席的想象力很强，很丰富，比如《蝶恋花·答李淑一》就发挥得淋漓尽致，很充分，一会儿在人间，一会儿在天上，一会儿又见吴刚、嫦娥。其实，这些都离不开对生活的体验。有人说，毛主席的诗词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的结合，这话不错。但如果进一步加以分析，就觉得这个说法太笼统了。毛主席的诗词就总体而言，艺术性很高，但不是每一首都这样。我认为，也可以从艺术上具体分析一下毛主席的诗词。比如说最好的，像《沁园春·雪》这样的杰作，“风物长宜放眼量”、“无限风光在险峰”这样的句子，有哲理，也很有诗味；有的偏重于政治思想内容，艺术上有点欠缺，诗味少些；还有一部分是毛主席本人不愿意发表的。这样三种类型，是侧重对他的诗词本身从艺术上加以研究分析相比较而来的。我们看到，好诗好词都是浓烈的感情蓄积很久，喷发而出的。

**访问者：**作为毛泽东，他的诗词创作有哪些有别于他人的特点呢？

**臧克家：**毛主席诗词的水平很高，思想性、艺术性很强，不但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喜欢它。我认为毛主席的诗词所以写得好，水平高，有两点：第一，他是在中国革命曲折艰难的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领袖，生活经历异常丰富。第二，他喜欢读书，好研究，学习很深入，深受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他18岁时写的文言文《祭母文》，就写得那么好，那样动人，恐怕现在有些大学文科老师也不一定能赶上他。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又注意刻苦读书，同时他有天资，有诗才，又热情，具备天资、诗才、热情，也是诗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毛主席写诗，学古不泥古，富于创造性，不是都说毛主席喜欢三李吗？他喜欢李商隐的缠绵，李白的浪漫，李贺的丰富想象力。这三种风格，在毛主席的诗词里都体现出来了。但是他有创造性，不像学院派旧体诗作者那样，刻意讲求典雅。毛主席用典很少，也不完全受格律的限制。现在有人写旧体诗，重用典，讲平仄，性灵不多，诗味觉少。民族化，是毛主席诗词有创造性的另一个方面。他对民歌很重视，他的诗词吸收了许多民歌的营养。如“惊回首，离天三尺三”这样的句子就是口语。他的有些句子，比老百姓的话还要俗，像“不须放屁”就是。这些东西，别人不愿写，他写了，又不是刻意求之的，表现出来，很自然。毛主席诗词的语言风格很有特色。我主张写诗要有三新：第一，思想新。思想不新，跟不上时代，也就没有时代感。第二，感情新。感情新，写出来的东西才会有新意。毛主席谈他个人思想感情变化的那些话，人人皆知。参加革命后，他和劳动人民的关系近了，思想感情变了，写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了。第三，语言新。现在我读到不少旧体诗，但能让人赏心悦目的不多，主要是语言太陈旧。我们应以毛主席为榜样，好好向毛主席学习。说到底，作诗和人的经历、思想、学识、修养、品德有密切关系。人大，诗才大。毛主席有豪迈的革命激情，丰富的生活经历，勤奋读书的精神，所以才能写出内涵那么丰富、那么有气魄的诗。这些年，我更多地了解了他的读书情况以后，心里更加佩服他。所以毛主席的思想之新，



感情之新，语言之新，是从学习中得来的，是从生活与实践  
中得来的。另外再加上天分。天分不是抽象的，是一种几乎  
与生俱来的特殊感觉、特殊爱好的体现。

**访问者：**诗格和人格的关系如何？

**臧克家：**一个人的人格，和他的创作关系重大。现在有些诗人，不深入生活，关在屋里写诗，小有成绩，就高视阔步，自大得不得了。诗，是人的心灵表露，不与时代同步，人民同心，能写出真正的好诗来吗？！我认为，我们写诗，做人，都应该向毛主席学习，学习他的美德——谦虚，平易近人。有些写诗的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很淡，追求名利的心很强。毛主席写诗，从未想过发表，他也从未想成为一个诗人。他写诗，就是情之所至，有感而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在马背上吟诗，诗情充溢于中，不吟出来不痛快。这种美丽高尚的感情，喷薄而出，才能写出好诗来。我们知道，毛主席的诗，决不止现在知道的 50 多首，有些诗，他写好了，可惜没保留下来。解放后，我们办《诗刊》，再三请主席让《诗刊》发表他的诗，他回信，并且附来旧体诗 18 首，态度十分谦逊。我记得 50 年代周扬同志曾经在大会上谈到这么一件事：他起草的关于文艺方面的一个报告，其中有一段谈了毛主席的诗词创作，毛主席审阅时全给勾掉了。我听了感动极了。毛主席 1957 年 1 月 12 日给我们的信中也讲，他的诗“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他说：“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他还谦虚地说自己的诗“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所以我想，毛主席是一个伟人，也是一个大诗人。他的诗值得我们学习，他的品德更值得我们学习。

1992 年 5 月 8 日于北京南小街

## 访任继愈——

### 不研究神学，就写不好哲学史

任继愈

任继愈，1916年生，山东平原人。1938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哲学系，后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等著名学者研习中国哲学和佛学。195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64年受命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并担任该所所长长达20余年。现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佛教史》、《中华大藏经》、《道藏提要》等。

任教授已届高龄，却很繁忙，不仅行政事务缠身，学术活动也排得满满的，我们去的那天，还有一个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开幕式在等他。说好9点，准时赶到，于是“见缝插针”，开始了我们的采访。

访问者：任教授，我们今天来想请您谈谈在您和毛泽东的交往中关于宗教研究问题的一些情况。

**任继愈：**毛泽东对宗教问题始终是注意的，这一点我原来没有领会，和他交往几次，体会比较深。比如，我过去写过的一些有关佛教史研究的文章，毛泽东都看过。1959年10月13日他把我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说，你写的那些文章我都读了。接着他就讲研究宗教问题的重要性，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他问，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我说除我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他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三字，他的口音我听不大懂，他见我听不懂，说了两遍，我才听懂是问福音书，指的是基督教）？我回答说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他说，那可不好。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我说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他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一定要抽出个把人来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慢慢地来，先做着。

大约到了1963年冬，周总理访问非洲十四国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国现在的地位和从前不同了，在国际上是个大国，人家很重视我国，我们也应该了解他们，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一些研究所，有非洲、拉美、美国、日本等，苏东、拉美、美国、日本研究所就是在那时开始建立的，另外，中央还成立了以廖承志为组长的“国际研究指导小组”。就是在这个报告上，毛泽东于1963年12月31日作了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唯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我们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正因为有毛主席这个批示，1964年成立的众多研究外国

的研究所中增加了世界宗教研究所。

**访问者：**是您筹备的？

**任继愈：**我参加筹备，当时设在北京大学，先由中宣部负责，具体工作有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于光远同志，北京大学校长陆平同志，还有国务院宗教局长肖贤法同志。具体筹备工作由我负责，如调干部等。北大东方哲学史专业的全部教师拨归世界宗教所，这样，我们的基本队伍已有十来位，编制和经费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那时社科院未成立）。我国的世界宗教研究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访问者：**就是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世界宗教研究所？

**任继愈：**对，现在叫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我一直做这个所的领导工作。那时就是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精神，了解和研究外国宗教情况。原来曾考虑是叫“国际宗教研究所”还是“世界宗教研究所”？后来决定还是世界宗教好，因为世界上几个大的宗教都是国际性的，外国的宗教中国也有，如三大宗教中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现在研究所设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研究室，还有宗教理论研究室。

这些工作开展起来后，又办了一个刊物，叫《世界宗教研究》。这个刊物在国外有影响，我到北美、欧洲看到一些大的图书馆都有这个刊物。外国朋友评价说，在中国出口的书刊里，《世界宗教研究》是有学术水平的。

**访问者：**您能不能谈一谈研究世界宗教的意义？

**任继愈：**宗教是社会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的一个重要方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没有宗教。人类社会从没有宗教到有宗教是一个进步，低级的社会不产生宗教，这同小孩的生长发育一样，几岁的小孩就没

有宗教意识，鬼神观念是大人灌输给他的，光是他自己就不会相信有上帝。但到了一定程度，有了自我意识，发现了自己的存在，这时才产生宗教意识。宗教意识可能最早是生死意识，从灵魂开始。你们到北京房山区周口店猿人遗址参观过吗？

**访问者：**参观过。

**任继愈：**北京猿人遗址上面还有山顶洞人遗址，里面摆的殉葬物品中，有生活用品，还有一些生产用具，如钓鱼的钩、缝衣服的针，这说明他们认为人死后也要过生前的生活，他要没有这个观念，放那些东西干什么？这说明他相信人死后的世界，这个世界和现在的现实世界差不多。西安的半坡村遗址，是原始社会的村落，村落中出土了陶制的瓦棺，其中有一种花盆样的东西，是装死了的小孩尸体的。盆底下有一个小洞是留给死者灵魂出入的。古时候小孩的死亡率很高，小孩子离不开母亲，死后就埋在住地附近。宗教起源于相信人有灵魂。人类相信灵魂，才有了祭祀、上供、祭奠宗教等活动。

**访问者：**人们还解释不了看到的自然现象，是不是也是产生宗教意识的一个方面，比如说神。

**任继愈：**在古代，阶级社会以前的神，不具备后来赏善罚恶的性质。古代的神，如盘古、伏羲、神农都是为人类造福的，是民族英雄，为人民做好事的，所以大家怀念他，把他尊奉为神，这都反映了原始社会平等、自然的社会关系。

出现阶级以后，出现了国家，有了法律，出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了监狱，神也具备了赏善罚恶的性质，它是现实社会的虚幻歪曲的反映。

一个历史现象的产生不是一下子就有的，历史唯物论就

告诉我们，一个东西历史地产生也要历史地消灭。这一点我们和虔诚的宗教家不一样。他们认为在人类以前就有上帝，是上帝创造了人类，上帝是永恒的，没有了人类也还有上帝，地球不存在了也还有上帝。我们不这样看，我们认为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历史现象、文化现象，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这个东西，再发展到一定程度，宗教也会消失。这是很长很长的过程，但现在是不会消失的，要承认它，尊重它。过去受极左思想的影响，认为既然把宗教看作是虚幻的不实在的，就消灭它，取消它算了，所以“文革”时期干了一些砸庙宇教堂、毁坏神像的蠢事。

**访问者：**把它归到“四旧”之一，予以消灭。

**任继愈：**结果适得其反，砸是砸了，但是没有消灭宗教，宗教是社会意识在人们头脑中的曲折反映，用行政干预的办法是抹不掉的，也是不可能的。

**访问者：**实际上破坏了很多珍贵历史文物，是非常可惜的。

**任继愈：**还伤害了一些教徒的感情，譬如在“文革”中有些造反派强迫教徒们干他们教规不允许的事，这是很不应该的，也是违背我国宪法的。不能这样做，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主张这么做，认为宗教完全是个人的事情，信是个人的事，不信也是个人的事。我们的宪法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当然也保护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宪法规定在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也保护不信仰宗教的自由，这一点宗教界不大感觉得到，比如在单一宗教信仰的地区，居民都过着同一种宗教的生活，有一个人出外多年，他改变了原来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再回到自己家乡，有时会受到歧视，有的人欺负他，可见不信教也要有自由，才

能充分保证宗教信仰自由。还比如，在天主教徒的家庭，生下孩子要洗礼，起教名，就算成了教徒，这不是小孩子自己选择的，是父母加给他的。

**访问者：**在这方面，是不是我们宣传得不够？

**任继愈：**有宣传的问题，但也不全是。在执行政策方面，还要进一步去贯彻。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才能符合宪法的精神。这也是宗教改革面临的问题。

宗教本身又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现在到了文明社会，对于刮风下雨，有没有雷神一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凡是念过中学的人都会明白这些自然现象。可社会上还有很多现象解释不了，比如老实人常常吃亏，有的吹吹拍拍的人却吃得开。社会应该是合理的，人们也知道怎么样才是合理的，可现实生活中有些现象不尽合理，甚至很不合理怎么办？宗教就站出来解释这种现象。相信“来世”的人，认为今生所没有得到的，来世可以得到加倍的补偿。现实世界的不合理，可以不必计较。历史上的佛教、道教，包括基督教，培养一种驯服的性格，所以历代帝王或当政者提倡宗教，就欣赏这一点。

**访问者：**儒教是不是稍微有点差别，它还提倡一种进取的精神，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什么的？

**任继愈：**儒教也讲忍的一面，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小不忍则乱大谋”等等。总之，忍让、驯顺是世界上几个大宗教一致的精神。另一方面，宗教还把一些合理的、不合理的東西攪和在一起，比如道教，把道观大多建立在深山里，修身养性，处在那种环境，生病到哪儿去看医生？所以很多道教大师同时又通晓医道，懂得养生、健身，以长寿。保持长寿无可厚非，如果由此推衍下去，要求活一百岁、二百

岁、三百岁，永远不死，就走到荒谬方面去了。道教就有这个东西，希望长生不死，于是炼仙丹，唐朝有七八个皇帝希望长寿是吃仙丹中毒短命死的。

**访问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到中晚唐开始？

**任继愈：**初唐就有，李世民就是吃药吃死的，以后不断有。秦始皇、汉武帝都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英明皇帝，也打不破神仙这个关，作为一个现象是可以好好研究的。

**访问者：**现在科学发展了，医学也发展了，很少有人信这些了。我们研究宗教，是否仅限于宗教本身，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意义？

**任继愈：**研究宗教，不能陷入宗教中去，应该从了解世界了解各国人民的文化传统的高度去认识。比如我们现在是改革开放，就要同西方打交道，如果我们对西方的宗教不了解，共同语言就不多，甚至在做生意方面，也会发生困难。比如一批货是赶在圣诞节卖的，你连圣诞节这个日子也不知道，不赔才怪呢。现在世界各国对宗教研究都很重视。日本原来是没有伊斯兰教的，日本缺石油，石油来源主要是在中东，它必须和阿拉伯世界打交道，就开展伊斯兰教的研究，并开始培养自己的阿訇。美国也是这样，本来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以后才有了佛教，佛教是一百多年前日本的后裔带过去的。美国原来也没有伊斯兰教，它要和阿拉伯世界打交道，于是在艾森豪威尔当政时期大约是 1959 年就建立了第一个伊斯兰教中心。他们要插手阿拉伯的政治事务，也要学习一点伊斯兰教。

在现实条件下，宗教只是一个外衣，在这个外衣里面，西方各国都有政治目的、经济目的。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见过纯的宗教。有时宗教内部的流血斗争不比一般政治的、军



事的斗争伤亡少，所以研究宗教不能离开实际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光从教义上去讲，那是书生的研究方法，不能抓住它的本质。

**访问者：**毛主席重视宗教研究，是不是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任继愈：**我想他是从文化、意识形态，也从政治上考虑的，他要求我们不要耳目闭塞，要了解外国，其中也包括宗教这个方面。

**访问者：**您和毛主席几次接触，除了上面讲过的政策方面以外，对宗教本身有没有谈过一些看法？

**任继愈：**纯宗教本身的问题，不记得他说过什么看法。

**访问者：**您和他探讨过一些宗教研究方面的问题吗？

**任继愈：**1959年会面那一次，除谈到要加强宗教研究，他还提出研究宗教不能让信仰宗教的人去研究，他说研究宗教要“外行人”才能把宗教作为对象来研究，因为有信仰的人，如果研究他所信仰的宗教，有时不免受到局限性。正如马克思说的，跪着的人看别人，总是比别人矮了半截。至少不客观。另外，所谓“外行”，也不是绝对的，一个人信仰这个宗教，对于这个宗教是内行，对另外的宗教就是外行。永远找不到一个信仰一切宗教的教徒。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研究，才能做到比较客观，既不走样，也不迷信，也不轻率否定。

1992年6月11日于北京图书馆

## 访袁德金——

### 毛泽东和《孙子兵法》

袁德金

袁德金，1951年生，江苏扬州人。1973年入广州中山大学学习，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1981年获哲学硕士学位，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工作。主要著作有《军事辩证法研究》（合著）、《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合著）等。

《孙子兵法》是古典名著，把它与毛泽东联系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题目。我们为此跑了20里，又到军科院。话题虽深奥，理解却不难——亲爱的读者，您同意吗？

**访问者：**《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兵书典籍，即使在上世界上也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有人还把它和毛泽东军事思想联系起来，认为毛泽东继承了从孙武子以来的中国兵家传统，因而创造和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这种观点不是没有根据，毛泽东历来重视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就称孙武是“中国古代军事学家”，还引述了《孙子兵法》中的观点。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孙子兵法》的关系你怎么看？

**袁德金：**我原来认为从思想渊源来说，毛泽东军事思想比较直接是从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过渡而来的，在这里面，他更直接地是从列宁的军事著作中吸收了思想。因为当时在延安，毛泽东看列宁的东西比较多，如《国家与革命》、《怎么办？》等，那时我们党也比较重视苏联的经验。这不仅因为他们搞成功了十月革命，而且他们在粉碎白军和国外敌人的武装干涉中积累了经验。现在看来，中国传统的东西，特别是《孙子兵法》，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的一个源泉。这一点不能否认。在他的军事思想正在形成的时候，为什么毛泽东那么迫切地需要这本书，就是因为这本书对构造他的思想起了很大作用。《孙子兵法》阐述的许多核心的东西，如积极防御、以退为攻等，正好是毛泽东当时需要的东西。中央苏区反“围剿”时，“左”倾教条主义者反对毛泽东的主张，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反对他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思想。对这一点，毛泽东的印象是很深的，因此到延安后，他做的头一件事，就是从理论上阐述和论证他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提出并实践了的革命战争的经验。

**访问者：**毛泽东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正面看是为了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的经验，换一个角度，是不是还有别的意图呢？

**袁德金：**实际上这本书有点为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的做法辩解的味道，为了从理论上回答“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诘难。你不是说山沟里没有理论吗？我总结出来让你看。理论的东西是很实用的，而且总结时也不完全是从实践构造理论，他还需要借鉴，吸取其他理论的营养。这也可以看出理论和实践虽然是一致的，但不是一个东西，他在理论上借鉴的一些东西，对他后来的实践无意识地起着一定的指

导作用。他用兵那么神，实际上看书对他有一定影响。

**访问者：**就是说毛泽东在没有读《孙子兵法》以前，也一直在打胜仗，也成功地运用了《孙子兵法》中的战略战术，这些都是自觉不自觉的？

**袁德金：**他在战争实践中恐怕是更多地吸收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在小说作品比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中所反映的战略和战术思想。对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我这么区分：一是正规的规范性的传统军事文化，就是以兵书为代表的军事典籍；二是非正规的或半规范性的传统军事文化，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民间文学或史学反映出来的军事文化；还有一种是历代农民战争的军事实践，我把它列为反规范性的军事思想。这三个不同层次，毛泽东在总结军事理论时都有吸收。从军事思想角度看，它们之间是一致的，概括出的军事原则、战略战术并不矛盾，这也反映出战争是有它的共性的东西，要想打胜仗就要按这些原则和规律去做。当然，它们各自反映的方式不一样，兵书就是理论性高一点。

**访问者：**文学的东西可能运用得更活、更生动、更形象，接受起来也比较容易，那么，兵书和文学里反映的战争是互补的吗？

**袁德金：**就是互补的，文学里实际上有形象思维方法，它对战争的解释和运用是通过对农民战争的描写反映出来的，或者说是有意无意反映的；而兵书就高了一个层次，它是有意识地总结战争的规律、原则和战略战术。

**访问者：**在当时的情况下，《孙子兵法》也不是很难找到吧？

**袁德金：**我看不难找，但一般老百姓家里不一定有，不然毛泽东在延安就不会专门写信让叶剑英替他在西安买《孙

子兵法》了。从流传的广度来讲，还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一类文学作品比较普及。

**访问者：**毛泽东到延安后，为什么那么急迫地想看《孙子兵法》？

**袁德金：**这时他正在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要给红军大学讲课。红军到达陕北以后，进行完东征、西征，相对的有一段稳定的环境。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完全投入理论创作，一方面他想总结一下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一方面也为了对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进行指导。所以，他很紧张地看书、写作，不仅要看《孙子兵法》等中国传统军事典籍，而且对外国的军事书，他也找来看，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及苏联的军事著作等。

**访问者：**毛泽东读《孙子兵法》，是从什么时候看的？

**袁德金：**具体时间还搞不大准。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的争论中，凯丰曾说：你毛泽东打仗不就是照《孙子兵法》打的吗？毛泽东反问凯丰：你看过《孙子兵法》没有？《孙子兵法》有多少篇？都有哪些内容？凯丰答不出来。后来毛泽东讲到这件事，说其实我在这之前，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就是在实践中打仗。解放后，他又多次讲到《孙子兵法》对他影响很大。从档案材料看，1936年毛泽东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前，他是完全看过了。

**访问者：**这是有书信可以证实的。

**袁德金：**对，1936年有好几封书信，《毛泽东书信选集》收入了其中的一封，这是1936年10月给叶剑英、刘鼎的信，其中说：“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所以，比较系统地真正钻研地读《孙子兵法》还是

在1936年。1961年3月，在广州会议上，毛泽东说，直到1936年他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时，研究了一些资产阶级军事学，也包括《孙子兵法》。

**访问者：**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引用了《孙子兵法》的哪些内容？

**袁德金：**引用了三次，在第一章第四节“重要的问题在于善于学习”中，引用了孙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说明战争规律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在第五章第三节“战略退却”中，引用了“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说明在战争中使敌人“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在这一节中，他还引用了孙子的“示形”，即“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说明战争可以搞欺骗、用计谋，兵不厌诈。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学习和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些问题上，就是为了论证土地革命战争中他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思想是正确的。还有其他一些思想，如“集中兵力”的思想，兵法上有，文学作品中有，历代农民起义的战例中也有，这是战争的共同的东西，不好说谁从谁那儿的来。

**访问者：**《孙子兵法》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中，是一个什么地位？

**袁德金：**毛泽东对《孙子兵法》，从他一生看都是比较重视的，不能因为他在遵义会议上说没看过《孙子兵法》，就说他不重视。《孙子兵法》的确在他的军事思想的形成中起了很大作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本书标志着他的军事思想和体系的形成。但他构造这个体系时并没有忘记《孙子兵法》，也没有忘记从《孙子兵法》中挖掘有用的东西。1936年9月10日他连续写了三封信，里面都提到《孙子兵法》，这说明他不是一般的重视，而

是非常重视。从这几封信中还可以看出，毛泽东是用战略家的眼光审度《孙子兵法》的，他比较重视战略问题，就是关于大的理论性的东西，比较具体的战术性的问题不能说他不重视，因为那不是他考虑的重点。《孙子兵法》的确对他构造军事思想体系起了作用。从他以后在作战指挥上看，也有意识无意地吸收了《孙子兵法》中的思想，如搞“示形”、搞诡诈。这也说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就产生了许多新的东西。

**访问者：**在用兵问题上，像《水浒传》里所反映的战略战术，野史及农民起义中运用的战术，同《孙子兵法》有矛盾的地方吗？

**袁德金：**基本上没有。农民起义战争主要是打游击战，它不受什么条条框框限制，其实在《孙子兵法》里也有这些思想，如先退后进、怎样分散敌人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点也是“先保存自己，然后消灭敌人”，这是历来战争规律的共同处。这里我再说明一点，就是把《孙子兵法》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响，要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不要贬低，也不要拔高。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解放后有人在研究《孙子兵法》时，曾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同《孙子兵法》加以对照，据说毛泽东看后不满意。

**访问者：**这似乎说明一个问题，毛泽东不太同意把他的思想仅仅归结为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尽管他说要继承自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他还是觉得，他的思想是继承了马列主义。前面你曾说到，毛泽东在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不仅吸收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他还吸收了马列的军事思想以及近代资产阶级的军事思想。关于这方面，他是怎么做的？

**袁德金：**毛泽东注意学习和吸收马列的军事思想，最早

的应该是《反杜林论》，因为这本书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得到了。他还说过，长征中许多东西丢掉了，只有《反杜林论》没有丢掉。另外，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许多是通过列宁间接吸收的，因为那个时期我们党翻译列宁和苏联的著作比较多，甚至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最早他也是通过列宁最先了解到的。他先看到列宁对《战争论》的论述之后，到1937年又找来《战争论》重新看，并把其中的一些思想学习和吸收进来。

**访问者：**这样看来，毛泽东军事思想有两种继承关系，一是从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再一个就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继承来，否则不好解释《古田会议决议》所阐述的建军这个原则问题，《古田会议决议》中涉及的战略战术比较少，主要是解决建立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军队，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主要是谈战略战术了。那么，我们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孙子兵法》还有现实意义吗？

**袁德金：**很有现实意义。现在国际流行《孙子兵法》热，我们国家也召开了三次《孙子兵法》国际学术讨论会，美国的军事院校里就开有《孙子兵法》课，中国社会科学院曾有人在美国国防大学专门讲这门课，日本、东南亚对《孙子兵法》都很感兴趣。现在他们不仅仅把它看成战争的兵书，而且运用到各个领域，如领导艺术、经商艺术、决策艺术等。他们认为，战争是流血的东西，而和平地把《孙子兵法》运用到其他领域，更能很好显示它的价值。

**访问者：**在《孙子兵法》热中，他们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否也比较关注？

**袁德金：**美国的军事院校还开有毛泽东军事思想课，从这也可以看出他们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视。



**访问者：**外国人是不是在重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上重视《孙子兵法》的？

**袁德金：**认为都是中国的东西。在许多外国人看来，毛泽东军事思想基本上就是继承了《孙子兵法》。日本一个军事理论家曾评价说，虽然毛泽东军事思想主要来自马克思，但更多的来自于《孙子兵法》。外国人就是这么看的。

**访问者：**《孙子兵法》是不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在国外热起来的？

**袁德金：**《孙子兵法》在国外流传虽然很久，也受到了一些外国人的重视，但真正形成“孙子热”，还是近几十年的事。随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世界军事史上的地位的确立，《孙子兵法》也热了起来，同时，《孙子兵法》中讲的东西和当前的现实斗争有一致的东西，如“不战而屈人之兵”，从现在看，大家都不希望有战争，《孙子兵法》中阐述的这种战略思想，对政治领导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再加上国外的一些大企业运用《孙子兵法》的思想进行管理，在经营上取得成功，比如日本的服部千春先生，他在经营和光建筑有限会社的同时，就非常喜欢研究《孙子兵法》，1974年曾著有《新编孙子十三篇》，并以此书手稿呈赠毛泽东。1987年又在中国出版了《孙子兵法校解》，他把《孙子兵法》运用于企业管理上，使企业越办越好，于是到处鼓动人们学习《孙子兵法》。

美国是另外一种情况，它偏重于军事上的谋略方面的运用，希望少死人，通过智谋取胜。本来中国的传统军事思想同美国的军事传统不大一样，我们重谋略，讲究以少胜多，他们重实力，靠力量取胜，“以少胜多”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但战争实践告诉他们，中国的确取得了成功。于是他们就想找到这个奥妙，为什么中国在实力小的情况下每次都打

胜？这也是《孙子兵法》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引起他们重视的一个原因。

**访问者：**其实，东西方的东西是可以互补的。

**袁德金：**美国的某些做法实际上就是互补的，一是重视自己的力量和技术，同时又注意吸收东方的谋略思想，慢慢合并。我们也应该这样，一方面通过我国国力的不断提高和增强我军的实力，另一方面还要不断研究和发展我国的军事理论，提高军事素质。这后一方面更现实，因为在一个长时期内，我们仍然技术不如人，力量不如人，还要靠智取和人民战争。

**访问者：**这么说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孙子兵法》的研究没有止境？

**袁德金：**没有止境。随着实践的发展和军事技术的进步，我们会越来越感到《孙子兵法》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博大精深，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

1993年4月10日于军科院

## 访侯宝林——

### 毛泽东听我说相声

侯宝林

侯宝林，(1917~1993)，北京人，幼时曾学京剧并搭班演出。16岁改学相声。1949年后，曾入北京市曲艺工作团、中央广播说唱团。后任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指导、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中国曲协副主席。著有《谈相声的形式、结构、语言》、《曲艺概论》(合著)等。

毛泽东的爱好是多方面的，看京戏、听相声是他人生的一大乐趣。侯老在病床上的这番谈话，既表现了毛泽东的这个特点，同时也表达了侯老先生对毛泽东的深深怀念之情。还要感谢蒋建农同志，这篇谈话是他提供给我们的。

**访问者：**毛泽东一生爱好文艺，喜欢听京剧、曲剧，特别喜欢您的相声，他还说过：“侯宝林是个人才，是个语言研究家。”我们今天来，想请您谈谈毛泽东听您相声的情况。

**侯宝林：**今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有人特意编排了一出叫做“毛泽东与侯宝林”的电视小品，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反响。为此，一些老朋友和新闻出版界的同志都要我写点儿什么，我

又何尝不想了一桩旧心愿，只是一场大手术夺走了我的整个胃脏，化疗又摧毁了我百分之八十的体力，手中的这支笔提起来没有一吨也有八百斤，真是力不从心了。

毛主席听我说相声不是进城以后的事。那时在香山，还没搬进城里住呢。每次开会几乎都有晚会，有时在东交民巷。当时还是木板条儿的大椅子，只有中间第三排放两把藤椅，是为主席和朱老总准备的，因为全国正在打仗，还是“战犹酣”的时候，朱老总是很少来的，可主席每次都来。我记得头几次在我演出时，中央首长都在，那时任弼时同志很瘦，还没去苏联养病呢。后来他从苏联回来，我见到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胖多了，可精神了。

那时我的相声节目有点儿特殊，就是说不论什么晚会——歌舞晚会、杂技晚会，还是戏曲晚会，都加我一场相声，大概因为毛主席爱听相声吧。好像是在1950年，杨尚昆同志（当时他还是办公厅主任）见我去了，非常高兴，说：“哪一个人能使我们的主席这样高兴？只有侯宝林，侯宝林是我们的国宝。”当然，这可没有文字记载啊。

**访问者：**这些晚会，当时都由谁来组织？

**侯宝林：**那阵儿，彭真同志是总提调，所有的晚会都归他负责。当初北京还没有文化局，叫文艺处，刚进城叫文管会，后来成立了文艺处，张梦庚任处长，后改局了，他就升为局长，他也是主席很喜欢的一个演员。有一次，我和他商量：“今晚有两个晚会怎么办？”他说：“你先到那边儿去，让车跟着你，你那边儿下台，大褂别脱，就跟车回来。”回到这边儿，梅兰芳的戏刚完，大伙儿正不知怎么办呢，我告诉检场的：“你搬着场面桌，顶着走，别等梅院长下来，你就把桌子摆上。”我就跟着上了。那时候没有报幕员，不像后来，每

场节目都有报幕的。那就只有听我指挥了。等梅先生快走到下场门儿，主席站起来，把风衣往胳膊上一搭，就要走。桌子搁上了，主席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怎么梅兰芳演完还搁个桌子呀？我们跟着就上了，主席笑了，放下衣服，坐下来听我们说相声。那时节目都长，一段相声至少是25—30分钟，尽管已经很晚了，主席还是从头到尾听完了才走。

主席听我说相声，喜欢用拳头打拍子，这个细节我注意过。主席擅长诗词，人所共知，那几年刚进城，是他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写字也是那几年的爱好，诗词也写得很多。当我在相声中提到诗词时便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有一次，主席刚到，还没坐下，正站着脱风雨衣，一听我说到诗词，马上转过头来给了耳朵（注意听）。我就说最近作了一首诗，其实，诗是引用老昆曲《昭君出塞》中王龙的词儿，后来被评剧借过去了，这四句诗是：“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当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一般主席乐的时候，就是脸憋得红红的也不出声，只有这一回张开嘴哈哈大笑，大概是这首诗尤其是这第四句词儿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吧。

**访问者：**听说您还和毛主席同场跳过舞，有这回事吗？

**侯宝林：**有过。1954年，政务院改了国务院，国务院的工作加重了，主席的工作减轻了，仗也打完了，蒋介石去了台湾。主席工作少了，春藕斋的舞厅就是这时候为他盖的，我们原来是在老春藕斋演出，后来又翻修了一下。翻修后我们每周去两次，每礼拜三、六。主席的舞会很少有人去打搅，朱老总只去过一次，一家三口，老总、夫人，带女儿，那时我看老干部穿布拉吉还是头一回，是康克清同志。江青就去过一次，还是在舞会正式开始前，呆了一会儿就走了，有人让我陪她跳舞，我没跳，因为我不会，陪王光美同志跳过一次，

跳了一身汗，她不舒服，我也不舒服。人家会跳，我不会，人家很累。所以后来凡是夫人们来了，让跳舞，我绝对不跳。刘主席夫妇也只是偶尔去一下。说起跳舞还让我想起一件事。一次，我被人硬拉着跳舞，边跳边说精神不集中，一不小心正撞在主席身上，我当时很紧张，心想糟了，那种心情不亚于契诃夫笔下谨小慎微的小公务员伊万·德米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要知道在半个多世纪里，他毕竟是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最具权威的大人物啊！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看主席时，发现他笑了，目光是那样慈祥，全然没有动怒的迹象。这件事，这令人难以忘却的目光，几十年来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访问者：**毛泽东听您的相声，除了他喜爱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侯宝林：**毛主席确实喜欢听相声，这是可以肯定的。有人说毛主席听相声也是搞社会调查，了解民俗，了解民间的喜怒哀乐。我们当时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非常认真，完全按照“讲话”的精神搞节目，创作新的，整理旧的，把旧相声中那些不健康的東西去掉，创作新社会需要的相声。1950年我们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编了四个小册子，都是新相声，使相声打了个翻身仗（而且没有向上级要一分钱）。这在当时太难了，首先就说我们那点儿马列主义水平吧，实在太难了，全靠“讲话”的精神做指导。主席喜欢我的相声恐怕和这一点有关，当然他也很喜欢我这个演员。1956年，大概是由于我发表了几篇有关相声的学术文章吧，主席见到我说：“怎么？你要当博士哟！”从这句话里，我体会了主席的心情。解放后听我说相声最多的可能要算主席了，现在回忆起来，大约有150段左右，连新带

旧，一些传统节日我们在外面已经不说了（不合时宜），到了主席那儿人家说：“你还教育主席呀，外边不说的，这儿也可以说。”不过我使的传统段子都是经过自己加工整理的。旧相声中有许多低级庸俗的东西，只有经过改编的主席才听得过去。我这个人适应性强，接受新事物快，我在台上别人看着不旧，没有旧艺人的气质，这大概也是主席喜欢我的原因。上台去俗不可耐，小市民那一套，连蹦带跳，出洋相，胡来一通，他早就厌烦了，所以在主席身边工作了那么长时间，总算没落下什么不好吧。

**访问者：**在您说过的相声中，毛泽东最喜欢哪些段子？

**侯宝林：**《关公战秦琼》是主席喜欢的节目之一，他听我说相声没点过，说什么，听什么（他喜欢的节目还有一个叫《字意》）。怎么知道主席重视《关公战秦琼》呢？是因为当时有好几个人跟我说，比如马专员（马锡五），当时最高法院院长，也就是老区常说的马专员，《刘巧儿》里还提到过，他说：“你写嘛，写官僚主义嘛。”习仲勋同志也说过，中央提出反官僚主义。当时我们就搞了《关公战秦琼》，讽刺瞎指挥。这个段子后来被许多人引用，老舍先生和夏衍同志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文章。1960年我们在广州开创作会议，第一个引用的是陶铸同志，他说：“我们不要做韩复榘父亲那样的人，瞎指挥。”第二个人是陈毅，陈老总，他是1962年讲的。主席当时听了这个段子很高兴，几天后我正在表演，刘主席夫妇抱着孩子来了，主席把刘主席叫到身边，让我说《关公战秦琼》。这是主席唯一一次点节目，可见这个节目在当时影响不小，惊动了大人物。

**访问者：**最后问一个问题，据说您当全国人大代表，还是毛泽东亲自提名的。到了他的晚年，您和他有些什么交往？

侯宝林：四届人大毛主席亲自提名补选 10 名代表，除了我，还有萧华同志，听说当时他还在劳动。四届人大是 1975 年 1 月份开的，我是 1974 年“五一”才宣布不是“黑帮”的，但什么节目也不让上，不让工作。有个段子叫《种子迷》，我改了十一稿，他们老让改，就是通不过。1975 年主席在湖南养病期间，特意要我为他录了 10 段相声，这 10 段相声是：《醉酒》、《婚姻与迷信》、《改行》、《串调》、《关公战秦琼》、《买佛龕》、《汾河湾》、《戏剧与方言》、《卖包子》、《阴阳五行》。这些节目有时电视台还放。这就是毛主席最后看到我为他说的相声了。一晃儿，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 16 年了，可每年 12 月 26 日有不少人家仍保留吃“寿面”的传统。这是对毛主席的纪念。

1993 年 2 月于北京医院



## 访林克——

### 毛泽东读英文，读外国书

林 克

林克(1925—1996)，江苏常州人。1949年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1954—1966年任毛泽东秘书。后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室主任、中国西欧研究会副总干事、中国欧洲共同体研究会常务理事等。主要著作有《人间毛泽东》、《世界经济概论》(合著)、《2000年中国的国际环境》(合著)、《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合著)等。

这是林克大病初愈后同我们谈的。说起毛泽东，滔滔不绝。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2个春秋，要讲的话实在太多了。从什么地方谈起呢？我们围绕着毛泽东的读书谈了下面几个问题。都是切身的感受。

#### 毛泽东为什么学英文

**访问者：**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几年，除担任秘书，还教他学英文，毛泽东对您也有很好的评价，称您为“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到他身边工作的？

**林 克：**我是1954年秋到毛泽东办公室工作。前后有12

年。我教他学英文是附带的，主要是做他的国际问题秘书。

**访问者：**困难时期，毛泽东曾得过浮肿病吗？

**林 克：**毛泽东一生简朴，但决不是苦行僧，现在有人把他写成像苦行僧一样，甚至像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还说他在三年困难时期二十天不吃一颗粮，长期吃野菜和菠菜充饥，还得了浮肿病，很多书都这样照抄。我当时就在他身边，为了弄确实我还专门打电话问当时给毛泽东做保健的医生和护士。

**访问者：**我们首先想问毛泽东为什么学英文。

**林 克：**我认为毛泽东学英文首先是出于兴趣，如果根本没有兴趣，硬着头皮学是学不好的，像他这样忙的人，国家大事那么多，要集中力量学英文是很困难的。所以有浓厚的兴趣是首要的因素。有人说毛泽东学英文是因为斗争的需要，我觉得这种提法不太恰当，也不太合乎实际。

第二，他学英文的目的是为了开拓知识面，因为读理论方面的书是很枯燥的，如逻辑学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他采用读英文版马列著作的方法，既学了英文，又学了理论，进一步加深了理解。如在读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时，其中有一段话“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读到这儿时，他说，可惜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宣言》序言中还有另一段话：“关于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第四章）虽然大体上至今还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而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彻底扫除，所以这些意见在实践方面毕竟是过时了。”读到这里，毛泽东说，以中国的情形来看也是这样，从清朝的康梁保皇派到袁世凯、北洋军阀时期的研究系（后来的

政学系)、吴佩孚、曹锟、段祺瑞、张作霖、青海的五马……都被历史的进程扫除掉了，惟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存在下来。他就是这样，既学英文，又从中学到理论，学习时他经常喜欢探讨，所以拓展知识面是他学英文的主要目的。他学英文是很认真的，一边学一边在书的天地、左右两边用削得很尖的铅笔注上字义。到晚年，看东西不太清楚了，就用大字、粗笔在上面反复注，如英文版《矛盾论》、《共产党宣言》从第一页到最末一页，都密密麻麻用很小的行草注满空白的地方。《矛盾论》的英译本他就先后学习过三遍，并在封皮的内页记下了三次阅读的时间：1956年5月10日开始读第一遍，1959年10月31日开始读第二遍，1961年10月9日开始读第三遍。

第三是有坚强的毅力。像他这么大年纪，这种条件，如果没有毅力，学英文是很困难的。经常是有重要会议就打断了，但他还是利用一切机会坚持下来，有时一天学很长时间，也有时几天学不了。

**访问者：**没有固定时间？

**林 克：**碰到开重要的会，就间断了。一般是起床后或睡觉前，也有是在游泳、散步结束后和我汇报工作时，在外地视察工作时，在火车、轮船和飞机上也利用时间学，时间有长有短。反正我每天要和他见面，选文件、送文件，他什么时候想学了就把我叫来。

毛泽东有很强的求知欲，就读书来讲，党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恐怕近代革命家中像他这样强烈求知的人，也是不多的。他又和那些革命家不一样，他已经领导建成了一个国家，国事非常繁重，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读书，不仅学英文，还读别的，这本身就是很简单的事。号召领

导同志学外文，他曾提倡了几次，但多数人学了几次就放下了，他是一直坚持学到底，虽然他的英语能力远没有达到像其他方面知识那么深，当然这也和他过去的基础有关。

但在学英文上他也有独到的特点，一是记忆力非常强，有时几年不读了，有些单词还能记起来；再一个是他对文法结构很清楚，理解能力也很强，他曾提到英文似乎应该改造一下，不要太烦琐，提出现在没有一部好的汉英词典或英汉词典。他常常喜欢把英语同汉语的语法、修辞作比较，或者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他说：“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同汉语比较。如有机会，我还想学点日文。”后来由于工作实在太忙，学习日语的愿望未能实现。

**访问者：**您教毛泽东学英文，主要是对话，还是讲词义？

**林 克：**主要是阅读，阅读中有的单词念错了，我再纠正。

这里我要讲到第四点，就是在学习问题上毛泽东非常谦虚。应该说从各方面他都是我的老师，可在学英文上我当他的老师。他说，你当我的老师有什么不对，我读错了，理解错了，你就及时给我指出来。在学习中，他也从来没有过什么不好意思，大声朗读，一遍不行，读两遍、三遍、四遍。不懂就问，让怎么念就怎么念。不仅学英文，他学其他东西也有这个特点，一篇好的文章都要重复学几遍，既有博览，又有精读。

所以，他后来的英文程度可以达到阅读一般文章、报刊消息，有时碰到生字，就借助字典。

**访问者：**毛泽东学英文，还有什么和别人不一样的特点？

**林 克：**他学英文的办法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他是政治人物，对政治特别熟，所以这方面的知识很丰富。他不是从

什么牛、羊、猫、狗一类单词学起，而是适应他自己的特点，选择一些时事消息、短的评论读起，这样生字、词也少一点，以后英文提高了，再读长一些的政论文章。

**访问者：**您刚去时，他的英文是什么程度？

**林 克：**只会简单的词汇，会话也只会说“你好”、“早晨好”一类的问候语。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能看中国出版的英文杂志，因为这些刊物比较适合中国读者的要求，还不是 pure English(纯英文)，另外有些文章能比较顺利地阅读了。有时接见外宾，他还拿起一篇英文的东西读起来，听起来还比较准确，外宾感到很惊讶。其实他的发音不太准，湖南口音太重，年龄大了也难纠正。

**访问者：**他为什么在 1954 年想起要找个英文教师学英文？

**林 克：**我想，可能是对外交流慢慢多起来了，客观上有了这种需要。有人就问过我毛泽东学英文的目的，我认为多方而的。有人说是为了斗争的需要，我不赞成这样看。他学了英文难道是去直接和资产阶级辩论吗？不是这样。我看还是上而我讲的，一是他对学英文有兴趣，一是扩大知识面，借助学英文，使一些比较枯燥的学习，换一种方式，更能有效果。另外，这也是一种特殊的休息，看书、看文件看累了，会议开累了，接见外宾累了，就让我和他读英文，一读英文，脑子都钻到单词、句子里去了，别的不想了，也就得到了休息。有时他睡不着觉，也把我找来读一会儿，读着读着打起鼾来了。这是一种特殊的休息，也可说是毛泽东式的休息。所以，毛泽东学英文的目的是多方而的，不是单纯只有一个目的。

## 毛泽东读过哪些外国书？

**访问者：**这又涉及到毛泽东是不是开放的，他学英文是如此，读外国书恐怕也是如此，你觉得这样说对不对？

**林 克：**大体可以这么说。在对待西方文化上，毛泽东是很开放的。至于他读过哪些外国书，就我的接触，有这么几类：一类是马列经典，一类是西方古典社会学和经济学。他和我讲过，他读过严复编译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还有卢梭的《民约论》，以及一些经济学著作。但他好像没有讲到近代的社会学和经济学著作，所以他读的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都是比较古典的，近代的相对少一些。当然后来他从杂志上也作了一些弥补，他订有十几份理论杂志，十几份报纸，让我也订六份。十几份报纸中，有六份中文报、六份港澳台报，让我经常选些报刊上的理论文章拿给他看。他还比较喜欢看《光明日报》，因为《光明日报》开有“文学遗产”栏，现在我还保留有他批阅过的少数原件和复印件。

**访问者：**看来毛泽东对理论方面的文章很感兴趣。

**林 克：**特别感兴趣。我给他选过一些理论文章，现在有的保留下来了，有的没有保留下来，面很广，数量也很大，有的我也记不清了，因为那时我对理论的东西不是特别感兴趣，这同我原来的专业有关，主要研究国际形势。所以他那封给我的信中说：“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这比较合乎我的实际。以后我就注意钻研理论，还做了一些笔记。

在毛泽东读的书当中，哲学占了很大比重，从中国到外国，哲学是他学习的重点，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是他读的哲学书中的一部分，就这样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哲学的重视了，他始终对哲学有浓厚兴趣。

**访问者：**毛泽东读马恩列斯的著作的情况怎样？

**林 克：**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著作，最早的是《共产党宣言》，由于那时出版条件的限制，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不多，但也是找到多少读多少。除《共产党宣言》以外，他读过《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论》等，还有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这本书，他单独和我学习过一遍，让我把要点标出来，有什么问题也标出来，他看后又作了很多符号。

**访问者：**我们见到毛泽东读斯大林这本书有三个版本，都有批注和圈点。

**林 克：**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他还对我谈论过他的看法，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两点：一是斯大林虽然承认社会主义有矛盾，但比较勉强，不认为有对抗，说社会主义矛盾不会发展到对抗，毛泽东认为不然，在那段话旁边打了几个问号。二是讲到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斯大林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这个看法不对，生产资料也应该属于商品范畴，发展商品生产也应包括生产资料。在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对商品经济讲了一大段话，阐述了他的观点。

**访问者：**有人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他没有读过。

**林 克：**是不是读完了我不好说，但他肯定读过《资本论》，现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里就存有他读《资本论》留下的手迹，有批注和圈点。毛泽东读书有个特点，他在考虑某个问题时，就找来相关的书读某个章节。比如《列宁全集》他不一定通读过，但其中的重要文章如《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

命》、《“左派”幼稚病》等都写有便条，让我找来给他阅读。《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学英文时就跟我读过，《共产党宣言》不止读一遍。

**访问者：**对外国的历史著作毛泽东重视吗？

**林 克：**这也是他读外国书的一个方面，不仅重视而且非常熟悉。他在和外宾的谈话中，往往讲出这些国家的某段历史，有些连外宾自己都不熟悉。对一般的历史，如美国史、法国史、英国史，他都能自如地谈论，尤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哪一年发生的，哪一年出了什么大事，他的记忆力非常好，这给我的印象很深。

毛泽东还喜欢读外国人的传记，读得相当多而且熟悉，早年读了，晚年也还读，还经常谈论起《戴高乐回忆录》、《艾登回忆录》、《阿登纳回忆录》等。他对戴高乐的看法和别人不一样，认为戴高乐有民族精神。所以他对外国历史相当熟悉，各国的历史知识非常丰富。

**访问者：**对外国的专门历史著作也读过吗？

**林 克：**他的书房里就有英国著名作家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原来放在他的床上，是经常翻的。他读历史，既读通史，如世界通史、西洋史、欧洲史，也读个别的国史，如上面说到的美国史、法国史、英国史等。

**访问者：**1950年新区土改时，毛泽东给刘少奇有封信，其中就谈到中国的土地改革和法国、日本的情况不同，可见他对这些国家的历史很清楚。在其他方面是什么情况？

**林 克：**再就是逻辑学，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毛泽东读逻辑比较集中的时期，因为1958年发生了一场关于逻辑学的论战，主要是在周谷城和马特之间进行的，他们的文章刊登在《人民日报》和《哲学研究》等报刊上。以这个问题为契机，



他让我找来几本逻辑书阅读，我记得找过三四本，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我还记得人民大学的王方名在《教学研究》上发表关于逻辑学的文章后，他特别感兴趣。

宗教的书也读过，他和我说起他读过《圣经》，还说，《圣经》不仅是基督教经典，文字也很优美，是文学名著。我说我也喜欢，在大学时我就当作文学著作读过。但关于《圣经》的内容和评价没有细说。

**访问者：**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佛教的《金刚经》等，他也读过吗？

**林 克：**《古兰经》不记得他说起，但现在一般的说法他读过。佛教的《大藏经》、《金刚经》他读过，关于六祖禅宗的故事，他和我说过多次，对慧能评价很高，特别赞赏他的革新精神，说他不要教条、不要清规戒律，还背出慧能的那首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精神是和他的性格相通的。他还给我专门解释了这首偈的背景，说慧能本来是做下等粗活的，文化不高，几乎不识字，但他的悟性好，在听人诵《金刚般若经》后，才发心学佛，投禅宗第五世祖弘忍门下，弘忍便将禅法秘诀授予他，并付法衣，这也就是“继承衣钵”的出典。这个故事，毛泽东多次提到。

**访问者：**关于外国文学方面的书，他读过哪些？

**林 克：**相对讲，毛泽东对外国文学读得较少，但也读过一些，我就听他讲到 he 早年读过希腊罗马时代的小说，还有《茶花女》、《简·爱》、《红与黑》都读过。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对我谈起苏联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那是在1958年“大跃进”出了问题后，有一次和我谈起这篇小说，他说：别人的经验还不能变成自己的经验，自己没有实践经验

还不能得到教训。像苏联《被开垦的处女地》里描写的，地主富农都被扫地出门，造成了社会紧张和生产力的破坏。类似现象我们也发生过，如中央苏区时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都造成了失误。现在有人又对农民搞剥夺，刮“共产风”，瞎指挥。这些在《处女地》里都写了，不少人也看过，但就是不能吸取教训，看来没有自己的经验有时还是不能取得教训。

比较起来，毛泽东对外国文学方面的书读得少一些。我个人很爱读小说，从中学到大学，不论中国小说，还是西方的小说都读了很多，他要和我谈起来，话题是很多的。他和我谈论过《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西厢记》、《牡丹亭》等等中国文学作品。但他就是很少和我谈西方文学作品，不知为什么。对外国的诗歌也是这样，我不记得他谈过雪莱、拜伦、歌德、席勒的诗歌。对诗，他有个特点，喜欢古诗不爱看白话诗，臧克家讲过这个问题，说他虽然不愿看白话诗，但提倡写白话诗。毛泽东和我说起时，就更坦率了，大概也没有什么忌讳，他说，让我看白话诗，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看。

**访问者：**可能嫌没味。

**林 克：**意思是那东西不叫诗，诗读起来应该朗朗上口。

## 对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分析

**访问者：**对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您怎么看？有人说，他的失误主要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他的整个哲学思想就是世界要动，不断变革，因此给他概括为斗争的哲学。

**林 克：**我认为，毛泽东的失误，主要是在理论上出现偏差，主要有三点：一是对过渡时期的认识估计得太长，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又认为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因

此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些斗争由党外到党内，又由党内到党外，三反五反、反右派，是党外，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是党内，最后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第二是急于求成，他的思想老在变，使别人总有赶不上趟的感觉，总想在有生之年使中国富强起来，急于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就对别人不大放心，在理论上虽然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两个方面都讲过，但实际工作中偏重于在生产关系上的变革，而对发展生产力的力量不够；第三是国际的原因，中国一直受压，受别人的包围封锁，先是帝国主义的禁运，后有中苏分歧以至冲突，无论美苏都曾想要对我国动用核武器，1958年金门事件时，美国就要动用核武器，1969年苏联也要动用核武器，毛泽东是有骨气的，他不怕这些，但这在客观上为他的理论的偏“左”提供了外部条件。

毛泽东对治乱有他和别人不一样的看法，“大乱达到大治”，他不是随便讲的，是根据历史上的兴衰变化总结出的规律。但问题出在哪？不论“文革”中，还是“文革”前，毛泽东都讲过阴暗面，就是党内的腐化变质问题。现在这些现象仍然存在。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采用了群众运动的办法，最后还是没有解决，反面走向了失误。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应当采取法治的办法，而不是人治，他是用人治，靠个人的号召力、个人的威望魅力来解决。他又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年轻时讲的一些话就很一鸣惊人，“读奇书、做奇事、做奇人”，作为一个农家出身的人，那么年轻就有这种抱负确实是少有的。但用这个办法，不能治理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口众多的大国。我看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原因，主要是这些。

总之，我认为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大地上崛起的世界伟

人，他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尽管他也有过严重的失误和挫折，但他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他对我的教诲使我受益终生，他的音容笑貌还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不仅是我，整个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他。

1993年3月14日于北京羊坊店

# 访高菊村——

## 毛泽东和韶山“情结”

高菊村

高菊村，1936年生，湖南汨罗人。自1965年起一直在韶山工作，曾任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馆长、湖南省韶山管理局副局长、湖南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主编的著作有：《青年毛泽东》、《韶山吟——古今名人墨客咏韶山》、《风景名胜·韶山》、《毛泽东故土家族探秘》等。

韶山因毛泽东而闻名，还是韶山养育了毛泽东？恐怕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湖南人说，韶山出了个毛泽东；陕北人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我们还是借用高菊村的话：毛泽东——韶山，日月同辉！这篇访谈录是我们趁高菊村来京出差的机会采访到的。

### 韶山给了毛泽东很多

**访问者：**毛泽东生于韶山，长于韶山，但他不仅仅属于韶山，而属于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说，又属于世界。韶山因为他的出现而闻名中外，走向繁荣。那么韶山曾给了他什么？

**高菊村：**韶山给他的东西很多，对他的影响深远。可以说，没有韶山昔日的影响，就没有今天的毛泽东。他在韶山

的经历，关系到他的一生。他在这里诞生，从这里启程；他的思想、个性、人格，在这里奠定根基。

**访问者：**请说说少年毛泽东的思想、性格的问题。

**高菊村：**毛泽东的童年和少年在韶山度过，1910年秋快满17岁才离开。对于他这段历史情况和故事，已有许多宣传介绍，然而对他当时的思想性格，却缺乏应有的重视和研究。我也是近几年来才注意到它。我认为，少年毛泽东的思想、性格的根本内核是：思想上，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立志救国救民；性格上，刻苦追求，奋发上进，从不屈辱盲从——这便是独立思考、勇敢抗争。

**访问者：**他当时的这种思想、性格是怎样形成的？

**高菊村：**这就离不开社会环境，韶山的人和事。具体说来有六个方面。

第一，外祖母家。我先讲这个，人们也许会感到意外和奇怪，殊不知这正是毛泽东经历中的第一个特点和优点。毛泽东出生时，父亲毛顺生仍是贫穷潦倒；母亲文氏，娘家湘乡唐家坵（今属韶山市），虔诚信佛，生育不顺，头两胎夭折。毛泽东出世后，父母深感生活无奈，尤恐先例重演，故此，毛顺生外出当兵，文氏抱毛泽东回娘家寄养，直到毛泽东8岁才接了回来。当时文家已是四世同堂、40余口的大家庭，又属小康之家，书香门第，更有优良的家风。这家风一是坚韧不拔、勤劳精细的治家作风；二是行善好施、乐观开朗的人生态度，人人都有一颗善良、纯朴的心，真诚相处，温顺和谐。毛泽东在文家七八年，颇受长辈爱护、器重，加之他聪明可爱，被人视为宝贝。舅舅在家办私塾，经常带他在身边，他成了一个特殊的“旁听生”，所受的教益比正式生还多。另一方面，优越的环境和优厚的待遇，常使毛泽东称心如意，乐

而无忧，难免产生某种优越感。他在同辈或同龄孩子中，往往不是被羡慕，便是遭妒嫉，也难免时有口角和“纠纷”。这一切，不能不影响到他思想性格的发展，使毛泽东得到最初的锻炼。

这个情节说明：毛泽东在受父亲、毛家、毛氏家族影响之前，先接受了母亲、文家的影响，在学会恨之前，先学会了爱，在认识假恶丑之前，先认识了真善美，在产生忧患意识之前，先有了乐观向上。唐家坵的生活，使他获得了对人生的重要的第一印象，获得了日后反抗活动的初始依据和初始动力，萌生了最为朴素的善恶观，从而为他回到韶山冲以后，不断地与父亲、族长抗争，打下了根基。

**访问者：**这个情况的确很特别，也鲜为人知，但又重要。请说第二个方面。

**高菊村：**第二，父亲母亲。母亲文氏，上面已经提到，她的优良品德及对毛泽东的影响，已广为人知。她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一生勤俭、善良、无私、大度，对人怜悯、同情，对毛泽东的影响特大。毛泽东对母亲十分孝顺、敬重。这些都不多说了。在这里我要借此机会，对毛父顺生及其给予毛泽东之影响，多说几句。

我认为，过去人们对毛顺生的了解是很肤浅而片面的，宣传也是不很公道、客观的。对他过分苛贬，失于偏颇。他固然有专制、自私和对人刻薄、粗暴的消极一面，但这是次要的一面。他更有勤劳、节俭、精明、能干的积极一面，也是主要的一面。这一面还包括他的强悍、武勇、坚韧不屈的性格，无畏、果敢的胆量气魄，奋发进取、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以及他的商品经济意识和经商发家之道。而这些对当时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来说，真是难能可贵！又恰恰是这些，对

毛泽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的身上始终可见毛顺生的影子。

即使毛顺生的消极一面，也给毛泽东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少年毛泽东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以文家、母亲对比毛家、父亲，以前者的乐善好施对比后者的刻薄自私，以文家的自由活泼对比毛家的专制压抑，这，正是整个少年时期毛泽东父子间充满火药味的原因。文氏对丈夫只有温顺，而毛泽东对父亲的弱点却是坚决地抵制和斗争；毛泽东的抗争虽未也不能克服父亲的阴暗面，但使自己得到了难得的磨砺。

所以我说，少年毛泽东正是在父母的交互溶磨中塑造出来的：父亲给他以棱角，母亲给他以光环，他既扬弃了父亲的自私、刻薄，又保留了父亲的坚强、勇敢；他既接受了母亲的善良、无私，又抛弃了母亲的逆来顺受。他是阳刚、阴柔兼备的人。

**访问者：**你的观点值得重视。全面、准确、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父亲，成为研究者应该重视的一个方面。看来我们应该为毛父“恢复名誉”。还有影响毛泽东的第三个方面呢？

**高菊村：**第三，毛氏家族。毛姓源于周文王第八子“郑”，史称“毛伯郑”。毛氏家族历尽沧桑，由中原到江浙，再到江西。明洪武年间，毛太华及其子，从江西经云南到湖南湘乡，最后定居韶山，开韶山毛氏家族之先河，自太华公到毛泽东计20代。这个家族，系韶山最大的家族，组织、制度非常严密，俨然是个“小王国”。它的总祠堂——“毛氏宗祠”，分祠堂——几个“公祠”，犹如“宫敢”；它的历修族谱，类似“宪法”，族谱所载《家规》、《家训》、《家戒》、《家劝》等，如同法规、法令。这些虽然基本属于封建的东西，但是也有



其精华。如规定：敬养父母，友爱兄弟，严于教子，婚丧喜庆不骄奢，不溺女婴，体恤孤儿寡妇，和睦乡邻等；严戒：游荡，赌博，偷盗，酗酒，迷信风水、强占他人财产等；劝行：培植心田，品行端正，奋志芳窗，勤劳务本，等等。这些，多少体现了民族精神、传统文化和社会公德，曾为少年毛泽东所吸收和效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韶山的毛氏家族，在历史上出了不少的名人，如毛遂、毛亨、毛萇、毛延寿、毛贵、毛伯温、毛晋、毛奇龄、毛有庆、毛正明、毛恩毅等。毛尔达、毛彝生、毛兰芳等在主持修族谱时，不仅对他们都有所载入，而且把韶山的风景和神话、传说写了进去，并配上诗词或骈文，使本属正儿八经的儒书，染上了难得的文艺色彩和浪漫气息。于是，这本毛氏子孙必读之书，毛泽东更为喜读，并受益匪浅，1959年6月回韶山时，还点名要看。

**访问者：**毛氏家族共修过几次族谱？毛泽东当年看过的族谱还在吗？

**高菊村：**韶山毛氏家族共修过四次族谱，毛泽东1959年看的是四修（1941年）。这些族谱都已珍存。

第四，蒙馆塾师。毛泽东1959年回韶山祭拜父母坟墓后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人民，老师、朋友也。这老师，也包括了他的蒙馆——私塾老师。所以，他那次请父老乡亲吃饭，就请了当年的塾师，并一一敬酒。当敬到塾师毛宇居（堂兄）时，毛宇居激动地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即席作答：敬老尊贤应该应该！少年毛泽东在韶山，读过六年私塾，换过七个塾址和六位塾师。

**访问者：**真是“打游击”一样！为什么换得如此频繁？六位塾师中哪位对毛泽东影响最大？

**高菊村：**应该说，每个私塾、每位塾师都曾使毛泽东获得益处，如文化基础、历史知识，还有古文写作和书法。他熟读先生点教的“四书”、“五经”，但他不喜欢经书，爱看中国古典小说；他如饥似渴地汲取，但强烈的求知欲望远远难以满足。同时，他很不满意当时的学制和教学方式。他一生中最后也是最好的、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位塾师，就是毛麓钟。麓钟先生世居东茅塘（毛泽东祖居地），是毛泽东的堂伯父，韶山冲唯一的“秀才”。他才高八斗，品德高尚，曾游历江浙，目睹中日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严重创伤，深知清廷之不可救药，乃愤而归乡，在自己家里续办“面山楼”私塾，决心造就下一代，以资救国救民。因此，他办学的方式与前辈迥异，吸收了若干新学成分，将亲身经历的“国耻”引入教学内容，以励学生为国读书。毛泽东于1910年上半年在其门下就读，使他眼界大开，爱国爱民意识更浓，其收获超过了以前的几年。

还有一位，虽然不是毛泽东的正式塾师，但给毛泽东的影响不亚于毛麓钟，那就是李漱清先生。他家住毛泽东家以北三四里处，他比毛泽东大21岁，早期在外地进的是新学堂，思想激进，回乡后大谈维新变法，以拯救中国，主张废除祠堂、庙宇，建立新学，培养救国人才。毛泽东十分钦佩，经常趋前请教，结为忘年之交，并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了维新救国的道理，读了不少维新变法的书刊。这时，毛泽东不但有了爱国主义、民本思想的萌芽，而且有了救国救民方法的启蒙。

**访问者：**中共韶山支部首批党员、五位烈士之一李耿侯，是不是就是他的儿子？

**高菊村：**是的。李漱清帮助毛泽东走出了韶山，15年后，

毛泽东又引导李漱清的儿子走向了革命的道路，培养其成为韶山农运的领导骨干。这也是“毛泽东与韶山”辩证关系的一个逻辑反映。下面，我继续谈韶山对毛泽东的影响。

第五，乡土文化。由于自然地理和社会历史的特殊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在韶山的具体体现，内容极为丰富而典型，并为本地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化。少年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度过，受其影响殊深。例如说“儒”和“佛”，在韶山均颇盛行，少年毛泽东既受影响，又有扬弃，充满着矛盾、复杂情况。因我有专著和专文，在此就不说了。

第六，阶级斗争。这可说是毛泽东与韶山关系中的一根红线。韶山当年的社会状况和阶级斗争，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对少年毛泽东思想性格的初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个带实质性的问题。因为它比较广为人知，我就点到为止吧！

**访问者：**恐怕有两个问题还得请说说。一是毛泽东少年时期韶山的土地占有情况，二是哪一两件阶级斗争的事实对当时的毛泽东影响最深。

**高菊村：**毛泽东少年时期韶山各阶级的土地占有情况暂无资料可查，但在解放前：仅占人口 6.5% 的地主、富农，却占去土地 60%。而占人口 71% 的贫雇农，仅占土地 5.8%。韶山最大的官僚地主成涤泉的弟弟和儿子 6 人，共有良田 1 万余亩，占了韶山水田面积的  $\frac{1}{7}$ 。

解放前，韶山冲有 70% 以上的贫苦农民靠讨米、做工为生。迫于生活，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韶山人民多次掀起自发的反抗斗争。对少年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 1910 年上半年的

长沙“饥民暴动”、韶山内外闹“平粜”、“吃大户”的运动。毛泽东不仅耳闻目睹了这些斗争，而且还亲身参加了与封建地主兼族长毛鸿宾的斗争，加之一些带爱国色彩新书报刊的启迪，对毛泽东的思想触动很大。他后来回忆说：这些事给他“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有的事“影响了我的一生”。从这时起，他“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深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而忧虑，为人民的痛苦而不安。他认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救国救民”是自己的“天职”。

所以我说，毛泽东思想、性格之基牢牢奠基在韶山，毛泽东之根深深植在韶山。

### 毛泽东对韶山的馈赠

**访问者：**韶山既然对毛泽东有这么大的恩赐，那么毛泽东对韶山有何反馈？

**高菊村：**说到反馈，我想讲三点：一是毛泽东把自己的整个精力和全家六位亲人的宝贵生命，献给了包括父老乡亲在内的全国人民；二是对韶山和韶山人民感情深厚；三是对亲属、亲戚、同宗、同学、同乡关怀备至，要求严格。三者概括起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培养了“韶山精神”。

关于第一点，众所周知；关于第二点，表现有三：

其一，多次回韶山。1910年秋到1918年夏，毛泽东在外地求学期间回去的次数很多，之后也不少，主要有：1921年春回来教育全家亲人干革命，1925年2—8月在韶山领导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初考察韶山农运，还有解放后1959年和1966年两次回韶山。

其二，书信频传。迄今为止，我们发现和掌握的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给韶山和有关人士的信件达80余封，其中有不少

已被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随书信或托人向亲人、老师、同学、朋友赠款的不下 30 次。

其三，邀人上京。在解放后，毛泽东邀集或同意去北京见面的乡亲达 60 人次，他把他们请到自己的住处，同席共餐，连夜叙旧，调查了解情况，临别时还要赠送些生活用品。毛泽东所赠送的这些钱物，都是从自己稿费中开支的。

**访问者：**韶山是否有人凭借与毛泽东的关系享受特权的？

**高菊村：**韶山毛泽东的亲属、亲戚等因毛泽东的关系，被引导参加革命并做出牺牲的有，而且不少；但凭借毛泽东的关系捞到特殊权益者一个也没有。毛泽东对亲人、乡亲的关怀、爱护是深厚的，也是全面的，但主要是政治思想上的关心爱护，对他们的要求极为严格。他曾在致文表兄的信中写道：“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祖父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眷念我外祖父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在给当地组织的信中又写道：我外祖父家的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任何人都“不应特殊”。“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正“因为我爱他们，我希望他们进步”，“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

**访问者：**难道韶山在物质上，也没有因为毛泽东而得什么特别的好处吗？

**高菊村：**这种特别的好处，不能说没有。例如：因为是毛泽东的家乡，上面在经费、物资分配上适当照顾点，外地支援和优待点，这是有的。尤其是在“文革”期间，这里送拖拉机，那里送卡车，还由红卫兵倡议，经中央批准，修建了一段（22 公里长）通往韶山的铁路。

**访问者：**当时毛泽东知道同意吗？

**高菊村：**在1966年冬开始修筑时毛泽东是不知道的，是由周恩来批准同意的；1967年通车前夕才知道，并不同意选在他生日那天（12月26日）举行通车典礼。你们提问这个事使我联想到另几件事，即公路、故居和“自力更生”指示问题。50—60年代，湖南和湘潭党政组织决定修路，将湘潭—韶山公路改直加宽，毛泽东知道后，不同意这样做，直到1993年才完全实现。解放初，省市决定给毛泽东重建旧居，一切准备就绪，毛泽东知道了，勒令停工，不准兴建；1959年回来时，又有人请示他要不要把旧居修理一下，他回答：不要花钱，最好让地方上的人去住，房子无人住容易坏。现在，故居红匾为小平同志题写，基本上保持了原貌。“自力更生”指示事，发生在70年代初。当时有人请求国家直接资助韶山生产建设，毛泽东知道后指示：韶山应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不应由国家直接拨款。

**访问者：**你前面提到“韶山精神”，请问：什么叫“韶山精神”？它与毛泽东有何关系？

**高菊村：**1991年3月11日至12日，江泽民总书记来到韶山。他在参观过程中，曾三次高声背诵1959年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当他诵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一句时，情绪尤为激昂，指出：这就是“韶山精神”。韶山精神就是“奋斗，牺牲，奉献，进取”。并挥笔题词：“发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精神！”至于它与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说，韶山精神是韶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是韶山148位烈士用鲜血凝成的，也是毛泽东的直接作用和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半个多世纪以来，韶山党政组织和人民，坚持、发扬韶山精神，为中国的革命战争做出

了重要贡献，并建设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尤其是近十余年来，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使韶山精神得到了大弘扬。

1993年4月9日于北京中毛家湾

## 访王兴国——

### 杨昌济的得意学生

王兴国

王兴国，1937年生，湖南株洲人。现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著有《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合著）、《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等。目前正撰写《青年毛泽东（1910—1927年）的思想轨迹》。

几年前，就和王兴国一起在《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共过事，再加上京、湘两地在毛泽东研究方面颇多联系，找他谈谈也就不是什么难事。况且王兴国快人快语，挺爽直。

**访问者：**您在国内从事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是比较早的，同时也最早系统地研究过杨昌济。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早年是杨昌济的得意学生，后来又成为杨的女婿。您能具体谈谈他们之间的关系吗？

**王兴国：**我们对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研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的。开始的想法比较单纯，就是试图证明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他也有一个从非马克思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向成熟的马克



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在研究过程中，我接触了许多具体材料，感到杨昌济与青年毛泽东关系十分密切，对毛泽东的思想影响十分深刻。于是在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告一段落之后，便立即转入杨昌济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觉得杨昌济与毛泽东之间，不是一般的师生关系或翁婿关系，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说，杨昌济是青年毛泽东的精神导师。在《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一书的“引言”中，我曾通过对杨氏生平经历及其在湖南思想界地位的分析，指出他“在旧文化与新文化、中学与西学之间，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确是起了某种桥梁作用的”。也就是说，他是引导青年毛泽东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一个重要领路人。

杨昌济生于 1871 年，1920 年去世，湖南省长沙县板仓人，所以人称“板仓先生”。他出身于一个农村的读书人家，从小饱读儒家经典并精研宋明理学，服膺程朱。19 岁考取秀才后，几次参加乡试，均未考上举人。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在爱国热情的激发下，他开始鄙弃科举仕途，关心经世致用之学，并在戊戌变法时期积极参加了谭嗣同等人在湖南进行的变法活动，撰文发表自己的政见。戊戌变法的实践，使他大开眼界，“以为处此时势，非有世界之智识，不足以任指导社会之责，于是出洋求学”。1903 年至 1908 年留学日本，先后在弘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主攻教育学。1909 年考入英国滬北淀大学，主攻哲学和伦理学。1912 年夏毕业于滬北淀大学，获文学士学位。此后在德国进行短期考察，于 1913 年春返国。1913 年至 1918 年，先后在湖南省立高等师范学校、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湖南商业专门学校任教。1918 年夏，应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任哲

学系伦理学教授，直到逝世。主要著作有《达化斋日记》、《教育学讲义》、《论语类钞》及收入其他论文的《杨昌济文集》，译著有《西洋伦理学史》、《伦理学之根本问题》。我下面引用的杨昌济的一些话，基本都出自这些著作。

毛泽东与杨昌济的来往始于1913年秋。其时，杨昌济刚从国外留学归来，任第四师范学校修身和心理学教员，而毛泽东在这一年春考入该校预科。现存的毛泽东的笔记《讲堂录》中修身课部分的内容，就是1913年10月至12月听杨昌济讲课的记录。1914年第四师范与第一师范合并，杨昌济与毛泽东均转入一师。由于杨昌济学识渊博，贯通中西，加之平易近人，诲人不倦，所以毛泽东对他十分尊敬，课余经常与好友一道去杨家请教、谈心。《达化斋日记》1915年4月5日就曾记有毛泽东与杨昌济的谈话情况，内容除毛泽东自述的家世、个人简历之外，还有杨昌济对毛泽东的评价，认为毛虽农家出身，“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1918年4月，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等创立新民学会时，其21个“基本会员”，除罗章龙外，均系杨昌济的学生。所以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谈及学会缘起时，着重指出，除时代的影响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教后，仍十分关心刚从一师毕业的毛泽东等人的前途，他不仅大力支持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湖南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而且介绍第一次赴北京的毛泽东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对毛泽东等1919年底组织的驱逐军阀张敬尧活动，也积极支持。逝世以前，他还致函章士钊，拜托他以后多关怀和提携

毛泽东、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章士钊：《杨怀中别传》）杨昌济逝世后，毛泽东十分悲痛，曾与蔡元培、章士钊、杨度等联名发布启事，高度评价了杨一生的教育事业，并发起捐集赙资，抚恤杨的遗孤。同年，毛泽东与杨昌济的爱女杨开慧结婚。

**访问者：**杨昌济与毛泽东友谊如此深厚，那么他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影响一定也是很深的了？

**王兴国：**是的。杨昌济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从政治方面来说，首先表现为炽热的爱国主义。杨昌济生活的时代，恰处国际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时代。为了瓜分市场，攫取中国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地处中国近邻的日本帝国主义表现得特别贪婪。其突出表现就是1894年对中国属地朝鲜的侵略和辛亥革命后与袁世凯的勾结。对此，杨昌济始终抱有警惕。他曾回忆，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听到讲西洋历史的日本老师说，中国人与罗马人同，惟宝爱其文化；虽外人入主其国，苟不伤其文化，即亦安之。当时他心里就感到，日本人不怀好意，确有入主中国的思想，值得国人注意。所以杨昌济在讲课时经常联系现实，以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教育其学生。杨昌济的这些教诲，在青年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当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立即激起了毛泽东等人的愤慨。他在悼念亡友的挽诗和挽联中曾痛切地写下了“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瀚”等语句。他还在一师师生编印的揭露日本侵华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明耻篇》一书的封面上写下豪言壮语：“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

学子！”正是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激励着青年毛泽东在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百折不回。

其次，杨昌济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他曾说：“从政治上求变，变之自上者也；从教育上求变，变之自下者也。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高以下为基，吾宁自教育始矣。”所以他说：“欲救国家之危亡，舍从事国民之教育，别无他法。”这种教育救国论的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也是比较深的。所以当毛泽东在一师毕业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还被读书从事教育事业与从事现实政治斗争的矛盾所困扰。同时，毛泽东在《民众大联合》中所以称道克鲁泡特金一派的“温和”方法意思“更广，更深远”，显然也是受了杨昌济的这种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

从文化观方面，杨昌济主张从实际出发，正确对待本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他说：“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基于这种认识，杨昌济既反对“留学迷”和“全盘西化”的主张，也反对闭关自守的“国粹主义”。

**访问者：**有的人认为杨昌济的这一观点是“折衷主义”。

**王兴国：**是有这么一种说法。但不管怎么评说，我们都不能忽视它对青年毛泽东五四时期文化观的重大影响。首先，它使毛泽东能避免五四时期许多人在文化问题上的绝对化的形式主义方法，正确区分中西文化的优点和缺点。例如，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就指出：“怀中先生言，日

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其次，它引导了青年毛泽东注重对国情的研究。所以，当新民学会中很多成员于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却决定暂时留在国内进行研究，并认为这样做有几个好处：第一，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第二，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现在有的论者曾为毛泽东当年没有出洋留学而惋惜，觉得这影响了他的文化观并导致了他思想上的某种局限性。这一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更重要的是应该看到，正是由于毛泽东始终重视国情研究，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促使他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并且成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光辉的典范。

**访问者：**青年毛泽东所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似乎要比“西学”浓厚得多。留在国内的这种选择，您刚才说到，毛泽东有许多理由，但这几种理由的出发点，还是对“中国文明”的充分重视。其实，毛泽东对“大本大源”的认识与追求，也体现了他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间的这种渊源关系。这里也有杨昌济的影响吗？

**王兴国：**杨昌济一生十分重视哲学思想的研究，认为“人不闻道，是谓虚生”，又说：“近世各种科学，各研究宇宙现象之一部，哲学则以宇宙之全体为其研究之目的物，故学

问以哲学为终极。宇宙为一全体，有贯通其间之大原则，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原也。”这深刻地影响到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就可以看到毛泽东记录的杨昌济介绍的某些哲学观点。1914年冬，以杨昌济为首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其成员有毛泽东、黎锦熙、蔡和森等人。杨昌济推荐给小组的读物是西洋哲学、伦理学和宋明现学。毛泽东将杨昌济翻译但尚未出版的《西洋伦理学史》译稿借来，整整抄了七个笔记本，认真地进行研究。杨昌济不仅向青年毛泽东传授了丰富的中西方哲学史知识，而且其“贯通大原”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激励着他热烈地探讨宇宙的大本大源。当时，毛泽东宣称：“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另外，《讲堂录》及杨昌济的其他有关著作表明，他经常教导毛泽东等学生“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杨昌济这种注重学以致用、知行统一的思想，也曾给青年毛泽东以深刻影响。

杨昌济道德高尚，对伦理学有很深的造诣。因此，他不仅在人品和人格上给毛泽东等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在伦理学理论上给毛泽东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封建道德的批判。由于杨昌济对宋明理学有深刻理解，对中国传统礼教知之甚深，又长期在国外留学，对西方伦理学史，特别是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伦理思

想很有研究，所以他在批判封建道德时，往往能一针见血，击中要害。他说过：“中国三纲之说，严责卑幼而薄责尊长，实酿暴虐残忍之风。君子之为教也，与父言慈，与子言孝。卑幼者自由之意志、独立之人格，尊长者而不可蔑视之。人有自重知耻之心，乃能以进德修业相尚。过度之压制，固非训育之所宜也。”正是从重人格独立和进德修业的立场出发，杨昌济曾尖锐地抨击封建的家族主义及社会上的种种陈规陋习，诸如欺诈虚伪、好逸恶劳、铺张浪费、无谓的应酬、打牌赌博、不讲卫生等等。这些均影响到青年毛泽东。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对“三纲”的批判，以及他和战友们在新民学会成立时提出的“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等纪律，就鲜明地反映了这种影响的痕迹。其次，杨昌济宣传和介绍的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自由、平等、博爱、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毛泽东的《〈伦理学原理〉批注》之中。针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的弊端，杨昌济极力宣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但为了避免极端利己主义的弊病，他提出了一个“有公共心之个人主义”的概念。这一概念为青年毛泽东所继承，即《〈伦理学原理〉批注》中的所谓“精神之个人主义”。

**访问者：**毛泽东是读师范的，师范培养的是职业教师。杨昌济在师范任教，他的教育思想对毛泽东又有什么影响呢？

**王兴国：**在教育思想方面，除前面说到的教育救国论之外，杨昌济其他一些教育思想也曾影响于毛泽东。其一，是人格主义的教育思想。按杨昌济的说法，人格主义者“谓教育宜发达个人之人格，同时宜使个人得能与社会调和之性质”。这一思想与杨昌济在伦理学上主张培养“有公共心的个

人主义的人”是一致的，与青年毛泽东“精神之个人主义”也是一脉相承的。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认为，学校之设就是要使学生“自完成自发展自创制他们各个及全体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人格”。（《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其二，从人格主义出发，杨昌济和青年毛泽东均批判资产阶级学校的“坏处”。杨昌济说：“现在学校钟点，总不免太多，学生负担过重，大有害于身体。女学尤甚。此事关于国民之体力甚大。”毛泽东则更尖锐地指出，旧学校“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蔑视学生的人格”；“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其三，他们认为要使人格主义的教育思想得以贯彻，就必须实行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针。杨昌济说：“自来论教育者，往往分为智育、德育、体育之三部。”毛泽东则认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育之研究》）只有三育并重，才能达到“身心并完”，这正是杨昌济和青年毛泽东所提倡的“自我实现论”在教育上的反映。

在治学态度和修养方法上，杨昌济的“以久制胜”被其学生奉为“达化斋的法门”。他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着力，常欲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早在1913年的《讲堂录》中，毛泽东就记下了这一“法门”：“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也，亦即积之谓也。”1920年萧子升在致毛泽东的信中，也提到“以久制胜”，并特别注明“这是达化斋的法门”（《新民学会资料》第143页）。

访问者：如您所说，从政治、文化、哲学、伦理学、教



育、治学态度和修养等等方面都能看出杨昌济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的影响，有些影响还相当深刻。说毛泽东是杨昌济的得意学生，真可谓名副其实。

**王兴国：**的确如此。1936年他在和斯诺的谈话中说：在一师学习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毛泽东对恩师、岳父杨昌济始终抱有无限崇敬的心情。

1992年6月2日于长沙

# 访萧超然——

## 青年毛泽东和北京大学

萧超然

萧超然，1929年生，湖南临澧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现任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主任、教授，蔡元培研究会总干事，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共党史、中国政党与政治、北京大学校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著有《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合著有《国民革命的兴起》、《北京大学校史》，主编了《中国政治发展与多党合作制度》等。

萧教授的家在北京大学，到处堆满了书，显得有些拥挤。他笑笑说，这大概是北大的特色。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有关毛泽东和北京大学的谈话。

**访问者：**北京大学是我国历史最久的一所名牌大学，荟萃着不少风云人物，为国家培养了很多栋梁之材。1919年这里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恰恰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和它有密切关系。我们想，北京大学一定对毛泽东也发生了一些影响。

**萧超然：**如果谈到影响，这是一个还有点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充其量只是一个图书馆

助理员，地位低下，谈不上什么。我想，地位低，那倒也是。假如毛泽东后来没有成为伟人，我们也就不会知道他的名字。问题是毛泽东成了伟人，他又刚好是五四时期在北大工作过一段时间，北大呢，又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处在新旧转折的阶段，那里又出现了一批群星，这与毛泽东在北大很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现象就值得研究了，虽然时间很短。

**访问者：**影响是一定有的，那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萧超然：**影响有大有小，这个影响有多大，大家看法也不相同。我认为，毛泽东从韶山到长沙应该说迈出了一小步，然后从长沙到北京是比较大的一步。如果没有两次北京、上海之行，他可能不会走向全中国，甚至走向全世界，换句话说，就不会有后来的伟人毛泽东。

**访问者：**请您具体谈谈。

**萧超然：**这个影响主要表现在他早期思想的转变，表现在他人人生道路的选择方面，具体说来，就是对他选择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

第一，北京大学的文化现象使毛泽东眼界大开。毛泽东在来北京之前，从没有出过湖南省界。但他是一个好学深思的人。在湖南求学的几年中，他读书，看报，脑子不停地思想，一门心思地要探讨救国拯民的“大本大源”。1918年的北京大学，由于蔡元培校长采取广揽人才的政策，正处在人才荟萃，思想上、学术上异常活跃的时期，各种新思想在这里争奇斗艳。像毛泽东这样渴望知识，追求真理的年轻人，一来到这种地方，受到这种文化现象的感染，一定会感到极大的兴奋与刺激，并且眼界大开。同时，他又是一个有极强参与意识的人，所以一到北大，他就参加了北大的新闻学会和哲学会。此后还参加了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

学会”(不是北大的,但初期会员多数是北大的)。这些学会在当时都是针砭时弊,研讨救国救民道路的学术团体,无疑对毛泽东会发生不小的影响。

**访问者:**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的之前与之后,思想有很大不同。这之前,他强调立志,强调探求“大本大源”。这之后就接受了很多新思想,强调民主和科学,反对儒家的独霸思想等等。

**萧超然:**下面我谈的第二个影响,也就是对他选择信仰的影响。当然这个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接触工人啦、社会啦,都有关系。我主要谈谈他从北大读过的书所受的影响。因为毛泽东信仰的确定,是从各种主义、学说比较中逐渐形成的。要比较各种主义、学说,首先要了解这些学说,不了解这些学说就谈不上选择。毛泽东自己说过,他在北京期间,读了许多东西。当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在全国大学图书馆中拥有最大的藏书量,毛泽东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在这样的地方,他一定读了不少过去从未读过的书。具体读了哪些书,现在还找不到直接的材料,起码《每周评论》、《新青年》他读了。像《国民杂志》、《新潮》等北大的一些刊物也会读的。李大钊欢呼十月革命胜利的文章,也正是毛泽东在北大时发表的。这些都会对毛泽东产生相当的影响。拿《共产党宣言》来讲,毛自己说1920年夏就读了,有些学者提出《宣言》还没有出版。我觉得毛自己说的话,不要轻易否定。他没有读到陈望道译的《宣言》,但他可以读到其他人翻译的《宣言》。1919年4月,《每周评论》就介绍过《共产党宣言》其中的一章,“无产者与共产党人”,翻译者是成舍我,他当时是北大的学生,后来是《世界日报》的总编辑,很有名的报人。还有1919年11月出版的《国民杂志》也刊登了《宣言》的一章,是北大经济系学生

李泽彰翻译的，是《宣言》的纲领。像这些材料，毛泽东是不是可能看到，我想完全可能。另外罗章龙的回忆，也有一定的可靠性，因为他是德文班的学生。北大存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最早的文献，关于德文版的有8本。罗章龙说曾和他的同学翻译过《宣言》，或打印或油印，是比较可信的。还有黎锦熙回忆，1920年1月，看到毛泽东的桌上摆着《共产党宣言》，如果和罗章龙的打印本或油印本联系起来就不奇怪了。总之，当时的北大介绍各种主义、学说，介绍俄国革命的书刊很多，这在毛泽东确定信仰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对于他选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方向是很关键的。

**访问者：**北京大学的各种人物也一定对毛泽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萧超然：**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三个问题。各种人物对毛泽东的综合影响。

**访问者：**早年的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友不博，则见不广”，只要“人有善，虽千里吾求之”。凭着毛泽东这样一种访贤问道的精神，在北大一定拜访了不少名人。

**萧超然：**大体说来有三种：第一种，是地位高的名流学者。如蔡元培、胡适、梁漱溟、邵飘萍、周作人，还有新闻学系的教授徐宝璜等，这些人对毛泽东说来，可谓神交已久。通过杨昌济的介绍也好，还是自己登门拜访，或去听课也好，毛泽东两次在北京期间，都或多或少地和他们有些接触。虽然没有过多过深的交往，但给毛泽东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就一再提及这些人，并引以为自豪。从受的直接影响来看，曾受到胡适实验主义的影响、周作人的新村主义影响，当然这些影响在他选择主义的过程中都逐渐被否掉了。邵飘萍自由主义的倾向，也曾使他非常佩服。可见那些

名流学者们新颖的思想、深邃的学问和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魅力，曾使青年毛泽东感到了一种吸引力和精神满足，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他日后的修养和领袖品格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第二种是李大钊、陈独秀这样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论影响恐怕他们两人最大，主要反映在毛泽东世界观的形成上。毛泽东在没有见到李、陈以前，还谈不上对主义的选择，第一次在北京期间见了，当然也还不存在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因为陈独秀本人也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都对俄国革命的胜利抱有好感，这就为他们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当毛泽东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对各种主义的分析、比较中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他第二次见了陈独秀，很快就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这一方面，毛泽东自己也有回忆，他说：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两人在毛泽东选定人生目标与信仰中起了导向作用。

第三种是在北大的湘籍教授和一些学生。湘籍教授主要是杨昌济和黎锦熙。毛泽东在湖南求学的时候，他们就是毛的老师，而且师生关系很好，到了北京，毛泽东和他们更是来往密切，有问题、有困难总是找他们解决。黎锦熙国学根底雄厚，在治学、研究方面对毛的影响大一些。杨昌济在修身立世方面对毛的影响大一些。1920年杨昌济逝世以前，还向上海的章士钊写信道：“吾郑重语君：二子（指毛泽东和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

子。”可见杨对毛是十分看重的。在北大学生中毛泽东和朱谦之一起讨论过无政府主义，和康白情一起议论新诗，还接触了傅斯年、罗家伦等等，当然一段时间之后，毛就对他们表示失望。影响最大的还是湖南籍学生邓中夏，他们后来来往密切，通过邓中夏，毛泽东认识了许多别的朋友，还参加了邓中夏发起组织的“平民教育演讲团”。五四运动中，邓中夏曾专程到湖南向毛泽东介绍北京的情况。邓中夏还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将毛泽东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公布于众，使青年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在当时的北大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访问者：**一个人的成长，要受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从毛泽东来看，他和北京大学的这段因缘，是他选择人生道路的关键所在。那么，毛泽东和北京大学的关系到目前为止，还有搞不清的问题吗？

**萧超然：**大的问题基本上都可搞清楚了。比如他在北大做什么，有些什么活动，结交了哪些人，思想受了哪些影响等等。但具体问题有的也说不太清楚。比如，他来北京前，从他的通信来看，杨昌济希望他进北大读书，但为什么没有进，直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没有看到材料。

**访问者：**当时的北大要考试，是否他外语或者是数学不行？

**萧萧然：**这是一种可能。文史专业一定要考数学。吴晗当年考北大，中文、历史都是100分，数学零分，结果北大没有录取，清华录取了。

**访问者：**现在人们比较强调他的经济困难，是否也有关系？

**萧超然：**也有可能。他自己讲，开销很紧张。不过毛泽东不太喜欢学校，喜欢自由研究。北大的环境他肯定欣赏，但

让他进正规的班听课，他不一定欣赏，他一直讨厌正规的教育，喜欢不受拘束。

**访问者：**其实门捷列夫在普鲁士留学时和他有相似情况，那里的教授请他读博士学位，他不肯。毛泽东也很有主见，求真理不一定非进学校才行。

**访问者：**如果强调他的经济困难，我也不太赞成。以毛泽东当时的家境，说服父亲不一定不准他进大学读书。还有毛泽东没有出国，也有人把它归结为家庭经济困难，我认为也不一定正确。当时经济困难的罗学瓚，就是毛泽东等为他借钱出国的，还有陈绍周也是这样。以毛泽东当时在学生中的地位，以及向章士钊借款三万元的情况，他出国是无问题的。关键还是想立足国内，这也符合他本人的性格。

**萧超然：**显然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进北大读书，各种因素都有可能。还可以探讨。

1992年5月7日于北京大学



## 访黄允升——

### 三十年代初：毛泽东的坎坷与挫折

黄允升

黄允升，1935年生，浙江义乌人。长期从事毛泽东生平、著作的编辑研究工作，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研究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毛泽东年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编辑和起草。主要著作有《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合著）、《韶山曲——毛泽东的故事》（合著）等。

北京西城有个毛家湾，高高的灰墙围成一方天地，这就是中央文献研究室所在地。那里的一群人们，甘于寂寞，乐于清贫，每天翻阅、研究着一大堆文献资料，与历史对话，同现实交流……这其中就有黄允升。

#### 王明遥控指挥中央苏区，首当其冲和 “山沟里”的毛泽东发生碰撞

**访问者：**毛泽东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重大事件，在那些事件中，他往往又是最重要的参与者、决策者、指挥者或者说是导演。他有着这么丰富的、极不平凡的经历，却为什么对30年代中央苏区那一段不愉快的印象那么深刻，以致常常提起？他究竟受了哪些不公正的待遇？据我们所知，直接打

击他的并不是王明本人，又为什么把账算在了王明头上？

**黄允升：**你们提的问题比较大，说起来话就长了，从何说起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弄清王明是怎么回事。

王明 1904 年生，比毛泽东小 11 岁，安徽六安县人，1925 年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是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得意门生。可以说，王明是有书本知识的，但他的缺点是不注意中国社会的实际，一切都是从条条出发。他 1929 年回国，1931 年初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上台，成了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人。

**访问者：**王明上台不久就去莫斯科长住，为什么还要把账算在他的头上？

**黄允升：**王明虽然去了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但他一直遥控着临时中共中央的领导。那时临时中央的行动都是向王明汇报，所以临时中央的实际领导人仍然是王明。

**访问者：**他是如何和毛泽东发生关系的呢？

**黄允升：**王明为了实现他的“左”倾政治纲领，提出“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组织纲领。在中央一级把坚持不同意见的人一个个地打下去，如瞿秋白等一批人；在各个苏区，派人下去代表中央行使职权。所以有句话，叫“钦差大臣满天飞”。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在农村搞武装斗争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正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问题。他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成为我党我军建说的纲领性文献；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

面”的思想路线；在反“围剿”战争中总结的作战原则和古田会议确定的建军原则相结合，形成了反映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军事路线。从《井冈山土地法》到《兴国土地法》、到1931年2月提出的土地所有权归得地的农民所有，“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的思想，形成了土地革命路线。毛泽东的这套理论和办法，已经被苏区实践所证明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但这和王明所推行的“左”倾路线显然是不合拍的。所以当王明的东西要在中央苏区推行的时候，首先受到了毛泽东的强烈抵制。所以就发生了后来的一系列的事情。

**访问者：**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中央苏区，正好是反第二次“围剿”的前夜，一上场两边就发生了意见分歧，是吗？

**黄允升：**是的，开始有分歧。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第一个碰到的是军事问题，也就是反“围剿”打不打的问题。中央代表团不懂战争，面临20万敌军的大举进攻，开始倾向项英的意见，主张不打。当时任弼时带去临时中央的三月指示说，“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也就是说，换个地方开辟根据地，比如到四川去创造新的根据地，并引斯大林的话说，四川是建立根据地最理想的地方。这样一来，毛泽东主张打的意见就占了少数，于是建议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讨论打不打的问题。

**访问者：**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开得如何呢？

**黄允升：**第二天开扩大会议，各军军长、政委和红三军团的总指挥、总政委等都到会了。军队高级干部发言非常热烈，个个信心十足，慷慨激昂，一致主张坚决地打。赣南、闽西的领导干部也不同意中央红军这时退出中央苏区。这样，毛泽东主张打的意见就占了绝对优势，使那些主张转移开辟新

根据地的人不再坚持了。这是毛泽东抵制不打二次反“围剿”错误主张的胜利。

**访问者：**据说王稼祥在青塘会议上说了一句忿忿的话：“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

**黄允升：**这个话也不无道理，因为毛泽东在说明应该打的理由时，讲了一大堆话，都是中国、江西，一句也没有涉及马列主义。而转移根据地则是斯大林的主张。为了说服王稼祥，毛泽东找出很多文件给王稼祥看，找王稼祥谈话，谈得很深，比较务实的王稼祥受益匪浅；同时也影响了任弼时同志，他觉得毛泽东在军事上确实有道理。这样，中央代表团就慢慢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支持毛泽东的军事部署，为第二次反“围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于是才有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接着是第三次反“围剿”。第三次反“围剿”，我们是以3万多对30万，两军实力更为悬殊，由于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援，中央代表团完全支持，又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 赣南会议再起波澜

**访问者：**第二次反“围剿”的风波过后，表明毛泽东在军事上已受到了中央代表团的信任和理解，尤其从中央局代理书记这个职务来看，如果项英不行，应该由中央代表团的一位成员来代，但他们并没有那样做，而是选择毛泽东来代。这表明他们对毛泽东是尊敬的，或看说看得比自己要高。可是后来的赣南会议又起波折是怎么回事呢？

**黄允升：**这主要是中央的干预了，为什么把账算在王明头上，也就表现在这些地方。1931年8月31日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前委写了一封长信，主要在军事和土地问

题上批评中央局，说他们犯有很严重的错。信里谈道，中央苏区容许地主残余租借土地耕种，对待富农只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是阶级阵线不明；在军事上红军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与小团体观念，这与红军已在进行的大规模战争和担负着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是不相称的。中央要求苏区：必须迅速扩大根据地，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大的城市；必须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贯彻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国际精神。中央的这封信是十月到苏区的，这时红军的第三次反“围剿”已经取得了胜利。

如何贯彻中央的指示呢？于是大家的意见发生了分歧。中央代表团认为，苏区应根据中央指示，迅速扩大根据地，乘胜夺取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毛泽东认为，这是行不通的。他提出：红军在粉碎第三次“围剿”后，从敌人方面说，蒋介石已忙于应付全国高涨着的抗日救亡的反帝运动，不会很快进行下一次“围剿”；从红军方面说，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连续作战，打得精疲力尽，急需休整和补充。另外闽赣两个苏区之间还有七八个县的一些土围子被地主武装霸占着，当前的中心任务应该是扫除土围子，打通两个苏区，然后再打通赣南与赣东北两苏区。面所谓中心城市则被蒋介石军队面守着，我们这个步枪鞭炮多，很少机枪重炮的红军，此时绝无战胜攻取之可能。毛泽东坚持“从容不迫地去打土围子”，把打中心城市“放在脑后”，或者说“比脑后还要后，叫做放在屁股后”。

访问者：这样两种意见就对立起来了。从毛泽东的话语来看态度极其坚决，毫无妥协之意。

黄允升：关键是双方的思想方法不一样，对当时的数情我情的认识也不一致。当数人来了，如何消灭敌人，毛泽东

和中央代表团的思想和一致了。胜利以后，如何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就产生了矛盾。所以在1931年11月苏区中央局召开了赣南会议。

中央代表团要贯彻中央的指示，毛泽东嘴上虽然不是明顶，实际上是另外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明显有悖中央精神。还有一点：这之前，中央代表团对毛泽东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书，就觉得不妥。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到的本本，是指中共“六大”决议。作为党的一级组织，怎能不执行党的决议？这一次大家在讨论执行中央指示时，毛泽东又是另有一套，所以他们认为毛泽东不太重视党的指示和决议，总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未免太经验主义了。所以这次会议，他们对毛泽东提出了三条批评：一是从思想上批评狭隘经验论，二是军事上的批评游击习气，三是土地革命上批评富农路线。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强调贯彻四中全会路线，集中火力反右倾，并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当然，这次会议并没有撤掉他的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

**访问者：**毛泽东明明是正确，却被误解为是错误的。同志们不接受也罢，且还给戴了三顶帽子，确实让人难过。

**黄允升：**难过的事情还在后面。毛泽东关于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虽然没有被撤，但会议确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毛泽东仅仅是个委员。中革军委成立之后，就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总政委被取消了。

有种说法，赣南会议，毛泽东丢了兵权。我想这话也不为过。实事求是地讲，是受了排挤的。

## **毛泽东主张不打赣州打漳州。漳州 打下来了，但他的日子并没有好过多少**

**访问者：**打赣州是怎么回事？

**黄允升：**1932年1月上旬，中央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讨论贯彻执行临时中央要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和反对主要危险右倾的决议。毛泽东不赞成打赣州。他根据以往攻打赣州的经验发言指出：赣州是敌军必守的坚城，三面环水，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朱德也不赞成打赣州。但是，多数与会者执行临时中央指示，主张攻打赣州。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议再听听红军前线主要指挥员的意见。前线主要指挥员回到瑞金，表示执行临时中央指示，坚决主张打赣州，并拍拍胸脯说，打赣州包在我身上。10日，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规定中央红军坚决夺取赣州，以赣州为中心向北发展，争取革命在江西省的首先胜利；任命彭德怀为攻赣前敌总指挥。接着，开始赣州战役。而毛泽东就成为不执行临时中央“进攻路线”及攻打赣州城市的人了，中央局代理书记不能再继续当了，于是有个叶坪会议。

**访问者：**就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会议主持人的身分中途被换，是吗？

**黄允升：**是的。叶坪会议是1932年1月中旬开的。当时做会议记录的同志回忆：在叶坪，毛泽东先主持中央苏区中央局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贯彻王明“武装保卫苏联”的主张，不同意毛

泽东作这样的分析，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不这样提出口号，“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以沉默来抵制，一声不吭。会议中途，因毛泽东“太右”，另选了主持人。会后不久，毛泽东就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到瑞金郊外东华山休养去了。

**访问者：**毛泽东不同意的赣州战役，到底打得怎么样？

**黄允升：**中央红军攻打赣州，历时 33 天，不仅城未攻克，反遭很大伤亡。

**访问者：**实践证明毛泽东反对打赣州是正确的。5 月 11 日的苏区中央局会议，毛泽东又受到批评是怎么回事呢？

**黄允升：**这件事与项英到上海临时中央汇报工作有关。他汇报了中央代表团对一些问题的处置和赣南会议情况，同时认为反右倾还不够。临时中央对这位工人出身的干部的意见特别意视，于是有临时中央对苏区中央局的连续批评。4 月 5 日一封信，4 月 14 日又一封信，说：“右倾机会主义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强调对“右倾作最坚决无情的斗争”。改组后的苏区中央局于 5 月 11 日开会讨论，表示同意和接受临时中央的指示和批评，承认过去的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右倾主义错误”。当时毛泽东在漳州，未出席这次会议。毛泽东后来说，他被缺席审判，一审终结，不许上诉。

**访问者：**据了解 5 月 20 日临时中央还有一封信，批评了苏区中央局，是吗？

**黄允升：**是的。5 月 20 日临时中央又电示苏区中央局，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评得还不够。6 月 17 日苏区中央局开会，承认中央的批评是正确的，这就预示着王明“左”倾路



线要对毛泽东进行更严厉的批判和斗争了。

所以怪事也就出来了。1932年4月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身分率红一、五军团攻克漳州，缴获两架飞机和大量军用物资，并筹集了大批款项，为反击敌军“围剿”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当红一方面军恢复番号时，苏区中央局只任朱德为司令，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就没有恢复。后来周恩来去前线，在他力荐的情况下，毛泽东才又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访问者：**可是好景不长，在作战方向问题上，很快就和后方中央局的同志产生了分歧。

**黄允升：**是的。这年8月，毛泽东等在前方，本来是要打南城的，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就放弃了攻打南城的计划。这样就和中央局产生了分歧，中央局对他们不乘胜进攻南城很不满意，要求他们立即找寻机会与敌人作战。毛泽东等认为：“出击必须是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严重错误。”中央局则认为他们贯彻的不是中央关于积极进攻的策略，是在延缓作战时间。这顶大帽子底下，毛泽东等前线同志解释：我们是在贯彻积极进攻的路线，只是必须寻找合适的作战机会，不能鲁莽从事。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苏区中央局收到临时中央关于中央红军行动方针的指示电，说蒋介石由武汉回庐山，召集在赣将领开会，即将倾全力向我中央苏区及赣东北取进攻之势，我方须立即紧急动员警戒，并以最积极迅速之行动，择敌人弱点击破一面，勿待其合围，反失时机，望即定军事动员计划。9月26日毛泽东、朱德又正好发了一个红一方面军的训令。这个训令不是积极寻找敌人作战，而是就地发动群众，准备反“围剿”战场，无疑这是

正确的，后来的第四次反“围剿”也是在这里打的。但却使中央局火了，立即致电说，这个训令“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对这种离开原则的观点，要“给以无情的打击”。因为原来前后方意见不一致，前线曾提议后方的中央局到前线开会讨论决定，他们没有同意。待接到临时中央关于军事行动接示电和毛泽东、朱德的训令，中央局立刻命令前线暂时停止行动，他们立即到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并把中央指示电转发给前方。因此就有了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就有了毛泽东又丢兵权，回后方做政府工作的事情。

### **第一次宁都会议，毛泽东挨批，而且， 受牵连的还不止他一个人**

**访问者：**宁都会议都有哪些人参加，会议主要讨论和决定了什么问题呢？

**黄允升：**这次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是在宁都县的小源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后方来前方的有任弼时、项英、邓发和顾作霖，还有从后方来的刘伯承列席参加。会议由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主持，“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右倾向的斗争”。会议开始时，前后方的意见并不一致，比如周恩来在报告前线这一段作战情况时，他说前方的行动是符合中央“进攻路线”的。毛泽东坚持关于部队分散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是正确的，是从敌强我弱的实际出发，符合前线的客观情况。后方的同志认为，前方同志的表现是对革命胜利和红军力量估计不足的表现，是等待主义，所谓“诱敌深入”，是守株待兔，是不合中央精神的。因为是中央的精神，所以周恩来在发言中也承认前方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并温和地批评了

毛泽东，同时也指正了后方同志对毛泽东的过分批评。

**访问者：**这时，毛泽东那种“老子不信邪”的精神又出来了，他据理力争，还想说服众人。

**黄允升：**遗憾的是宁都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具体毛泽东是如何讲的说不清楚，但从会议简报记载的情况来看，说毛泽东“不尊重党领导机关”，“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表明毛泽东是比较坚决地坚持了自己的原则立场。因为毛泽东态度坚决，所以会议对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评，算了老账。他被指责为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由于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不承认错误，与会者多数认为，他“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不尊重党领导机关”；“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所以，会议最后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访问者：**当时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是否也开了一个批评毛泽东的会？

**黄允升：**是的，几乎在开宁都会议的同时，临时中央于10月6日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苏区中央的问题，批评毛泽东“分数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作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名字，并提出他“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会议决定，立即给苏区中央局去电。

中共临时中央电示到达中央苏区前线，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去长汀福音医院休养。苏区中央局立即开会（可说是宁都会议的继续）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来电指示，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在宁都会议上不赞成毛泽东回后方的意见也无法坚持了，所以一致确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

**访问者：**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又是怎样排挤、打击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

**黄允升：**临时中央在上海大城市屡遭破坏，是被迫来中央苏区的，时间是1933年1月下旬。早在1931年王明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前，找博古等谈话，互相谈到：毛泽东小事有办法，大的问题是错的。当博古等进入中央苏区经过长汀时，有人提议去看一下在福音医院的毛泽东，傲慢的博古根本看不起毛泽东，并反问说，为什么要去看他？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第一件事就是批评福建的“罗明路线”，第二件事是批江西的“罗明路线”和“军队中罗明路线”，就是批邓、毛、谢、古，有七个书记被撤职，还有大批干部撤换。

**访问者：**据说还有个第二次宁都会议，是吗？

**黄允升：**是的。第二次宁都会议是在1933年6月上旬开的，会议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入博古主持，总结了前段工作。毛泽东出席会议，仍然坚持积根防御路线，认为第一次宁都会议确定红军主力北上、击破敌军一面、粉碎敌军于“进剿”合围之前的进攻任务并未实现，而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采用的仍然是“诱敌深入”、运用大兵团伏击战的办法取得的，于是对上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不正确的批评提出申诉。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不怕压力、坚持原则的韧劲，为当时好多入所折服。但是，博古在作结论中重申前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说没有前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样，毛泽东有根有据的批评和正确的申诉又被否定，仍处在挨批的位置上，心情沉重。

后来博古等主持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推进到顶点，同时把毛泽东等整到了最低谷，他仅有一点实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也给搞掉

了，由洛甫来代替。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到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仅剩下一个挂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了。

## **毛泽东在军事问题的争论上没斗过 王明们。于是，长征开始了**

**访问者：**毛泽东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取得很大成绩，但在军事问题上一直未斗过“左”的东西。

**黄允升：**是的。毛泽东尽管不断挨整，但仍维护党的团结，忍辱负重，从党的利益出发，积极向中央提出军事上的建议。于是，傲慢的宗派主义者对毛泽东、彭德怀等的军事方面的建议，一一加以拒绝，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不仅如此，还把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工作的一般人员李德聘为军事顾问，并推为“太上皇”，竭力推行王明的军事冒险主义，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作战方针，结果中央苏区日益缩小。所以，第五次反“围剿”也不能不失败，造成中央苏区的丧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迁移，迫使中央红军不得不作战略转移——长征。红军长征初期，由于博古、李德等军事指挥错误，在湘江一战就使8万多红军锐减为3万多人，可说是惨败，在红军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这也可说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所创造的另一个“奇迹”。

以上种种过火斗争、无情打击说明，博古等一直贯彻执行王明《两条路线》中“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造成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继续惨败；其他根据地和广大白区工作，也同样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

物极必反，广大指战员在湘江惨败情况下开始思考问题了：为什么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却失败了呢？毛泽东启发中央高级干部总结经验教训。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支持毛泽东转兵到贵州的主张，通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做了准备。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对党内两条军事路线这场大争论作出了正确结论，重新恢复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批判了王明“左”倾军事冒险主义“进攻路线”。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中央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组织问题，是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坦途。

1993年10月24日于北京前毛家湾

## 访郭洪涛——

### 迎接毛泽东到陕北

郭洪涛

郭洪涛，1911年生，陕西米脂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3年任中共陕北特委组织部长，1934年兼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1935年后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陕北省委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建国后任铁道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家计委顾问等。曾是中共七大、八大、十二大代表，十三大、十四大特邀代表，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经过两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历经千难万险，落脚到陕北。陕北有块根据地，那里的好兄弟欢迎了他们。郭洪涛当时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于是有了他和毛泽东的交往，有了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访问者：**1935年10月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当时您和程子华同志作为陕北红军的代表去迎接中央红军，您是什么时候见到毛泽东的？

**郭洪涛：**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的吴起镇。红军有个好传统，一路走，一路开展宣传工作，写标语，散发传单，张贴布告，使陕北苏区群众都知道中央红军

来了。当时我担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在这之前，我们只知道中央红军到了甘南，不知以后去哪里。那时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也在后方。怎么迎接中央红军，前方有人提出越出苏区，到关中彬县一带的大道上去迎接。程子华不同意这个意见，认为不应远离苏区，应该继续南进，到洛川方向，既可钳制敌人，又可迎接中央红军。当时，我们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还未打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红军远离苏区，敌人一下子进来怎么办？朱理治和我同意程子华的意见。这个方针是对的。朱理治就让程子华到前方，部署这个工作。后来我也去了前方，同去的还有派去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的崔田民。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把红军抗日先遣支队司令部的布告送来，我们知道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吴起镇。

当我们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商量由程子华和我一道去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我们从稻左堡出发，走了一天，到了下寺湾，先碰见了贾拓夫，后又见到了李维汉。

**访问者：**你们什么时候见到的毛泽东？

**郭洪涛：**我们先和李维汉谈了一些陕北两个苏区的情况。一两天后李维汉就领我去见了毛泽东、张闻天。

**访问者：**您见到毛泽东，他给您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郭洪涛：**印象很好。毛泽东是我久仰的领袖人物，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他们都来了，我非常高兴。见面后，毛泽东就肯定了陕北红军，说因为有个陕北根据地，中央来了才有落脚点。我早就看过毛泽东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也看了遵义会议的决议，对毛泽东是十分佩服的。也知道朱德。朱毛领导的红军很有名气。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工作时就听说过，他在党内和社会上都很著名。周恩来在下寺湾找我谈话，代表中央分配我担任陕西省委书记。



**访问者：**从保存下来的照片看，当时的毛泽东非常瘦弱，两只眼窝深陷，颧骨老高，完全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但精神很好。

**郭洪涛：**是的，瘦得很，也很累，天天走路、打仗，饥一顿饱一顿的，哪能不瘦？大家都很瘦。但又因为心里有着崇高的信仰，我们是为美好的理想而奋斗、而牺牲的，所以大家的精神是饱满的。从毛泽东的照片里就可以看出这种精神来。我们就是在这种精神之下奋斗出来的。

**访问者：**你们初次见面谈了些什么？

**郭洪涛：**我向毛泽东、张闻天做了简要汇报。主要是陕甘边和陕北两个苏区的创立和发展过程。如陕北经过几次暴动，成立了红二十七军，陕甘边较早地成立了红二十六军。这两块根据地在发展中互相联系，互相配合，互相支援，终于在1935年2月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达到完全统一的情况。还有谢子长负伤去世后，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在刘志丹统一指挥下，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把原来的两块苏区连成一片，创造了大片的革命根据地等。因为我在陕北特委工作，对陕北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对陕北根据地的情况谈得比较详细。此外还汇报了陕北错误肃反问题。

**访问者：**您对陕北的肃反问题怎么看？

**郭洪涛：**对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编的《党史通讯》1987年第4期《更正》中写道：“1935年9、10月间，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陕北发生了错误肃反，使苏区陷入严重危机，这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产物。”当时，我虽然不是中央代表团成员，但我是本地干部，担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的职务，因此，我在政治上也负有重要的责任。

**访问者：**中央认为陕北的肃反是错误的，对吗？

**郭洪涛：**是的。当我汇报了陕北错误肃反的情况后，中央当即决定纠正肃反的错误，释放所有被捕同志，王首道担任西北保卫局局长。中央到瓦窑堡后，又决定成立了以董必武为首的五人委员会负责处理错误肃反问题，释放了被冤的红二十六军刘志丹等老干部，因而挽救了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

**访问者：**下寺湾中央政治局会议有什么决定？

**郭洪涛：**中央在下寺湾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程子华和我参加了，是决定中央和红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程子华讲了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以及当时第三次反“围剿”的情况。这次会议决定中央分两路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到直罗镇，打击、消灭尾随之敌；洛甫、博古、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王稼祥、李维汉等率领党中央机关、中革军委等非战斗单位去陕北苏区的中心瓦窑堡。

会后，我先回到瓦窑堡，动员了数千名群众夹道欢迎中央的到来。群众热情高涨，送茶送水，街道两旁红旗招展，到处贴着欢迎的标语，中央领导同志和干部也频频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大家都高兴得了不得，那热烈兴奋的情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忆犹新。

我请中央领导同志到省委机关就餐。这顿饭比较丰盛，有海参、鱿鱼等佳肴。这些海味当时在陕北很罕见，是解放瓦窑堡后打土豪的战利品。中央领导同志讲，这么好的饭菜只在遵义吃过一次，这是第二次。在直罗镇，我军取得了巨大胜利，歼灭敌军一个多师，打破了敌人第三次“围剿”。直罗镇战役打完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来到了瓦窑堡。

**访问者：**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你们是如何解决其吃穿问题的？

**郭洪涛：**中央到达瓦窑堡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解决红军的吃穿问题。中央指定林伯渠负总责，我通知西北军委供给部长白如冰和陕西省政府财政厅长艾楚南参加，并告诉说：部队需要什么，我们就发动群众解决什么，要粮食给粮食，要服装就动员群众去制，布匹不够，就拿钱到白区去购买，并将没收地主豪绅的猪、牛、羊送往前线。使红军战士都穿上了新的棉军装，改善了部队的的生活，大大鼓舞了士气。

**访问者：**1935年12月中央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这次会议您参加了，一定了解不少情况。

**郭洪涛：**我是列席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回到瓦窑堡，正好张浩从苏联回来了，带来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林。于是，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会议是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开的，窑洞中间放着一张长桌，多数人围坐在长桌两边，个别人就坐在炕上。会上讨论了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路线策略问题、军事战略问题。在讨论政治形势和党的路线策略时，对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的问题发生了争论，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在党内最高领导层内的争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对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并指出我们在江西时，对处理十九路军的问题上有错误，我们本来是可以争取他们一起抗战反蒋的，但没有争取。博古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引经据典，还引了斯大林的话，说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不可能和无产阶级联合。毛泽东一点也不示弱，第二天再次发言，强调他说的这些是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的，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最后他反问道：“难道这样做（指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中间势力），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宗不孝吗？”博古哑口无言，往炕上一躺不说了。

**访问者：**这次会议上的争论，其他人参加了吗？

**郭洪涛：**毛泽东和博古争得面红耳赤。

**访问者：**当时您是怎么看待他们之间的争论呢？

**郭洪涛：**感到很惊奇，从未见过这么激烈的争论。总的印象，觉得还是毛泽东有道理。而博古只是引用了斯大林的话，显得软弱无力。最后张闻天作结论，他和毛泽东的意见是一致的。

**访问者：**瓦窑堡会上毛泽东提出东征山西的战略方针，并得到会议通过。会后立即开始了准备工作，扩红成了一项重要任务。

**郭洪涛：**是的。周恩来亲自到陕西省委作了动员和布置，并派李维汉指导陕西省委的扩红工作。李维汉给我们介绍了中央苏区扩大红军的经验。我们的措施是组织突击队，每个县都派一个突击队去，并动员了几位女同志担任队长，比如李坚贞同志是秀延县的扩红突击队长。那时苏区老百姓参军的热情很高，分了田，废除了高利贷，取消了苛捐杂税，得到了实惠，一说当红军，群众都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当时那个场面非常热烈，先后两次扩红，扩大了9600人，壮大了红军。

**访问者：**关于东征，大家的意见似不甚一致，担心东征不能成功。

**郭洪涛：**东征的意义很大。出河北打日本，可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同时既可扩充红军，又可筹集军费。瓦窑堡会议上，大家对实行东征的意见是一致的，没有人反对。决定东征时，我也发了言，意思是不要远离苏区，从黄河边向东推进，这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访问者：**红军东征时，有多少人？

**郭洪涛：**大概有二三万人。毛泽东、洛甫、彭德怀等都去了前线。由于蒋介石出兵 10 个师，阻挡我军东征抗日去路，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回师河西。毛泽东率领红军东征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打击了敌人，扩大了政治影响，扩充红军 7 000 多人，筹集了大量的军需财物。通过红军东征，我对毛泽东更加敬佩。他调兵遣将，气派非凡。刚打了直罗镇战役，喘了一口气，就在 12 月的瓦窑堡会议上决定东征，一环扣一环，别人是没这个战略气魄的。

1993 年 5 月 28 日于北京月坛北街

## 访宋一秀——

### 《实践论》《矛盾论》 的写作、发表和流传

宋一秀

宋一秀，1931年生，广东五华人。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会长。主要著作有：《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革命》、《周恩来早期哲学思想研究》，并主编《毛泽东哲学思想教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三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六、七卷、《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等。

我们最初给宋教授的题目是《毛泽东的“两论”是抄袭之作吗？》整理记录才改成现题。之所以这样改，不仅因为谈的内容既涉及了“抄袭”问题，而且还涉及了“两论”的写作背景和历史意义，这个范围显然比最初的题目大多了。

**访问者：**关于《实践论》、《矛盾论》写作的时间、修改以及发表情况，国外一些研究者从60年代起散布了种种迷雾，他们怀疑“两论”不是1937年的作品，甚至断言它们是1950年和1952年写的，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您多年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我们想请您谈谈这些问题。

**宋一秀：**除了上面你们提到的说“两论”不是1937年的作品这种观点以外，还有一种“抄袭”论，即认为毛泽东的“两论”是抄袭之作。散布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前苏联的一些学者，如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77年出版的《毛主义的思想政治本质》一书，认为“经过重新修订”发表的毛泽东的《实践论》，“在‘修订’时利用了”、“抄袭了”苏联的弗·伊·哈斯哈契赫的《物质和意识》这部著作。这本书影响很坏，如你们所说，“散布了种种迷雾”，这确有澄清的必要。

**访问者：**除前苏联人这样说以外，国内有些人也散布这些观点，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

**宋一秀：**国内主要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非毛化思潮泛滥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提出比外国人更新的论据，基本上是拾了外国人的“牙慧”。

**访问者：**那么，他们说“两论”不是1937年的作品，根据是什么呢？

**宋一秀：**这是60年代国外有些人提出的，他们的所谓论据是：在《实践论》1950年和《矛盾论》1952年正式发表以前，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其中包括《整风文献》里都没有收过这两篇文章，甚至说当时中国理论家们的文章里也没有提到过这两篇文章。

这只能说明他们的孤陋寡闻。从1937年4月起，毛泽东应抗大邀请讲授哲学，并开始准备讲稿，总题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其中包括辩证法唯物论的许多基本原理和范畴。首先讲的是第一章绪论部分，如哲学中的两军对战、唯物论与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问题；第二章接着讲物质论、运动论（发展论）、时空论、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和实践论；在第三章“唯物辩证法”部

分，除重点讲“矛盾统一法则”这一节外，还列举了质量互变法则、否定之否定法则，以及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原因与结果、根据与条件、可能与现实、偶然与必然、必然与自由、链与环等对立统一的范畴。后来正式公开发表的《实践论》即该提纲的第二章第十一节。《矛盾论》的原本则是该提纲的第三章第一节，原题名为“矛盾统一法则”。和其他一些章节相比，这两部分实际上已不完全是提纲性质的东西，讲得相当详细、充实，具有较完整的逻辑结构，反映出毛泽东当时对辩证法唯物论哲学的体系内容，已有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某些深刻独到的见解。据一些回忆文章说，从1937年4月到7、8月，毛泽东的哲学课共讲了约100多个学时，后来主要由于“七七事变”的爆发讲课中断了。辩证法部分只讲了“矛盾统一法则”，其他法则和范畴都没来得及讲。当时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曾派人做过讲课记录，记录稿连同整个讲授提纲经过整理后印发给大家学习，从此便非正式地在一些地区或单位印行和流传开来。

**访问者：**现在人们普遍的看法是，最早印行的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油印本。1983年我曾访问过吴亮平，他给我看了一本《实践论》油印本，封面上毛泽东还写着：“吴亮平同志：请阅处。毛”字样，吴亮平说：这是1937年毛主席赠送给他的。我拿回来和《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对照了一下，虽然都是油印本，但字体不一样，一个是手写仿宋体，一个是普通字。这样看来，当时就有单独的《实践论》单行本流传了。

**宋一秀：**你说的吴亮平藏的那个本于我也看过。那个本子应看成和《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油印本同时期。此后这个讲授提纲又有许多翻印本，如1938年4月广州统一出版



社出版发行的《抗战大学》(半月刊)第一卷第六期和以后几期新哲学讲座专栏上;就曾连载过这个提纲,并署名“毛泽东主讲”;1940年3月上海出版的《民主》杂志从第1卷第1期起也署名连载过,这些杂志都不是中共的正式刊物。在1940年,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把《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铅印成书。以后冀中第四军分区政治部国防出版社(1941年)、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2年)、张垣印刷局、大连大众书店都翻印过。这些翻印本都源于1937年9月的那个油印本,除翻印过程中发生的错漏外,内容完全一样,未作过任何修改。

**访问者:**日本学者竹内实在70年代曾收集到一个版本并公布了,引起了一场对《实践论》版本及修改情况的争论,这是怎么回事?

**宋一秀:**竹内实找到的那个版本,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大连大众书店的那个版本,题为《辩证法唯物论》。1980年12月《中国季刊》发表《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解放前的文本》一文,详尽地考订了他们看到的这些文本,并说:“这些被发现的解放前的文本,其意义不只是为这两篇论文写作期的争论提供了新的证据,而且涉及到关于延安时期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才能和历史地位的争论。”这个评价是很高的,也说明一些外国学者在事实面前还是公正的。

**访问者:**但是,他们又提出一个观点,认为既然从1946年的文本看不出《实践论》在1950年发表时作了很多修改,那么,1946年的文本必定已经作过很多修改。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宋一秀:**这纯粹是主观推测。我在前面说过,1946年的文本包括其他在建国前出版的文本都出于1937年9月那个油印本。1950年编辑《毛泽东选集》时,作者作了一些修改,但

《实践论》的内容同油印本的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内容上的修改主要是增加了第四自然段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一段话，删去了原稿中在论述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时对社会条件的具体论述；另外还加上了“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真理”一句，其实这句话原来写在《讲授提纲》第二章第十节“真理论”中，这里是移来的。除此之外，只是一些个别文字的变动和修饰。《矛盾论》修改较多，为此，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本篇的题解专门作了交代：“在收入本书的时候，作者作了部分的补充、删节和修改。”《矛盾论》原稿大约有25 000字，重新发表的稿子大约有24 000字，其中删去了近7 000字，增加了6 000字。关于《矛盾论》的修改情况，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七卷第一章中作了详细交代。总之，我认为这些修改是符合科学精神的，既保持了原貌又吸收了自抗大讲课以来的新的经验，增添了一些新思想；同时也表明毛泽东希望把他的著作用他所能达到的最完善的形式贡献给读者。对这一点也是无可指责的。

**访问者：**对“两论”写于1937年持怀疑态度的人，还说到当时的理论家都没有提到过这两篇文章，是这样吗？

**宋一秀：**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引用几个材料。1941年4月，张如心在《解放》月刊上发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除了其他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能够真正唯物地具体地理解我国的情形，真正掌握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唯物辩证法。从毛泽东同志编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如何深刻透彻地了解唯物辩证

法的本质，如何善于把长期的丰富的革命经验以辩证法的方法科学地综合起来”。同年6月，另一位青年哲学工作者和培元在《中国文化》上发表《论新哲学的特征和新哲学的中国化》，其中说：“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抗大的哲学讲座迄今犹脍炙人口，他的讲授提纲——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一章是最好的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他对辩证法原则阐述之所以那样爽朗、生动、有力，这不仅由于他的文字的流畅易懂，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活的中国革命经验。这就预示着新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1943年8月艾思奇也撰文说：“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和具体化了的辩证法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这里说的“发展和具体化了的辩证法唯物论”，就是指的《实践论》、《矛盾论》。这些材料表明，“两论”流传开不久，对“两论”的研究也就开始了。外国人对我们的历史资料不熟悉，还情有可原，我们自己的学者也跟着起哄，就太不应该了。

**访问者：**那么，所谓“抄袭”之论又是怎么来的？

**宋一秀：**对前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的《毛主义的思想政治本质》中认为《实践论》“抄袭”了苏联的弗·伊·哈斯契赫的《物质和意识》一书，可以说不值一驳。哈氏写作《物质和意识》大约在1939年至1941年间，这时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已经写成并流传；哈氏的著作的出版在40年代末，翻译成中文是在1951年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的《论世界可知性》，它是《物质和意识》中讲认识论的两章，这时毛泽东的《实践论》已公开发表。前面说过，1950年《实践论》正式发表时根本没有作多少修改，根本谈不上任何“利

用”、“抄袭”哈斯哈契赫著作的必要和可能。因此，只要摆出这些事实，苏联某些人的信口谬说就不攻自破了。

至于谈到毛泽东写作“两论”和苏联30年代哲学教科书的关系，这确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1988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提供了最直接的原始文献资料。毛泽东在写作“两论”之前，阅读过苏联30年代的一些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并作了大量的批注。主要有：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研读苏联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著、李达和雷仲坚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1937年以前读米丁等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毛泽东在“西氏本”中写下了12000多字的批语，并从头至尾作了圈点和勾画，其中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批注文字最多。对“米丁本”的批注约2600字，从内容上看，批注最多的是统一规律问题，占批注文字的一半，其次是对认识论问题的批注。这说明，毛泽东研究的重点仍是矛盾问题和认识论问题。我们把毛泽东读的这两本书及其批注同“两论”对照，可以看到他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时，曾利用过苏联哲学教科书中的思想资料，吸收了“西氏本”和“米丁本”中论述的观点，其中不少观点及其分析使毛泽东受到启发，并且他还以自己的方式吸取了其中一些有见地的思想。否认这一点，不是科学的态度。

但是，“两论”同苏联哲学教科书相比较，又有它自己的许多特色和独到之处，它以长期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作基础，在理论上进行了独立的创造和发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访问者：**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宋一秀：**首先，从体系结构上看，“两论”没有像苏联教

科书那样广泛地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方面的问题，而是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根据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实践需要，有目的、有选择、有重点地来安排、构造自己的体系内容。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实践论》所以要突出认识和实践的相互关系及其矛盾运动这个中心，侧重于论述和解决认识论问题，《矛盾论》所以要突出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分析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义，侧重于论述和解决方法论问题，不仅因为它们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中的根本问题，更因为它们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观主义者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

其次，从内容上看，“两论”克服和弥补了苏联教科书的某些不足之处，如对某些哲学概念、范畴、原理等，有的无明确的定义，或者论述得不全面、不系统、不准确等，而“两论”在阐述和论证问题时，密切联系中国的实际，以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经验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进行了系统的独创性的发挥。

第三，从论证、表达问题的方式和用语上看，“两论”具有明显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它们继承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哲学理论思维方式和风格，论著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思想鲜明，写法上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善于运用中国民间谚语、格言、典故以及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经验，具体、生动地形象地阐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深刻哲理。因而“两论”作为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较之苏联哲学教科书，更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也更便于他们理解和接受。

第四，就“两论”和苏联教科书的作者在阅历、斗争经

验、思想素质和境界等主客观方面的因素来说，两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作为既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领袖，同时又是哲学家，与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哲学家相比，即便是对同一概念、论点、命题的理解和阐述，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有差别的。特别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前者较后者显然有其优越条件和过人之处。毛泽东之所以写出“两论”是同他长期参加革命实践和党内斗争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分不开的。而只有一般的哲学知识素养，或者只是利用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思想材料和哲学成果，是写不出“两论”这样思想深邃、具有鲜明针对性、战斗性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的。

**访问者：**在所谓“抄袭”这个问题上，国内有些人还散布了这样的观点，即认为毛泽东还抄袭了艾思奇、李达等人的著作和观点。

**宋一秀：**艾思奇到延安是1937年10月，这时“两论”已经油印流传开了。在这之前，毛泽东的确阅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1936年10月22日他在给叶剑英、刘鼎的信中就提到过：“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面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但是，《大众哲学》毕竟是通俗的哲学读物，不能同“两论”同日而语。另外，有人还说 he 利用了艾思奇编辑的《哲学选辑》，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哲学选辑》是艾思奇到延安之后于1939年编的，只从时间上看也对不上。

对于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虽然这部书在1937年就出版了，但由于道路曲折，毛泽东得到它，已经是1937年底或1938年初的事情了。毛泽东在1938年2月写过一篇读书日

记,里面详细记载了他读李达这部书的情景,从1938年1月17日读起,中间有间断,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到3月16日全书读完。这说明毛泽东在写作“两论”时还没有读到过这部书。

但是,我们也不要否认“两论”的写作同30年代中国哲学战线上的论战和研究成果的联系。因为中国30年代的哲学论战同毛泽东写作“两论”同处于一个时代,有着共同的时代要求,他通过阅读艾思奇等人的著作和资料也了解了那场争论,虽然“两论”解决的问题主要是针对“左”倾教条主义,但也间接地驳斥了张东荪、叶青等人散布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时,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写作“两论”阅读这些资料时,肯定和吸收了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论战中阐发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思想,并加以补充使之更精确化和系统化,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同时也纠正和克服了他们的某些不正确、不恰当的提法。在当时哲学界普遍存在着脱离中国革命实践的情况下,“两论”的写作本身实际上起了扭转这种不良倾向的作用,为在哲学研究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特别是联系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提供了范例和指导。

**访问者:**看来,国内外有些人散布的“种种迷雾”,不是主观臆测,就是别有用心推断,都站不住脚。

**宋一秀:**站不住脚。事实胜于雄辩,“两论”最初写于1937年7月和8月,是确定无疑的,无可辩驳的。毛泽东在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提问时也说,“两论”是写于1937年夏。谁也否认不了《实践论》、《矛盾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而且随着历史实践的发展,人们会越来越感到它的博大精深和深远的理论意义。

1993年2月21日于北京大学

## 访林默涵——

### 毛泽东三篇著作对我 人生道路的影响

林默涵

林默涵，1913年生，福建武平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宣部文艺处长、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鲁迅研究会会长，《中流》杂志主编。著有杂文集《狮和龙》、《浪花》，文艺论文集《在激变中》，专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林默涵劫后文集》等。

林默涵同志长期担任文艺界的领导工作，是一位有影响的著名文艺理论家。他畅谈了毛泽东对他人生道路的影响，使入感受到他们那一代人的追寻，那一代人的奔腾……

**访问者：**您做了多年的文艺领导工作，经历了建国后的许多运动，像《武训传》、《红楼梦》的讨论，以及胡风问题等等，就您所经历的能给我们谈谈这些情况吗？也算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体会。

**林默涵：**文艺方面的事情太多了，我谈的也够多了，不想再谈这些事情。我还是给你们谈谈毛泽东对我影响最深的



几篇文章，也就是《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篇。因为这三篇文章给我影响很深，对我奔赴延安，指导我的人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访问者：**您是什么时候到延安的？

**林默涵：**1938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那一年发表的，它在最关键时刻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指出了抗战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也使我的思想产生了一次最重大的变化。我就是因为看了《论持久战》，才萌发了去延安的愿望。

**访问者：**您是从哪里去延安的？从上海吗？

**林默涵：**不是，我是从武汉去的，早先在上海。上海失陷后，我去了一个国民党的部队，这个部队的司令是张发奎。张本人还是比较进步的，北伐战争时期有个第四军，就是张发奎率领的，叶挺独立团是他的部队。张在北伐时期比较进步，而且和郭沫若熟悉。

**访问者：**那时，他的部队在武汉周围？

**林默涵：**他是战区司令，但没有实际部队。因为他几次反蒋，反后又拥蒋，蒋对他一直不放心。到抗战时期，因为他是老军人，还有号召力，蒋介石还是给了他一个位置。他让郭沫若介绍一些人到他的部队去搞文化宣传工作，郭老介绍了一批人。这批人都是左翼知识分子，其中有写《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麦新，有写《救亡进行曲》的孙慎，还有老共产党员、文化名人钱亦石等等。他们到了张发奎司令部组织了一个战地服务队，队长是钱亦石。在上海时钱亦石曾主编《世界知识》，我在他手下负责《世界知识》的一个小栏目“科学与发明”，专门介绍世界科学知识动态、各国科学的新发明等等。因为这个关系，我向钱亦石提出也到他的队里去。那时上海已经失陷，我没有心思安心伏案工作了，只想着要为抗日救

亡做点事情，所以向钱提出了这个要求。钱同意了。于是我到了张发奎的战地服务队。

**访问者：**你们的战地服务队住在哪里呢？

**林默涵：**先是在上海的青浦，后又退到浙江的嘉兴一带。那时日本人的攻势十分猛烈，中国的地盘每天都在缩小，所以我们一退再退。在青浦的时候敌人的飞机总是在头上飞，天天轰炸，我们既没有防空洞也没有力量驱赶这些飞机，就躲在乡下的破房子里眼睁睁地挨炸。尤其日本人在金山卫登陆，国民党军哗哗地往后撤，一溃千里。这时大家的情绪就很不稳定了，再加上钱亦石不在（去上海治病，不久逝世），服务队乱得很。当时的南京、武汉还没有丢，人们就商量着到武汉去。这样我也辗转到了武汉。

**访问者：**到了武汉您就看到了《论持久战》，是吗？

**林默涵：**是的。到武汉之前我顺路去了杭州。杭州是我国最美的城市之一。心里想着趁日本人还没有占领，先去看一看，再不看以后就去不成了。结果杭州一片萧条，一座偌大的城市连一名警察也没有，都跑了。当时我们的心情是苍凉的。面对日本人的进攻，尽管国民党的口号喊得很响，要保卫这儿，保卫那儿，胜利一定是我们的，结果没等敌人来就先跑了。怎么办呢？感到非常茫然。我到了武汉，武汉有郭沫若的第三厅，不少人去了那里，我觉得第三厅的文人很多也不太愿意到三厅去，就到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工作。那时胡绳也在《全民周刊》，并小有名气了。不久，武汉又发生危机，蒋介石提出一定要保卫大武汉，但是人们已不相信能守住了，因为南京他也是这样说的，还不是照样丢了吗？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思想一片混乱，完全是一种无所适从的样子。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毛泽东撰写的《论持

久战》。

**访问者：**您看到的是小册子还是报纸？

**林默涵：**是《解放》周刊。我看到的时间也就是1938年7、8月的样子。我是在武汉郊区的山上一口气读完的。越看心里越亮堂，越看越高兴。中国不会亡，但也不会速胜。我从心底里呼出了这句话。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分析了日本，分析了中国，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中日战争的性质、世界各国的动态，回答了为什么不会亡国、又不能速胜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分三个阶段，战略防御阶段、相持阶段、反攻阶段，在这三个阶段各应采取的办法等等，毛泽东都作了非常详尽的论述。我过去怎么也想不清的问题，现在觉得一下子全清楚了，心里有底了。当时奇怪得很，仿佛自己换了个人一样，由茫然变得有信心了。

**访问者：**所以您鼓起勇气去延安，去见见毛泽东是吗？

**林默涵：**是的。当时我想，在日本人猖狂进攻的情况下，为什么其他人讲不清楚，蒋介石讲不清楚，为什么国民党表现得毫无秩序，或者说惊慌失措的样子，毛泽东能讲清楚，共产党显得胸有成竹呢？关键是中国共产党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他们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研究中日战争的形势，决定救亡的办法，预测战争的未来，所以得出了叫人信服的结论。这样我决定到延安去，到延安的马列学院去学习马列主义。当时延安有名气的学校还有抗大、鲁艺等，我都不想去，一心想去马列学院学马列，觉得自己太没有马列主义了，所以糊涂。

**访问者：**看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您的影响非同一般，某种程度上说，改变了您的人生道路。那么您是怎么去延安的呢？

**林默涵：**我首先向柳湜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柳湜把我介绍给凯丰，凯丰又写信给张闻天介绍我去。张闻天当时是马列学院院长。我拿着凯丰的介绍信同演员吕班、田蔚一块去了延安。到延安后我直奔马列学院。第一天没有见到张闻天，先找到秘书长朱光，说明来意。张闻天的办公室就在马列学院附近，当我第二天见到他的时候，他非常痛快，当即答应了，让我进第二班。但第一班的课还没有讲完，剩有列宁的战略与策略，这门课是张闻天亲自讲的，他让我听听这最后一课。最初的时候，还让我进了马列学院的编译室，因为我懂点日文。我过去曾翻译了一本书，书名是《人类的婚姻发展史》，这本书的原作者是苏联人，由日本人译成日文，改名为《唯物恋爱观》，我又按日本版翻译成中文，其实原来的书名挺好，没必要更换书名。

**访问者：**去延安之前，您已是中共党员了吗？

**林默涵：**不是党员，是共青团员，到了延安才入党。我做社会工作的时间比较早，大约在你们还是上学的年岁，我已经做社会工作了。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是我高中的一个同学，我们两人很要好，他家里穷，吃饭连伙食钱都交不起，我知道了就替他交。因为我的家境还比较好，年轻人又比较热情，所以我做衣服就做两套，买皮鞋也买两双。

**访问者：**您的这个同学叫什么名字？

**林默涵：**他叫姜树民。当时他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担任福州团市委宣传部长。他还是一个很有才气的青年，文化水平也高，他写了不少白话诗，在福建的报纸上发表。我对文学的爱好也是他启蒙的。那时我从偏僻的山区走到城市，山区的文化很落后，所以我的文化水平也很低，什么新文艺作品都没有看过，是在他的介绍下读鲁迅、都达夫的作品，郁

达夫的作品比较好读，鲁迅的作品似懂非懂，是以后慢慢才读懂的。也是在他的影响下，我才知道了共产党、国民党的区别等等。他见我富有同情心，又痛恨现实社会的黑暗，就介绍我加入了青年团。慢慢地我也学着写点白话诗，在刊物上发表，那调子“左”得很，什么打倒土豪劣绅，剥他们的皮等等。当时根本不懂得做地下工作，结果学校盯上我了，呆不下去，我只好离开福州到上海。从此我和姜树民同学分手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建国后，多方打听，也不知他的下落。

**访问者：**您是哪一年到上海的，到上海和党组织接上关系没有？

**林默涵：**大概是1929年。到上海要和党组织接上关系比较难，因为党在上海也是秘密的，我是由福州市委入团，要把组织关系转到上海，必须从厦门省委转才行。转不了关系，朋友介绍我到艺术大学，说里面有很多好教员，如黄药眠、阳翰笙等。于是我到艺大旁听，也就是不交学费偷听。因为家里不同意我去上海，所以断了经济来源。黄药眠、阳翰笙的课我都听了，觉得很受启发，他们讲的真是好极了。当时日本入抓中国留学生，学校闹起风潮，我很积极地参加了进去。学生中派别很多，有国民党的、国家主义派的，也有我们地下党。我那时因为关系没转到，就和一个同乡自己干，自己编墙报，晚上贴出去。白天大家看了不知道谁贴的。学校的党支部也不知道。那时的情况很乱，同学们也不知道我不是正式学生，还把我选为学校学生会负责人。

我是在马列学院正式入党的。我是第二班学生，我爱人是第三班。说到去延安，我还想再重复一遍，我之所以去，受影响最深的就是《论持久战》。因为那时内心最焦虑，抗战能不能胜利，喊口号都是抗战必胜，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总感

觉那是空的，只有毛泽东讲的才是实实在在的，说服力很大。我当时精神状态很特别，看完后觉得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一下子轻松了，思想影响就这么深刻。

**访问者：**您到延安见到毛泽东了吗？

**林默涵：**没单独见过，倒是在公开场合常常见到，因为他经常出席一些会议，到马列学院讲课等等。

**访问者：**这是《论持久战》对您的影响。那么《新民主主义论》对您的影响是什么呢？

**林默涵：**我是1938年去的延安。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缓过手来，又开始限共反共，民族资产阶级也从中间活动，企图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我们党内大家的认识也不很一样，有的主张服从国民党，担心破裂统一战线，有的要直接搞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国家向什么地方去呢？抗战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呢？这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很现实的问题，也是天天要遇到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人们工作起来就会觉得心里没底。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回答了这些问题。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的讲演，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当时我已离开了马列学院，到文协筹备处工作，所以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我也在场。听了他的讲话，真觉得豁亮。革命必须分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是社会主义。要在中国建立大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专政，或者直接搞社会主义都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为什么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他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现状，以及它们的发裂趋势，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阶级，规划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

蓝图。讲得句句在理，给你的感觉前途是明确的，放开手脚干就是了。

我之所以对《新民主主义论》印象深刻，还有一个原因。毛泽东在文协讲演之后，正好《中国文化》创刊。创办《中国文化》是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商定的，我记得除了张闻天、艾思奇，还有周扬，我也到场了。艾思奇当时是文协主任，丁玲是副主任。《中国文化》由艾思奇主编，我协助他做具体工作。当时大家都很忙，实际上主办《中国文化》的也就是艾思奇和我两个人。从组稿、发排、校对到跑印厂都是我一个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就在《中国文化》的创刊号上作为发刊词发表，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

接过毛泽东的稿件，我们就开始编排，跑印厂校对。印《中国文化》的印厂不在延安，远在六七十里路以外的安塞。本来毛泽东对自己的文稿一贯是很认真的，要亲自校对，因为安塞很远，交通也不方便，他只好作罢，就由我全包了。我借了一匹老马，到安塞去看清样，校对。那马虽然很老，但很“负责任”，走起路来相当稳当，不要滑，给我印象极深。当时我知道毛泽东的这篇稿子很重要，反复看了几遍，生怕有错误，才最后开印。

**访问者：**据我们了解，毛泽东的讲演是1月9日，15日补充修改成文。《中国文化》2月15日刊出，在当时的印刷条件下，真是够快的。

**林默涵：**我们是加班加点干出来的。出版后毛泽东没有说哪里还有错，为此我也很得意。

**访问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1942年的事情，对您影响很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林默涵：**毛泽东在发表讲话前，找了很多文艺界的同志

谈话，了解他们对文艺工作的意见。

**访问者：**毛泽东也找过您？

**林默涵：**没有。我本不是文艺界人士。但是有一天突然接到要我出席座谈会的请柬，打开一看，两个人署名，是毛泽东、何凯丰。请柬上写着：“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当时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邀请我？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抗战爆发前我曾在香港参加过邹韬奋主创的《生活日报》、《大众生活》工作。韬奋去世后，大家将华北书店改名为韬奋书店，实际上就是三联书店。后来我又到三联书店工作。延安也办了华北书店，是韬奋书店的分店。毛泽东、凯丰发给我的通知就发到了华北书店。我想如果真与这有点关系的话，大概是凯丰知道我的情况。这是我猜想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这样的，当时的延安有几个人写杂文写得不好，对延安批评得很多，我那时在书店里经常看到重庆来的材料，那里面国民党攻击我们的东西很多，所以我针对国民党的言论也写了一些杂文，专门驳斥国民党。这和王实味不一样。后来我看到丁玲写的文章（她当时是《解放日报》文艺版的主编），她说，杂文很不少，但杂文也不都是一样的，有攻击延安的，有的人写的杂文就很好，例如林默涵、许立群、田家英等。她还举了几个人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我想让我出席座谈会，大概与此也有关系。

**访问者：**整个座谈会您都参加了？

**林默涵：**参加了。

**访问者：**听了毛泽东的两次讲话，您当时的感受和前面的两篇文章一样吗？



**林默涵：**是一样的。这一篇很对我的心思，完全能够接受，没有什么格格不入的地方。我觉得毛泽东讲的，也正是我自己想说的，但没有他那么周到，那么好，概括得那么高。

最后我总述一下毛泽东的三篇文章：第一篇，他对抗战能不能胜利作了最科学的分析。第二篇，胜利后怎么办？那时他就提出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不可能再回到蒋介石一党专政的老路上去，但也不可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要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逻辑性非常强。第三篇，他解决怎样才能胜利，解决干部世界观问题，干部要和群众相结合，要为人民服务，这是根本问题。所以我认为《讲话》不只是文艺问题，是讲整个世界观问题，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的党，我们党的事业才有后来的兴旺发达。

1993年9月2日于北京南沙沟

# 访温济泽——

## 听毛主席的整风报告

温济泽

温济泽(1914—1999)，江苏淮阴人。1938年到延安，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解放日报》副刊主编、新华社口头广播部主任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中国社科院科研组织局副局长、研究生院副院长、院长，并担任《瞿秋白文集》编辑组组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坐在对面的这位老人和蔼亲切，虽然年逾古稀，但他每天的工作、写作日程还是排得挺满。说起那些死难的先烈，他的声音有些哽咽。那是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体会的一种激情。

### 要认清“左”倾路线的危害不容易

**访问者：**40年代在全党开展的整风运动，被称作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整风运动之后，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人们都知道的。您当时在延安参加了整风运动，对这段历史，今天回想起来，是不是还有很深的感受呢？

**温济泽：**关于整风运动的情况，讲得比较全面的是中央

党史研究室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比较简明的是胡绳同志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两本书我看后比较满意，运动的经过的确就是那样的。今天，我不去介绍它的全过程了，只就从1942年2月开始的全党整风的第二阶段谈一谈。这个阶段是对全党影响最大的。2月1日，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题目是《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改为《整顿党的作风》。隔了一个星期，8日，毛主席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两篇报告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整风的任务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里把整顿学风放在第一位。这是因为，学风问题是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思想方法问题，是全党工作的态度和思想方法问题。我那时是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的研究员，重点研究哲学。整风开始时，我还在做研究工作，但不久就被临时调到院党委去做宣教工作了。我对于延安的整风运动的确是感受很深的。

说到整风运动，根本的任务就是为了肃清王明“左”倾错误的残余影响。遵义会议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已经得到了纠正。瓦窑堡会议以后，他的“左”倾错误的政治路线也已得到了纠正。但是思想路线还没有彻底清算，它的影响还存在，还不可低估。整风就是为了解决这种错误的思想路线进行彻底的清理。王明“左”倾错误领导在中央占统治地位有四年之久，影响不小，在这之前，还有个立三“左”倾错误。对这些错误的认识，需要时间，需要经过实际斗争的教育才能纠正。就我自己来说，对这一点也是深有体会的。

**访问者：**您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吧？

**温济泽：**我是1929年参加革命的。当时我在江苏淮阴中学读书。参加革命不久，就遭过一次被捕。经过这次被捕，我更加看清了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出狱之后，就在1930年4月，参加了共青团。那一年我16岁。立三路线时期，我在南京做地下工作。立三路线失败以后，结果来了个更“左”的王明路线。那时，我已在上海。立三路线、王明路线是怎么回事，错在哪里？这是我到延安整风时才慢慢懂得的。在当时，只是服从组织，盲目蛮干。那时我们怀着一股极高的热情，抱着要革命就不怕死的精神，向往着靠这样的献身精神来赢得中国革命的成功，而且以为不要很久革命就会成功的。当时我们那种幼稚的想法，那种不怕死的精神，那种准备悲壮牺牲的心情，是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的。

**访问者：**是很难想象。我们看到的都是书本、电影、电视里描绘的，已经人们加工了的。

**温济泽：**那时我们并没有认识到什么路线错误，什么路线不对头。不但没有认识到，而且觉得干革命就应当是这样干的，胜利很快就会到来。1932年我接连被捕过两次，7月10日一次，7月17日又一次，都是星期天，中间只隔了一个星期，真是不要命地去干。

**访问者：**是在什么活动中被捕的？

**温济泽：**7月10日那一次，是在援助牛兰示威中被捕的。牛兰是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工作的，被捕后，听说要解到上海就医，我们举行了要求释放牛兰的示威。7月17日那一次，是这样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失败后，5月间，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为了反对这个协定，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群众团体，叫上海市民众反对停战协定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简称“民联”）。我被推举为“民

联”青年部部长。接着组成江苏省和全国“民联”筹备处，我又担任筹备处的青年部部长。当时我是复旦大学的团支部书记，我一边上课，一边参加活动。7月17日这一天，江苏省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自由市代表大会开会。大会开始以前，特务包探已经布满会场周围。我是主席团成员，我向大会主席建议，把大会推迟，另外找地方改期再开。这时，四面八方的人都来了，改期也的确有困难。大会主席就决定，派三个代表到警察局去要求保护开会。结果，三个人去了就没回来，来的是大批警察和三辆大卡车，我们一起被捕的有88人。有13个人被判死刑，牺牲在雨花台。有70个人被判了徒刑。我看到自己非常要好的难友走向刑场，看到这么多人坐牢，心中很难过。但当时并不觉得“左”倾错误的做法有什么不对。对王明“左”倾错误危害的认识，就我来说，是到延安以后才懂得了一些。要说完全弄清楚，还是在整风运动中。

王明路线统治党中央四年之久，的确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害。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给这条军事路线、政治路线画上了句号。到延安后，毛主席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样的理论著作，目的就在于继续清算王明路线在思想路线上的坏影响。1941年5月19日，他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判主观主义，提出要在全党树立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这个报告之后，马列学院改成中央研究院。我也从中央宣传部调到中央研究院工作。中央研究院开学的时候，毛主席做了一个报告，内容还是讲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毛主席讲了不少一遍。但是，要真正理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有个长的过程，需要从点点滴滴的实践中去认识。口头上会说了，也并不意味

着思想上就彻底解决问题了。我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才在认识上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 毛主席说出一句令人吃惊的话

**访问者：**1942年2月，延安整风开始时，毛泽东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两个报告，您去现场听了吗？

**温济泽：**我去听了。当时我在中央研究院做哲学思想研究工作，对毛主席两个报告中提出的思想方法问题很注意，印象很深，感受很深。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听毛主席讲《整顿学风党风文风》，那时的中央党校礼堂没有座位，大家都是站着听的。我站在前面的一二排，离主席很近，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清楚，心里非常高兴。那时人们对毛主席不能说有什么个人崇拜，但是爱戴毛主席的感情的确是很深厚的。毛主席开始讲为什么要整风，我觉得讲的很有道理。但在讲到反对主观主义时，有一句话使我为之一惊。他说，你们当中也有30年代在上海做过工作的吧？我一听，感到很亲切。谁知主席接着说，有些人比猪还笨。我一听，很惊讶。怎么回事？我们许多同志不要命地在斗争，怎么说比猪还笨？当时心里挺不舒服的。接着听主席继续说下去。他说，你们每逢一个纪念日，都要去示威，明明敌人已经有准备了，要逮捕人，你们还是不顾一切。主席又说，你们看，猪在猪圈里，哼哼着向前走，碰到墙还知道回头，可你们明明知道要遭敌人逮捕，也不回头。这不是比猪还笨吗？听主席这么一说，我觉得是有道理。回想那时，的确是这种情景，上级一个决定来了，我们就坚决执行，有人稍有犹豫，就会给扣上“动摇”之类的帽子，处分，甚至停止同他的联系。我们对这样“左”的领导并不满意，但又往往认为革命就应该这样嘛！听

了毛主席这一番话，感触很深，使我信服。整风中，我才对王明“左”倾错误有了深刻的认识。

**访问者：**您当时是否知道这就是针对王明的？

**温济泽：**我认为主席讲这些，是在指出以王明为代表的整个“左”倾错误领导对革命造成的危害。我15岁参加革命，整风那年28岁，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都是我经历过的。对“左”的一些做法，在实践中，并非能够诚心诚意地接受，并非一点意见都没有，有时也感到行不通，但不懂得他们不对在哪里，也不知道正确的又应该怎么做，思想上是幼稚的。到延安后，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从根本上认识“左”倾路线危害，还是在整风运动中。认识真理，往往需要一个长过程，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访问者：**毛泽东讲的这些话我们过去没听说过，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也没有，可能在修改的过程中删去了。

**温济泽：**在解放区出版的老本子上有过。很多人都听到过这些话，我是亲耳听到的。话说得不太好听，但有分量，给我的感受也很深。接着，毛主席又讲到了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等问题。讲到理论与理论家，毛主席说：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末，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大概不能算吧。毛主席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是很注意地在听的。

我想，我初到延安时，23岁，在陕北公学教了两三年书，又到中央研究院，讲的是哲学、社会科学概论，研究的也是

哲学。这总算是做了理论工作吧？但接着听下去，毛主席说，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我们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的实际问题，能够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听了毛主席的这番话，我心悦诚服了。我懂得了怎样才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这是我在整风运动中的一大收获。

**访问者：**是否可以说完成了思想上的飞跃？

**温济泽：**确实是一个飞跃。整顿三风，除反对主观主义外，另外还有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党八股。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不消除这些，只反对主观主义，还是不彻底。

对于反对宗派主义，毛主席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说中，指出了宗派主义的种种表现。他首先批评闹独立性。有些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接下来他讲到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团结，军队工作干部和地方工作干部的团结，老干部和新干部之间的团结。再后面，毛主席又讲到要消灭宗派主义在党外关系上的残余，说有些人自己读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就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不尊重人家。他说假定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中有四百五十万党员，也只占百分之一，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非党人员合作呢？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没有排斥他们的权利。这一点，我也很有感触。王明视中间派为最危险的敌人，认为他们很反动，这真是莫名其妙。“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成立上海市民众反对停战协定援助东北



义勇军联合会这个团体，按理说应该联合所有赞同抗日和愿意援助东北义勇军的人们，就连蔡廷锴这样坚决抗日的将领也应当成为联合对象，但当时并没有这样做。相反，“左”倾错误领导甚至对抗日的十九路军竟提出过要兵不要官的口号。我非常信服毛主席关于团结党外人士的这段讲话，因为没有千千万万的群众一起来斗争，光靠清一色的党团员，革命能胜利吗？不团结包括国民党蒋介石在内的各个阶层，能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打败日本侵略者吗？听毛主席的讲话，的确有拨开迷雾见太阳那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访问者：**毛泽东在2月8日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其中列数党八股的八大罪状。这也是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您当时对此有何感受？

**温济泽：**毛主席讲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二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三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党八股对党的工作的影响的确存在。写个报告，往往都是长篇大论，第一讲国际形势，第二讲国内形势，最后才讲到我们要做的事。王明做报告，几乎每次都把马列著作一大摞放在桌上，一边讲，一会儿翻这条，一会儿翻那条，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就是有的同志写文章，也老是引经据典，似乎拉得越长越有气派。毛主席批评了这种不好的文风。毛主席讲话时，当场还发了一个小册子，名叫《宣传指南》，里边有四篇文章，第一篇是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中摘下来的，讲列宁怎样做宣传；第二篇是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中摘下来的；第三篇是《鲁迅全集》中的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其中说到要“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要看到一点就写”，“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写完后至少看两

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等等；第四篇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对这个小册子中的这四篇文章，毛主席一一作了说明，要我们学习。这在今天的《毛泽东选集》里都能够看到，就不细说了。

### **“左”和右都不是实事求是**

**访问者：**您对整风运动的成就怎样估价呢？

**温济泽：**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这是我有切身体会的。我在中央研究院参加整风。当时领导我们整风的是李维汉同志。他是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研究院新闻、教育两个研究室主任，又是中央研究院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主任。在纪念中央研究院建院四十周年的时候，李维汉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题目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其中这样讲过：“延安整风是教育了两代人：青年一代（新干部），中年一代（老干部）。那时延安除董老、林老、徐老、谢老、吴老五老外，一般老干部还是中年人。”“整风教育了中、青两代人，教育了新、老两层干部。这是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思想战线上的一个伟大创造，是培养实事求是精神的一次伟大胜利。”他自己还说：“经过整风学习，我的世界观得到根本性的转变。”我非常同意他的这个估价。我的世界观也是在整风学习中得到根本性转变的。整风运动中我听了毛主席的这两个报告，还听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认为，这些报告对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对年轻一代，是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的。整风运动使我们从理论上、思想上明确认识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肃清了三风不正的残余，使中国革命和党的工作真正地完全地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但是全面地考察整风运动，

也不能说它没有缺点。比如运动中写思想自传，有些单位比较好，大家写得比较全面，正面和反面，成绩和缺点，都写，还总结出发扬成绩和克服缺点的办法，使大家充满信心，努力前进。但有的单位就一味要求写缺点，特别是对知识分子，使他们感到自己毛病太多，感到压抑，感到丧气。另外，运动中提倡实事求是的精神，但有时候有些事却仍违背这个精神。拿中央研究院讲，它是整风的试点单位，整风时是拿批判王实味开的头，最后把他错打成托派分子和国民党特务。王实味问题已经在1991年初完全正式平反了。我有一篇文章《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登在《炎黄春秋》1992年第1期上，这就是一个事例。

**访问者：**这篇文章我们都看到了，反响很大，很多报刊都转载了，海内外舆论界也很重视。

**温济泽：**“实事求是”很重要。王实味问题是一个错案，虽然主要的责任者的确是康生，但从王实味被冤这件事本身也可以看出，整风运动中确实仍存在一些不实事求是的地方。王实味问题近半个世纪之后才得到澄清，本着的也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整风运动在1943年开始了审查干部工作。审查干部是必要的，但在审干工作中，出现了严重偏差，搞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搞逼供信，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冤枉了很多的好同志。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在康生。后来周恩来同志提出意见，毛主席也发现了问题，及时制止了这个错误，对冤假错案进行甄别平反。毛主席还主动承担了责任，亲自到一些单位，向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整风运动在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结束。整风运动虽然存在一些缺点，但无疑成绩是巨大的。

**访问者：**从整风运动开始至今天有50年了，整风运动是

一次思想解放运动。1978年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带来的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这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伟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把中国推向了历史性的转折，走上改革之路。今天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又被人称之为一次思想解放运动。50年前，50年后，在这个历史的纵向上一以贯之的是不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

**温济泽：**50年前的整风运动，对于我们今天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实事求是”的确是整风运动中在全党树立起来的优良的思想作风。但要做到这四个字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毛主席在晚年犯了错误，也是他老人家自己违背了这四个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就是致力于要恢复和发扬这种优良的思想作风。小平同志在南方重要谈话中说：“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我想，也就是要我们真正学会“实事求是”。小平同志又指出，现在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和“左”，都不是实事求是。对于小平同志的谈话和他历次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述，我们应该认真地学习，坚决地贯彻。

1992年5月30日于北京木樨地

# 访吴亮平——

## 学个唐三藏 实是功德无量

吴亮平

吴亮平(1908—1986)又名吴黎平,浙江奉化人。1925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张闻天等翻译了《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列著作。1929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环球》周刊主编,1930年在艰苦的环境中翻译了《反杜林论》。曾历任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陕甘宁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化工部副部长、中央党校顾问等职。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小史》、《唯物史观》、《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等。

这是一篇“老”的访谈录,在笔记本上躺了近十年,偶然翻出,感觉很有价值。那是1983年4月的一天下午,我们为弄清两封毛泽东书信的背景情况,去拜访吴老。老人很热情地谈了两封书信涉及的问题,还谈了党史和党的翻译工作的一些重要情况。然而,斯人已矣,尚存此篇,今予发表,以存后人。

**访问者:** 我们收集了两封毛泽东书信,一封是写给您的,

一封里面提到您，所以想请您提供一些情况和背景，并鉴定书信的年代（看毛泽东6月15日给吴亮平信：亮平同志：接了美国一位同情者的信，我想请你起草一封回信。信内除感谢她外，并说及八路抗战情形，请她转告美国兄弟姊妹们多给我们援助，我们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如何，盼示！敬礼！毛泽东）。

**吴亮平：**这封信是1938年的，“美国一位同情者的信”内容记不起了，只记得是从美国来的，是位女士写给毛主席的信。

**访问者：**毛主席经常保持和外国人通信吗？

**吴亮平：**噢，当时的情况是这样：1936年斯诺到保安访问，大概在这年的8月，斯诺来陕北，当时因为我是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也懂英语，所以就由我接待了他，后来他采访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张闻天等同志，写成《西行漫记》。《西行漫记》在美国出版后，引起美国读者的强烈反应，当时写信给陕北的很多，有的直接写信给我党毛主席，有的信转来转去，经过关系才能给陕北，一般这些信先由我收下，再给毛主席，如他考虑可以回信的，再告诉我。这封信就是这个情况。给这位“美国同情者”回信，我按照毛主席信上的指示，讲了八路军抗战的情况，那时我们很穷（已经是1938年了），但我们抗战的信心不减，八路军需要援助，让我们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抗战。这封信写好后，给主席看了，他说很好，然后译成英文寄出去了。至于她收到信后怎么样，下文不清楚了。

这里我想多说几句《西行漫记》。《西行漫记》的出版对党的形象及对外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外面好多人，包括西方和国统区的人民，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西行漫记》才知道红军

和共产党的，知道在中国的西北部有一块共产党领导的真正抗日的根据地，不仅引起了世界的同情，而且吸引了广大国统区的青年向往红军，向往陕北，导致后来1937、1938年大批青年学生去延安形成一个高潮。我记得，周总理传达过，说是毛主席说的，这件事的功劳，如同“大禹治水”，叫“不下大禹治水之功”。

**访问者：**这个评价是很高的。还有一封毛主席1942年9月15日给凯丰的信，里面提到您“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不知你过去见过没有？

**吴亮平：**这封信我最近才看到，以前不知道。我想说明两点。一点，毛主席在信中说我“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这是指我翻译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我是1925年到苏联上中山大学的，当时我已经入团，在上海大厦大学读书。同去的还有沈泽民、张闻天等。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读书条件并不好，马列的许多书没有翻译过来，仅有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等等，教员也是俄国教员，一上课，好多人不懂俄文，只能干瞪着眼睛，那时不仅生活困难，学习上也很困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瞿秋白、向忠发给代表团布置任务，说，到莫斯科没有书读，英文只有少数人懂，懂俄文的更少，代表团应建立一个翻译组，把一些懂英文的、俄文的组织起来，一而口译一而笔译。参加这个组的有张闻天、沈泽民和我。实际上我党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马列著作是从这时开始的。我记得当时翻译出来的有《法兰西内战》、《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等。《反杜林论》就是在这时准备资料，酝酿翻译的，但正式翻译是在我回国后。

我于1928年冬回国，那时党中央还在上海，分配我到中

宣部工作，搞两件事：一件是编《环球》杂志；另一件是参加中央文委的工作，书记是潘汉年。当时文化工作很活跃，成立了许多左派文艺团体，有“左联”、“社联”，也出了不少刊物，如《新思潮》、《萌芽》等等。正当国内的工作做得有劲的时候，王明回国了。王明也是1925年出去的，这个人品质不好，喜欢拉拉扯扯，我在苏联时就对他看不惯，提过意见，因此对我怀恨在心。他回国后在中央宣传部当秘书，那时共产国际的远东部副部长米夫很器重他，他有后台，因此一到中宣部就讲了一大堆帽子，对我也说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话，把我从中宣部撤掉，下放到地下支部，搞写标语、喊口号、发传单等工作。当时我有气，心说：你王明撤我的职，撤不了我的决心。1930年春，我开始翻译《反杜林论》，记得是在上海的亭子间里翻的，整整干了一个夏天，挥汗翻译《反杜林论》。从这年4月干起，到8月完成，将近五个月的时间。书翻出后，我拿到和我们有关关系的地下书店去出版，11月就出版了，是“江南书店”出的。这是第一次翻译《反杜林论》，在那种情况下，可想而知缺点是很多的，我是根据俄文，参考英文、德文翻译的。现在看来挺有意思，倒是王明对我的迫害促成翻译了《反杜林论》，没有他，我还不定哪一年才能翻成。坏事变好事。

《反杜林论》刚出版，我在租界被捕了，这是1930年12月，随后判刑两年。关押一年，国民党要引渡，还没引渡，发生了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人民要求自由、民主的气氛高涨起来，公共租界被捕的几个人趁这个时机，找人保释出来。我也被放出来。

从监狱出来后，我和地下党接上头，请求分配工作。党中央让我到中央苏区。到达中央苏区是1933年阳历二三月



间，被分配到红军学校当宣传部长，校长是叶剑英。

我第一次碰到毛主席是1933年的4月，他问我：“《反杜林论》是不是你翻译的？”我说：“是呀，我还写过一篇骂蒋介石的文章。”毛主席说：“骂得好，有空我找你谈谈。”那时毛主席是中央政府主席，林伯渠是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让我当副部长，后来林老改作财政部长，国民经济部就让我管。毛主席经常找我去谈话，不仅谈哲学，还谈经济学、军事形势等等。有一次谈话中他跟我说，他有一部《反杜林论》，是打漳州时得到的，战争环境，有时要轻装，别的东西可以丢，这部书不能丢，始终保存在他那里。

到了1934年，苏区的情况已经不好，福建十九路军发生事变，提出反蒋抗日，成立人民政府，但博古等不采取和十九路军联合的政策，又打不破第五次“围剿”，红军只有长征。我们是9月间出发的，我骑的骡子还是叶剑英送的。我在三军团担任宣传部长。到遵义开会，正式清算了王明路线在军事方面的错误，改组了中央机构，后又由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指挥军事，我们高兴得很，因为没有毛主席指挥，能不能过大渡河都是有问题的。自从毛主席指挥红军后，生龙活虎，很灵活，我军胜利地渡过了金沙江、大渡河，后来和张国焘斗争，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

毛主席是很注意翻译工作的，他说：“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可能我在这方面没有很好地理解毛主席的意思，这也是我想说的第二点。为什么这样呢？就是那时很愿去做地方工作，这里也有原因，红军到达陕北后，张闻天是中央书记，罗迈（李维汉）是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要我当，但王明来后又把我撤掉了，我心里有气，不想在上面工作，要求去

做地方工作，后来到了晋西北中央局，任中央局党委委员、第一地委书记。毛主席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对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也非常注意，他总觉得翻译书太少，质量也不高。到达陕北以后，我们一方面建立了对内对外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利用暂时较稳定的环境做好马列主义的研究，培养和扩大我们的队伍。因为当时我没有见到这封信，也没有人给我传达，所以后来我还是去了晋西北。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遗憾。

1983年4月13日于北京

## 访刘炽——

### 《东方红》出了新作者

刘 炽

刘炽(1921—1998)，作曲家，陕西西安人。15岁参加工农红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文艺工作。解放后，历任中央戏剧学院歌剧团作曲兼艺术指导、中央实验歌剧院作曲兼艺委会委员，中国铁路文工团艺术顾问，中国音协理事等。写了大中小音乐作品近600件，多次获奖。其代表作有：大型歌剧音乐《白毛女》、《阿诗玛》、《节振国》等10部，电影音乐《上甘岭》、《英雄儿女》、《大渡河》等。创作的《工人大合唱》、《边疆战士大合唱》等曾在北京及许多大城市上演。

一首《东方红》，曾唱遍全中国，不论老幼，妇孺皆知。这首歌是怎样诞生的，又是怎样流传的？1997年，当事人刘炽叙述了事情的前前后后。1998年刘炽同志不幸去世。斯人已去，记录犹存，这篇谈话更显得珍贵。

### 回首忆当年，引出新故事

访问者：听说《东方红》正式首演是您指挥的？

刘 炽：说来话长，那是60年前的事。

**访问者：**您15岁，从家跑出来当红军？

**刘 炽：**对！我在红军剧社当小演员。说起我到红军剧社，还有段故事。1936年冬，我在陕西云阳镇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伍修权给我戴的红军帽。1937年初，我到延安，被分到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当时红军刚从保安开进延安城，生活条件艰苦。我们上课，就在广场土台上支张桌子当讲台，学员坐土砖上，膝盖上垫个纸板当课桌。教员都是一流的，毛泽东讲辩证唯物论，朱德讲游击战争。

我年龄小、个儿矮，总坐在前面。有一次毛主席上课，辩证呀、唯物呀、黑格尔、费尔巴哈呀，又满口湖南话，我哪懂呀？听着听着瞌睡了，竟打起了呼噜。大队长急坏了，立刻让值班排长戳我。值班排长跑到前面，正伸手，被毛主席打断：“别戳，这个小鬼昨晚没睡好，让他睡好了。”听课的学员哈哈大笑，我惊醒了，揉着眼睛，见主席正冲我乐呢。下课后，主席托着我下巴：“小鬼，睡得香吧？以后晚上别调皮，好好睡觉，再上课可不许打瞌睡喽。”

回到大队部，大队长聂鹤亭训我：“你个小鬼，毛主席上课，你敢在他眼皮底下打呼噜，可把大队的人丢尽了。”他叹了口气，摸着我的头：“这么大点的孩子，成天跟大人听课，真难为你。这样吧，你还是到剧团唱歌跳舞吧。”

**访问者：**这正合你意，打小你就能拉爱唱。

**刘 炽：**我们剧团有几个老民间艺人。一个叫方宪章的，以前一直在黄河两岸卖艺，肚里装了很多山西民歌，拳脚也可以，他教了我很多民歌，其中有一首晋西北民歌《芝麻油》，歌词是：“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嘿哟，哎呀我的三哥哥。”

**访问者：**这不是情歌小调吗？

**刘 炽：**正是。我们传唱的很多民歌甚至艺术歌曲都源于民间小调。1938年，安波等按这个小调填上了新词，取名《骑白马》：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咳哟/打日本我顾不上。

**访问者：**跟《芝麻油》对上了，上女下男。

**刘 炽：**但它有了抗日内容，很快在陕甘宁边区流行，一直唱到内地。

**访问者：**再以后就是李有源编了新词《东方红》。记得我上小学时，有一课专讲李有源早晨见日出有感创作了这首伟大的颂歌。

**刘 炽：**你别急，听我慢慢讲。1944年，我们鲁艺大秧歌队在绥德演出。在《拥军花鼓》、《兄妹开荒》等剧目后，我们又想写一部反映移民题材的戏，定名为《下南路》。

**访问者：**移民？类似三峡的移民？

**刘 炽：**两回事。当时陕甘宁边区，从绥德北部到葭县、吴堡、无定河一带，人多地少，人均不到半亩地。而延安以南的三湾：南泥湾、豹子湾、金盆湾一带却荒着，急等开垦。王震率三五九旅首当其冲。但部队人力有限，于是边区政府动员北部困难户到南边。

**访问者：**这跟《东方红》有什么关系？

**刘 炽：**我们全体创作人员下去体验生活。一天我们要到葭县、吴堡一带慰问一旅的将士。当晚住在乌龙堡的一个骡马大店里，听说有两个移民模范也在镇上，就请他俩谈有关移民的情况。这就是李增正、李有源叔侄。

我们在炕上聊上了。有王大化、张平、马可、贺敬之、张水华、于蓝、张鲁、关鹤童、姜应宗、王岚和我。聊到开心处，李有源说他们为宣传移民编了个歌。听说有新歌，我来

神了，拿出笔和纸，准备记谱。李家叔侄扯开嗓门就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儿咳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访问者：这不是《芝麻油》的调吗？

刘 炽：下面的词是：②山川秀/天地平/毛主席领导陕甘宁/迎接移民开山林/咱们边区满地红。③三山低/五岳高/毛主席治国有勋劳/边区办得呱呱叫/老百姓颂唐尧。④边区红/边区红/边区地方没穷人/有了穷人就移民/挖断穷根翻了身。⑤移民好/移民好/移民工作闹开了/葭县出来延安跑/移民变工把山掏。⑥葭县移民走延安/一定要开南劳山/不过几年你来看/尽是一片米粮川。⑦吴满有/马丕恩/高克兰来郭凤英/男耕女织是模范/咱们和他争英雄。⑧咱老乡/仔细听/移民开荒真光荣/各州府县来欢迎/送了好多慰问品。⑨移民开荒真光荣/走到延安开山林/打下粮食兑回来/有吃有穿好光景。

访问者：《移民歌》这么长呀？

刘 炽：这才九段，还有人往下编过其它内容。我们秧歌队在《下南路》中用了他们的《移民歌》。有一次，我到葭县中学给学生队辅导，我教他们唱“东方红，太阳升”。他们的音乐老师说，这歌他们早唱过，是他家附近一个小学语文老师李锦绮编写的，共四段。县宣传部长嫌重复，去掉一段，还剩三段，第一段和我唱的一模一样。

访问者：这么说李锦绮先于李有源写的这词？或说李有源听了这词后编的移民歌？

刘 炽：是这样。

## 《东方红》是集体创作的结晶

访问者：那怎见得不是李锦绮和李有源不约而同写了这首词，或李有源在先，或你的记忆有误呢？

刘 炽：据《延安文学》副主编白玉奇调查，先于李有源的《移民歌》就有不少人传唱东方红的，并知道作者是一位小学语文老师，这和我记忆相吻合。

访问者：那原作者没说过话吗？

刘 炽：据说，“文革”后李锦绮因说《东方红》是他写的而挨整，他不服，还到北京上访过。

访问者：现在唱的“毛主席爱人民”、“共产党像太阳”也是李锦绮写的吗？

刘 炽：不，是公木。

访问者：跟你合作《英雄儿女》的词作者？

刘 炽：是的，他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我们秧歌队回到延安后，觉得这第一段词上口，内容又歌颂领袖，就是太短了，想请公木续上两段关于共产党、八路军的词。没等公木写出来，日本鬼子投降，抗日战争结束了。

1945年9月，延安组织了挺进东北干部团，鲁艺组织了一个文艺干部队，编为八中队。我和公木都是八中队的文艺干部。我们从延安出发，一路步行，横跨五省。行军途中，《移民歌》第一段大家反复唱，又顺口续上和行军胜利有关的新词，但都随唱随丢，没传下来。

同年11月我们到达沈阳，因演出需要，又请公木执笔，有王大化、高阳、田方、雷加、严文井和我，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续写了三段新词。第一段仍保留《移民歌》原词，仅将

“谋生存”改为“谋幸福”。第四段是东北民主联军的内容，后来拿掉不唱了。

**访问者：**据我所知，公木讲的和您的回忆有些出入。公木在给艾克恩的一封信中说：“《东方红》本是陕北民歌。它的产生和流传，多有歧说，难定论。我只说我参与和知道的情况。《移民歌》是1944年2月编出的，我们采集是在1944年冬天。1944年冬我与鲁艺戏音系孟波、于蓝、唐荣枚、刘炽四位同志合为一组到绥德地区采风，闹秧歌。在绥德停留了几夭，便兵分两路，我与刘炽去子洲县十里盐湾，孟波、于蓝、唐荣枚赴葭县黄河边上。过了一个月，又在绥德会合。这时孟波同志等采录的民歌中有《移民歌》，共九段。”您和公木讲的，哪一个为准呢？

**刘 炽：**李有源叔侄那次唱公木不在场。

**访问者：**公木的信还说：“直到抗战胜利，在延安及整个边区，还没有以《东方红》为标题的歌曲。偶然传唱的，就是《移民歌》，传唱得也不广。我们的《陕北民歌选》编成于1945年夏秋间，其中就不见有《东方红》的曲调。”

### 《东方红》从东北文艺工作团开始唱红

**刘 炽：**《东方红》传唱起来，就我所知，是从东北文艺工作团开始的。1945年9月2日我们从延安出发，六七十人作为东北干部大队的一个连，一路上说说笑笑，歌声不断。除了唱些现代歌曲，也经常即兴编唱顺口溜、信天游。在这中间，有人唱完《移民歌》第一段以后，又乘兴自编一些新词接唱下去，歌声随风飘散，没人留意记录。我于1945年9月行军途中，曾写过一首短诗《出发》，共37行，开头两句便是“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而最后结尾则是：哪



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这说明，这一段歌词，在东北文艺工作团行军途中就编出来了。当时倒并未意识到它将成为《东方红》的一个唱段，但肯定是在唱《移民歌》时顺势联唱下来的。不必说是我的创作，更多的可能是听了大家这么唱，我才这样写出来的。到了沈阳，已是10月底，要登台演出，这才想把《移民歌》改写成一支可供演唱的歌曲。参加这次编写的有刘炽、王大化、高阳、田方、雷加、严文井，我只是执笔记录。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凑合成了四段。除第四段，大都是在行军路上大家唱过的，我们只是又加以修整。编好以后，由我编曲，略加准备当晚就登台演唱，连根本不会唱歌的一些同志也跟着上台充数，摆摆阵势。这次演出，报幕就是《东方红》——陕北民歌。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东方红》这个名字。时在1945年11月间。

东北文工团在沈阳编整的《东方红》共四段：第一段即《移民歌》的第一段，只把“谋生存”改成了“谋幸福”。第二段大体是“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领导我们向前进”。第三段，印象最深，当时写定如下：“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达哪达亮，哪达有了共产党，哪达人民得解放。”在编写这段歌词时，是有意识把“哪里”改成“哪达”，忘记是由谁提出的，用意是显出陕北民歌的地方特色，有土味。第四段的词是：“共产党，老百姓，民主联军子弟兵。军民合作心连心，保家卫国享和平。”以上四段歌词，首次用《东方红》标题，由我编曲，在《骑白马》调的基础上，略有加工，仍不失为陕北民歌。由沈阳传唱到全东北，传唱到关里，甚至返流到延安，到边区。在传唱过程中，淘汰了第四段。建国初期，《东方红》作为陕北民歌，正式刊载于《中国人民画报》上。

(访问者:赵世民)

## 访李希凡——

### 毛泽东与《红楼梦》

李希凡

李希凡，1927年生，祖籍浙江绍兴，久居北京通县。1953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研究班当研究生。1955年初调《人民日报》文艺部，后任该报文艺评论组组长、文艺部副主任。1986年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从事文艺评论和研究工作多年，有《红楼梦评论集》(与蓝翎合著)、《说情——红楼艺术探微》、《李希凡文学评论(当代)选》等著作。

中国艺术研究院设在原清恭王府内。这天，风很大。雅致的客厅里，那场《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当事人之一李希凡，爽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 我和蓝翎写这篇文章的经过

访问者：1954年，您和蓝翎两人写过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被称为“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

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对俞平伯、对胡适主观唯心主义乃至后来对胡风思想的批判。作为当事人，请您谈一谈这件事的前后经过。

**李希凡：**1954年这场批判运动涉及到我和蓝翎，涉及到我们当时写的两篇文章。时事变迁，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今天来回顾历史，我只能谈谈自己的记忆和想法。这是我要首先说明的。其实当时我们只是两个普通的共青团员，政治上很幼稚，对党内的情况也不了解。至于说到对俞平伯先生以至胡适的红学观点和古典文学见解有不同的看法，在我来说，是从上大学时就开始了。1952年教学改革时，我就写过一张小字报，提出意见，认为在文学史教学中，不少是胡适观点。应当说，我们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而我自己又早在1947年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我的姐夫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我曾在他家寄居两年，一而帮助他写作，一而在山东大学旁听。青岛解放后，军管会文教部的王哲同志知道我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就主动写信介绍我到华东大学（革命干部学校）去学习，在那里进一步接受了革命教育。1951年华东大学和山东大学合并，我又回青岛在山东大学中文系读书，和蓝翎同学。当时，全国解放不久，党的威信很高，很多老师在政治上虽然倾向进步，拥护共产党，但学术思想上，恐怕是资产阶级的影响比较多，特别是古典文学的教学中，胡适的影响还不小。课程内容，总是讲考证多，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作品内容，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倾向，以及分析作品的艺术成就，比较少。可以说，真正能说出《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成就的，几乎没有。这使我们很不满意。1953年，我们毕业了，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做研究生，继续学习；蓝翎也分配到北师大工农速

成中学教书。记得是1954年春假中的一天，我和蓝翎在中山公园的报栏里看到了《光明日报》上登的俞平伯先生的一篇文章，联想起前些时看到的俞先生在《新建设》1954年3月号上发表的文章《红楼梦简论》，我们就商量要对他的那些观点写一篇文章进行商榷和批驳。这样，我们就利用春假的时间写出了那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对俞先生《红楼梦》研究主要观点的不同意见，也比较扼要地阐述了我们《红楼梦》思想艺术成就的评价。由于当时我是《文艺报》的通讯员，就先写了一封信询问一下，大意是说我们写了这篇文章，长了点，有9000多字，不知能不能用。但等了一段时间，《文艺报》没有回音。我就把文章寄给了我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文史哲》杂志执行编辑葛懋春同志，他是一名历史学家。这样，文章就在《文史哲》1954年第9期上发表了。《文史哲》是建国初期较早创办的社会科学的学术刊物，倡导和创办这个刊物的，是当时我们的老校长、中国著名的现代史学和鲁迅研究专家华岗同志。他主持下的山东大学学术思想很活跃，《文史哲》的办刊宗旨，也是不拘一格，不大讲论资排辈，而且主张不同学术观点可以进行讨论，很有点百家争鸣的味道。我在大学二年级时，就曾有过一篇读书报告被刊用过。写完《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以后，我们觉得话还没有说完，就在1954年的暑假，又写了一篇文章，这就是《评〈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研究》是俞先生解放后出版的一本著作。文章写出后，寄给了《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

### 我所知道的批判运动的风波

**访问者：**后来的事情现在也了解一些了。你们发表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

“文学遗产”专刊发表的《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毛泽东看了，表示赞赏。虽然《文艺报》后来在第18期上转载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毛泽东在1954年10月16日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还是表达了他不满的心情。他认为这不仅仅是看不起青年作者的态度问题，而是甘心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做资产阶级俘虏的问题。他表示通过对俞平伯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错误思想的批判，“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毛泽东态度一明朗，当时《文艺报》的主编冯雪峰就被要求做检讨，《文艺报》的编辑机构也被改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也很快展开。这些情况，您和蓝翎当时了解吗？

**李希凡：**我们写的两篇文章，主要是对当时古典文学研究现状不太满意，不同意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评价中的许多看法，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古典文学作品，发表一下不同的意见，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想法。前几年所谓反毛非毛一股思潮起来的时候，红学界对这场批判运动说什么的都有，包括对我个人，也有各种说法。在港台，海外奇谈就更多了。发表我们文章的当年《文史哲》编辑葛懋春同志80年代初去美国探亲，从美国图书馆收存的台湾出版物中抄录了有关我的小传寄给我，有的写得没边了，说我是江西红小鬼出身，给康生当过通讯员，是康生布置了这项任务给我们。这真荒唐可笑，也太拔高我了。红军时期我只是一个几岁的孩子，而且是生活在开始沦陷于日寇之手的北平郊区。其实，就是我们的文章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也不可能是我们能预料得到的。我记得当时《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发表后，大概是在国庆节前后吧，《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同志找到蓝

翎和我，了解我们写作的经过，要我们作一些补充和修改，准备在报上转载。但文章改出来拿去排印，却没有见报，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曲折，我们当时不了解。隔了些日子，又说要由《文艺报》转载，请冯雪峰同志找我们谈话。我对雪峰同志是很尊敬的，因为我读过他很多论鲁迅的著作，认为写得很深刻。后来批评《文艺报》，冯雪峰同志出来做检讨，我也懵了。我记得他接待我们时非常平易近人，他只说了你们的文章有些地方还粗糙，没写好，有些地方我要给你们改一改，发表时还要加个编者按语这样一些话。我们的文章确实比较粗糙，我自己也没感到这话有什么问题。《文艺报》要登，我们当时很高兴。领我们去见冯雪峰同志的是“文学遗产”的主编陈翔鹤同志，是文学界的前辈。他也很和蔼，说《文艺报》是老大哥，等《文艺报》转载了你们的文章以后，我们就登你们的《评〈红楼梦研究〉》。至于当时中央或高层领导的意见，只是邓拓同志向我们透露了一点，说是你们的文章毛主席看了，肯定你们的观点。至于有什么具体批示，他也没给我们说。我们知道毛主席读了我们的文章，就已经兴奋得不得了啦！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我在“文革”前没看到过。“文革”中，戚本禹的一篇文章公布有这封信，那时我已被造反派打人牛棚，进行劳动改造。是因为这封信，我才被放出牛棚。毛主席对我们的文章作的批注我也是在“文革”中从中宣部的一位同志那里看到的。当时我们的两篇文章发表后不久，1954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钟洛的《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称“这两篇文章，是三十多年来向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胡适派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反击的第一枪，可贵的第一枪”。在此前后，邓拓同志又曾把我们找去，说你们还可以再写些文章，你们的《评〈红楼梦研究〉》不是讲

到了胡适的观点吗？这篇文章可从批判胡适的角度写。这样，我们就写了那篇《走什么样的路》，发表在1954年10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按照邓拓同志意见着重提了胡适的实用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论，不过其中联系到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却不知是谁加上的，那时我们还没有“那么高的认识”。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文章的同一天，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在东总布胡同的作协所在地召开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参加的人有研究古典文学的，也有作家、文艺评论家和报刊编辑。我们参加了，俞平伯先生也参加了。就是在这次会上我们第一次看到俞平伯先生，还是周扬同志引见的。其后，很快又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楼上召开了文艺界更大规模的会议，名义大概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开始进入批判胡适思想的阶段。但可以说，我们的认识当时还没有到自觉的程度，没有感觉到《文艺报》压制我们，至于什么阶级、路线斗争问题，更不是我们当时所能认识到的。在《走什么样的路》发表以后，袁水拍同志发表了一篇批评《文艺报》的文章，当时，我还在学校上课，是听了广播才知道的。

**访问者：**是在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那一篇吧？题目叫《质问〈文艺报〉编者》。毛泽东当时还审阅、修改了，其中毛泽东加了这么一段文字：“《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的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李希凡：**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很多意见，听说周扬同志就曾打电话问邓拓同志：怎么回事？矛头又指向谁了？《文艺报》是文联和作协的机关刊物，周扬同志是文艺界的党的领导

的代表，有此一问，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文艺报》的主编是冯雪峰同志，他就在会上做了检讨，检讨也没通过。我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记得一位文艺界的领导同志曾问我对冯雪峰同志的谈话有什么感想，我说：印象很好。他有点像鲁迅，很关心青年人的成长。这位领导同志立刻批评我说，你真糊涂，这是假象，他一贯会这样做。譬如他说党给鲁迅以力量，实际上是标榜他自己给鲁迅以力量。《文学遗产》的主编陈翔鹤同志也做了检讨，他检讨中有那么一句话，说：《文艺报》是老大哥，我们跟着老大哥走。说得下面哄堂大笑。看得出会上的人不满意他们的检讨。

**访问者：**冯雪峰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在1954年11月4日的《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看后也不满意，认为是“陷人资产阶级泥潭里”、“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应该以“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11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黎之的文章《〈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毛泽东看了，也不很满意，认为把问题说轻了，说编辑部不是骄傲的问题，面是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到12月上旬，《文艺报》就改组了领导班子。

**李希凡：**毛主席的这些批示，在当时没听说过。但后来的批判运动的形势大大紧张起来，我们也想象得出，党对文艺界工作不满意。到12月8日，三位文学界泰斗出来讲话，讲话都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是郭老的《三点建议》，一个是茅盾同志的《良好的开端》，一个是周扬同志的《我们必须战斗》，很快转向对胡适的批判、对胡风的批判。对胡适、胡风的批判开始还都是批判他们的学术思想，后来对胡风的批判越来越激烈了。在我听来，胡风先生和陆翎先生的发言是



针对周扬同志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以后的事，这里不提了。开始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后，我们已经插不上话了，我们还是继续写关于《红楼梦》问题的文章。

**访问者：**这个时候您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了吗？

**李希凡：**我是1955年初到人民日报社的。1954年10月蓝翎已经调到那里去了。调我的时候有些周折。中国人民大学的老校长吴玉章同志，还有聂真副校长，都找我谈了话，希望我留校继续学习。老校长还说，本来学校已准备让我去上俄文专修班，然后到苏联留学。我很感谢老校长和聂真同志对于我的培养和期望，但我实在太爱我的文学专业，不愿转向其他专业了，何况那时我已经结婚，有了孩子，经济上也比较困难。我给周扬同志写了信，表示自己想上文学研究所工作。周扬同志回了信，大意说，已决定调你到人民日报社文艺组工作，“你们走了很好的第一步，望继续努力，不要有一丝骄傲情绪，因为学问和斗争都是无止境的”。后来听报社同志讲，邓拓同志也向毛主席反映了我对工作调动的想法，毛主席只说了一句：“那不是战斗岗位。”就这样我调到了人民日报社。但为了不辜负老校长对我的期望，我向吴老保证，一定继续在夜校把我该读的课程读完。一进人民日报社大门32年没挪窝儿，直到1986年才离开那里来中国艺术研究院。

**访问者：**您见过毛泽东吗？

**李希凡：**见过三四次。1954年12月我当选为第二届政协委员，在怀仁堂大厅里第一次同毛主席握手，开幕晚间宴会时曾向毛主席敬酒。当年春节在中南海团拜时，又见过一次。1956年二届政协二次会议上也见过一次。每次毛主席都讲过一些不同的话。我写过一篇回忆录，题名《在毛主席身边》，记录了这几次见面。

## 我对这场批判运动的看法

**访问者：**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到今天，已经过去 38 年了，您现在对那场运动怎么看？

**李希凡：**对这场运动作历史的结论，是党中央有关部门的事。林则徐有一句诗，叫做“青史终能定是非”，我相信这是真理。“文革”后的一段时间，以及 1988 年兴起的一股思潮，对这场批判全盘否定，并把它同毛主席的晚年错误扯在一起，我是有不同看法的。最近，我看到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这场批判运动作了这样的评断：“1954 年，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文章开始，又领导发动了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胡适是五四运动以后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影响最大的一位。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而且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党发动这两次批判（另一次指批判《武训传》——引者注），提出的问题是重大的，进行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结合实际的事例，开展批评和讨论，来学习如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种方法。这两次批判，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这两次批判已经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我以为，这样从正反两个方面

来总结这场批判运动，才是有说服力的。自然，也要承认这场运动对俞平伯先生有伤害，给他心理上造成的压力很大。后来运动升级，批判也升温了，有些文章也就不实事求是了，包括我们后来的一些文章，也有对俞先生不尊重的称谓和说法。

**访问者：**对红学研究的影响呢？

**李希凡：**从红学本身的发展来看，可以说，从1954年有了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新的开端。前几年不是发生过一场“红学三十年”的论争么？事实证明，这三十多年间，“红学”确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不仅《红楼梦》的思想艺术得到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就是那些过去所谓新旧红学的老课题，如作者家世、版本考证等，也有了新发现、新结论。特别是1979年《红楼梦学刊》创刊和1980年中国红学会成立以来，有关《红楼梦》的学术活动，广及国内外，多次掀起所谓“红学热”，使《红楼梦》出版的印数始终居于四部古典小说之首，而且三十六集电视连续剧和六部八集电影系列片《红楼梦》的问世，在亿万观众中普及了《红楼梦》，使这部杰作产生了空前未有的影响，1954年提出的主要观点基本上已被大家接受了，当然也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

**访问者：**有不同意见是免不了的，也是正常的。

**李希凡：**有不同意见后来也都展开了公开的争论。总之，通过这件事，在那么大的范围，有那么多的人说《红楼梦》、译《红楼梦》，的确拓宽了《红楼梦》研究的视野，推动了红学在新的历史阶段下的发展。

### **毛泽东读《红楼梦》的独特历史视角**

**访问者：**您能不能就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评价谈一谈您的看法？

**李希凡：**好的。毛主席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的评价很高，从他多次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是十分喜爱这部作品的。他说他读过很多遍，他认为这部小说代表着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最高成就。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他就说过：我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这当然不是说，中国优秀的文化艺术传统，真的只有一部《红楼梦》，而是以《红楼梦》为中国优秀文化艺术的代表。在我国四部古典小说中，《红楼梦》不同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它是篇幅浩瀚、头绪纷繁描写现实生活的长篇巨制。它不以情节取胜，而以多彩多姿的世俗人情的深刻描写见长。它主要写的是一个贵族之家——荣宁二府，或者扩大一点说，是牵连到四个贵族之家的兴衰破败。但它所显示的艺术视野却十分广阔，封建末世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从王公贵族到市井小民，以及乡野情趣，反映在它的艺术世界里，就像实际生活存在一样，虽然千头万绪，参差交织，却相互联系，浑然天成，不可分割。其中大事件中穿插小故事，小故事中又潜伏着大变故。可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作者的构思既周密又巧妙，首尾相应，筋脉连贯，丰富多彩地展现在层层涟漪的艺术画面里了。至于所写的人物，就有四百多个，上至妃子、王爷、公侯、官吏、夫人、少爷、小姐，下至管家、奴仆、小厮、丫鬟、庄头、村姬、村女，以至和尚、道士、尼姑、娼妓、无赖，三教九流，一个个生气勃勃，血肉丰满，个性鲜明，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当年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里写过这样一句话：“《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毛主席看到后，加了密密的圈点。我想毛主席说他读《红楼梦》是把它当作历史来读，意思就是通过它了解中国封

建社会的状况。1987年第2期《红楼梦学刊》发表过龚育之、宋贵仑同志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红学”一家言》，其中说到毛主席“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这是读小说的一个重要视角，一个高明的视角，马克思主义者读《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尤其不能忽视这个视角”。当然，一部反映时代的伟大作品，它也必然具有这样的认识价值。龚育之、宋贵仑同志还列举恩格斯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称赞《人间喜剧》“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列宁则把托尔斯泰的作品誉为“俄国革命的镜子”来作说明。这还不都是把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当作历史读么？只不过毛主席读《红楼梦》公开说明了他自己的这个视角，难道这就损害了《红楼梦》？相反，只把它说成是一本“爱情小说”，倒没有贬低它的价值？我以为，正因为毛主席对《红楼梦》的认识评价是如此之高——可以当作历史读，他才那样不能容忍“新红学派”把《红楼梦》说成是曹雪芹的“自传”，或是什么《红楼梦》的基本观念是“色空”等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呓语。王凤姐跟爱情有什么关系？但作者写她的笔墨一点也不少于宝黛爱情。那么作者是什么意图呢？读过《红楼梦》，又有一点生活经验的人，一定会感受到写这么一个大家族，如果它的神经中枢没有王凤姐这样一个人物，那层层阶阶的贵族家庭的生活“体制”，会无法转动。凤姐是这个封建大家庭中各种关系的一个集中点，从她身上集中反映了各种矛盾。毛主席在谈《红楼梦》时经常谈到她，引用她的话，称赞作者对这个人物形象的创造。有人抓住毛主席说的“《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这句话大做文章，其实这也不过是个比喻，与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读是同一语义。恩格斯不是还说过，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

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难道能因为他们是从这方面的“视角”来看待文学作品的，就断定他们忽略审美，不懂艺术？毛主席不但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诗人。不仅他的古体诗词写得那么气魄恢宏，独具一格，就是《毛泽东选集》四卷的每一篇文章，也何尝不是说理透彻，文字优美，显示了他广博精深的文学造诣。谁会相信，他能幼稚到连文艺与历史的区别都分不清呢？

**访问者：**好像记得胡适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共里边要数毛泽东的白话文写得最好。

**李希凡：**胡适的这个评价，还是公正的。据说主席很喜爱唐代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当然，三李的诗的思想艺术成就，并不是在同一水平线上，但他们都工于诗艺，各有独特的风格。好像毛主席不太喜欢杜甫的诗，虽然他也评论过杜甫诗“是政治诗”，作了肯定。还有，对于新诗，主席开过玩笑，说，要让我看新诗，除非给我二百块现大洋。他虽不喜欢新诗，但在给臧克家同志的信中，还是提倡和鼓励青年人写新诗。可以说，毛主席的艺术修养、艺术情趣都是很高的，但他同时又不以他个人的爱好简单地去看文艺问题。

**访问者：**这一点我同意，毛泽东处在政治领袖、革命领袖的地位，所以有时他评价一样东西，哪怕是文艺作品，也自然有他特殊的角度，和一般人不一样。

**李希凡：**当然不一样，高屋建瓴，视野开阔。仅就《红楼梦》来说，茅盾同志40年代的回忆录中就称赞，毛主席在和他谈话中“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延安文艺回忆录》第6页）。可见他对《红楼梦》是早已熟读了的。他曾把《红楼梦》与《金瓶梅》作比较，认为《金瓶梅》只反映黑暗，不尊重妇女，而《红楼梦》写得有点希望，是尊重妇女的。话很简单，却抓住了

要害。我曾写过两篇文章,涉及到《金瓶梅》:一篇是1957年写的,题目是《〈水浒〉和〈金瓶梅〉在我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中的地位》,是从《水浒》与《金瓶梅》的比较而言的;另一篇是80年代写的,题目是《极摹人情世态之歧》,是从《红楼梦》与《金瓶梅》比较而言的。《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虽有一定的地位,但决不能像目前有些学者那样一味瞎吹。我还是同意清人诸联的这样一段评语:“书(指《红楼梦》)本脱胎于《金瓶梅》,而褻嫫之词,淘汰至尽,中间写情写景,无些黠牙后慧。非特青出于蓝,直是蝉蜕于秽。”(《红楼评梦》)再比如,毛主席认为《红楼梦》的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四大家族的“护官符”是全书的总纲。过去没有人这样讲过,这也是毛主席的高明视角的一个方面。毛主席晚年的确犯了错误,而且很严重,也包括文艺上,“文革”前的两个批示,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伤害了文艺界。毛主席是人不是神,过去我们把他当成神,也有我们自己的责任。今天,我们也不要用人神的标准来要求毛主席。毛主席的伟大历史功绩是无法否定的,毛主席的错误,也得到了党中央的批评纠正。我们应该像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那样,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有些人因为毛主席“文革”中的错误掀起全盘否定的所谓反毛非毛的浪潮,这是我绝对不能苟同的。没有毛泽东思想,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我们中华民族的新生么?同样,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也应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理论基础。只不过,这是另外的一个话题,可以不涉及了,今天的主题本来就是谈《红楼梦》研究批判问题的。

访问者: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1992年4月22日于北京前海西街

## 访杜润生——

### 1955 年前后毛泽东的变化并非突然

杜润生

杜润生，1913 年生，山西太谷人。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秘书长，中南局秘书长，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国家农委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等职。长期研究中国农村问题，著有《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等。

杜老从事农村工作几十年，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这段历史又是他亲身经历的。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一起回顾时，老人的目光显得那样深远、深远……

访问者：中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是在 1955 年。这一年毛泽东的思想变化比较大，党内的争论也比较大。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曾激烈地批评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特别是点名批评邓子恢，说他犯了右倾错误。这个问题现在中央已经作了结论，认为邓子恢当时的主张是符合实际的，并为他平反。这件事已过去 38 年了，人们回想起来，都认为 1955



年这场争论来得很突然，您现在怎么看？

**杜润生：**1955年的事情，从毛泽东同志本人说变化并不突然，他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已经完成了两个革命转变的思路。过去人们在许多场合听过中央领导说，非社会主义因素将存在一个较长时期。此期间要创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有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相对稳定的政策，就是说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允许非社会主义因素存在的同时，又提出消灭它们，政策预期目标不确定叫人不可理解。

**访问者：**在逻辑上也说不通的。

**杜润生：**毛泽东同志恰好在建国初期提出主张：要即时开始并预期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而人们有突然变化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在头脑里的新民主主义，和毛泽东同志当时所理解的新民主主义是不一样的。他说：“新民主主义在桥上”，不是一个稳定下来的历史阶段，而是个社会制度新旧转换的过渡时期，不能讲什么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当时我们没有深刻领会毛泽东的这番意思，所以反映到实际工作中产生了矛盾。事实上，就和前苏联一样，前苏联是两个革命直接转变，夺取政权之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领导我们走出中国式道路，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因生产力水平差异，同样设想力求另走中国式道路，结果就农业方面讲，还是以俄为师，土改后过快进入集体化。

**访问者：**列宁还搞了一个新经济政策，虽然时间很短。

**杜润生：**那是后来的事。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只有八个月就完成两个革命的转变。十月革命后有一个军事共产

主义时期，列宁在逝世前，才提出新经济政策。从1928年始在斯大林主持下，改变了列宁的政策，很快完成农业集体化。我们原来设想似乎不是这样。有段时期，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有共同点，“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要经历一个历史阶段。

**访问者：**毛泽东曾说，进入社会主义大约要15年左右。

**杜润生：**事实是15年后，还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你看我们1957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只用了几年时间。20年后，消灭了资本主义又要让私人经济恢复，外国的三资企业也在兴起。现在重新肯定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恢复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各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总不能说又在提倡三资企业，同时就宣告要消灭三资企业，那人家还来吗？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物质文化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这样的社会制度转换要按世纪来计算，50年至100年。

**访问者：**从哪一年开始算起？

**杜润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起点是从1957年，因为在那一年建立了社会主义所有制。

**访问者：**您体会，毛泽东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设想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杜润生：**1953年6月正式提出。更早一点，1951年关于山西试办合作社的争论，他就说私有制就应当动摇它。1952年下半年提出设想，用10到15年时间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

**访问者：**正式提出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吧？

**杜润生：**从那个时候明确地形成中央决策。搞新区土改时，还说富农经济一定要保留，因为保留富农经济对农业发展有好处，“富农放哨，中农睡觉”。他还说，“你们下去看看，家家户户都贴着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老百姓都想发财，你能挡住？”这是1950年的事。

**访问者：**新区土改时，确实贯彻了这个政策吧？

**杜润生：**实际进行中没有完全执行。中央允许个别省区征收富农出租土地。不少地方把富农经济搞掉了，只是华东和西北某些省份没有征收。

**访问者：**有种说法，认为当时保留富农的政策，实际上是对着中农的，中国的富农经济哪有那么大？

**杜润生：**数量只占5%—6%左右。毛泽东同志提出剥削收入量超过25%的就是富农，和外国比起来就不算是富家，前苏联的规定是有多少匹马，我们是看剥削关系。

**访问者：**我们的划分是不是要科学一点？

**杜润生：**这就如同雇工超过8人就算资本主义的规定，不能说有什么标准根据，但有了个阶级划分标准文件，就算一个大进步。从照抄前苏联消灭富农政策，到有别于地主加以保留，也是一个进步。毛泽东那时肯定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对富农经济采取保留政策，是必要的。

**访问者：**请说说毛泽东在合作化运动开始后的变化。

**杜润生：**合作化初期，两件事，农民有了抵触。一个是粮食统购统销，搞得老百姓意见很大，突然把所有私人的粮店关闭，把市场经济完全取消，余粮统统卖给政府，老百姓多少年自由交换的习惯一下子改变了，大多数群众当然适应不了。而且征购的粮食一年比一年多，1954年要的就够多了，1955年又要增加，有些地方搞得口粮不够吃。这件事又和互助合作化搞到一块，土改才结束，农民正想在分得的土地上好好经营一番，此时，却叫他们带上土地、农具参加集体，有些困难户还有要求，一般农户并不自愿，于是杀鸡宰羊、杀牛卖牲口、逃荒。周总理派人下去调查，我们农村工作部也

派人下去，报来一些材料。起初对这个情况毛泽东是很重视的，对我们的一些建议，如不单纯追求办社数字，保证自愿，办好试点，留足口粮等，他都接受了，即时提出主张有的地方停下来整顿，有的地方慢一点，不要提什么时候进入社会主义。然后有了三字方针，一曰停，二曰发，三曰缩。

但这时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新的基本思路已经确立，这是战略性的，不会轻易改变。上边三字方针只是战术性措施，因此和我们之间的一致也是暂时的一致。后来他亲自下去看，第一件事就是看到铁路两旁的麦子长得很好，他就认为说农民种田不积极是不准确的，麦子长得半人深，这么好的麦子，还能说老百姓种地不积极？第二件事，上海的柯庆施向他上报了些重要情况，最核心的是领导干部有三分之一对合作化是消极的，而这些同中央农村工作部控制过紧有关系，农村工作部散布消极思想，从而影响了下面。这正符合毛泽东的看法。于是他把南方各省市的第一书记召去，开了一个会，调子就变了。

**访问者：**这是哪一年开的？

**杜润生：**1955年4月。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讲了重要的看法，说广大农民有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主流，与此相反的现象都是支流。农村工作部这些人是代表了支流。希望大家给合作社说点好话，代表主流说话。并对三字方针重新做了解释。

**访问者：**关于主流和支流的问题您怎么看？

**杜润生：**我到现在也难以从理论结合实际的高度上、从哲学上，将主流和支流的含义解释明白。长期以来，我们总结工作，一般说到符合领导方针的东西就是主流，不符合的就是支流。在庐山会议后，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

主流，“文革”中把极左的东西说成主流。今天评价这种说法，就不能证明是对的。我只觉得，在这问题上容易出简单化。

**访问者：**不是采取分析的态度。

**杜润生：**毛泽东历来提倡处理问题要采取分析态度，可是他提出这个概念，却使人感到很难把握。难处在于：有时候被我们判定是支流的东西，却代表了群众多数人的动向与行为。如在中国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如果按生产力标准考虑问题，那么必须是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小农经济容纳不下生产力的发展时，才是合作化的成熟时机。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合作化必须和工业化相配合，不能离开工业化的发展程度，把合作化的规模一两年内搞得太大。化肥多一点，科学技术多一点、机械多一点，大量劳动者农外就业，劳动生产率有变化，才能使农业合作化获得物质基础。那时这些还都谈不到。在这条件下家庭经营的潜力还应充分利用，给农户一点可支配资源去自由发展是有利的。这是当时农民的一种愿望。当时农民当中，不只是富裕中农，一般中农也对入社抱怀疑抵触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

**访问者：**农业基本上是手工劳动，几把锄头，一头牛，最多有部水车。

**杜润生：**就是说，生产更多靠人的因素。第二个问题是，在当时条件下，合作化规模搞得越大管理越困难，大农业需要现代型管理方法，对于农民说来，这要有一个学习过程，循序渐进，利于培养人材。另外，农民入社后和土地的关系疏远了，都变成了工人，劳动报酬靠记工分，对于生产的好坏可以不负直接责任。如果我们有办法能像工厂对劳动纪律予以监督也可以，但农业和工业不同，工业是集中在一个工厂里，农业劳动则是散在四面八方的土地上，完全靠自觉。靠

自觉就要有某种直接性利益动机，离开利益推动，光靠教育是不够的。所以，主张慢一点，有准备有步骤地前进是对的。但这方面讲的多了，是不是混淆主流与支流的错误？这就难以把握了。那时我们坚持15年时间，这就够快了，这本是毛泽东同志原来所提的计划。后来他认为土改后应趁热打铁，加快发展，他出于维护战略方向的需要，当别人反对他认为正确的东西时，他就逐条批驳，树立起了一个十分明确的对立面。

**访问者：**毛泽东有很强的挑战心理，喜欢挑战。

**杜润生：**邓子恢与毛泽东的争论，起源于合作社发展数字的变化，原定100万，毛泽东要加30万，邓子恢主张不动。这本来是可以妥协的问题。邓子恢还是坚持前一段的想法，不愿轻易改变。他反复说，太大不行，过快不行，没有会计不行，干部水平太低不行。毛泽东逐条加以驳斥，并看出邓子恢思想不好通，提出“必须大炮轰”。从此，着手编《怎样办合作社》一书，并决定召集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来一次大辩论。毛泽东在最后大会总结中，就此问题，提出如下极其明确的结论：

这次会议，破除了很多迷信。

合作社大发展还是小发展？群众要求大发展。

新区能不能发展？新区也能发展。

山区能不能发展？山区也能发展。

灾区能不能发展？灾区也能发展。

落后农村能不能发展？落后农村也能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发展？除西藏、大小凉山外，少数民族地区也能发展。

没有资金能不能办社？也能办。

干部少能不能办社？也能办。

没有文化能不能办社？也能办。

大社能不能办？能办。

没有机器不能办社的空气也不大了。

毛主席历来主张战略上勇敢，战术上慎重，此时为鼓舞大家前进，反对保守倾向，慎重讲得少了。主张稳步前进的人，被视为“小脚女人走路”。看条件办事，说成是清规戒律。下边同志为避免右倾保守错误，把原来一直强调的“由点到面，由少到多，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的工作方法，当作应该抛弃的清规戒律，一定要快、要高、要大，造成一股潮流。那时毛泽东的威信非常之高，过去对时局估计，每言必中，如解放战争中，说消灭国民党多少个旅，每次都实现了。新中国伟大的创始人，他的话，我们完全相信，再加上他提出区分现象与本质、主流与支流问题，从思想方法上批判，我们觉得自己就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作了检讨。与会同志一致拥护毛主席的决策，还有一些同志也作了检讨。现在回想起来，有些代表前进方向的东西，并非一定是现实的东西，合乎理想面缺乏现实性的东西当作主流，就容易搞成理想主义。

**访问者：**但既然脱离实际，要付诸实践就会碰壁。你们当时主要检讨些什么呢？

**杜润生：**我们当时检讨的是右倾保守思想和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内容一个是对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估计不足，一个是区分不清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检讨不是违心的，是诚心实意的，和后来“文革”中的检讨不一样，那时承认走资派，多有违心成分。

**访问者：**当时毛泽东说的主流，意思是大多数群众有合作化愿望吗？

**杜润生：**合作化代表一个历史前进的运动方向。他看到一些事实，认为农民群众是支持合作化的，而在北京很少听到看到替合作社说好话的人，是报忧不报喜，只看事物的支流，罗列现象，看不见主流和本质。

**访问者：**根据你们当时到农村考察的情况看，当时的农民是真的那么强烈要求合作化吗？

**杜润生：**1952年才结束土改，当时农民才分了土地，农民有个体经营积极性，同时也愿接受共产党号召，走合作化道路，但不明白怎么合作，“跟共产党走没错”，但一定要看看事实。

**访问者：**毛泽东应该了解农民，当时也说过，要保护农民的个体积极性。

**杜润生：**听说1953年春，在起草第一个互助合作决议的时候，赵树理说，他家乡的农民都是想奔富，互助可以，很少想搞合作化的。赵是文学家。这个意见陈伯达反映给毛泽东了，很受重视。在第一个互助合作决议上写了农民有两种积极性，决议说：中国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  
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文件时，还加了这样一段话：“在一个农村内，哪怕绝大多数农民都加入了互助组或合作社，单干农民只有少数，也应采取尊重和团结这少数人的态度。”可见，这时毛泽东是很讲求实际的。

**访问者：**那么，他后来为什么变得那么快呢？搞了互助组，还没巩固就搞合作社，合作社刚刚开头，又搞人民公社，一个接一个，使人有点跟不上趟。

**杜润生：**他在农村问题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同时也把中国古代知识界提倡的“大同”社会思想继承下来，加建



立一个公社，工农商学兵一块搞，共同生产，公平分配，认为有了这个体制就能建立起走向共产主义的大桥了。1958年，一度走到了极端，废除商品，实行供给制，搞公共食堂，认为共产主义已不是遥远的事情了。

但是，群众吃不饱饭这个事实把他唤醒了，又重新用马克思主义认识现实，承认价值法则和商品的作用，反对“共产风”和一平二调，最后，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不过在这以后一段时间内，他还是认为三面红旗是主流、是本质、是方向，认为这是亿万群众的伟大理想和向前进的伟大运动，决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狂热性。所以把说此话的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认为党内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1955年时说邓子恢等是代表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利益讲话的，实际已经把认识上的问题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到了庐山会议，就明确了党内有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到八届十中全会，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到“文革”就更厉害了，革命的矛头主要朝向党内的走资派。

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亿万农民从个体经济走向合作制应经过什么样的中介性步骤和组织形式，党内有不同主张大多属于工作是非认识是非问题，从此都被判定为两条道路是非和阶级斗争是非了。

我上面说的这些，就是想说明毛泽东在1955年前后的变化并不突然，是前有起源后有继续的，有历史渊源的。我们今天谈话限于时间还没有就国内外环境进行分析。应该认识，当时国内外环境，决定中国必须动员国内一切资源，赶超先进国家，使人民富裕，国家安全有保障，这正是全国人民的愿望。当时，加速农业合作化被看作一个先决条件，这是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的思想中始终有实事求是的一面，比如他曾同意“停、发、缩”的三字方针，提倡整顿，不要过急等等。一度搞人民公社，这个理想化的设计，是对建设工业国的困难估计不足，发展生产力的先决性作用几乎被忽视了。这属于认识问题。说到底，还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原来的设想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的，而我们却是在生产力很不发达的一个农业国的基础上建立。按正常的道路，首先应当以工业为主导，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凡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因素，包括私人经济要给它一个发展机会。社会生产力没有发展到一定阶段，对非公有经济一下子取消是不行的，国家还必须以公有经济作为主干，允许各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发展。这些主张都是毛泽东提出过的，可是到了50年代初，有某些新的因素限制人们继续执行这些主张，毛主席带头作出新的决策。70年代末，形势又有变化，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起，实行了战略转变，又回到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上。邓小平同志在这个关键时刻建立了不朽功勋。

**访问者：**其实毛泽东的一些失误，也是在探索中的失误，您怎么看他这个人？

**杜润生：**毛泽东的伟大是世界公认的，我同意中央的文件中的话：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仍可能在黑暗中摸索，还要用更长的时间来完成。他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依靠工农联盟，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及群众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等构成一个思想体系，武装了千千万万干部，起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中国近代以来，有多少革命起义，都没有成功，只有到有了共产党，共产党又有了毛泽东领导，才使革命走上成功。建国以后，毛

泽东确实想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也出了许多好主意，可惜后来一度自己也未能一贯地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历史任务由邓小平同志继承下来了。

**访问者：**毛泽东在建国后探索中的一些失误，是不是在于他的理想主义？

**杜润生：**没有理想不行，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社会主义社会奋斗看来是完全必要的。哪个国家没有理想家，哪一种民族没有理论思维？没有理想屈服在现实面前，无所作为，会被历史所淘汰。只是认识客观世界不是一次完成的，为理想奋斗要通过实践，检验理想，校正理想。所以要讲求实事求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干了70多年，一直为理想奋斗，成为民族振兴的主要动力。

**访问者：**理想也是个凝聚力。

**杜润生：**这是个了不起的东西。不过要记住，单从理想模式出发，不顾现实条件，要付出代价。历史长河中，有点曲折，为前进提供了教益，坏事变成好事。一个政党不可能没有错误，问题在于当错误被认识之后，能不能修正错误。我们党从来就是既无畏地坚持真理，又能勇敢地修正错误的。如农村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是接受群众要求，朝着正确的方向上前进了一大步吗？过去的探索是产生了好的结果的。80年代起，邓小平掌航的时代，把理想和现实结合得更好了，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所以兴盛不衰永远前进的希望所在。

1993年3月24日于北京西黄城根南街

## 访卢文——

### 毛泽东、邓子恢关于 合作化问题的三次争论

卢 文

卢文，1922年生，广西合浦县人。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七支队政委、中共钦县县委书记、中共广西省委党校党委副书记、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联络室主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等。

对卢文的这次采访可以说是高效率。电话一联系，他就爽快地定了时间。骑了几分钟的单车，谈了不到一小时，我们出来一看表，哟，还早呢！

**访问者：**50年代，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同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邓子恢发生过一些争论，请您谈谈这件事的大致经过。

**卢 文：**那时我大部分时间不在北京，没有直接的经历。近十多年来由于从事农村问题和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研究，看了不少材料，可以根据所知的情况谈谈。

邓子恢到农村部工作是1953年。他和毛泽东之间关于合

作化问题的争论实际有三次。

第一次是1955年春天在浙江收缩农业合作社的问题上。3月下旬，邓子恢和当时的浙江省委负责人开会讨论，写成了《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用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发往浙江省。这个电报稿据说是经毛泽东审阅过的。发到浙江后，浙江开了四级干部会议作了部署，一个月后浙江的农业合作社就由55000个压缩到40000个（后来“文化大革命”中说浙江砍了20万个合作社是不符合事实的）。毛泽东了解到浙江的这个情况后很有意见，批评邓子恢说：“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1955年6月下旬以后，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了一个计划，准备在全国65万个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到100万个。中央批准了这个计划。但毛泽东巡视长江以南回来后，提出翻一番，发展到130万个。这样就发生了农业合作化的大发展与小发展之争。邓子恢坚持原来的计划。他提出的理由有三个，一是整个合作化运动应该与工业化进度相适应，不能过快；二是现有的合作社存在问题多，要打好基础，巩固的任务很重；三是各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干部的领导水平和群众的觉悟有待逐步提高。这样一来就和毛泽东的意见不合。这一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时，不点名地批评了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提西摆地在那里走路”，是一种右倾错误的指导方针，批评邓子恢是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到了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对邓子恢点名严厉批评，并定为“右倾

机会主义”。对“小脚女人”的批判随着《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出版而进一步深入，扩及全国。这是第二次争论。

第三次争论是在1962年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上。这时，全国还处在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时期，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制度经过调整后，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邓子恢主张贯彻稳定小队所有制、尊重生产队自主权、保留自留地、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的方针。形式是责任组向生产队包工，零碎活包到个人，对田间管理和集体不便进行的技术活可以包到户，联系产量，超产奖励。这与今天我们说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还是不同的，它仍是建立在坚持集体统一领导、统一分配、统一核算的前提下的。但邓子恢的这个主张又遭到毛泽东的批评，认为是“刮单干风”，说农村工作部“十年来没有办一件好事”，宣布撤销农村工作部。邓子恢也离开了那里。这是第三次。

**访问者：**在农业合作化进度问题上，其实邓子恢是按照中央决议精神贯彻执行的。

**卢文：**这在中央批复的1980年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就说到了，对邓子恢的工作也作了客观评价。认为压缩浙江的一部分合作社“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纠正了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一度紧张的中贫农关系得到了解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了，干部政策水平提高了。实践证明，这个处理是符合群众要求的。有的地方由于酝酿不够，行动过猛和工作粗糙，对不该收缩的也收缩了一些，这是在具体执行中的缺点错误”。“把浙江省坚决收缩说成是邓子恢同志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

线，是不符合事实的。”关于1955年大发展问题的争论，“实际上，邓子恢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当时对他的这种批判，曾导致以后合作化运动高级社化和人民公社化等急躁冒进的错误”。关于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实际上邓子恢同志并不是提倡包产到户和鼓吹单干，而是想找到一种将集体经济利益和个人经济利益联系起来的责任制形式。其实，回顾当时实际情况，在一些经济极端困难的地区，允许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也是必要的，也不算什么错误”。

**访问者：**在争论以前，农业合作化是按计划、有步骤地前进的。毛泽东自己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对合作化的进度和完成时间也有估计，认为需要10年到15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到后来有突然的改变？我们注意到了1955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巡视江南的事。这次巡视是不是毛泽东改变决策的转折点？

**卢文：**毛泽东巡视江南的确影响了他对中国农村形势的估计，对推动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有一定作用。但我认为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毛泽东为什么前后有如此的变化，基本的也是根本的还在于他思想深处的东西。他有很多好的思想，比如说主张土改后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要调动农民的两个积极性；要坚持自愿入社原则；通过示范、帮助、教育的办法使农民逐步地从互助组进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用15年或更长的时间实现全国农业合作化；以生产作为检查合作化的标准等等，都是正确的。但他自己又违背了这些。当邓子恢按照这个原则按部就班地安排工作时，他提出了批评。为什么呢？里边是有深层原因的。

我认为，第一，他对中国农民当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估计过高，对改造小农及小农经济的艰巨性估计不足。为

什么会有这样的估计？与他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和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战争的经验有关。他把这两件事情跟改造小农及小农经济同样看待。在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农民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战争和进行土地改革。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土地改革后农民大批参军，争取解放，三大战役一下子就扭转了局势，党在人民中间树立了很高的威信。这使他感觉建国后农民也会很快地跟着党的号召走社会主义的路。他有句话，叫做中国的农民要比西方无产阶级的思想觉悟还高。他没有估计到改造小农和土改与革命战争的根本不同，也没有估计到改变小农经济贫穷落后的状态需要进行长期艰苦的建设与多方面的工作。在夸大农民这一面的同时，他又夸大了农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对富农、富裕中农的发展会造成农村的两极分化很担心，害怕商品经济，害怕出现贫富差距，急于要用合作化的办法来防止这些东西。

第二，他对工农矛盾的认识。他看到了国家工业化和分散的小农经济不能相容这一点。工业化离不开农业提供的食物、原料和资金，但小农经济不能保证有效地提供这些东西。毛泽东想通过实现农业合作化，加上粮食统购统销等政策来实现农村食物、原料市场的计划性，使农业的发展服从工业化的需要。毛泽东看到这个矛盾，重视这个矛盾，想要解决这个矛盾，但他简单化了，想用尽快合作化的办法全部解决矛盾。历史证明他是急躁了。

第三，与当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关。改变农村的小农经济，就割断了城市资本主义和农村小农的联系，孤立了资本主义工商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没有了农村提供的食物、原料和农村市场，就无法生存。事实的发展也是这样。合作化一搞起来，资本主义工商业很快也就实现了全



行业的公私合营。但毛泽东这个步骤迈得过急了。现在看来，有些个体的东西、私有的东西对于调动一些人的积极性是有好处的。特别在农村经济很落后的情况下，应允许公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存在，以便适应各方面的情况，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可惜毛泽东忽略了这一点，急于建立一个全盘干干净净的社会主义。

**访问者：**急于把私有制一下子扭过来，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

**卢文：**毛泽东头脑中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来的。马、恩总结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情况，创立了社会主义理论。它的基本原理是对的。而我国的社会状况，特别是农村情况，和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也认识到这一点，但他想到了另一面。这表现在他说：我国是一穷二白。穷就要革命，白就是一张白纸好写文章。他想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纯粹的公有制，要走一条笔直的道路，一步就迈入社会主义，办法就是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来个大跃进，一下就进入纯粹的社会主义，就像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一样，一下子解决问题。因而在农村中就以大批判开路，掀起合作化高潮，不断实行变革，搞各种运动，想迅速把小农经济变成纯粹公有的发达的农村。他没有估计到中国小农经济落后的现实状况和改变这种状况的长期艰苦的过程，也忽略了列宁讲述的需要经过很多过渡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的话。

**访问者：**结果搞快了，搞急了。毛泽东的思路有时是跳跃性的。他自己定了的，往往又会改变，使别人难以跟上。

**卢文：**是的。邓子恢搞农村工作，接触实际，接触农民，比较了解农村情况。当他按照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作

出的决定按部就班地往前走的时候，毛泽东的思想又已经走到了他的前头了。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争论也是这样。新民主主义要不要巩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多长时间？刘少奇也是按照毛泽东以前的《论联合政府》和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表述的思想提出的，结果这时毛泽东已经走到前面了，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刘少奇就急于跟着赶上去，但在很多地方还跟不上。到了60年代，“文革”开始，刘少奇就被划入了“右”的、“修正主义”的一边。在和邓子恢的争论中，同样也表现出了毛泽东思维的这种跳跃特性。

**访问者：**假如在浙江收缩农业合作社，和毛泽东发生分歧的不是邓子恢，换一个人，争论是不是就不会发生？

**卢文：**换一个人也会发生这种争论。上固也讲了，事情发生的原因更多还是面为毛泽东头脑中对中国社会形势和社会主义的认识。

**访问者：**这次争论毫无疑问是毛泽东赢了。那么作为决策人，作为处在领导地位的毛泽东，他的观点看法肯定要影响到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影响是什么？争论已经过去30多年了，今天回头再看，您怎么评价？

**卢文：**毛泽东赢了这场争论，当时的历史好像也是按照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发展了。他说农民有很高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农民确是敲锣打鼓入社的；他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就要到来，那就真的到来了。几个月的工夫，合作化就在全中国范围内完成了，比预计的提前了11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随着也席卷全国。但是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1978年以后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说明了什么？社会主义的发展是有它自己的规律的，你人为地硬拉它

前进，想走笔直的路，却往往最后要走曲折的道路。

**访问者：**历史的曲折前进，螺旋式上升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卢文：**农业合作化的急速完成无疑对以后中国农村人民公社的很快建立产生了影响。但问题是一步步地暴露出来的。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发展又极不平衡，干部不多，又缺乏管理集体经济的能力和经验。而我们却通过运动一下建立起大规模的、纯粹公有的、高度集中的、靠行政命令行事的、清一色的、“吃大锅饭”的和平均主义的集体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不利于生产要素的很好结合，不利于调动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一种僵化的体制，并没有显出预想中的优越性。加之那时不断地开展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没有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耽误了宝贵的时间，就延缓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邓子恢原想在那种基本体制下找出一种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办法，却又受到了批判。这个问题直到1978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才真正开始得到解决，其中走了20多年曲折反复的道路。

这场争论带来的另一个直接的影响，是把邓子恢批为“右倾机会主义”。邓子恢与毛泽东在发展农业合作社这个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争论的问题也只是工作上的意见不同。毛泽东给他扣上“右倾机会主义”、“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等帽子，这种做法滥用了领袖的威望，损害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当时的批判还株连冤枉了一批同志，也给当时的合作化运动施加了人为的压力。

**访问者：**由争论上升到批判邓子恢为右倾机会主义，它所产生的政治压力是不是当时农业合作化所以能像预想的那

样飞速发展的一个推动力？

**卢文：**农业合作化的迅速发展，有一部分是与农民的思想情绪分不开的。新中国建立不久，群众是十分信赖我们党的。他们从过去的经验中看到共产党所提的东西都是正确的，都是能办到的：共产党说，要打败日本鬼子，就真的打败了日本鬼子；共产党说，打倒蒋介石，就真的打倒了蒋介石；共产党说，要分田给农民，就真的分田给农民了。共产党真是说到做到。这次共产党说合作化好，那加入合作社准没错。这种想法在农民中还是普遍的。但是另一方面，压力的存在是不能否认的。对干部来说，这是一种政治压力；对农民群众来说也是一种强制。干部党员带头敲锣打鼓入社，很多人就只好跟上，即使心中有打算，嘴上也不敢说出来。等到热潮过后，逐渐感觉到合作社不像所说的那样好，如农户的许多东西归到社里，说是折价，其实后来没有完全兑现。在社里，生产没有自主权，生活也不自由，生产和分配也不理想。特别是在困难时期搞得很多人没有饭吃。农民的思想就逐渐发生变化。后来有不少农民要求牵牛退社或搞包产到户，但都被批判压制了下去。

今天回头来看，就这场争论来说，是毛泽东错了，他只考虑到了集体的优越性，忽略了个体的积极性，脱离了中国农村的实际。其实个体积极性也是不可缺少的，没有个体，集体是空的，人的积极性不调动起来，集体的优越性怎么显示出来？邓子恢看到了农村的实际情况，要调动集体和个人两个积极性，他当时探索的方向和路子是对的。这已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的实践所证明。

**访问者：**邓子恢和毛泽东的争论是围绕着农业合作社发展速度展开的，是快或慢的争论。其实，实现合作化是他们

一致的方向，这在今天还应该肯定。几十年来，生产力还是有所发展的。

**卢文：**是这样。互助合作的道路是小农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这是不能否定的。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尽管出现许多失误，但我想起码有这样几个成绩是应该肯定的：第一，现在农村中的乡村合作组织的基础是那时打下的。有些搞得好的单位如北京的窦店、江苏的华西、河南七里营的刘庄等，它们仍坚持统一经营为主。目前全国还有七千个这种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单位。第二，实现了土地公有，消灭了两极分化和剥削的基础。第三，促进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第四，发展了一批乡镇企业，发展了集体的公共财产。第五，保证了几十年城市人民低水平的供给，也保证了国家工业化的需要。第六，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第七，培养了一大批农村干部。总的说那段农业和农村生产还是发展的。所有这些成就不能一概抹杀，要一分为二。我们今天的改革就是继承那一段的积极成果，扬弃不合理的东西，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

**访问者：**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中国农村今天的这种好局面，正是昨天中国历史的继续。如果我们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的路走下去，中国八亿农民的明天会更好。谢谢您今天给我们谈了这些好意见。

1992年4月18日于北京西四

# 访卢之超——

## 探索中的三个突破和三个悲剧

卢之超

卢之超，江苏人，1933年生。曾任《红旗》杂志编辑、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政治组组长、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研究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和党的理论研究工作，发表有关这些方面的论文多篇，主编过几本关于哲学和社会主义的教科书、辞书、文集等。部分论文收入《冷静下来的思索》、《实地上的足迹》两个集子。

卢之超同志很忙，在接受我们的采访当中，还有几拨客人找上门来，最后不得不匆匆结束。这样多的事务缠身，还能抽暇思考毛泽东，真叫人敬佩。当您读了下面的谈话，一定会和我们一样有着同样的感受。

**访问者：**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算起，毛泽东领导中国建设27年，既取得了伟大成绩，也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我们怎样看待这些成绩和教训？

**卢之超：**这个问题我也考虑很久了。虽然从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犯了不少“左”倾错误，但他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一些探索和设想，是很可贵的，至今仍是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从斯大林逝世到“八大”前后，毛泽东确实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弊端，试图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既然是探索，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曲折甚至失误。因此我把这些探索概括为：毛泽东的三大突破和三大悲剧。突破是创造，悲剧是失败。我在这里所说的突破和悲剧是一回事，就是说它是一个问题或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从突破这点看，毛泽东是伟大的，是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创造；但是反过来，从他突破后的发展看，往往又走向失误，或者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的甚至违背了他的初衷，因而不能不认为又是一个悲剧。

**访问者：**这个问题的关节点是不是在这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探索和迷惘、成功和失误往往交织在一起，解开这个谜，就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

**卢之超：**是这样。既然我把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探索概括为三大突破和三大悲剧，就是说主要集中在有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命运的三个重大问题上。下面我分别来谈一谈。

第一个突破，发生在《论十大关系》发表前后。毛泽东突破了苏联经济建设的发展道路和经济体制的束缚，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设想。这个突破是需要有理论勇气的。不光要有深邃的眼光，更需要勇气。现在我们看苏联几十年的经济建设道路和体制模式，问题和教训当然是很清楚了。但在那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从一个沙皇统治下的农业占

很大比重的落后国家，变成了一个在世界上数第二的工业强国，实现了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而且在50年代苏联经济的弊端并没有完全暴露。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表现了他的过人之处，开始认识苏联建设上的一些根本问题，并结合我们的建设实践，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此前对苏联建设中的问题我们也不是一点没有认识，比如农业集体化，我们搞合作化运动时就有所不同，苏联搞农业集体化是很粗暴的，和农民的关系没有搞好，结果是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一直到二次大战结束后，50年代，苏联的农业生产才达到1913年的水平。比较起来，我们搞农业集体化是平稳的，也是成功的，没有对农业生产力造成破坏。现在有些人试图想否定农业集体化而肯定工业化，但在我看来，如果否定了农业集体化也就否定了工业化，因为城里是不生产粮食的。所以，统一起来看待苏联的经济建设道路和模式，要有历史观点。苏联的工业化还是应该肯定的，不管怎么说，斯大林的经济模式在当时国内外形势紧张的情况下，是比较现实的一种选择。问题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斯大林逝世后，仍然没有意识到对这个经济模式应有所改变，而是把这个经济模式凝固化了，如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以及有关的用工制度、分配制度等。从1953年开始我们搞工业化，一开始也是把这一套搬用过来。虽然觉得它有些弊病，并没有完全照搬，但并没有从发展道路和体制上去怀疑和有所突破。

**访问者：**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苏联经济模式的认识才逐渐清晰起来？

**卢之超：**主要是在完成三大改造以后，我们面临一个全新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现在来看，当时毛泽东敢于对斯大林以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为重



点、忽视农业轻工业的做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完全靠计划控制的经济模式提出怀疑，提出不同看法，提出另外的思路，这是很了不起的。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当时急需正确处理的十大关系。提出这十大关系，一方面是从总结我国经验、研究我国建设中的问题提出来的，一方面是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提出来的。“十大关系”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前三条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第四、五条讲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后五条是属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讲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十大关系的提出，标志着党和毛泽东在探索一条和苏联高度集中的把重工业放在最重要地位而忽视农业、轻工业的不同的建设道路，他指出的方向，今天看来也是对的。它又体现出我党比较讲究辩证法，能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和探索新的建设道路。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一个突破。

访问者：您开头说，一个突破，又伴随一个悲剧。这个突破为什么又叫悲剧呢？

卢之超：所谓悲剧，是因为后来出现了1958年的大跃进。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如果发展得正确，是可以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好的前途的。但后来的发展出了偏向，搞了大跃进，造成了经济的大混乱。大跃进的失误，关键在如何依靠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的问题上。不是采用商品经济，尊重经济规律的办法，而是按过去那种战争时期发动群众的办法，不计成本，不顾效率。当然这个问题也包含有大胆的尝试和突破，但后来的实践证明那种方法是不对的，主要是

没有重视经济规律，把过去领导战争的规律机械地移植到搞经济建设上。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没有从实际出发，考虑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和中国经济的落后状况，订了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发展战略也是越来越强调追求速度。

**访问者：**有一次，金冲及和我们谈，他说，他读毛泽东建国后关于经济方面的文稿，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毛泽东有那么高的热情，真心实意想把我们的生产力搞上去，但不懂经济和经济规律，结果是个悲剧。

**卢之超：**毛泽东的认识是受到一些限制，主要是他对现代化的工业不大懂，对商品经济也不大懂，因为他过去接触的多是农村的自然经济和小商品生产的经济形式，虽然对苏联经济体制中的一些问题看到了，仍然没有找到好的办法，只能把自己过去的经验再用起来，恐怕问题出在这里。

**访问者：**这也很自然，因为他想突破，就要考虑过去的经验，当然首先想到的还是自己的经验，过去的经验也不好说一点也不管用，包括生产，延安大生产那一段还是管用的。

**卢之超：**即使是成功的经验，在不同条件下也会有一定的限制。他把这些经验扩大了。当然这里也有客观原因，比如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当时是对立、封锁的局面，朝鲜战争爆发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封锁我们，不可能去吸引外资，去了解、学习西方的情况和经验。当时没有这个条件。

**访问者：**除这些客观原因以外，毛泽东在主观上是不是也有框框？

**卢之超：**框子也是和国际形势连在一起的。其实毛泽东在对外开放这点上历来是很开明的，在建国前他就曾设想将来如何跟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发展经济关系。1949年12

月20日，他在一份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又说：“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但朝鲜战争一打，两个阵营对立，西方包围封锁，根本不是你愿不愿意对外开放、做生意的问题，是人家不跟你干，卡你的脖子。所以，闭关锁国并不是我党历来的政策，经济封锁是人家强加给我们的。

**访问者：**对外开放是有个客观形势问题，但研究资本主义，把它成功的经验吸收一些，我想说的主观上的框子是不是在这里？

**卢之超：**有这个问题，他头脑中确实对现代化大生产不太了鲜，特别是对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了解不够。但在当时这里还是有客观原因，同后来的情况不同。50年代的资本主义并不像现在这样发展，那还是它们倒霉的时候，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倒霉还没有完，比如日本还不如中国的情况好，只是到了60年代发生第三次技术革命，资本主义经济恢复过来了，在生产上、技术上以至管理上才发展了许多新的东西。

所以，大跃进的失误，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没有机会也没有重视学习，结果只能沿用过去的办法，搞出个大跃进。这当然是悲剧，犯了大错误。但人们在分析大跃进的失误时，往往只看到毛泽东异想天开搞出个大跃进，超英赶美，头脑发热的一面，却往往忽视另一面，就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苏联经济体制的弊端提出怀疑，大胆突破，而且在理论上作了阐述。特别他对工业和农业、集体和个人、集中和分散等关系的阐述，从原则上看，直到今天还是正确的。因此我把它看成是个突破。所谓突破，就是创造。创造也就

是开了个门儿，有了个开端，以后的路或许还不太清楚，因此又发生失误。我们现在根据中国情况搞经济建设，搞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从历史渊源看，应该说是从毛泽东开始的探索的继续，包括吸取他失误的教训。目的就是要把僵化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改革掉，改成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适合世界上生产力发展情况所证明了的市场经济体制。当然这种改革不是改成资本主义，仍然是使大多数人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

**访问者：**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第一个突破？

**卢之超：**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突破是提出“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这些问题当然也和苏联有关系，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后，使人们看到斯大林的专横、个人崇拜不仅是思想体制，实际是政治体制，从思想意识形态范畴直到政治范畴，斯大林都是采取了高压政策。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解冻了一批政治历史问题，也包括文学等方面的问题，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无穷地咒骂，谁骂得厉害似乎谁就正确。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比他们想得深、看得远，他首先想到在思想文化领域应当怎么办，提出了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党要领导意识形态以及科学、文学、艺术这些领域，但是这种领导应当同一般的行政领导不一样，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强迫命令的方法，应当允许科学上和文学艺术上的多样性，允许各种观点、流派齐放和争鸣，在相互竞赛和讨论、争论中发展科学和艺术，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要求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但仅有“双百”方针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有人公开出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怎么办？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都一齐进攻，当

然不允许的。不能允许，又要坚持“双百”方针，因此，毛泽东又提出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了这一条，就有了一个标准、一个界限。敌对势力从政治上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是不允许的；而不属于政治上敌对性质的问题，应该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办法，让科学、艺术，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都通过发表、讨论、创作、竞赛等等，并经过实践检验，来判断谁对谁错。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就是没有分清两类矛盾，没有任何界限，把共产党、社会主义说得一塌糊涂，从思想深度讲是很表面的，从后果讲只能把自己搞乱。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再加上区分两类矛盾，就基本上解决了党如何领导意识形态的问题。这些道理直到今天也是对的。

**访问者：**有人写文章说，“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毛泽东早在抗战时期就提出来了。

**卢之超：**抗战时提的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主要是就戏剧讲的，跟后来的“双百”方针有区别，作为政治思想上的一条政策，实际上是从1956年开始提出的，科学上和文学艺术上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党派关系上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到1957年，集中起来讲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实际上包含了“双百”方针。这个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它实际上解决了党对意识形态领导，对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领导，以及整个政治体制、上层建筑如何建设的问题。

现在这问题仍有现实意义，我们要搞改革开放，就要调动和发挥各种积极性，但同时要警惕来自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袭和影响，极少数想要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理论或政治力量，是不能允许的。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实现大

同，哪个国家都要维护自己的统治。但这个范围是很小的，在其他不属于这种性质的更大的范围内，要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允许人家说话的办法，讨论的办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来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逐步达到在重大问题上的思想的一致；与此相适应，在政治上要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扩大统一战线，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允许各种政治力量、各种要求、意见能表达出来。这可以说是整个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问题。所有这些，可以说突破了斯大林的一套，在批评斯大林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访问者：**毛泽东指出的这个方向无疑是对的，但后来为什么又酿成悲剧了呢？

**卢之超：**这个问题更复杂。从历史发展看，出现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反右派运动本身就违背了区分两类矛盾的方针。当时所说的“右派”进攻，不能说没有存心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但那是极少数；很多是属于正确的意见，对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工作的正确批评建议，或者说虽然不正确但属于人民内部的不同看法，应该是通过讨论、批评等办法来解决的。对于当时的形势，党内有不同意见，反映也各种各样；有些知识分子本身也有毛病，越讲越厉害，有很大片面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还有当时的国际形势，波匈事件之后，全世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对国内也有影响。总之情况比较复杂。但不管怎么样，这么大的范围，这么多的人数，一下子都来反对党，这种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受过去长期阶级斗争条件下思维习惯的影响，没有真正贯彻新的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大量的主要的矛盾的新认识。反右派以后，就形成了非常严重的形势，在知识分子中

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不正常局面。不过即使在反右派以后，毛泽东也没有完全改变关于两类矛盾的估计，只不过是认为这是补了思想上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课。

毛泽东本来是有相当民主意识的，但由于长期残酷的战争环境和对敌我矛盾的过分敏感，情况就复杂了。对当时的很多情况估计和处理方针，党内思想也是不统一的，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和人民内部矛盾时，有人就不大同意，后来乱得似乎不可收拾，也为持这种意见的人找到了借口。反右派运动的错误的发生，还有更深的社会历史原因。建国之初，国民经济还没有恢复，共和国的政权还没有巩固，因此不得不加强了控制，各种矛盾都积压着，一旦鸣放，就有可能控制不住。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经济上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比还比较差，群众中还有各种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存在着各种不满情绪，不让讲不行，不加控制也不行。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民主的困难，那时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谁也没有经验。现在也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今后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但不管怎么说，毛泽东的功劳是应该肯定的，他试图改变斯大林那种在意识形态以及在政治生活中不民主、不能团结大多数、不能让大多数人表达意见的情况，这一点无论何时也是对的。

**访问者：**从这两个悲剧看，情况不大一样，第一个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突破，但方法不对，搞了大跃进。

**卢之超：**有一个问题还是引起重视了，就是关于农、轻、重的发展道路问题。大跃进后，接受了教训，对农业还是比较重视的。后来批判包产到户，属于体制方面的问题，从发展战略讲，没有像苏联那样只是畸形地发展重工业。

**访问者：**“双百”方针的提出，初衷还是好的，但从发展

的结果看，也几乎全部否了。

**卢之超：**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有现实意义，这和第一个突破有所不同。那个虽然也可以看作突破，但本身有缺陷，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上有很多问题没弄清楚，比如关于商品经济、关于价值规律的作用，都不甚清楚。第二个突破可以说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到现在看还是非常好的，“双百”方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现在还是要坚持。对我们今后搞政治体制改革，仍然有指导的作用。

**访问者：**这是第二个突破，同时又包含有悲剧。那么第三个突破呢？

**卢之超：**第三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一直考虑的如何使我们的党、我们的领导人，在执政的条件下不脱离群众，始终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个问题，毛泽东从建国前的七届二中全会就开始考虑，到50年代60年代不断提，他是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的。也是在1956年和1957年之交，他在考虑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就考虑到党的建设、党和群众的关系。因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以后，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又大量地存在于群众和领导之间。共产党是作为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直接管理着经济文化事业，所以要解决党同群众的关系问题。1957年春天开始整党，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就是为了使党不脱离群众。虽然后来出现了复杂形势和反右的扩大化，但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以后，无论如何要表示自己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利益，不脱离群众，不能变成官僚主义者，这在毛泽东那里始终是保持警惕的。这确实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根本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没有领导力量不行，但领导力量如果不代表人民利益和社会主义方向了，也



不行。现在看，他的一些具体说法不完全对，甚至于到“文革”前他提的一些过头的甚至完全错误的观点，如共产党里有人已经成为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这话说得太过了，而且也不符合当时的情况。但这种警惕他一直是有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提了不少办法，搞了不少运动，如整党、“四清”，甚至最后搞“文革”，许多是“左”的，“文革”更是完全搞错了。但从一个理想主义的角度讲，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想保持共产党的纯洁性和保持党与群众的关系。关于不脱离群众的问题，防止领导干部蜕化变质的问题，列宁、斯大林虽然也讲过，但没有毛泽东那么重视，从取得政权开始就一直强调，50年代60年代反复强调这一点，大概也是吸取了苏联的教训吧。苏联党脱离群众是很严重的，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看得更清楚了。

**访问者：**抗战初期，解放战争初期，建国初期毛泽东都比较集中讲这个问题，建国后他更是不断提醒这个问题。

**卢之超：**这个问题不只是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掌握一定的权力，各方面条件都比群众优越一点的问题，是关系到执政党变不变颜色、蜕化不蜕化的大问题。党从一个被压迫的党变成执政党以后，客观条件会发生一些变化，做了领导，考虑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自己的利益、思想感情以及整个行为会自党不自党地和群众不一样，如果不注意，脱离群众也会越来越远。这个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把握得好，不会出大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矛盾有可能发生激化，根本不代表群众利益，整个思想感情严重脱离群众。

**访问者：**毛泽东提出哪些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卢之超：**他提出了一些观点和办法，比如吸收群众参加整党，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进行整风，强调干部

参加劳动，两参一改三结合，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等等。为什么后来他赞扬供给制、搞平均主义，包括军队中不搞军衔制，也是要求在生活上大体平均，干部的待遇跟工农差距不要太大，领导层不要太特殊。后来又提出接班人的条件，提出反对“和平演变”等等。这方面提出的观点和办法不少，也比较复杂。有的正确，有的错误；有的作为原则是正确的，实践中搞错了，需要认真分析。但是，我认为他把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保持党和人民的联系当作能不能保持住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的关键，并不断力图加以解决，是很值得注意的。这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突破。为什么又没搞好，以至造成悲剧呢？是因为他搞来搞去，始终没有把党的建设与发展经济这个中心任务的关系摆对，同时又没有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找到一个错误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斗“走资派”，最后搞成“文化大革命”，这是最大的一个悲剧。

**访问者：**使党不脱离群众，这是他考虑的根本问题，但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办法来解决，原因是什么呢？

**卢之超：**没解决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方法不对，一个是把问题孤立起来，变成阶级斗争为纲。把经济建设的任务放在一边，离开经济建设，离开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的生活，离开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而去专门抓党的纯洁性问题，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后来把这个问题与党内的意见分歧搅和到一起，无限上纲地搞党内斗争，更把问题搞乱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把这个问题纠正过来，就是说，不能孤立地强调党不能脱离群众，一定要在紧紧抓住生产力不放的前提下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因为群众最关心的还是生产发展不发展，生活能不能改善。

**访问者：**首先要给群众带来好处。

**卢之超：**所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对的，在这个前提下，再去解决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党群关系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党内有腐败现象也确实存在，我们的经济还比较落后，物质还不丰富。掌权了，个别人有可能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很容易想为自己捞点好处，捞多了群众中就有反映，而且会使一些党员、党的干部蜕化变质。所以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一定要解决的。从毛泽东当时考虑问题的思路看，他也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但他的方法不对。邓小平同志看待这个问题就不一样，他强调要靠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当然，这方面现实的问题还不少，也是今后的一个难点，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and 解决。

**访问者：**你说的三个突破和三个悲剧，基本意思和内容是这些了？

**卢之超：**我初步的考虑是这样。总之我认为要重视这三个问题。三个问题都可以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和社会主义的体制上，这也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考虑的根本问题。毛泽东的这些突破是有很大贡献的，他的失误也确实是悲剧。但是无论是贡献也罢，教训也罢，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性，仍然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and 解决，因而毛泽东的理论创造、实践经验，以及他在探索中造成失误的教训，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在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在经济文化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虽然不能搞多元化，但一定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和方法，承认利益是多样性的，在长时期内不可能追求所谓高级的单纯的形式；与此相适应，各方面的意见也一定是多样性的，不可能要求在初级阶段大家都有一样的觉悟，必须容纳各种意见、各

种利益。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要抓住经济建设的中心，使国家经过较长期的建设逐步富裕繁荣起来，就需要一个保持先进性质的团结战斗的党。只要党保持清醒，保持工人阶级的性质，时刻与最大多数人民保持密切联系，不论以后发生什么情况，都不用害怕。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一定大有前途的。

1993年1月6日于北京

## 访林蕴晖——

### 探索社会主义， 毛泽东的成与失

林蕴晖

林蕴晖，1932年生，江苏丹阳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7年军事学院政治系毕业。现任国防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参加编写《中国共产党六十年》、《怎样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合著《凯歌行进的时期》，主编有《四十年战略演变》等。

探讨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今的一个热点话题，林教授自己也说，他早就想找个机会，凑几个志同道合者，在一起切磋切磋了。因此，我们用了一个晚上，完成了下面一篇谈话。

**访问者：**我们想请您谈谈1956年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经验教训。

**林蕴晖：**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问题。从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存在的弊端的认识来说，在我们党的领导人当中，毛泽东是比较早的一个。他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讲话中，就明确提出要吸取苏联

的经验教训，探索一条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且提出了很多重要原则、方针、政策。无论在当时或今天来看，都是很深刻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1957年6月在评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指出：“这篇讲话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影响可能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来得大。因为毛泽东的讲话完全是在积极地提出新的思想和政策，而赫鲁晓夫主要是在消极地贬斥过去。”如果从1956年前后，由纠正斯大林的错误而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革来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在不少重要领域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访问者：既然这样，为什么毛泽东提出了那么深刻的见解，可后来并没有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反而走到“文化大革命”这样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相反的路上去了呢？

林蕴晖：这有多方面的原因。重要原因之一，是对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从总体上还缺乏认识。

访问者：那就请您谈谈毛泽东对斯大林模式的认识。

林蕴晖：我认为，1956年前后，毛泽东并不认为斯大林模式的总体框架有什么问题，只是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具体方针、政策上有缺点错误。如：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把农民挖得很苦；权力过分集中等等。因此，毛泽东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基本上还是在斯大林模式的总体框架中起步的，没有跳出或突破这个框架。后来我们同赫鲁晓夫发生争论，在批评赫鲁晓夫全而否定斯大林的时候，我们正确地维护了斯大林的历史地位，但同时也维护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在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如果说这时毛泽东还认为斯大林模式有弊端的话，那就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还不干净，他实行的“高薪制度”，还可

以滋生出“新的资产阶级”。这就是后来毛泽东要通过“文化大革命”建设一个“纯洁”、“完美”的社会主义的由来。

**访问者：**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究竟如何看待斯大林模式？毛泽东在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上是怎么看的？他对斯大林模式本身触及到的深度如何？

**林蕴晖：**我的看法是，从斯大林所论述的社会主义来讲，主要有四点：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集体所有制要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是斯大林的一个基本理论。二是统一的中央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三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商品生产只限于消费领域，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生产中不起调节作用。四是社会主义越深入阶级斗争越尖锐。这是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斯大林领导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特征。

毛泽东在我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已开始觉察到建立完全的单一公有制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因此，他在八大前后曾经提出可以允许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可以允许地下工厂合法化等等。甚至说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样使人振聋发聩、耳目一新的话。应该说，当时把这个问题说得这么透彻，这么深刻，是一般人所不能达到的。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终究是即席讲话，没有在理论上进一步论证，既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要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那么现在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又要允许私有经济以至于资本主义存在，并要它来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呢？理论如果不加以说明，实践必然要发生动摇。

**访问者：**这就是他的正确思想未能贯彻到底的原因。

**林蕴晖：**是这样的。事实上从整个观念来讲，毛泽东还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不能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的，二者是不相容的，没有摆脱这个框框，当时也不可能摆脱。

**访问者：**需要个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补充这一思想是八大时陈云提出的，当时毛泽东同意这个看法，后来的具体情况怎样？

**林蕴晖：**毛泽东当时尽管同意了，但党内的看法并不统一，也没有从理论上进一步解决问题。早在1956年底，党内就有人惊呼“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又要泛滥了”！经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开展的两条道路大辩论，到1958年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汉口会议、成都会议，终于又决定农村由小社并大社，缩减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城市则强调继续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正是理论上没有突破社会主义是单一公有制这个总体观念的反映。

60年代初的调整，人民公社比较突出的就是把基本核算单位退到以生产队为基础，重新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明确我国的手工业应该有三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商品流通有三条渠道：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农村集市贸易。但在理论观念上，同样没有改变。如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仍肯定1958年人民公社决议中由队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再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是正确的（只不过规定的时间短了一点）。于是，后来又强调由小集体过渡到大集体，不断割“资本主义尾巴”。总之，社会主义只能是单一公有制，毛泽东和斯大林在认识上是基本一致的。

**访问者：**在计划经济问题上，毛泽东是怎么看的？



**林蕴晖：**在经济的计划管理体制方面，毛泽东提出了一些很好很重要的思想。《论十大关系》提出两个积极性还是一个积极性的问题，也明确提出要给企业和生产单位以自主权，并强调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这些都涉及到管理体制问题，是很重要的。毛泽东当时提出处理好这些关系，是针对苏联完全由中央集权这个弊端提出来的，很中肯，也很深刻。但仅从行政权力的区分上提出统和分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总是在统和分的框框里打转。即：统死了就分，分了又乱，乱了又统，统了又死。可见，仅从权力分配上提出和解决问题是达不到目的的。和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困难时期，毛泽东虽然主张人民公社退到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但他绝不允许搞包产到户，认为这是分田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说明当时把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具体管理体制看成是一回事，只有统一经营才姓“社”，个体经营就姓“资”。

**访问者：**在所有制问题和计划经济体制问题上，看来毛泽东还没有突破斯大林的框框，那么在商品经济问题上，毛泽东曾提出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如不要剥夺农民等等，是不是比斯大林前进了呢？

**林蕴晖：**毛泽东鉴于大跃进中共产风的教训，重新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并说“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在这个问题上，有的学者说，毛泽东除了赞同斯大林不能把商品生产简单地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的思想外，还明确提出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由此断言：从对商品生产的历史作用的认识来看，毛泽东比斯大林“前进了一大步”。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作全面分析。毛泽东使用过“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但这是否意味着他对商品生产历史作用的

认识比斯大林前进了，还要看他对商品生产历史作用的具体阐述。从现在能见到的材料看，毛泽东在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还必须发展而不是废除商品生产时，指出最根本的理由，是还存在着集体和全民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国家对农民不能剥夺。这说明就对商品作用的认识而言，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斯大林的水平。而且他在一次引用斯大林强调要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话以后，接着又说：“那么，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它，过去的资本主义的鬼已经吃掉了，将来再出现资本主义的鬼，就再吃掉它。”这明显地反映出毛泽东仍然是把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的。资本主义的鬼哪里来的？还是商品生产中出来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后来把资产阶级法权作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也就可以理解了。另外，毛泽东在谈到商品生产的目的是说，我们发展商品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试问，如果商品生产不讲成本、价格和利润，还谈什么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就这一点而言，毛泽东还不及斯大林，斯大林还比较强调经济核算。

从以上几个侧面可以看出，毛泽东尽管很敏锐地察觉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弊端，并据此提出了很多好的见解，但并没有真正从理论上认识到斯大林社会主义总体模式的缺陷。说来也不奇怪，因为这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观点是吻合的。如果动了这些基本的东西，似乎也就否定了社会主义“基本原理”。

**访问者：**看来，这种理论和认识的局限，并不只是毛泽东个人。

**林蕴晖：**是的。所以到60年代同赫鲁晓夫争论时，我们就把苏联包括东欧对斯大林体制进行的一些改革，当作是

“修正主义”加以反对。

访问者：这个问题可能还要早一点，在 50 年代初的南斯拉夫问题上就开始了。

林蕴晖：对。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在纠正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错误时，我们曾同意了。但到 60 年代同赫鲁晓夫发生争论时，把南斯拉夫的问题又提了出来。1963 年 9 月发表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可以说是用斯大林模式作为裁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范例。可见，我们是走了一条由吸取斯大林错误的教训，转向维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的路。不仅没有从这个模式中突破出来，而且沿着这条路走得更远。

现在看来，这种把社会主义看成只有一种固定模式的理论观念，是建国以后党内斗争越斗越“左”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农业合作化中的“右倾”、“三自一包”到后来提出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无一不是把与这种传统模式不一致的党内意见，看成是不搞社会主义，而在搞资本主义；不搞马克思主义，而是搞修正主义。当把党内在搞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不同主张，看成是姓“社”、姓“资”、姓“马”、姓“修”的问题时，斗争就必然成为不可调和，于是要把姓“资”、姓“修”的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也就势在必行，理所当然了。

最近小平同志讲，“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这一点确实高明。三中全会以后，如果搞姓“社”、姓“资”的争论，第一耽误时间，第二必然把问题引导到政治争论上去。这是历史的教训啊！本来从毛的思想作风来讲，他是

注意吸取斯大林搞个人专断的教训的，但后来也走了这条路，其原因，就是把不同意见提到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高度，这样，其他一切制度规定、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等等，都成了次要问题了，政治方向才是第一位的。

**访问者：**不搞争论是非常现实的，但是不是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没有区分的必要呢？

**林蕴晖：**问题的实质在于标准。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一条是实事求是。我们今天坚持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述作为尺度，也不能把苏联模式作为尺度，更不能把我们60年代“反修”斗争中的观点作为尺度。因此，如果不更新观念，我们走了多少年的路还要走回去。所以，进一步深入研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有很重大的现实意义，对于澄清思想上长期影响着我们的糊涂观念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仅仅把毛泽东当年说过的话，简单地指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还不足以使我们看到毛泽东的思想的整体，还是一些平面的直线的东西，为什么对，为什么错，对到什么程度，错到什么程度，要放在一起看，才能把握住问题的“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说，这同毛泽东在1956年以后20年探索过程中正确的和错误的思想都有联系，是对毛泽东正确和错误思想进行扬弃的结果。有的同志偏重强调继承毛泽东的正确方面。实际上，不是直接的继承。离开了对错误的否定，正确的东西也没法继承下来。我这里谈的，不是说50年代中期开始的探索，毛泽东没有提出什么新思想，而只是说明在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上，毛泽东没有突破斯大林的框架。

**访问者：**在您看来，毛泽东虽然经过艰辛的探索，但最终仍然没有摆脱斯大林的模式。您能不能谈一谈，为什么没有能

摆脱这种模式？

**林蕴晖：**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历史的局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但工人阶级却是首先在落后国家取得了胜利。这就涉及落后国家怎样超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讲到这个问题时曾经设想，如果前资本主义国家，在获得了一定的历史条件，比如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了胜利，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已经做出了榜样，同时能给落后国家以物质支援，在有了这些条件时，处在前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民可以大大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并没有争取到这个条件，因此列宁去世后发生了一场在一国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争论。斯大林坚持可以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他在实践中首先消灭了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消灭了剥削和阶级，虽然还不是像马克思所设想的没有商品，没有货币，完全由国家组织生产、组织分配，但是建立了由中央计划统一管理经济的体制。从基本内容来讲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在实践中，以较短的时间实现了工业化，打败了法西斯德国，也显示了它的优越性。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从学习《共产党宣言》接受马克思主义以来，对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理解的。所以后来就把苏联的社会主义看成是全世界“一个完全的典型”。这不仅仅是毛泽东，整个一代人都是如此。应该承认是有客观原因的。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这种实践，在矛盾还未充分暴露以前，人们的认识要从原来的框框里突破出来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

**访问者：**我想毛泽东个人的经历、经验，对他的社会主义探索也是有影响的。

林蕴晖：逢先知写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有一段分析毛泽东的话说得很好。他说，毛泽东不是不主张发展生产力，但更多的是考虑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如果这两方面发生矛盾，他更多的是倾向于后者。这个情况和毛泽东的个人经历以及中国革命的历史有关。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农民占绝大多数，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对革命队伍的团结，党和群众的团结，组成一个强大的力量，夺取政权是起了巨大作用的。几十年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以及由此形成的作风，不能不对毛泽东包括他们那一代人发生影响。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这在毛泽东身上确实是印象深刻的。回过头来，我们研究一下建国初期贯彻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过程中，为什么出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我认为，无论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还是他对山西省委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建议的批评，都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也符合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但毛反过来认为刘少奇是思想右倾，给予了严厉批评。说明他们看问题的视角不同。毛泽东之所以发生这个变化，主要是着眼于防止在农村土改后出现两极分化。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也是为了追求很快地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以至于消灭差别。结果是事与愿违。根据某些历史事实，有的学者讲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农业社会主义，国外有人说是乌托邦，是民粹主义，这显然是一种轻率的武断。应该承认，毛泽东的思想，总体上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样也应该承认，由于在实践中，他离开发展生产力去片面地追求社会公正，这样，他的思想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某种空想。

1992年3月27日于解放军原政治学院

## 访李越然——

### 毛泽东说，涉及主权 的问题不能谈

李越然

李越然，1927年生，黑龙江人。1946年从苏联学习回国。1948年在中苏友协工作，不久转至东北铁道部部长室任翻译。建国后到北京，至1965年，为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外事活动及各种重要会谈、国际会议做译员，并长期参加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文献的中俄文翻译、审订工作。发表过若干译学论文及文学翻译作品。曾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兼中国译协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顾问等职。

眼下，他似乎更忙了。忙里偷闲，约上一次访谈，也是匆匆来去。就连我们的这篇文字整理稿，也是通过电话定稿的。

**访问者：**您在毛泽东身边做翻译工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李越然：**从1949年8月，当时我22岁。那一次，毛泽东接见在沈阳铁路局工作的苏联职工和家属。记得是一天的下午，我们一行来到中南海，等待着毛主席的接见。大概是下午三点钟，毛主席从勤政殿北面的旁门进来。他同我握手时问道：“你这个小鬼是干什么工作的呀？”当时我又激动又紧张，竟然说不出话来了。站在一旁的沈阳铁路局副局长王学文同志忙替我回答：“他是翻译，同时在我们铁路局做秘书。”主席微笑着：“噢！翻译，那好啊，请你告诉苏联同志，我们很感谢，他们一路上辛苦了。”这是一句普通的寒暄语，可对我来说却是一次考试。“辛苦了”，如果翻译不好，在俄文上会被理解为“你们累了”，这样就不确切了。当时我译成“谢谢你们的服务和劳动”后，苏联朋友很高兴，忙说：“感谢毛主席接见我们，我们在火车上做了点工作是应该的。”然后毛主席和苏联朋友作了亲切的交谈。这次工作以后，我就从沈阳铁路局调到北京，被派在苏联顾问团工作。

**访问者：**您给毛主席做了多年的翻译工作，他留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李越然：**从1949年8月第一次给毛主席做翻译起，一直到60年代初，十几年时间，我对毛主席的了解只是一个历史画卷的局部，但既然为他老人家做翻译，就必然会多方面地去熟悉他，注意他的思想、他的作风、他的言行表现的特色，甚至他使用语言的特点。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毛泽东既伟大又平凡，他的伟大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他的平凡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因此我叫做：伟人身上的平凡，平凡中的伟大。我举个例子：1957年，毛泽东准备去苏联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组织上确定我跟随毛主席访苏，担任翻译。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外交活动。为了让我更好地完成翻译任务，



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安排我在中南海直接接触毛主席，熟悉他老人家的言谈特色和日常生活习惯。记得有一天，毛主席带着思考问题的神色漫步走了一会儿，侧脸望我一眼，问：“李银桥呢？”“我在这儿。”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闻声跑上来，主席站住脚，指着我和李银桥说：“你们这二李，一个管说话，一个管安全，这次跟我一道出去，我看你们俩也算得上哼哈二将了。”我和李银桥都笑了。主席又对我说：“今年五月伏老（指伏罗希洛夫）来的时候，我看到大半个翻译都是你，你帮了我好多忙啊。”我赶紧说：“主席，这是我应该做的，只是水平还不够。”他说：“你看，我说的许多事，如果你翻译不过去，那伏老也不能理解，而伏老究竟什么心情，你不翻给我，我也不知道，可不是你帮了我的大忙了！”我听了非常感动。毛主席就是这样的人，他不仅心里装着世界大事，还装着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的工作。

毛泽东的伟大是连外国人甚至我们的敌人也承认的，更难得的是这样一个伟人又非常平凡。我们一般人具有的喜怒哀乐他都有。他平时一般是不发脾气的，偶尔发脾气都是遇到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就生活而言，他发脾气都是为睡觉惊醒了他，但过后又做工作，说：“你们别生气，我能睡下去很不容易，刚睡着了，又把我搞醒，实在烦心。”但有特别重要的事叫醒他，他是绝对不发火的。在生活上，他的俭朴是出乎人们的想象的。比如，1949年8月我第一次见到他，看他穿的皮鞋，是那时北京刚兴的那种橡胶底的皮鞋，一直到1957年去莫斯科开各国共产党大会，还穿那双皮鞋。那时出国也讲置装，大家忙活要给他做衣服，他高低不同意，费了好大劲才做了一套衣服。吃饭也非常简单。在莫斯科时，克里姆林宫里什么最好吃的都拿出来招待主席，但他吃得不多，

主要还是按自己的习惯吃辣子、火腿、鱼、米饭、小米粥。实际上那些好吃的大部分让我们工作人员分享了。

**访问者：**在平凡而伟大的毛泽东身上，您认为最突出的是什么？

**李越然：**第一条，他随时想着人民，随时想着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他探讨每一个问题都是从人民利益出发的。三年困难时期，他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并坚持和身边工作人员一样，吃粮不超过定量。他对工作人员说：你们想过没有，在这么困难时期，全国老百姓吃什么？照理说我们要吃一点也没什么困难，但这样行吗？全国人民这么困难，我们吃着舒服吗？人民的困难怎么解决，我们还没有找到好的办法，当然天灾是一条，那么我们自己的工作有什么不足啊？在国家最困难的日子里，他曾七个月没吃过一口他最喜欢的红烧肉。有一次，他对我说：你们是做翻译工作的，但做翻译不能光懂语言，还要学政治，学经济，要懂得人，要了解人的心理状态，否则翻译工作也做不好。

第二是中华民族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首先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他不是照搬苏联现成的经验，而敢于向苏联、斯大林提出自己的意见，斯大林也钦佩毛泽东这一点。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因为毛泽东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屈服于外部的压力，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我党同其他党相比最突出的一条。到1957年莫斯科全世界共产党大会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可以说给予了适度的支持，使会议开得很成功，但也有过相应的批评。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搞共同舰队和长波无线电台，这看来似乎是一件具体事，但毛泽东在这件事情上表现了他革命家的远见和维护中华民族主权的大无畏精神。

事情是这样的：1957年莫斯科会议之后，两国关系发展得不错，经济、贸易和文化合作都在发展，军事合作也谈过，也准备搞些合作。大概赫鲁晓夫觉得两国关系发展很好，就提出了搞一个长波无线电台，并联合成立一个共同舰队。提出这两个问题，是先由当时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向毛泽东提出的，说是为了防御美国的第七舰队，希望同中国方面搞这两个项目。毛主席听尤金讲完后，问这是什么意思，尤金也说不清楚，答应说回去向赫鲁晓夫汇报，于是赫在1958年7月31日秘密来中国。

赫要来，阎明复给我打电话（我当时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毛主席有外事活动，一般由我和阎明复担任翻译），说主任让你赶紧过来。主任就是杨尚昆同志。我过去后，杨主任对我说，明天赫鲁晓夫就要来，你们准备一下。并说了一些注意事项。

赫鲁晓夫的专机降落在南苑机场，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都去接了，但能感觉到气氛有些紧张。赫下飞机后就在飞机场休息一下。还有一段插曲，刘少奇和赫鲁晓夫谈话说：我们现在大跃进（正是浮夸风的时候），粮食产量特别多，现在发愁的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粮食多了怎么办。赫很轻松地一笑，“那不要紧，你粮食多了给我们。”

**访问者：**毛主席同赫鲁晓夫的会谈是在什么地方？

**李越然：**在颐年堂，当时参加会谈的还有邓小平，苏方还有费德林。首先毛主席表示欢迎，然后说，尤金大使向我讲了你们的想法，这是怎么回事？赫鲁晓夫显得很轻松的样子大谈起来，说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为了对付美国的第七舰队，我们提议搞一个共同舰队；另外我们潜艇为了联络，需要借中国的力量，搞一个长波电台，也可以共同使用。赫说

得很起劲，这时毛主席憋不住，火了，站起来指着赫鲁晓夫说：“你讲了大半天，我也听了大半天，说了许多话你还没有进入正题。我问你，什么叫共同舰队？”气氛一下子很紧张，赫说：“共同舰队就是跟你们一块共同商量商量。”主席说：“还是不切题，什么叫共同？你是不是想把我们沿海都拿过去？那好，统统拿去好了。”赫说，我们商量商量嘛。毛主席很干脆地说，涉及主权的问题根本不能谈，共同舰队怎么指挥？

**访问者：**当时情况，赫鲁晓夫很尴尬吧？

**李越然：**相当尴尬。这就是毛泽东的伟大。1957年他支持了赫鲁晓夫是出于全局的考虑，一旦涉及中华民族的主权，有损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丝毫不让的。我们中华民族被帝国主义奴役了几百年，我们知道被别人支配、受人欺负的滋味。所以说毛泽东的伟大是其他人难比的。

**访问者：**第二天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在游泳池继续谈，又发生什么事情没有？

**李越然：**事倒没有发生什么，就是有点争吵，主要是关于斯大林的问题。赫鲁晓夫讲，原来你们是支持我们的，现在好像不大支持了，好像是向我们的后院抛石头。主席说，不对，实际是抛了一把金子。赫说，别人的金子我不要。毛主席说，你要不要是一回事，我要助你一臂之力，因为毕竟在我们共产党国家里你们是头一家。

**访问者：**有种看法，毛泽东在游泳池接见国家元首，是否不太礼貌。

**李越然：**我不这么看。毛泽东就是这样，他并不一定是有意的，他不大管外交礼节，很随便。说到游泳就更有意思了，赫鲁晓夫是没法和毛泽东比的，毛主席一下水，真是如鱼得水，而赫鲁晓夫只是戴着救生圈扑腾两下。

**访问者：**还有人议论，说毛泽东建国后只读古书。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越然：**这种议论我也听到过，无非是说毛泽东对西方世界不熟悉。这是不对的。我亲身感受到，他对世界各地的情况是相当关心的，而且就他的愿望，非常想自己出去看看。他多次给我们讲：我很想出去看看，但是我毛泽东今天处在这么个状况，是无法实行的。因此我非常主张少奇、恩来、小平同志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多了解外界的情况，不要光呆在自己的国家里。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像美国、法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有谁能够邀请毛泽东？这是个很客观很现实的事情。所以对那种说毛泽东不了解外国情况的说法，我是不赞同的。我就多次亲耳听到毛泽东讲这个问题，而且显得很迫切。

不仅如此，他为了能直接阅读西方的原文报刊，特意请了英文教员，其中就有林克同志，我亲眼见到他抓紧时间学英语的情形。那么他学习英语是为了什么呢？我看他不是为了讲外语，他学习外文就是为了直接阅读西方的书报。老人家经过努力，到晚年基本达到能阅读英文报刊的程度。他还利用一切机会了解西方的情况。举个例子，还是1957年在莫斯科时一次一块吃饭，他问浦寿昌博士（曾在美国学经济学，后来担任副外长）：你是学经济的，你能不能把美国的经济情况给我谈一谈，它过去怎样，现在怎样，你是怎么分析的。浦寿昌同志给他讲了美国经济的一些情况，毛主席表示很满意。他是通过各种方式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

毛泽东有个特点，非常爱跟别人交谈，特别是对他周围的工作人员，常常给你出些题目，请你回答。他不喜欢八股调，常说，说错了不怕，但你讲话要有自己的观点，一个人

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思想，究竟你怎么想的，把你的观点你的看法讲出来，哪怕还很不成熟，甚至不对也没关系，总是你的看法。他很愿意和这样的人谈话。如说了一通，什么意思也没有，净是顺着他说些应付性的话，他就很反感。1957年到莫斯科时，赫鲁晓夫来机场接他，毛泽东、赫鲁晓夫，还有我和李银桥坐一辆宽大的“吉斯”车，我当翻译。他问赫，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到了没有？赫说到了。毛主席特别问了一下“铁托到了没有”，赫鲁晓夫说：“还没到，我们给他发了请帖，希望他能到，他不来就是他失礼，他要来我们正好批评他一下。”毛主席听后不同意，说：“铁托不来，一定有他不来的理由，你要知道斯大林整人整得够苦的，把人家开除出情报局，人家能没气吗？他来了更好，不来要理解人家。”然后又问，如铁托不来谁来呢？赫说，卡德尔来，他是南斯拉夫的笔杆子，南共中央的重要文件大都出自此人之手。毛主席说，我一定要见他，看看他有什么想法。光从外界评论南斯拉夫不行，情况究竟怎样，我很希望他和我讲一讲，他们搞的那个自治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都说明毛主席想尽一切办法，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去了解外界的情况，学习和借鉴他国的经验，并不像一些人说的那样只读中国的古书。古书当然也是读的，我们中国的当代人有谁读古书能达到他那个水平？他是一个手不释卷的人，很少看到他不看书。他读书非常仔细，手里拿支铅笔连圈带画，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但他不仅读古书，也读西方书、现代书。

1992年6月14日于北京水碓西里

## 访邓力群——

###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前后

邓力群

邓力群，1915年生，湖南桂东人。1935年参加革命。建国前曾任延安马列学院教育处处长，中央政治研究室组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1949年后，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书记处办公室组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1975年后，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部长。1982年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0年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邓力群同志同毛泽东有着较多的接触，又是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可谓权威人物。名人学者谈毛泽东，缺了邓老一直是我们的憾事。此次本书出版，我们有了这篇谈话，也算了了一桩心愿。

## 1960 年底、1961 年初，毛泽东对 “左”的认识比较清楚了

**访问者：**我们常常想，“大跃进”的失误，对毛泽东的后半生影响非常之大。他是什么时候发现了“大跃进”的错误呢？

**邓力群：**实际上是在 1958 年末，毛主席开始看出了问题，所以有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纠“左”，1959 年初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纠“左”，1959 年 7 月，“庐山会议”前期的继续纠“左”。你们知道，庐山会议后期，由于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又打断了纠“左”的进程，不仅如此，把批彭的文件一级一级地往下传达，全国各级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就更“左”了。

**访问者：**各级干部不敢吭声了，所以越末越“左”。

**邓力群：**各地“左”的错误也不平衡，相比之下，有的地区稍好一点，有的地区很严重。像河南、安徽、甘肃、青海等省的一些地方，就如火上加油，越末越“左”了。到 1959 年末，河南、安徽的问题开始暴露，可是还没有反映到中央，也没有反映到毛刘周邓他们的耳朵里。

**访问者：**当时的毛泽东对中国的经济形势好像是还比较乐观，1960 年 1 月，他还说：“看来，连续大跃进是可能的。”一直到 3 月他还说，“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

**邓力群：**1959 年 12 月，我们几个人正陪同毛主席读书，那时毛主席的心情好像没有什么着急的事情，那些事情还没有反应到他那个层次。到 1960 年的春天，“信阳事件”就暴露了。群众未信，人民未访，上告的人越来越多，反映的问题越末越严重。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



人之一)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讲: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访问者:**这些情况毛泽东知道了,他的反应是什么?

**邓力群:**事情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这些骇人听闻的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简直令人不可想象,唯一的解释是地主、富农趁机进行阶级报复。1960年春,中央发了一个文件,要在那类地区进行“民主革命补课”。

**访问者:**毛泽东的这种反应,仅仅是他一个人呢,还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邓力群:**应该说,有相当的普遍性。少奇同志也指示钱瑛大姐去调查,也说性质属于阶级敌人报复。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是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同志说,问题这么严重,究竟怎么样?他亲自到信阳考察,结果发现是省委主要领导人及基层干部的错误引起的。从这时起,中央开始感觉到农村的问题并不简单,而且严重。与此同时,暴露这种问题的地区也越来越多。中央这才认识到,根本问题是“左”。

**访问者:**反应慢了。

**邓力群:**1960年夏,中央采取了行动,周总理、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提出了对经济工作进行调整的八字方针,把一切不合实际的经济指标退下来,毛主席批准了。因为农村的问题最先暴露出来,毛主席要周总理主持起草一个农村整风整社的文件,后来叫做“农村十二条”。这个文件的下达,是中央大幅度调整农村政策以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开始。

**访问者:**这个文件是以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的形式下发的。重点是反对共产风,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强调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毛泽东多次修改,很重视。

**邓力群：**“农村十二条”是1960年11月3日下发的，很快就有了一些好的效果。但反映农村严峻形势的材料也大批地上来了。到了1960年底、1961年初，毛主席对“左”的情况的认识就比较清楚了，已经意识到，农村的问题，不认真对待不行了。

##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访问者：**此时的毛泽东心情好像比较沉重，似被一种苍凉无奈的感觉所笼罩。他在给身边工作人员的信中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这一小段话和他以前的文稿摆在一起有点不太协调。以前的毛，有着一种势不可挡、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但在这里就比较悲凉了。

**邓力群：**所以，他开始不断地进行自我批评。他经过反复思考，觉得这几年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党对下边的情况不摆底了，我们对农村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和了解。1961年初，他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全党要来一个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一个调查年。他并且讲，我自己也要亲自调查。于是，他组织了三个调查组，陈伯达一个组，跟他一起到广州；胡乔木一个组到湖南，田家英一个组到浙江、安徽。我是跟陈伯达到广州做调查工作的。

**访问者：**据我们所知，这个时候，中央领导同志对形势的认识还不太一致，有的同志认为，情况在好转，有了“十二条”就够了，还搞什么调查，还搞什么新的章程干什么。

**邓力群：**这种意见是有的，毛主席没有接受。事实上，我

们到广州一调查，马上证明，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光有“十二条”是不行的，还要进一步了解，进一步补充新的规定。

**访问者：**广州提供了什么情况？

**邓力群：**我们到广州时，恰好遇上广东省委召开五级干部会，检查、讨论执行“农村十二条”的情况。大家都说，有了“十二条”以后，情况大为好转，一致认为，只要认真贯彻“十二条”就行了，农村的问题就解决了。只有一个公社书记不以为然，他大会也好，小会也好，都坚持说：“农村十二条”解决了从上而下刮“共产风”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刮“共产风”的问题。无论大家怎么批他，驳他，他都不退却。一个人，孤立啊，很有一股反潮流的精神。

**访问者：**坚持真理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

**邓力群：**我们了解了这个情况，就找他谈。陈伯达立刻把这个公社书记的意见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非常重视，他说，这个书记的意见好，我们这次调查要制定的政策，就是要解决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是一个纲。

这件事传到了胡乔木那里，也传到了田家英那里，都引起了重视。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我们对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了解得更清楚了。这时毛主席叫胡乔木、田家英也都来到广州，起草一个条例式的文件，核心内容是把公社各级组织的职权搞清楚。文件草出后，由乔木统改了一遍，最后陈伯达又统改了一遍。这就是“人民公社六十条”。

**访问者：**这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曾召开“三南会议”（中南、西南、东南）。

**邓力群：**与此同时，少奇同志在北京召开“三北会议”

(东北、华北、西北)，这两个会议都是讨论农村工作的。后来因为有了“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就把“三北会议”的人调到广州，两个会合起来开。

**访问者：**正在这时，发现了31年前毛泽东写作的《农村调查》(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立刻推荐给大家，继续号召做调查研究工作。

**邓力群：**是的，毛主席还专门写了一封信，号召大家做亲身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会上，毛主席还把他的信发给大家，并点名批评了主张有了“十二条”就不要再进行调查的同志。毛主席说：你们看，只有“十二条”行吗？“十二条”只解决了“调”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平”的问题。这样，与会人员对“六十条”草案又进行了讨论、修改和补充。毛主席说，我们大家经过调查，有了这个草案，这还只是我们的意见，对这些意见，究竟农民、基层还有什么意见，还要返回去征求他们的意见。

**访问者：**这次会上，毛泽东尤其强调第一书记要亲自去调查研究。

**邓力群：**是的。会后，大家就拿着草案，原来在哪个地方调查，就回到那个地方。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就到大兴、顺义调查。总理那时也去调查了。少奇同志就去了湖南老家调查研究。

回去征求农民的意见，我们一方面高兴，一方面还发现不少问题。在胡乔木调查的地方说，公共食堂不解散不行。我们在广东通过对一个生产队的挨户调查，发现七分按劳、三分供给不行。到了5月北京工作会议时，大家汇总了征求来的意见，在草案中去掉了这两个尾巴，一个三分供给，一个公共食堂。这是1961年5月工作会议的成果。但这里还有一

个大队核算、小队核算的问题没有解决。到了11月，王任重根据湖北的经验，说核算单位留在大队这一级不好，还是要下放到生产队才行。立即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把核算单位下放到了生产队。至此，毛主席认为农村的体制问题就解决了，在他有生之年再也没有改变过，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

###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当时听了不过瘾，几十年后瘾觉很深刻**

**访问者：**七千人大会您参加了吗？

**邓力群：**没有。当时我在广东编辑《刘少奇选集》，春节后才回到北京，这时七千人大会已经接近尾声。少奇同志在大会上的报告经过多次修改，基本定型后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说，好啊，有了个稿子发给大家讨论，大家提意见嘛，少奇同志不要在大会上念稿子了，大家看了就行了。毛主席自己就不习惯念稿子，延安七大，后来的许多全国会议，大都是稿子搞了七八遍，印发大家，然后他在会上讲他自己还想讲的，发挥一下、解释一下正式稿子上没有的东西。他希望少奇同志也是这样。

**访问者：**所以刘少奇有一个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稿。

**邓力群：**是啊！现在回过头来看，正式报告也好，口头讲话也好，都是从总的方面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调整的方针政策。但口头讲话，毕竟没有像书面报告那样磨来磨去，说得比较开放，语言也自由一些，有感受很深的东西随口而出，难免说了些不好听的话。有些提法可能是受下面的影响，如，三面红旗不提了吧！显然不够策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农民的语言，也拿到大会上讲了。后

来我参加修改他的口头讲话时，在把大家的意见向他汇报中间，他不断插话。我的突出印象是，他感情很激动。他说：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给人民带来那么大的损失，我们这是第一次总结！总结一次还不行，以后每年都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他十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其中还讲了这样的话：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

**访问者：**作为国家主席，在人民遭受灾难时，有这种感情是很可贵的。

**邓力群：**是啊。但不清楚这些话是否会传到毛主席的耳朵里，如果毛主席听到了这个传闻，再有人添油加醋，会不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他们这种地位的人一举一动都引人注目呀。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把握，究竟传到毛主席的耳朵里没有，如果毛主席听到了会怎么想。

**访问者：**现在有些同志对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评价不高，您当时的感受怎么样？

**邓力群：**毛泽东的讲话当时听了不过瘾，觉得很一般。但事过几十年后，感觉他的讲话确实是讲得深刻，经得起时间、实践的考验。在民主问题上，他说，列宁讲，无产阶级的武器只有一个，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把自己的队伍组织起来，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武器。在社会主义建立以后，这个民主集中制、党内生活怎么适应新的情况，今天还没有解决。并说，没有民主的集中，只能是修正主义的集中，法西斯的集中。他还说，党内要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只是不允许秘密的反对派存在。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他说，社会主义建设是个必然王国，人们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个过

程，这个过程还没有完结，我们还没有进到自由王国。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说他在今天以前，只关心和努力从生产关系的变革上来考虑问题，对制度方面、生产关系方面注意较多，而对生产力和对生产力的发展方面知识较少，做得不够，不如谁谁。在国内，在世界，我们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在怎样对待犯错误和受挫折的问题上，他讲了孔子的故事、左丘明的故事、司马迁的故事、屈原的故事。当时觉得毛主席讲的不如少奇同志讲得那么切肤之痛，但后来看，非常重要。

从毛主席的讲话中得到启发，刘少奇在修改他的报告时，也跟着指出：原来起草书面报告时，只把分散主义作为主要问题来批评，忽略了民主集中制方面存在的问题，由此建议把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改为“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把毛主席讲的那层意思修改进去。

**访问者：**七千人大会在党内发扬民主方面确实起了很好的作用。

**邓力群：**七千人大会以后，干部进行学习讨论，有些尖端的意见就通过《宣传动态》反映上来了。人们敢讲话了。其中甚至有人说，下次开党代表大会，他就不选谁了。当然这也过激了一点。

同时，在人民公社六十条、工业七十条的推动下，各部门分别制定了本行业的条例。如科技十四条，文艺八条，高教、商业、合作社、手工业等都有了几十条。这是因为毛主席在这过程中已经提出，单有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不够，还要有为总路线所需要的具体工作路线。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继续说，有了总路线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

商、学、兵、政、党七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对各条战线的各项具体工作路线作出明确肯定，这是七千人大会的积极成果。它对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是有利的。

### 在北戴河出现了波折

**访问者：**七千人大会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就离开北京南下了。事隔两个星期，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了著名的西楼会议，对形势作出了和七千人大会不同的判断。

**邓力群：**那是因为财政部反映 1962 年的财政预算，还有 50 亿元的财政赤字。那个年代财政收人才多少啊，有这么多的赤字，不好办啊，引起了少奇同志的高度重视，于是就召开了西楼会议。西楼会议是七千人大会的继续，如果没有西楼会议就不能很好地贯彻七千人大会的会议精神，实际是保证七千人大会精神落实的一次重要会议。这个会议对形势的估计确实和七千人大会不一样。七千人大会讲困难已经过去，这次会议讲，困难还没有过去。当时有人提出，离开七千人大会对形势的估计好吗？少奇同志引经据典，说历史上我们曾经开过什么会，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就改变了原来会议对形势的估计，这样的事情不乏其例。历史唯物主义者、共产党人要面对现实，不能因为上次会议定了，形势变化以后，仍拘守于原来的东西，这是不对的。如此下来就出现了恢复时期、非常时期的说法。

**访问者：**您认为西楼会议的主要成果是什么？

**邓力群：**从历史上看，七千人大会对农村问题搞得比较清楚，城市问题是西楼会议以后才搞清楚的。最重要的，七千人大会之前，我们党的领导考虑问题，是从一个个方面来



着手的，未从全局、从综合平衡来考虑和解决问题。西楼会议的可贵之处在于仅有条例还不够，还要有综合平衡，还要有总体的解决，注意了这样的问题。比如工农比例关系失调，财政赤字太大，票子发得太多等等。有了综合平衡，才把这个问题真正解决了。

**访问者：**西楼会议把形势估计得很困难，是否会影响毛刘之间的关系？

**邓力群：**关于西楼会议和毛主席的关系，这个事情我知道。作为少奇、小平，对毛主席还是很尊重的。西楼会议临结束时，少奇同志在会上讲，我们说了还不行，还要把这一套向主席汇报。主席同意，我们就照着执行；主席不同意，回来再议。所以西楼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少奇、总理、小平同志就飞抵武汉，将西楼会议通过的文件和中央批转陈云同志讲话的批语送给主席看，听取主席的意见。毛主席看了，他表示同意。第三天少奇同志从武汉回来，给我打电话，说：“主席同意啦。”高兴得不得了。

**访问者：**那边会都开了，中央的七大常委中的四个（刘周邓陈）都同意了，更何况他们是在第一线工作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选择余地好像并不很大，所以，他的同意是不是有点勉强？

**邓力群：**对此我曾想过，毛主席的同意，是不是勉强的，或者是应付的？我认为不是。因为西楼会议这一套，完全符合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所肯定的综合平衡、农轻重为序安排计划的说法。即使退一步讲，毛主席是勉强同意的，勉强同意也好啊，如果当时毛主席口头上就表示反对，或者根本不表态，那这个事情就不好办了。这件事，一方面表明刘、周、邓对毛主席还是很尊重的，他们有自己的意见就负责地

提出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并认真地听取毛主席的意见；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刘、周、邓提出意见以后，主席了解到这是多数人的意见，他做到了少数服从多数。七千人大会毛主席就讲，不管正确的错误的，要服从多数。他是这样做了。事实也已经证明有了西楼会议，形势就逐渐好转，先是恢复，然后发展，最后超过。

**访问者：**西楼会议以后，又有一个中央的五月工作会议。

**邓力群：**西楼会议以后，中央成立了一个以陈云为组长的财经小组，财经小组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提出了一个《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提交五月会议讨论通过。在会议讨论这个报告时，有的同志还是不赞成城市人口下乡的措施。特别是华东地区的柯庆施唱高调，表示不同意。多数大区的同志支持这个提告。邓大姐讲，过去的经济工作方面的提告看不下去，这个报告顺畅得很，说到了大多数人的心里。这个报告经毛主席批发全党遵照执行了。

**访问者：**七千人大会以后，全国的各项工作发展顺利，不料却出现了人们意想不到的波折。

**邓力群：**情况发生了变化。七千人大会以后，事实上毛主席对农村的情况还是不放心，要田家英带一个调查组去了解农村整风整社的情况。田家英首先来到毛主席的家乡韶山。因为韶山是毛主席的故乡，韶山的老百姓讲话，也就毫无掩饰，没有什么顾忌。调查中，田家英问他们，经过“六十条”这套办法行了没有？多数农民讲退得还不够。少数农民讲行了。他们又到湖北、安徽去调查，都是同样的意见，认为退得还不够。怎么办呢？这些农民讲：“分田到户”。当然，他们没有讲解散人民公社。

田家英带着这些意见回到北京。当时毛主席在外地巡视还没有回来，田家英就向少奇同志讲了。少奇认为解决人民当前的严重困难，采取这样的办法是可以的。他叫田家英去外地向毛主席当面汇报。联系后，毛主席回话说，等他回到北京时再谈。毛主席回到北京，田家英在中南海游泳池边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不久，毛主席把少奇同志找去，责备他没有顶住。还说，要是我不在世了，“你怎么办？”

**访问者：**就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前，陈云也从上海回来了。

**邓力群：**陈云在上海郊区农村也做了一些调查，结果他和田家英的意见不谋而合。陈云同志还说，现在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我们把田介绍给农民，有利于动员农民保卫自己的土地。

**访问者：**据了解，陈云也将自己的意见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讲了，他们均表示赞成。

**邓力群：**陈云要向毛主席提出建议，有人劝他，不要和主席讲这些，特别不要讲“包产到户”。陈云同志说：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我有意见，向自己的主席反映，有什么不好！陈云同志向毛主席讲了。毛主席听了，脸色不好看，不过，没有责备。后来知道，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初期曾找陈云同志个别谈话，进行了严厉批评。

**访问者：**这时的情况挺具戏剧性，还有一个邓子恢。

**邓力群：**邓子恢同志总结了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他多处作报告。作了报告，又去向主席讲。主席后来说：他那个讲话，一训就训了我三个钟头啊！水泼不进，针扎不进啊！发了脾气。说邓子恢不但观点不能同意，而且组织程序也不对，组织上也是错误的。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大家到了北戴河。

**访问者：**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就公开批评了他们，是吗？

**邓力群：**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的头一天，就批评了田家英的主张，但说田在组织上没有错误，作为秘书向他反映情况是可以的。在会上没有点陈云同志的名。对邓子恢，批评得非常尖锐，说邓的意见，实际上是搞单干，所谓经营管理的创造，是骗人的。不知是邓子恢没讲清楚，还是毛主席没听清楚，这些话对邓子恢确实是个冤枉。邓子恢讲的是实行“五统一”的“田间管理、包产到户”。

**访问者：**陈云、邓子恢、田家英具体同毛泽东怎么谈的，现在没有文字记录。我看过安徽太湖县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给毛泽东的信，讲述了太湖县实行包产到户的种种优越性，那些材料非常有说服力，但毛泽东没有被说服。我的感觉，毛泽东对包产到户是断然拒绝的，根本不予理会。

**邓力群：**毛主席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认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所以毛主席在会上讲形势、阶级、矛盾，说有三股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越到上面越厉害。于是，重提阶级斗争，重提两条路线斗争。北戴河会议原本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等方面的工作，结果改为抓阶级斗争了。

在这种情况下，少奇同志在会上不能不作自我批评。他说：原以为在这样的困难底下，农村有百分之三十的生产队会散掉，实际上真正散掉的也不过百分之十，比实际情况多估计了百分之二十。承认自己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

会议从北戴河一直开到北京。9月下旬开八届十中全会。少奇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都批了“单干风”。基本路线确

定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成了全会的主调。

## 毛泽东的两个思路：经济大革命、政治大革命

**访问者：**从“大跃进”这段历史看毛泽东，我们可以总结出一点什么东西来？

**邓力群：**从1958年到1962年，从毛主席的思路，他的关注点来看，是要进行经济大革命。所谓经济大革命，就是调整改革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期间，一步步升级，由初级社升高级社，高级社升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又升为全民所有，以至后来“一大二公”。用这种升级的办法来解放、促进、发展生产力。另外一方面是下放，把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一级一级地下放。主席当时的理论是要让各级有各级的积极性，由国家下放给省，发挥省的积极性；省又下放到地，发挥地委的积极性；地下放到县，以至到乡，发挥各级的积极性。升级的目的是发挥积极性，下放也是发挥积极性。采取这么两个办法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原来的想法以及政策，到第一次郑州会议，他开始觉得不行，从此转折了。以后就是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观点。现在需要看看主席在升级以前有些什么意见，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又是怎样修正自己的观点的。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划清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的两条界线。小的还有很多，比如：赞成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但按劳分配不能破除；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但不能破除科学；要热，但不能只有热没有冷，要热也要冷；由集体所有到全民所有，开始是5到6年，后来改成更长，再后来就是相当长一个阶段了；人民公社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在公社体制方面也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观点。诸如此类，可

以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到1961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到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核算单位、七千人大会，以至到后来，把这个过程中主席的议论、文章、指示细致地理一遍，看看他每个时期都提出些什么问题，根据情况的变化又是怎样改变自己的观点，使自己的观点逐渐接近实际的。这里要承认毛主席确实是一个革命家，他不是有了意见之后，就固执己见，情况变了，还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而是在修正错误中间坚持真理，在坚持真理当中不断地修正错误。没有这一条，就不会有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所以我们现在总结“大跃进”，包括总结“文革”，不能只看毛主席的错误。

**访问者：**这是经济大革命，还有呢？

**邓力群：**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特别是“文革”，从他的思路来看，主要是搞政治大革命。是他发现意识形态方面问题很多，所以用政治大革命来保卫改革了的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是一个矛盾的人，对新生事物很敏感，包括正确的和错误的。这恐怕也是他发动“文革”的一个原因。“文革”期间，毛主席就是在3000万—3500万人之间解决问题，其他的不要去动。农村不要去动；工厂停产闹革命，他发现了，立即制止；学生停课闹革命，他发现了也是纠正啊！三千万至四千万人的政治大革命，开始提得很高，然后慢慢降温，慢慢改变自己的观点。这里也有一个过程。同总结毛主席对经济大革命的探索一样，对他的政治大革命，也应当前前后后地搞清楚，弄清他是如何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

1998年于当代中国研究所

## 访廖盖隆——

### 毛泽东晚年的失误

廖盖隆

廖盖隆，1918年生，广东信宜人。1938年8月到延安。1944年起任延安《解放日报》国内评论部副主任，新华社国民党区新闻部主任。建国后任新华社副总编辑、朱德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主要从事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多部著作；主编有《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新中国编年史》、《中国共产党的光辉七十年》等书。

这位党史界、理论界的老前辈，近半个世纪以来（“文革”的十年除外），文章屡见报端，大部头的著作接连问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仍笔耕不辍、勤奋治学。当我们约他一谈时，他把时间定在后天晚上，“可后天是五一节呀！”我们说。“没关系，我刚好有空，只是耽误你们过节了。”仅此小事，便使我们肃然起敬。

**访问者：**在研究毛泽东以及他的生平、思想问题上，时常碰到一个如何看待他的伟大功绩和他晚年错误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廖盖隆：**关于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他的晚年错误，还是邓小平给我们指出了把握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1980年8月，他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中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化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代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邓小平又说：“毛泽东的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



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1962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访问者：**那么，如何把握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呢？

**廖盖隆：**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上，我们首先要明确，毛泽东一生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错误，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其次是要明确，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是性质根本不同而且相反的两种东西。因为我们要坚持并作为行动指南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经过长期的历史考验证明其正确性的、由它的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正如我们所要坚持并作为行动指南的马列主义，是指由它们的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而不包括它们的这样那样的个别错误论断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思想的含义，和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言论的含义是不同的，后者是包括他的某些错误观点、错误论断在内的。而毛泽东晚年错误，则不仅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而且正好相反，归根到底，这些错误是由于既违背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又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也就是由于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背离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或三项根本原则而造成的，并且它们是由长期的历史考验证明其为错误的。

拿发动“大跃进”运动来看，正如邓小平所说，这种做法“完全违背客观规律，想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这就是说，“大跃进”任务

的提出，是没有经过调查研究，不是从实际出发的；也不是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的；这些任务是过高的、超出了实际可能的，是一种盲目的冒进；这些任务是由上面凭主观愿望提出，并用强迫命令的组织手段推行的；推行以后，又没有及时地用实践的结果来检验这些任务是否行得通、是否正确，从而经过再认识，进行自我批评，及时地改正错误。

发动“大跃进”运动是这样，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包括把富队穷队强行合并在一起、实行剥夺农民的“共产”，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等在内)，提出以超高速度为核心而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这三者合在一起，当时被叫做“三面红旗”)，也完全是同样的情况。

**访问者：**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犯了错误，同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有所不同，因为他初步察觉到了，并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看法，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呢？

**廖盖隆：**我认为毛泽东对“大跃进”的错误的认识，只是初步的，不能说是彻底的。而中央的其他同志，比如刘少奇，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比毛泽东深刻。如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最近几年，由于我们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超出了实际可能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而且不顾一切地采取了各种组织手段，去坚持执行这些任务，因而，我们也就在组织上犯了许多错误。这些组织上的错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党的生活、国家生活、群众组织生活中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首先是有不少的负责人，没有充分地发扬民主，没有把任务提交给群众和干部，让他们认真地而不是形式地进行讨论，并且由他们根据

实际的可能作出决定。然后，这些负责人又在群众中和干部中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评和斗争，混淆了是非，压制了民主，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心话。这样，党的组织、国家组织、群众组织中的民主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就受到了窒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所谓‘集中领导’，只能是没有群众基础、违反群众意志的领导。这样的领导，是没有不犯严重错误的。”他又说：“现在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能够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在确定任务以前，先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充分地发扬民主，让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认真地进行讨论，用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那末，我们就可能不会提出过高的超出实际可能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提出了过高的任务，如果能够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那末，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也会通不过，会顶回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使我们能够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

**访问者：**但是，错误仍然没有避免，“左”的思想继续积累，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是什么？

**廖盖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更严重、时间更长的全局性“左”倾错误，同样是既违背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又脱离了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即是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背离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自我批评的党的三大作风或毛泽东思想的三项根本原则的。

正如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所指出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具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决议又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据的上述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完全不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也完全不是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的，而是一种主观的臆造。而这种主观臆造，正如1959年8月发动“反右倾”一样，是拒绝承认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要求超高速度的总路线的错误，拒绝作深刻的自我批评的表现。不错，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于1958年以来所犯的 error，是作了一般的、笼统的自我批评的。他说，他的错误也“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 error，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但他所

说的错误,是指所谓在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实际工作中所犯的  
错误,他仍然坚持“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总路线这“三面  
红旗”是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和不能动摇的。这就是说是下  
面的干部群众执行正确的路线发生的错误,而不是他提出的  
路线、提出的超出实际可能的任务的错误。所以,我认为他的  
自我批评是不深刻的,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对教训毕竟总  
结得不够”、“没有解决思想问题”的。他对上述刘少奇对最近  
几年来的错误的深刻批评,特别是对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所明  
确表示的保留态度,是很不满意的。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我  
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  
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  
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毛泽东  
为了表示他的不满和愤怒,在讲话中突然提出了中国可能变  
成修正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可能在中国复辟的问题,尽管他是  
说得很隐晦的。他说:“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  
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按:在这  
里强调的是高度的集中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是同上文不连  
贯的——引用者)。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  
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  
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  
政,而且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  
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  
专政不可能巩固。……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  
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  
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  
好好想一想。”毛泽东提出这些警告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  
后来在 1967 年 2 月(这时刘少奇已经被打倒了)对阿尔巴  
尼亚国防部长巴

卢庠的谈话中说出来了。毛泽东说，我们党内的斗争，多年来没有公开化。到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他就看出问题来了，因此他提出了中国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法西斯式专政的国家。

这就像1959年庐山会议时的情形一样，当彭德怀尖锐地指出，“左”倾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以后，毛泽东就反过来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资产阶级动摇性的表现”，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并且随即把彭德怀打倒了。1962年1月，当刘少奇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错误提出了深刻的批评，对“三面红旗”表示了明确的保留态度以后，毛泽东就反过来指责说，有人要搞修正主义，要求大家警惕和好好想一想。那时以后，过了七八个月召开八届十中全会的时候，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思想就进一步急剧升级，并指责当时出现了“黑暗风”（指刘少奇等把经济困难形势说得很严重，是非常时期）、单干风（指邓子恢提出，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等同意的要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翻案风（指所谓小说《刘志丹》要为高岗翻案，也指邓小平等主张用一风吹的办法来纠正“反右倾”运动中对许多干部的错误处理）、投降风（指王稼祥提出的对外关系上的“三和一少”以及统一战线工作中的所谓投降主义错误）。这样他就明白无误地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中央一线的多数领导人了。而且这是在毛泽东坚持“三面红旗”的“左”倾错误、拒绝自我批评和改正错误的情况下，对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的无根据的臆测和怀疑。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中央一线领导人的怀疑、臆测和严厉的指责，都是完全错误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说得对：“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

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访问者：**对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了很好的总结，同时决议又指出毛泽东在犯错误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些好的主张，这一点也要充分注意到。那么怎么才能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呢？

**廖盖隆：**如上所述的那些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确实是明白无误、完全错了的，应当彻底加以否定。至于毛泽东晚年在犯严重错误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有长远战略性指导意义的正确思想和正确决策，例如要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腐败，防止干部蜕化变质、和平演变、出修正主义，反对大国霸权主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打开同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等等，这些同上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完全是两回事，这些是当时中央领导层一致认同的，我们必须加以重视和坚持。同时，这些正确思想、正确决策是同毛泽东晚年占主导地位的“左”倾错误的思想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又必须仔细地、谨慎地加以辨别。

**访问者：**为什么必须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严格地区别开呢？

**廖盖隆：**因为如果对这两者不加以严格区别，我们就会或者是犯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右的错误，或者是犯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也加以坚持的类似1977年到1978年那种“两个凡是”的“左”的错误。这两种错误都是对党的事业、社会主义事业非常有害的。

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说：“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及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

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历史决议所讲的这两种错误态度，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存在的。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和指导意义的右的态度，就是那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即主张全盘西化的极少数人所持的态度，我们必须反对和批驳这种错误思想，指出这种主张的错误和危害性，消除这种主张在群众中的影响。另一方面，两三年来，还有些人借口 1989 年中国发生的一场政治风波、东欧的剧变和 1991 年 8 月以后苏联的解体，而要求重新研究毛泽东晚年错误，甚至提出所谓“毛泽东晚年思想”这样的概念。有人说，必须重新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思想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提出重新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理论，就是要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为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翻案，就是要推翻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就是要求回到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的老路上去。还有人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集中起来说，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还说中国现在在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远远没有胜利，甚至公然说“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反对党内走资派、反对党内资产阶级也是正确的。有人



把目前形势估计为现代修正主义要翻天、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要翻天，说最近几年国际上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空前泛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空前泛滥。这样说来，我们正处在一场反右派斗争的前夜，处在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夜。这也是拿大帽子来吓唬人的。

其实，足以亡党亡国的；正是使我们放弃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而且回到过去“左”倾路线的老路线上去的那种主张，这是最危险的。

**访问者：**您开头谈了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我们觉得，如果从总结经验的角度，不应光是知道他犯了哪些错误，还要总结他犯错误的原因，找到犯错误的根源，这对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会更有好处。

**廖盖隆：**我觉得主要是个认识问题，毛泽东长期生活在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中间，后来情况变了，他不能适应，还是拿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问题，这是原因之一。另外，他丢掉了自我批评的武器，犯了错不但不承认，而且听不得人家的批评意见，这也是认识上的错误。应该说，他的整个错误，都是在探索中间，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间发生的，是一个伟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访问者：**是不是还有这个问题，就是他对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缺乏经验，或研究不够呢？

**廖盖隆：**他在思想指导上犯的错误主要是三个：一个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一个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急于求成，再一个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空想性的错误。这三个是他在指导思想上的主要错误。前面说过，这些主要是认识上的错误。不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不坚持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认识方法，不坚持自我批评、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

时准备修正错误。这三条是他犯错误的主要原因。至于没有经验，当然也是一个原因。历史决议还讲，他对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思想准备。另外，毛泽东对现代经济、现代化的工业管理这方面的东西不熟悉，他对农村的情况了解一些，但也不是全部，他自己就说过，我只知道农业，也是知道一部分。我举个例子，60年代斯诺来访，他对毛泽东说，美国只用百分之三的劳动力从事农业。毛泽东听后不相信，认为这不可能。他不能想象怎么能用百分之三的劳力来搞农业。因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既不了解外面的情况，又没有调查，他实际上脱离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自我批评这些基本的东西。丢掉了这些，犯错误就是必然的了。

不过我们还要全面地看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的很多思想是很好的，这包括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思想、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这些思想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论有内在的联系。当然，我们没有必要恢复新民主主义的说法，我们是讲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允许各种经济成分存在，有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外资企业存在。这些经验也是毛泽东创立的，不过在今天这些经验大大发展了，例如对外开放、发展“三资”企业，就是过去所没有的。我们正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了不起的创造。我们要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建设高度民主、法制完备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重大发展。我们今后的任务仍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1992年5月1日于北京万寿路

## 访金春明——

### “文革”起因十说

金春明

金春明，1932年生于吉林延吉，祖籍山东昌邑。现任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文化大革命”论析》、《谈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建国后三十三年》，合著有：《不平凡的七十年》、《“文革”时期怪事怪语》、《新中国编年史》、《中共党史纲要》等。

金教授的家整齐明亮，大屋小屋一个个顶天立地的书橱；写字台很大，上面报纸杂志样样齐全；柜子上还有一张全家福。在我们的想象中，教授家就应该这样。

**访问者：**发生“文化大革命”是我党最沉痛的一段历史。痛定思痛，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这样一场“革命”？为了防止今后再犯这类错误，我们又从中得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这些问题都很复杂，请您说说您的看法。

**金春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到现在既算清楚，又算没有清楚，还在探索当中。所谓清楚，是因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作了结论，这个结论是经过党内集体讨论，大家得出的共同认识。所谓不清楚，是因为海内外

学者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观点各异，相差甚远，各执己见，众说纷纭，我们还不能完全说服他们。美国的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就曾撰文说：“极少历史事件像毛泽东的后十年所发生的事件那样令后人众说纷纭。”<sup>①</sup>我认为这个说法有相当道理。众说纷纭到底有多少种？我把它概括为十种。

**访问者：**金老师，在说起因之前，是否请您先说一谈什么叫“文革”，就是说给它下个定义，因为这个问题弄清了，再谈“文革”的起因，大概人们的认识就容易一致了。

**金春明：**这是一个必须统一认识的问题。到底什么叫“文革”？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从“文革”的结果来说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作为学术问题，还是可以探讨的。因为“内乱”这个词是中性词，革命可以造成内乱，反革命也可以造成内乱，内乱本身还表示不出“文革”的特点。我个人认为，“文革”可以这样定义：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种特殊的大姆模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的特殊性主要表现有七点：（1）它由党的最高领导人亲自发动；（2）它有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3）它用一种特殊的神圣使命为号召，如“反帝反修”；（4）它有特殊的革命对象——“走资派”及“反动学术权威”；（5）它有特殊的内容——夺党政财文大权；（6）它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7）产生了史无前例的规模。这样七点，造成的结果就是一场内乱。很多人赞成我的观点。当然如何更科学更准确还可以研究。

---

<sup>①</sup> 《大变动的局限性：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地位》，伦敦《中国季刊》1986年12月。

**访问者：**我们探讨了“文革”的性质，下面请您谈谈人们是如何评说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文革”起因十说，这些观点都是些什么？他们分析的对还是不对？

**金春明：**“文革”起因十说，是我对各种意见的概括，不是我对“文革”的十种看法。情况如下：第一种，阶级斗争必然说。这是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长期的传统的说法，是上了“九大”、“十大”、“十一大”文件的。“九大”报告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必然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激化，激化必然要引起“文革”，“文革”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必然引伸。这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文革”曾作出的权威解释，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这个观点在国外也有相当的影响。这个观点已被我们否定了，但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前一段就有人讲走资派还是有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是对的，新的资产阶级已经形成。这种理论虽然从整体上已经被否定，但它的影响还继续存在，不能掉以轻心。

第二种，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这种观点在港台、在西方相当流行。他们用资产阶级政治斗争、权力斗争的观点来反对我们的阶级观。认为“文革”的发生不是政治路线分歧，也没有原则问题，只是一种权力斗争。这种观点很多学者都有，但说法不同。他们对中共党内的派系分析也不一样。有毛派、周派、刘派、军派、地方实力派、务实派、激进派，各种说法都有。同样主张权力斗争总爆发说，这个人是讲这几派，那个人是讲另外几派。

**访问者：**权力斗争说根据是什么？

**金春明：**比较流行的是，他们抓住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毛泽东在谈话中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的权，我也管不了，大权旁落了，所以他要夺回失去的权力。实际上毛泽东始终牢牢控制着局面，掌握着全党的最高权力。如果毛泽东失去了最高权力，他不可能违反大多数党内高级干部的意志去发动“文化大革命”。所以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种：封建复辟说。**这种说法在理论上论述最多的是苏绍智。一个时期内相当流行。之所以流行，也有它的道理。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史，人们长期受其影响。封建残余及其影响不可能很快消失。而我们党对这一点又恰恰估计不足，认为我们完成了土地改革，因而反封建是最彻底的，甚至哪一个国家也比不上我们。其实经济上反封建和意识形态上反封建有联系但又不能等同。意识形态有相对独立性。本来中国的资本主义影响并不大，但毛泽东极力强调反资本主义。应当承认，“文革”期间确实有封建的东西泛滥，很多东西都是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如“株连”，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上也是不允许的。按规定丈夫犯罪是丈夫的，不株连妻子、孩子。我们的株连可厉害呀！不要说妻子、儿女、亲戚、朋友，就连老同志、上下级都要株连，这当然是封建的。“早请示、晚汇报”也是封建的。“文革”中确实有许多东西是封建的。也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封建残余是不可轻视的。但就“文革”中出现这种现象来说，我认为是属于沉渣泛起。像鲁迅先生说过的：平静的池塘，表面上看好像水很干净，但用大杆子一搅，底下的各种东西就会翻上来。翻上来快，沉下去也快，但显示了它们的存在。“文革”中不是讲各种各样的人都要跳上舞台表现自己吗？我在讲“文革”特

殊意义时，就强调这一条：“文革”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国情，使我们懂得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封建残余是不可忽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它的不妥当也是明显的，就是把封建残余的影响估计过分了，尤其强调是封建复辟则是错误的。“文革”不是封建复辟，红旗下长大的红卫兵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搞封建复辟。你们是不是红卫兵？

**访问者：**那时我们还小，小学五、六年级，是红小兵。

**金春明：**当时那些二十来岁的大学生，十几岁的中学生，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动机很纯洁，就是要保卫马克思主义，保卫毛主席，他们抱着这种神圣目的，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但他们生活在社会之中，受到各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本身不可能是一张白纸。加上天真幼稚，辨别力很差，有时会把封建的东西当成是革命的。例如他们并不清楚血统论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是两回事，有些人认为自己是高干子弟，就是天然的革命派，这是一种思想错位，是意识形态的错位。因此，这个观点我是不能同意的。

第四种，毛泽东帝王思想说。认为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想当皇帝。这种观点在国内私下议论的不少，但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最典型的是香港的一个刊物上的文章，题目就叫《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帝王思想的产物》。从他发表的文章内容看，这个人可能在大陆受过一点教育，接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他的基本观点是：毛泽东是地道的创业帝王，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更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历史就是创业帝王的历史。这个观点是非常反动的。

**访问者：**他说毛泽东想当皇帝，根据是什么呢？

**金春明：**根据不多。主要是毛泽东的一首词《沁园春·

雪》。他认为1935年前，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虽然相当显赫，但他只是毛委员，不是主席，帝王思想还没有表现的机会。遵义会议后取得了军权，他感到已上升到帝王的位置了，于是帝王思想迅速发展起来，几年之后，就有《雪》一词的诞生。这首词不仅表明毛泽东要成为创业帝王，而且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查了一些材料，想看看这种说法是不是这位作家的创造。结果是这样：1945年秋毛泽东的这首词在重庆发表时，当时的重庆曾掀起一股《沁园春》热，有很多人唱和。蒋介石知道后很恼火，下令批驳。《扫荡报》就发表文章，说毛泽东有帝王思想。《扫荡报》大家知道的，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的机关报。原来发明权是国民党军统特务，该氏只不过是在40年之后拾了军统特务的牙慧。

第五种：乌托邦碰壁说。这是苏晓康等在电视《河殇》解说词和专著《乌托邦祭》前言中所宣扬的。他们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违背了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规律，是乌托邦的空想。其实乌托邦说也不是苏晓康创造的，而是来自外国学者的看法。早在1981年，美国的施拉姆教授就提出过这种看法。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到乌托邦去和返回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周期》。当时廖盖隆同志就写文章作了否定的回答。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也有这样的提法。乌托邦这种观点从国外传来，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到底是不是乌托邦需要作出回答。最近《教学与研究》邀我写东西，我和我的学生写了一篇《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研究》。我们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是科学社会主义观，其中由于历史的局限，确实夹杂着某些空想成分，但总体上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他不但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而且有探索有发展，这个问题应该肯定。不然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竟是搞了个乌托邦，是不能



服人的。

第六种：群众反官僚主义说。这种观点港台有，国内私下议论的有，但在国内报刊上长篇大论不多。他们认为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群众有气，是干部脱离群众。毛泽东不是也说过吗，官做大了，薪水多了，就摆架子。我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确有纯洁党的组织、反对官僚主义的含义。但主线不是这个，主线还是反“走资派”，“反修防修”。开始挨整的那些人都是在第一线辛辛苦苦干事的人，刘少奇、邓小平是官僚主义吗？不是。这一点在地方上更明显，常常是那些长期休养不干事的干部最早被结合到领导班子里来。这样的例子很多。另外，“文革”前后的所有中央文件，也没有明确把反官僚主义作为“文革”的主要任务。

**访问者：**从当时提的口号看，这个问题也不突出。

**金春明：**所以要把问题区分开。从群众来讲，确实有不少人是出于对官僚主义的义愤，对某些脱离群众的领导干部有气，才积极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但这并不能决定运动的性质。说到底，“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群众运动。

第七种：东西文化冲突说。这是一位青年学者的观点。他提出“文革”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与现代文化价值体系尖锐对抗的一种集中表现。认为西方文化和东方传统文化的对抗和较量从近代开端就没有停止过，“文革”是其中一次全面的冲突和对抗。“文革”发生完全不是什么党内路线斗争，而是专制主义、皇权思想、忠君意识为主干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同现代化的发展和要求民主政治、尊重科学、思想自由、人权平等、法律至上的文化价值体系尖锐冲突的结果。“文

革”的结果表现为传统文化的复苏。这种观点在一些知识青年中有相当影响。但认真研究一下，不过是抽象的议论。他错误的地方是，首先，不符合历史事实。科学、民主的思想自鸦片战争以来就在中国传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重要关键。矛盾冲突一百年，怎么到了一百几十年后的60年代冲突出一个“文革”？这没办法用历史来解释。其次，他把中国传统文化归之于封建专制君主思想，把西方文化归之于民主文化、人权文化，这个立论本身就是片面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有民主性的精华，不都是君主专制。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到中国来和中国实际（包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相结合，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文革”之中有文化冲突，但说“文革”的原因就是东西方两种文化冲突的结果，而且把西方文化讲得绝对好，东方文化说得绝对坏，则是错误的。

第八种：人性兽化说。这种观点主要产生在文艺界，他们在议论中或作品中描绘，为什么出现“文革”，就是因为那一天人突然都变成了兽，一种是“牛鬼蛇神”被专政，一种是豺狼虎豹似的“造反派”。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老作家巴金，他说：他经常思考、探索，人怎样会变成兽？他对于自己怎样变成牛马有了些体会，至于造反派如何化为虎狼，却怎么也想不通。柏杨教授讲“文革”是兽性横行。还有人写文章，叫《我们需要一场灵魂的拷问》，说“文革”是道德的大滑坡，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忏悔。这样就把“文革”这场大灾难，归咎于人性，归咎于道德。“文革”有没有野蛮的东西？当然有，但从人性上解释是说不清的。

**访问者：**这只是一种表现，不是起因。

**金春明：**“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十几岁的孩子很纯洁，

他们穿着军装，拿着皮带，是很凶的。一经宣布某人反毛主席，是坏蛋，那他就义愤填膺，使劲整，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但把原因归结到这儿也不行，一个历史现象，不是光用人性、兽性就能说清的。

第九种：奸臣祸国说。持这种观点的人颇多，但很少系统论述，而是散见在传记和回忆录及各种文章中。“文革”中有些事情本来是毛泽东决定的，把一切坏事都说成是林彪、“四人帮”搞的，也不是科学的态度。当然，林彪、江青、康生坏透了，怎么说都可以，但有些是他们的，有些不是，要作分析。不能再回到中国传统的思路上去，无非是君王圣明，臣罪当诛；有了错误皇帝没事，都是下面人使坏，而且坏人中是坏的还是女人。江青的确干了很多坏事，国人皆曰可杀。但认真想一下为什么她过去做不了坏事，如果毛泽东不给她支持，她有那么大能量吗？

**访问者：**还是应看作是制度上的问题。

**金春明：**有制度上的，有习惯上的，也有毛泽东个人的错误，这都是不能回避的。研究历史还是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史实。毛主席伟大，但不是他的每件事都伟大，都正确。中国有个传统习惯，从孔夫子那里讲，有三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不希望人们怨恨老人家，都希望他好。但确是老人家犯了错误，你给他遮盖，能遮盖得了吗？林彪、康生、陈伯达原来在党内还有些地位，“四人帮”中谁在党内有地位？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所以把“文革”的原因仅仅归结于党内出了几个坏蛋，是不行的。

**访问者：**如果这样，我们就不能正确总结“文革”的教训了。

**金春明：**这就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讲的，如果把路易·波拿巴政变仅仅理解为出了几个坏人，那就太可怜、太幼稚了。

第十种：即“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这也是我持的观点。我们是根据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对历史作了充分的研究分析得出来的，也是现在学术界比较公认的说法。具体地说，可以把它概括成“三个恶性循环”。第一是“左”的理论与“左”的实践的恶性循环。这是从政治上思想上讲的。1957年反右以后，先是毛泽东从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误断开始，认为主要矛盾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误断是毛泽东提出来经八届三中全会同意的。根据这个精神后来搞了一系列运动。毛泽东曾说，北京是加工厂，材料是从下面来的，的确如此。毛泽东本来就“左”了，下面又有人投其所好，当然也有人认识问题，有人是调查研究中的片面性，但汇总到毛泽东那里，他就会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再概括提高，贯彻下去，结果越循越“左”。比如，认为农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最早并不是毛泽东说的，是下面报告来的；工厂大多数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也是下面报告来的；还有官僚主义问题、夺权问题等等，都是从下面来的。毛泽东有个突出的思想特点，就是思考问题透彻，看问题深刻，善于抓本质、要害。如果他进行了正确的概括、总结会比别人深刻，反过来，他进行了错误概括也会比别人错误得厉害。就这样，“左”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导着“左”倾实践，而“左”倾扩大化的阶级斗争实践（包括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又仿佛为“左”的理论找到了实践依据，强化了“左”倾理论。这是第一个恶性循环。

第二个恶性循环是个人崇拜与集权体制的恶性循环，这

是从组织上讲的。毛泽东并非不知道个人崇拜是错误的，但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和“理论”，有意鼓励了个人崇拜。比如1958年毛泽东讲有两种个人崇拜，就为个人崇拜开了绿灯。1959年庐山会议批了彭德怀，林彪上来后，第一篇文章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阔步前进》。林彪是有意识地极力推崇个人崇拜的，在他的笔记中就写着“得一人者得天下”。由于毛泽东本人的默认和提倡，再加上林彪、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推波助澜，个人崇拜就盛行起来了。本来中央的集权体制就容易产生个人崇拜，反过来个人崇拜又加强了集权体制。领袖被神化了，权力完全集中于一人之身，这样就出现了毛泽东个人可以否定政治局决议，凌驾于政治局集体之上的极不正常的局面。

**访问者：**看来林彪摸准了毛泽东的思路。

**金春明：**也可以说研究透了。相反，我认为毛泽东没有看透林彪。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山洞”里给江青的信，有人说那时毛泽东就把林彪看透了。我不这样认为。这封信的基本点是：我的朋友要借助我的名义去打鬼，我就自愿当了钟馗。你们看，他是在朋友和敌人之间进行选择的，很明白，“朋友”是林彪，帮我打鬼的，“鬼”是刘少奇。他对林彪的基本估计是朋友，而且是帮助他打鬼的朋友。这对林彪是肯定的。此外，毛泽东7月写信，8月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把林彪提名为全党第二号人物，如果说毛泽东把林彪看透了，这个问题就难于解释。

**访问者：**记得好像有谁说过，1949年进城时，人们就想到将来接班的很可能是林彪。

**金春明：**这个说法我没有听说过。但毛主席从井冈山时期起就欣赏林彪，而林彪也是被提拔最快的，1928年上井冈

山时是连长，到 1930 年就当了红四军的军长。

**访问者：**好像长征那一段他们之间有点别扭，林彪曾建议请彭德怀出来代替毛泽东指挥。

**金春明：**毛泽东认为林彪是受了彭德怀的指使，被人当枪使。

**访问者：**毛说林彪只是个娃娃。

**金春明：**总的讲毛泽东对林彪一直很重视。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有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员，资格比林彪老的多得很，但林彪是第一把手。这些都值得研究。

**访问者：**我们扯得远了，是不是请您谈谈第三个恶性循环？

**金春明：**第三是国际反修与国内反修的恶性循环。所谓“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现在大家都在重新反思。而在当时，占支配地位的观点确实认为大多数党都不信马列了，变成了修正主义。再加上帝国主义的敌视和封锁，就更认为有必要在国内搞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批判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特别是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公开大论战影响巨大。国际论战也影响到对国内形势的认识。这两种矛盾交互作用，互为因果。

**访问者：**现在人们对修正主义的看法，似乎还是不很一致。

**金春明：**是这样的。叫不叫修正主义值得研究。如西方对赫鲁晓夫的评价和我们就不一样。有的评价很高，有的很低。如：说他是伟大的改革者，失败的改革者，蹩脚的改革者，鲁莽的改革者等等，反正都承认他是改革者。我们还讲不讲他是修正主义，值得研究。我主张，不要笼统叫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已经被叫滥了，有些是弄错了，为什么还要捡

回来用呢？

这三种恶性循环作为理论分析是分开说的，其实作为现实生活是搅在一起的，错综复杂，很难单独分开。恶性循环的结果，最后导致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党内情况的错误判断：如果不来一场大革命，党和国家就要改变颜色。这样他下了错误的决心，发动群众搞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结果出现了一场巨大的全党和全民族的历史悲剧。

**访问者：**刚才您讲了“文革”的性质、“文革”的起因，再请您谈谈对“文革”的评价。

**金春明：**对“文革”的评价，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该不该彻底否定，能不能彻底否定，过去彻底否定对不对。说到底就是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坚持彻底否定的观点。这个问题我讲得最多，以至有人说“彻底否定”是我提出来的。我说不是，发明权不是我，是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这有文件作根据。其精神是源于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得很清楚，“文革”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也不是社会进步，它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纲领，只能造成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坚持彻底否定观点，就是贯彻《决议》。龚育之同志曾说：《决议》既是政治权威，也是理论权威。这个话我赞成。所谓政治权威，因为它是中央全会的决议，作为党员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就是要和党中央的正式决议保持一致，而不是和某个领导人的某次讲话保持一致。所谓理论权威，因为它是集中全党智慧的结晶，是拨乱反正的集中表现。《决议》代表了我们党对党的历史分析的最高水平，而且经过十年的检验证明是站得住的，所以

今天必须坚持。

**访问者：**现在对“文革”是不是还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金春明：**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彻底否定了“文革”，就是违背了毛泽东关于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我觉得不能这样看。我们说的否定不是一般哲学上说的肯定、否定，也不是从扬弃意义上说的否定之否定，而是从政治上讲的。为什么要加“彻底”二字，就是表示“坚决性”。借用毛主席的一句话，就是“干净、彻底、全部”，必须百分之百的否定。不是说它史无前例吗？已经空前了，那就让它绝后，决不能再搞了。搞了一次“文革”已经伤筋动骨落后了许多年，再折腾受得了吗？再折腾，中华民族就真的要被开除球籍了。

我们说彻底否定，还因为《决议》是在坚持辩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一分为二不是折衷主义，也不是说任何事物都只能有好有坏，都要好坏兼半。有的事就是坏事，比如黄色的东西就是坏的，这还能讲一分为二？什么事都机械地一分为二，这也是走极端，把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混淆了。

还有人认为，“文革”十年还是有成绩的，比如粮食产量增加了，南京长江大桥修起来了，卫星上天了等等。这样认识也是混淆了概念。我们说彻底否定“文革”，是否定“文革”的本身，不是“文革”十年。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怎么能否定了呢？十年历史和“文革”本身是两回事，“文革”是在特殊条件下发生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我们否定的是这个运动，而不是历史。如果没有“文革”，那些生产会搞得更好，成绩更大。如卫星上天，如果你们看了聂帅的回忆录就会知道，卫星早就做好了，并准备发射。给中央打报告时，让晚点发，等开“九大”时再发，好证明是“文革”的胜利成果，所以推迟了。哪里是“文革”的成果嘛！南京长江大桥也是



在“文革”前修的，本来早就该通车，因为“文革”起来后建桥工人打派仗，所以推迟了通车。你说这是“文革”成果，还是“文革”错误？如果没有“文革”，大桥早就通车了。所以要否定的是“文革”本身，不是十年历史。十年中党和人民特别是广大工农群众坚持生产和工作，坚持科研，都是应该肯定的，不能否定。

还有人认为彻底否定“文革”，就是否定了毛泽东。这个也要弄清楚。否定“文革”，不是否定毛泽东，也不是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晚年。《决议》已明确肯定毛泽东功大于过。即使晚年犯了“左”倾的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他还是提出了一些好的主张。当然哪些是对的，可以具体研究，有人估计高些，讲了九条或几条，有人估计没那么多，都可以讨论。

而且我特别感到，“文革”的后遗症至今仍然存在，随处可见。如姓“资”姓“社”的问题，就是“文革”思维定势后遗症的体现。因为“文革”中特别流行着两种观点：一个是只有两边，你站在哪一边？红卫兵念毛主席语录：什么人站在革命方面就是革命派，站在反对方面就是反革命派。还讲：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变成两极化了。世界的事情本来是很复杂的，并不是那么简单，不是拥护就是反对。毛泽东的话，本来是在抗战时期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讲的，有很强的针对性。把他的话离开具体的时间、条件，统统拿来套，就会出问题的。有一个当时流行的观点是：事事连着纲和线。无论什么事都上纲上线。比如，在干校劳动时，不小心碰坏了一把锹，说你不是劳动人民的感情，是资产阶级的感情，上纲上线，批评个没完。实际上并不是事事都能上纲上线，有些事是要上纲上线的，但大多数不是。特别是在今天，我们已经明确提出大

多数事情都不具有阶级斗争性质，还要上纲上线，就完全错误了。事物本身有大有小，不能随便都提到纲上去。联想到历史，王明路线错误时间只有四年，我们用了十年中间还经过了延安整风才得以彻底清算。“文革”十年，加上前后有二十多年，“左”倾思维方式可说是家喻户晓，要彻底清除其影响，决非易事。

**访问者：**我觉得，这主要靠实践。

**金春明：**实践是需要的。但实践也还需要总结，需要等待，不能立即见效。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加上一项宣传的任务，就是宣传《决议》的精神，贯彻《决议》的精神。这项任务要靠我们历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去完成。

1992年5月24日于中央党校

# 访王年一——

## 毛泽东晚年的一个侧面

王年一

王年一，1932年生，江苏扬州人。解放军国防大学正师职教员，多年从事中共党史教学工作。著有《大动乱的年代》、《执政党的建设研究》（合作）、《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讲话》，是《中国改革大辞典》主编之一，并参加编写《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发表过几十篇中共党史论文、文章。

美国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王年一为“党史专家”。约晚上十点半，我们拨通他的电话。好久，听筒那边才有声音，原来教授已经休息，他的生活习惯是早睡早起。我们连忙道歉，他连连说，不知者不为怪嘛！

**访问者：**多年来您一直研究“文化大革命”，并写出了专著。能不能请您谈谈晚年毛泽东？

**王年一：**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上建立过丰功伟绩。邓小平说过：“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我谈晚年毛泽东，力所不逮。只能

就毛泽东晚年工作作风的一个特点——专断，谈谈自己的看法。国内外都有人把它仅仅归咎于毛泽东一人或者若干人，或者予以不正确的解释，甚至因此给予毛泽东以恶谥，是我所不同意的。我力图对此作出比较科学的说明。

**访问者：**我们同意您的观点，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作了说明。《决议》说：“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决议》还说：“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那么请问：毛泽东晚年的专断，您能举例吗？

**王年一：**事例很多，不妨举几个：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个人发动的。他对此从不讳言。在他审定的文章、社论、文件（包括九大政治报告）里多次以歌颂性的语气述及这一事实。“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如此，“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也是如此。从未有过“文化大革命”是党或者中共中央发动和领导的说法。陈云从组织原则角度说过：“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74页）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否定和取消了中央第一线，毛泽东又走上第一线。此后，种种事实说明，他对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并不尊重。

**访问者：**请再具体些。

**王年一：**支持红卫兵，发动红卫兵运动，是他个人决定的。

未经中央讨论，他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批判实际上并

不存在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矛头指向中央常委刘少奇、邓小平，殃及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人，用以扶持造反派，压制所谓“保守派”。周恩来、陶铸、王任重都不同意这个提法，周当面向毛提出不同意见，都被否定。

支持上海夺权，是毛个人决定的。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召集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开会（唐平铸、胡痴以重要工作人员的身分参加），谈支持上海夺权问题。请注意，与会者中没有林彪或者常常代表林出席会议的叶群，没有周恩来、康生，没有中央其他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王力在一个材料中说：“这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总理不知道，康生也不知道，叶群也没有通知。”会上，毛口授《人民日报》转载《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语，当场审定，第二天见报。这个编者按语，不仅高度评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而且指出：“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1967年1月15日，陈伯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几万人参加的大会上讲话，要大家警惕上海刮起的“接管风”。周恩来接着讲话，说：“刚才陈伯达同志说得对，我们不要像上海同志向我们警告的形成‘接管风’。”毛泽东迅速得知，当天召开小会批评周、陈，讲了一番话。王力据以写成《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此文经毛审定，发表于1月16日《人民日报》和1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7年第2期。这是号召全国全面夺权的第一篇文章。

著名的“二月抗争”说明，中央政治局的多数成员不赞成如此这般的“文化大革命”。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正确意见被毛泽东个人否定。此后，中共中央常委、政治局、书记处由

中央文革碰头会取而代之。

**访问者：**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对斯诺说过：“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sup>①</sup>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是一个喜欢自由行动不受约束的人物。反映在政治上，他是不是愿意一个人说了算，或者说比较欣赏个人专断呢？

**王年一：**不是，绝对不是。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是载入党章的，就是中共九大通过的“左”倾的党章也是载入的。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这个报告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审阅过)中说：“在我们党内，从长时期以来，由党的集体而不由个人决定重大的问题，已经形成一个传统。”张闻天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时，作风很民主，毛泽东称他为“开明君主”、“明君”。这虽是戏称，但说明了毛泽东对民主作风的肯定。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如果不实行民主集中制而“一人称霸”，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说：“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指离开北京十个月——引者注)，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这几句话讲在1975年，特别耐人寻味，可以理解为是对“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否定。

事实上，毛泽东在1957年以前的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不但不专断(1957年以后在若干重大问题上专断，也远非事事专断)，而且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模范。参加编

---

<sup>①</sup> 斯诺说毛泽东讲的是“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4月出版的《漫长的革命》中译本第176页。龚育之在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的《再谈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新起点》中指出，这给弄错了，毛泽东讲的是，“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写《毛泽东年谱》的同志告诉我，他们看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的作风非常民主，凡大事都与中央领导同志商量，而不一人做主，十分注意倾听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建议，用以完善、修正自己的意见，甚至在与中央同志讨论后据以改变中央的决定。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战场上，“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确实是林彪先提出的，毛泽东、中央同意这个方针，把它作为中央的方针。粟裕建议中央改变派一部过江作战的决定而发起淮海战役，毛泽东、中央经过认真研究，批准了这个建议。许多好的意见、好的主张，是从下而上来的，真正做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

回过头来说，毛泽东并不认为专断很好。不要说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就是普通人，也不会认为个人专断很好。

**访问者：**个人专断在理论上自然都是站不住的，但毛泽东晚年还是犯了一些个人专断的错误。现在在学术界、在民间都有人认为这是受了封建主义影响很深的原故。您是怎样看的呢？

**王年一：**我不敢苟同，因为此说距离事实太远。

毛泽东早年是卓越的民主斗士。大量事实说明，他在各方面(包括生活上)反封建主义是很坚定、很彻底的。用受封建主义影响很深来解释，与毛泽东在长期革命生涯中并不专断这个事实相悖。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受封建主义的影响，后来却受了很深的影响，这是说不通的。

**访问者：**那末，毛泽东在晚年为什么专断了呢？

**王年一：**毛泽东晚年的专断，无非为了维护他的意见、主张。情形常常是这样的：毛的意见、主张不为中央集体所接

受，或者势必不为中央集体所接受，而他认为自己的意见不仅很正确，而且很重要，他就专断了。也只有这时才需要专断，任何人都不会为专断而专断。1956年经济工作中冒进，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批评了冒进，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也同意制止冒进。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批准解决冒进的问题。这与毛泽东的“反右倾”的主张不合，毛是主张建设速度快些、建设成就大些的（谁也不反对速度快些、成就大些，但要做得好）。毛泽东在1957年1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1958年1月南宁会议（九省二市委书记会议）、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了“反冒进”，一次比一次讲得尖锐、严厉，否定了中央集体的意见。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话，发动批判彭德怀。讲话是个人讲话，发动批彭未经中央集体讨论决定。何以不付诸讨论？因为估计中央集体不会同意。事实上，批彭不过是抓个典型，它是针对党内（首先是党内上层）的所谓“右倾”的。1962年8、9月间中央先在北戴河后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会前发了通知，规定会议讨论经济问题。毛泽东8月6日在北戴河会议上讲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突出地提出阶级斗争问题，改变了中央集体规定的会议的主题，并且为9月间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定了基调。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问题是个基本问题，必须提出。

这几个例子，都说明毛泽东的专断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意见。他并不是不承认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意要，但是他认为坚持他自以为正确的意见更重要。错就错在这里。在坚持组织原则和坚持他的意见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他放弃组织原则，认为组织原则要服从政治原则。他长期代表正确使他过子自信，长期的领袖地位和长期受拥戴使他感到有义不



容辞的责任指导党，他又有可能机械搬用了他在历史上独排众议而获得伟大成功的经验，因而专断，与受封建主义的影响相去甚远。

**访问者：**毛泽东晚年的专断一定是有特点的。

**王年一：**是的。毛晚年专断的特点就是需要组织承认。毛泽东尽可能地掩盖它。个人专断在毛泽东说来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他十分需要中央集体同意他的意见，或者事后批准他的意见。他以个人的崇高威望先在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一些会议上批判反冒进，会上自然都无异议，中央不得不接受他的意见。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就批判了反冒进。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先造成批判彭德怀的事实，使中央难于拒绝他的意见。在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是如此。“文化大革命”那样无法无天，毛泽东也需要中共九大的承认。毛泽东晚年的个人专断很特别，他需要组织承认。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如对毛泽东的信赖，在毛泽东造成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不得不顾全大局，对某个问题没有成熟的见解而提不出意见，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领导制度不完善、不健全），中央集体常常违心地或者不违心地接受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使他的独断成为中央集体的意见。这不仅使持不同意见者更难于抵制，而且使毛泽东更有理由坚持自己的意见。

**访问者：**邓小平说：“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人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

**王年一：**这种由集体决定掩盖个人专断的奇特现象，是由独特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毛泽东以前长期代表正确因而具有无人可以匹敌的极高威望是一个重要条件，领导制度不完

善、不健全也是一个重要条件。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等更是没有人反对过。既然如此，就不能仅仅归咎于一人或者若干人。

毛泽东需要组织承认，这也说明了他并不认为个人专断很好，也说明他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

**访问者：**既然如此，毛泽东为什么要说“我是和尚打伞”呢？

**王年一：**上面说的是1957年至1965年的一般情形。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若干重大举措的“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那更有特别的原因。

事情很复杂，我在这里只说个大概：

自1960年起，我们进行了“国际反修”。邓力群在《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说：“那么对60年代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应当怎么看？从原则上来讲，不能认为全部是错的，也不能认为全部是正确的。”叶剑英1979年9月29日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建国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里说：我们“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当时我们认为全部是正确的。苏联变修了，东欧许多国家变修了，这是当时毛泽东、中共中央和全党的共识。

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特别在中苏论战中，国际共运大分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内分裂，产生了新的共产党——同意中共立场、观点的党，与原有的、同意苏共立场、观点的党相对立。中共成为“坚持马列主义”一派的核心，毛泽东成为这一派的领袖。这都是自然面然的，不是自封的。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虑国际共运向何处去的问题。

指导国际共运，说一千道一万，首先要把中国搞好，要使中国成为高举马列主义大旗的样板。列宁主义的故乡苏联发生了重大变化，“复辟”了“资本主义”，中共中央不能不接受教训，毛泽东不能不关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我们以自己的观点进行国际反修，它没有影响苏联分毫，却真真实实地极大地影响了自己——正确的方面、不正确的方面都影响了自己。1960年以后，毛泽东在若干重大问题上违反了他本人在此以前的正确思想，似乎难以理解，其实症结就在于国际反修。他对问题重新作了考虑。针对苏联的“教训”，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的“左”倾理论，为全会所同意。本来我们在1957年以后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就有重大失误，这一次是错误的大升级。苏联的重大变化肇因于苏共领导集团的重大变化，苏共领导集团可以发生重大变化，中共领导集团就不能发生重大变化吗？处于最高领袖地位的毛泽东考虑了这个问题，也不难理解。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种情况”，就是国际反修。“党内同志间”，主要指毛泽东与中央第一线之间。“党内关系”，主要指毛泽东和中央第一线的关系。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处在第一线的中央领导人，在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比较务实，有许多正确的主张，毛泽东视为右倾乃至修正主义，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愈来愈不信任中央第一线。

**访问者：**这是毛泽东专断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只是我们感觉，问题不仅这些，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

**王年一：**是的。国际反修的深化，强化了中国是“世界的革命中心”这种认识<sup>①</sup>。这种认识的强化，又深化了两个想法：一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持鲜艳红色的样板；二是认为中国的现实太不纯洁，太不完美，存在许多“黑暗面”。要把中国建设成样板的心情愈急切，就愈是认为中国的现实有太多的“黑暗面”。毛泽东在1960年以后有许多批示、言论，极少讲到我们的事业的成就方面，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以前他总是讲成绩是主要的，而在1960年以后，亦即国际反修深入以后，他却对中国的现实频频不满，多所指责。他对文艺界不满，对教育界不满，对新闻界不满，对出版界不满，对卫生界不满，对学术界不满，对党政机关不满，对干部队伍不满，对农村不满，对工厂不满。上面说过，对中央第一线也不满。极而言之，他没有什么满意的。许多方面的缺点、错误确实存在，但是毛泽东极度夸大了。

毛泽东决心“大破大立”，发动了确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诉诸群众，要以空前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急风暴雨来“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我国整个社会面貌”。要用本来意义上的革命来鲜决社会主义的矛盾，这是一大教训。

**访问者：**“大立”是什么呢？

**王年一：**是创造一个最“纯洁”最“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的轮廓，毛泽东在“五七指示”里作了勾勒。创造这样

---

<sup>①</sup> 毛泽东审阅过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明确指出：“世界的革命中心已逐步转到了中国。”该文载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1967年第16期。

一个社会的底蕴，他在1974年12月26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里作了揭示。这个社会的构想萌发于1958年，《红旗》杂志1958年第4期所载陈伯达《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记录了这个思想。在实践中碰了壁，后来部分地否定了，是毛泽东本人否定的。正是在国际反修的巨大影响下，在国内问题上陷入“反修防修”的迷误的情况下，毛泽东不仅肯定而且发展了1958年的构想。既然把经济改革的要求视为修正主义，把改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视为资本主义，那就没有别的出路。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这是社会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胡绳对这样的社会构想曾加以评论：“这当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空想。”

香港大律师胡鸿烈讲到“无法无天的十年内乱”时说得好：“当时，既然叫一场‘革命’（我说的是加引号的），那就无法可言，什么法也不管用的，再健全也不行。不要说中国，哪国革命一来，都不会顾及法律的，否则就不叫‘革命’了。”毛泽东说他是“和尚打伞”，他是直率的，符合实际情况。

**访问者：**“和尚打伞”，这里总是有个结，它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王年一：**“和尚打伞”是现象，本质是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失误（这是探索中的失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有正确的方面）。

**访问者：**就“文化大革命”而言，根本教训是什么？

**王年一：**邓小平指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么搞社会主义。”这句话非常深刻。

1992年5月27日于解放军原政治学院

## 访于南——

### 从毛泽东处理 “九一三”事件说开去

于 南

于南，1928年生，吉林集安人。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长期从事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十讲》、《十年后的评说》、《中共党史简编》、《中共党史大辞典》等。

骑行一小时零十分，找到在中央党校的于南教授家。心直口快，坦坦荡荡，是他给我们的初次印象。那天天气很好，暖风拂面，正是北京不冷不热的季节，所以说得也顺当。告辞出来，见到教授家后院菜畦中的花椰菜长得正盛。

#### 林彪的出逃是被迫的吗？

**访问者：**1971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在我国当代史上是一件大事。它发生的原因和性质是什么，成为近几年一些人们议论的话题。您是搞“文革”史的，请谈谈您的看法。

**于 南：**“九一三”事件的经过以及定性，随着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以及近几年一些史料的披露，除某些

细节外，基本是清楚的。我认为毛泽东、周恩来在处理这件事情时是冷静的，措施也是得当的。现在有人认为林彪出逃是被迫的，也就是说被叶群、林立果等劫持走或被骗上飞机的。这不符合事实。

**访问者：**这种说法国外早就有流传。

**于南：**国外主要就是1983年出版的《林彪的阴谋与死亡》这本书。我已在《党的文献》1989年第4期写了一篇短文，作了批驳。

在审理“两案”时，曾就林彪究竟是否被劫持问题作过调查。结果证明被劫持的说法站不住脚。这里关键的人物是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李跟随林彪14年，最后和林同车去山海关机场。他在车上听到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因为林彪原来对李说是去大连，现在听说去伊尔库茨克，是到苏联，李怕当叛徒，想到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不愿跟他们一道走，就突然喊停车。司机当时是听他的口令的，车一停，李便跳下车，车里人向他开枪，击伤左臂，李用右手掏枪还击。李文普在“九一三”后，一直这么讲的，直到1980年审理“两案”时，从未改口。此外，林彪在北戴河96号楼上车时，很多人看到并没有人强拉他上车。因此劫持的说法不能成立。

叶群也可能做了准备：万一林彪不走，到时就强迫他走。也不排除叶群说些瞎话欺骗林彪，或说些威胁、恫吓林彪的话。林彪在决定逃跑时，是否有激烈的思想斗争，说过不想走的话，这也不难理解。但不管怎么说，最后下令让李文普调车去机场的是林彪。林彪愿听他老婆、儿子的摆布，却不信任中央和警卫部队，只能由他自己负责。写在党章上的“接班人”，掌握军队实权，身经百战的元帅，在周围有大批

警卫部队的安全环境中，竟会被 50 岁左右的女人、20 多岁的毛孩子绑架、劫持走，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不管林彪当时是怎么想的，他必须对出逃一事负直接的主要的责任，这是谁也开脱不了的铁的事实。

**访问者：**还有一种说法，林彪的出逃是被毛主席逼走的。

**于 南：**这种说法也不过是一种毫无根据的猜测，国外有的出版物也这样说过。我认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尽管林彪一伙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毛泽东还是有意保护林彪。他在南巡讲话中说：对林还是要保，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谈什么？无非还是想挽救他。我们还可以设身处地替毛泽东想想，他本人愿意出后来那种事吗？他根本没料到林彪会暗害他。林彪是他选定的接班人，并写进党章。他是不愿看到他的接班人出那么大大问题的。就是对林彪不满意，也不会采用逼走和整死的办法。

### **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对林彪不信任了**

**访问者：**林彪摔死后，毛主席衰老了许多。

**于 南：**是的；他大病一场，受的刺激太大了。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对林彪是不满意的，特别对他们一伙搞阴谋诡计很反感。他采取了几项削弱林彪一伙权势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访问者：**从总体上讲，毛泽东对林彪还是比较信任的。

**于 南：**我的看法，过去，毛泽东对林彪是信任的，但对林的弱点或错误毛泽东也是知谋的。在“文革”前毛泽东就考虑过接班人的问题。周总理曾对王稼祥说过：将来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元帅，或者是邓总书记。因为两个人的年龄差不多，到底是谁，没有定。但“文革”一开始，邓小平受到



批判，当时发动“文革”需要军队支持，只有选择林。

毛泽东如果根本不信任林彪，就不会叫他当接班人。但这种信任是有限度的。林作为二把手从来没有享受到像刘少奇当二把手那么大的权力。是林不想要吗？不是，是毛泽东不给他。

**访问者：**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于南：**毛泽东可能是鉴于过去的教训，给的权力太多，怕再出现大权旁落。为什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林彪一伙抢班夺权？就同这种情况有关系。林彪集团同江青集团的矛盾，以及他们在庐山会议上的种种表演，我在1992年《党的文献》第3期上发表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一场风波》，已经作了些评述。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面对林彪、江青两派的争夺，可以有几种选择：对双方都支持，这不可能；都反对，也不行，两派都是靠他崛起的，这样做等于否定了他自己。还有两种选择：或支林压江，或支江压林。毛泽东都没有这样做，他批评了林，但也没有明确支持江青的言论。当时这是最好的最没有副作用的处理方法。毛泽东还十分讲究策略，在会上就抓陈伯达、吴法宪，就点名批他俩。后来随着批陈整风的进展，毛泽东才知道林彪等在背后搞了一些阴谋活动，非常恼火，才出去南巡。当林得知毛泽东南巡讲话后，十分紧张，于是在叶群、林立果筹划下，经林彪同意，便阴谋暗害毛泽东，事情败露，只好出逃。

所以，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犯了全面性的错误，但不是所有事都错了。哪怕毛泽东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一旦发现他进行篡党夺权，要搞武装政变，也毫不留情地领导全党，指挥军队，及时平息。当时的处理方法也都是稳妥的。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保护和起用了一批老干部。

##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说明了什么

访问者：“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对于“文革”起了什么作用？

于 南：“九一三”事件发生于“文革”中期，它在“文革”中起了分水岭的作用。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说：林彪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把“失败”说成“破产”。这本书说：林彪事件促使人们进行严肃的思考，接着提出对“文化大革命”的十二个问号。问得好，不愧为大手笔！确实反映了当时许多人的真实想法。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始打破，至少认为毛泽东不是神，看人也有看错的时候，林彪这个接班人就选错了。这是无法遮掩的事实。人们对“文革”怀疑和不满的情绪日益增长。

为什么会出现林彪这样的反革命集团，除林彪一伙的个人野心外，应该说同我们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的某些弊端有关系。就是邓小平1980年说的：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同残存在党内的家长制作作风分不开，由于没有在实际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及其他一些原因，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还说：要避免类似“文革”那样的错误，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如何解决？就是要从改革制度着手，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搞个人崇拜，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必然损害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文革”中的“公安六条”，实际上是保护林彪、江青一伙的胡作非为，压制人民对他们的抵制和斗争。这些教训是很深刻的。

## **中国以后还会出现“文革”吗？ ——也可能发生……但绝不能发生了**

**访问者：**您认为，类似“文革”这种事情，今后还会重演吗？

**于 南：**我大胆地冒叫一句：如果不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对党的基本路线有些许动摇，大家不警惕“左”的苗头，不注意防止“左”的东西，让林彪、江青之类人物出来捣乱，那类似“文革”的悲剧，不管人们怎样深恶痛绝，它就有可能在中华大地或局部地区重演。早在1979年7月，邓小平就在一次会议上大声疾呼：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你们不要以为中国乱不起来，林彪、“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他们唯恐天下不乱。我原以为经过拨乱反正，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整党，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看来我是像小平所说的：想得太天真了。

**访问者：**您能举出一些事实吗？

**于 南：**可以。比如前两年有人鼓吹：阶级斗争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不是和历史决议、党章总纲“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唱反调吗？这个缺口一打开，必然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再发展下去，离“文化大革命”就近在咫尺了。去年又有人说：1957年毛泽东提出的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是正确的，要长期进行下去。这合适吗？首先，我怀

疑这位同志是否了解究竟什么叫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说：1957年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9年庐山会议打退彭德怀的进攻，就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1991年还要肯定这个命题，不能不使人担心是否又要开展反右派或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其次，1957年就说过：现在找到了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肯定政治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肯定它的形式，这不是在呼唤“四大”吗？接着，我们就会听到“文革”这个魔怪的脚步声了。最后，1981年的历史决议，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否定了指导“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和运用大民主的方法，正是这一理论的要点。肯定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导致肯定“继续革命论”；肯定指导“文革”这个理论，下一步的实践必然是“文化大革命”了。这是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你们看可怕不可怕？有人说某某就是“走资派”，连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样的话，也有人要重新肯定。虽然这只是些苗头，却令人十分担心。如果邓小平这次不出面说主要防止“左”，任那些“左”的东西发展，那还得了吗？

当然，作为历史，作为学术问题，究竟“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命题是否正确，它的内涵又是什么，不是不可以探讨，但不能把对政治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提出异议的同志，都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拨乱反正以来，我没有看到任何党史教材、党史工作者再去肯定政治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从它的提出及其以后的实践，认为它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左”倾理论的一个起点，这已成为党史界、理

论界多数人的共识。我不明白到1991年再肯定它究竟有什么积极意义。

**访问者：**这个命题的重新提出，是不是和这几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的大背景有关系？

**于 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和平演变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而恢复过去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左”的错误的东西。这几年，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队伍中已经出现苗头，有些人试图把毛泽东晚年（主要是“文革”前）的“左”的东西隐隐约约重新加以肯定，这恐怕不对头。那些东西已经试过了，实践证明不行，干吗还要再拿出来？现在研究毛泽东思想，应该好好区别一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错误的坚决不能再用，正确的就要继承和发扬。邓小平说得好，什么叫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许多事情已经拨乱反正，为什么还要回到以前错误做法上去呢？

**访问者：**继承和发展有个前提，就是拨乱反正，没有拨乱反正，就谈不上继承，也更说不上发展。

**于 南：**作为学术问题，过去否定过的东西，如果否定过头了，可以再探讨，说了过头的、不大妥当的话，也可以再纠正过来。但是重大是非，党中央已经作了明确决议的，有了基本结论的，就应该坚持。如有不同意见可以在内部探讨，不能在报刊上公开反对。我不理解：党章明确讲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怎么能公开发表文章唱对台戏呢？又如，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曾多次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央明确对知识分子不再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政治上一视同仁（有时叫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新政策。可

是去年就有人提出应恢复“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而否定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这行吗？我当时真想喊：需要起来保卫三中全会路线了。

**访问者：**如果真的改变了这一方针，接下来就会伤害一大批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会受到影响。

**于 南：**那当然！知识分子说不定又会成了“臭老九”。政策要有稳定性，不能随意变。为什么邓小平这次南方讲话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这是我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决定的。在这点上，邓小平抓住了要害。主要矛盾一变，基本路线也非变不可。我认为最近几年，有些“左”的东西是在反自由化过程中出现的，这也是反倾向斗争的一个规律。反“左”容易出现右，反右容易出现“左”，近几年我们一直在反右，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些“左”的东西就冒出来了。邓小平指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根深蒂固。这就抓住了要害。“左”的东西有些是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习惯，说“根深蒂固”是非常恰当的。

当然，我们不是要把他们和“四人帮”相提并论，但他们的思想体系确有某些相通之处。

**访问者：**为什么反右容易反“左”难呢？

**于 南：**首先，看看历史。建国以后，我们多次反右，却很少反“左”，并不是实际工作中没有“左”，而是把“左”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保护和肯定，同时又把一些正确或并非右的倾向当作右来批判。有些人是以“左”来反右，使“左”的东西，借反右之机得以发展，“左”便成为一种很大的习惯势力。其次，从认识论上说，长期流传一个说法：“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邓小平南方谈话说：“‘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怎么会比右好呢？把社

会主义给葬送了，还不是立场问题吗？“左”带有革命色彩，教条式地搬几条语录，容易迷惑人。第三，就是过去对犯“左”的错误和对犯右的错误的处理不一样，反右是喊哩咔嚓，反“左”则是羞羞答答；反“左”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反右则把人整得死去活来，没完没了。彭德怀是明显的例子。他是右吗？不过是抵制了“左”的东西，就把他说成右，以至整死。而犯“左”的错误的，有几个受过处分？顶多检讨几句，这里不能呆了，换个地方就是了。长此以往，一些人心理就是宁可“左”一点，总比右保险些。

还有学术问题、艺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它们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可混淆。不能把学术上的不同意见，艺术上的不同风格、流派，随意上升为政治问题，乱扣帽子。邓小平这次说：拿大帽子吓唬人，这就是“左”。有人似乎以马克思主义权威自居，一切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一律斥之为“自由化”，这行吗？学术问题能几个人垄断吗？怎么能把一切不同意见统统说成是自由化？任意扩大“自由化”的范畴，势必掩盖真正搞自由化的人。

访问者：您能举些具体例子吗？

于 南：去年有一个杂志，发表一篇读者来信，硬说某著名作家一篇寓言式小说，是影射攻击一位老一辈的革命家。证据是配合了境外某些攻击舆论。我特地找来看看，没看出有影射的地方，却使我感到这家杂志的做法和“文革”中批“三家村”的手法有些相似。为什么要拿海外舆论作依据呢？他挑拨离间你也信吗？有人就是摆脱不了“文革”及其以前“左”的思维定势：国外有什么风，国内就有什么浪，国内出点事，要到国外找依据，什么配合国际反华大合唱呀，是国外敌人的应声虫、代理人等等。我们为此造成的冤案难道还

少吗？怎么就不接受教训？

我不理解的是：有人过去执行了“左”的一套，整过人。但在“文革”中别人比他还“左”，又整了他，甚至被整得家破人亡。按说应该觉悟了吧，挨整的滋味不好受，挨过整的干部都会有这个体会的。可是有人一有机会还想整人，这是很可悲的。我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我很佩服两位老同志，他们过去执行“左”的东西，整了好多人。“文革”中他们被整得死去活来，拨乱反正，平反以后觉悟了，见到被他们整过的人一再表示道歉，对“左”的东西，警惕性也很高。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应该有这种精神，应该记住历史的经验教训。

1992年5月30日于中央党校



## 访金冲及——

### 毛泽东和周恩来

金冲及

金冲及，1930年生，上海人。现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复旦大学兼任教授，中国史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毛泽东传（1893—1949）》（主编）、《周恩来传》（主编）、《刘少奇传》（主编）、《辛亥革命史稿》（四卷本，合著）、《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合著）、《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等。

关于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个题目，我们很早就约了金冲及，但又觉得他太忙，不忍催得太紧。前几天和他说起，他说：“哎，反正我每天总这样，找个时间就谈吧。”于是就有了这篇谈话。

#### 毛泽东最离不开的最周恩来

访问者：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而周恩来更突出的是一个伟大的国务活动家。有人说，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谋事是毛，成事是周”。对这种毛周之间密切配合所产生的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您怎么看？

**金冲及：**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个人，的确是不可分离的。说起来很有意思，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常常有两人并称的例子。比如太平天国的洪杨（洪秀全、杨秀清）、戊戌维新运动的康梁（康有为、梁启超）、辛亥革命时期的孙黄（孙中山、黄兴），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的“南陈北李”等。两个人中总是以一个为主，另一个也有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往往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虽然没有“毛周”这样的说法，但两人关系的紧密是有目共睹的。在两人的关系中，当然毛泽东起着主导的作用。小平同志讲过一句很中肯的话：没有毛主席，也许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对周恩来，我想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周恩来。当然从青年时代起，周恩来一直是很杰出的，但真正能使他在一个正确方向下充分施展才能的，还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领导。这是事实。而对毛泽东，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所说，最离不开的是周恩来。这也是事实。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是相得益彰。

**访问者：**那么，具体而论，又怎么估价他们两人各自对中国革命、对中国政治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呢？

**金冲及：**尼克松曾讲过这么一句话：毛泽东是拿主意决定大事的人，周恩来是负责执行的。一般来讲，尼克松的话不无道理。我读过不少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和文章，有一个感党，就是毛泽东重在统筹全局，提出大政方针，那真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而周恩来的讲话和文章更多地给我的感党是细致周密，人情入理。所以一般说来，毛泽东确实是更多地把握大的方向，拿大主意，而周恩来更多地是负责执行和落实。

但这只是相对来说的，不能把话说死。毛泽东是不是光

拿大主意而对具体工作就不过问？不是的。毛泽东对他认为在全局中有决定意义的一些具体环节通常也抓得非常紧、非常细。他不是说“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吗？在他的前期尤其是如此。反过来，周恩来也决不是一个只能起执行作用的人。他也是一个战略家，一个有着重大决策能力的人。比如，周恩来1924年在法国时谈到“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关系时说过：“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说明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道理。1930年4月他在德共《红旗报》上写道：“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这些都是很早的事情。中央九月来信对古田会议的作用，也是大家所熟悉的。以后，在推动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过程中，周恩来对于党的许多重大决策的提出做出过很多贡献。我举个例子。

在《周恩来传》起草过程中，有位中央领导同志看了后觉得对周恩来在军事上特别是解放战争包括三大战役中所起的作用没有充分反映出来。因为周恩来当时是军委副主席、代理总参谋长，应当反映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后来我跟邓大姐讲到这一点时，邓大姐说，是这样。她说：“恩来同志在陕北时实际上是总参谋长。许多作战方案，包括以后朝鲜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案，都是他先拟好了送给主席看，由主席批，或者他先找主席请示，谈好后，由他再来贯彻。”这确是事实。我们为难的是：写传的主要根据是目前留下的档案，其中最重要的具有战略性决策问题的文件大都是毛泽东起草的，周恩来起草得比较多的是一些具体贯彻执行的或配合性的文件。但这是不是就说明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在作决策？也不能那样说。一位当时在军委作战室工作过的同志讲过：一般来说，当时几乎每天所有的军事电报，都是先送到周恩来那里，

周恩来看了以后，考虑好自己的意见，通常在地图上也标明了，然后去找毛泽东，两人一起对重大问题进行商量。作出决定之后，重要的文电由毛泽东亲自动手起草，其他一些具体问题由周恩来处理。当时党的领导集体是五大书记，在军事方面很多重大决策的作出，毛泽东当然起着主要作用，接下来就是周恩来的参与了。周恩来曾说过：转战陕北时，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这最小的司令部实际上就是两三个人。另外，在外交等方面，周恩来也发挥不少重大的决策作用。这不用多说了。所以，说毛泽东是决策者，周恩来是执行者，一般说可以，但不能说死，只是相对面论的。

**访问者：**“谋事是毛，成事是周”是一般概括性的比较形象的说法。

**金冲及：**在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也是有意识地使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的角色。一位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老同志曾跟我谈起过一件事：建国初，有一次他曾问周总理：你为什么不做些理论方面的工作？周总理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可见，周恩来从国家和革命事业全局的利益出发，甘愿把自己放在“配角”的位置。而他内心确实钦佩毛泽东，相信毛泽东考虑这些更大的问题要比自己高明。也是尼克松讲过这么一句话：周恩来总是小心翼翼地把聚光灯的焦点只对准毛泽东一个人。

**访问者：**梁漱溟曾讲过，周恩来是绝顶聪明的人。毛泽东召集会议，特别是建国以后，讲起话来经常是国内国外，海阔天空。讲完了，说，就这样吧！究竟怎样，别人未必明白，

但周恩来全明白。余下的事就要靠周恩来去贯彻执行了。梁漱溟的话，虽是一家之言，但起码说明，在重大决策过程中，毛泽东的主导地位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少不了周恩来这位总理。同时也说明，毛、周二人之间有着高度的默契。

**金冲及：**是这样。毛泽东的思想博大深邃，有时候不能止于从字面上去理解它。对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周恩来十分了解，能够准确把握；同时，对周恩来办事的细致周密，毛泽东也很放心。

周恩来对中国政治所起的作用，在毛泽东晚年，还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晚年的毛泽东，一方面越来越少参与党和国家的日常具体工作，另一方面他同实际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胡乔木同志讲到过，有一次他劝主席多到工厂农村去看看。主席说，我怎么去啊？我一去，人都围了上来，是我看工厂，还是工厂看我？在毛泽东晚年这种同实际越来越隔膜的状况下，周恩来在一些方针政策的制定方面对毛泽东所起的补充作用似乎比以往更多一些。

## 说到他们的一致和不一致

**访问者：**毛泽东、周恩来在党的历史上有一致的时候，也有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他们的一致和不一致呢？

**金冲及：**照我看，他们两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目标是一致的，而且周恩来对毛泽东确实心悦诚服。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之间为什么能建立起这样亲密而默契的合作关系。当然，他们之间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也有差别以至分歧。但他们之间一直没有发生过正面的尖锐的冲突，这和其他不少领导人显然不同。

先讲民主革命时期。国外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央苏区时

期党内的主要矛盾是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矛盾。我认为不是这样。

**访问者：**对于苏区时期，人们议论较多的有三件事。一件是苏区中央局的书记问题，一件是打赣州，一件是宁都会议。国外有人讲毛泽东、周恩来的矛盾是权力之争，说周恩来来到中央苏区就夺了毛泽东的权。

**金冲及：**这话不能成立。因为成立苏区中央局是1930年六届三中全会后几天政治局决定的。书记一开始就是周恩来。他不是只负责中央苏区，而是负责指导全国各苏区和红军。因为那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离不开周恩来，所以，书记一职由先去苏区的项英代理，后来因为“AB团”问题，说项英右倾，再加上项英军事上弱一些，改由毛泽东代理。1931年周恩来到了苏区，书记一职自然由他担任。这怎么说夺权呢？

**访问者：**那么，宁都会议是否存在周恩来夺了毛泽东军权的问题呢？

**金冲及：**这里讲的军权主要是指一方面军总政委的问题。本来，中央军委成立后一方面军的建制就不存在了，朱德任红军总司令，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是作为中央政府主席随中央军委活动的。后来一方面军恢复了，苏区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兼任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朱、王联名提议由毛泽东担任。周恩来又写信给中央局，坚持由毛泽东任总政委。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是在这种情况下恢复的。宁都会议上多数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周恩来坚持将毛留在前方，可以在两种方案中选择，或者由毛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周恩来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或者由周恩来负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协助。毛泽东个性很强，他认为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就坚决拒绝周恩来提出的前一方案。周恩来还是

先代理总政委，以后才兼了这个职务。这不存在周恩来夺毛泽东权的问题。

宁都会议前关于军事问题的那一场争论，前方的周毛朱王四个人意见是一致的，都是和后方中央局的争论。后方说你们不进攻，是消极等待主义。前方认为不能在不利条件下急于求战，主张先在那里发动群众，诱敌深入，集中兵力，等待战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前后方之间来来回回的电报多啦，不是一两句话说得完的。

**访问者：**宁都会议究竟讨论了些什么，有会议记录吗？

**金冲及：**现在就苦在没有会议记录，具体讲些什么，无从查找。不过看一看后方给中央的电报，也可以知道他们对周并不满意，说他是调和，说他批评项英甚至超过了批评毛泽东。毛泽东的脾气是，既然你们不支持我的观点，我就宁可不干。周恩来呢，他又要服从多数，顾全大局，又要尊重中央，想不通的也要暂时忍下去，继续干。他们两个人的性格不同。这一点也可能是周恩来不如毛泽东的地方。

**访问者：**在打赣州问题上，毛和周的不一致您是怎么看的？

**金冲及：**打赣州，毛泽东不赞成打是对的，周恩来赞成是错的。但这不能说是路线斗争。周恩来到中央苏区时也向临时中央表示过：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说，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打。当时许多人认为打赣州有很多有利的地方，那时以为城内守军只有一个旅（后来发现情报搞错了）。如果以三军团为主，再加上一军团、五军团，赣州能拿下来。打下赣州就和湘赣根据地连成一片，很有利呀！部队里很多人也表示有把握。周恩来那时刚刚到中央苏区，也支持了这种意见。结果，赣州的实际守军比情

报中所说的要多一倍，打了一个月打不下来，国民党增援部队又来了，只好撤围。这一仗没有打好。但如果认为只要主张打赣州就涉及到打不打中心城市的路线之争，那么这以前的打吉安呢？吉安也不小啊！还有接下来的打漳州，漳州也不比赣州小。这里，主要不是打不打中心城市的问题，而是对敌情的判断错误。其实，红四军第三次入闽前，毛泽东也打过一次赣州，结果没有打下来，为此他曾总结出七条经验教训，教训之一就是**对敌情的判断错误**。毛泽东的高明，常常在于他有了一次教训后，下次就记住了，不再干了。党的历史上发生过的争论很多，争论中当然有是非之分，但不见得要把什么争论都夸大成路线之争。像打赣州的问题，我觉得谈不上两人之间存在路线之争。当然从这件事情本身来说，毛泽东对了，周恩来错了。

第五次反“围剿”的打法，也并不是周恩来的主张。事实上，到后来周恩来也被架空了。

**访问者：**中央苏区这一段，周恩来、毛泽东的关系稍微曲折一些。从1927年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来看，周恩来对毛泽东似乎还不太理解，曾提出要撤毛泽东。1929年的红四军“七大”把毛泽东的前委书记选掉之后，周恩来又站出来支持毛泽东。我们的感觉是，要说他们有路线之争，恐怕不太好说，只是在个别的具体问题上，有时你这么看，有时我那么看。经过实践检验之后，错的，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对的继续坚持。要知道，当时革命没有经验，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呀！

**金冲及：**从总的看，毛泽东在政治上当然比周恩来要强，周恩来后来对毛泽东那样心悦诚服并不是偶然的。我的印象，周恩来大体上还是在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制定的方针之下，



也就是在这个大框架下，对事情考虑得很周密，有条有理地去做。他那精力充沛、机智果断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是别人很少能做到的。而毛泽东比周恩来又要高出一大头：只要时局有个变动，毛泽东一下子就能提纲挈领地对形势作出全盘分析，提出一整套适应新形势的理论、方针、政策，造成一个新的格局。至于对中央苏区时期，说党内的主要矛盾是毛泽东、周恩来的矛盾，这是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的说法。

**访问者：**抗战初期以后，他们之间很少有分歧，配合得很默契。但建国后，遇到一些过去没有经历的新问题，毛周之间又产生了一些分歧。

**金冲及：**大一点的问题可能是两次，一次是1956年前后的“反冒进”，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在反冒进问题上，详细的就不多说了，比如周为什么提出反冒进等等。我这里只讲一点，南宁会议批周批得很凶啊！毛主席讲，反冒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总理检讨了一次又一次。

**访问者：**总理的检讨，是违心的，还是不违心的？

**金冲及：**我认为，他有想不通的地方，但也不完全是违心的。他想不通的地方，因为当时确实发生了冒进，这是事实。据说他找主席汇报时，两人争得很厉害。主席提出要追加20个亿预算，周坚持不同意。据当时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他写检讨，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内心一定很复杂。但也不能说他完全是违心的。在总理的检讨里，第一句话就是：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我看这个话还是发自内心的。当然是不是完全想通了，也未必。

**访问者：**他可能是在试图想通，或者努力去想通。

**金冲及：**问题恐怕就在这里。在周看来，主席高瞻远瞩啊！他可能会想，以往多少次历史经验证明，主席比他看得高，看得远。那么这一次也许是自己错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理的检讨也不完全是违心的。

**访问者：**到1956年，可以说毛泽东还没有怎么失误过。

**金冲及：**批“反冒进”，引出了一个“大跃进”。对“大跃进”，有些外国人以为毛泽东是在发神经病，好像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没有脑子，跟着在那里胡来。不是那样的事情。“大跃进”当然错了，应该批评，但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出现，我们总要先把当时的周围环境、社会心态、领导人为什么会作出这种决策弄清楚，才能作出中肯的批评，引出有益的教训。公正地说，“大跃进”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问题。从当时的情况来说，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大多数党员、群众都是拥护的，而且是兴奋的。这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整个民族的心态。中国过去是一个文明古国，近百年来却一直受列强欺辱，被人家看不起，中国人的心里憋足着气。现在新中国成立了，谁都希望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当时提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主张“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是很容易得人心的。这反映了一种相当普遍的愿望、普遍的精神状态。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事情。

第二，是当时历史的特殊环境和气氛。那段时期是我们接连地发展得最顺畅的时候。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三年胜利了，谁想得到？胜利后，经济上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三年就恢复了，又怎么能想得到？抗美援朝和美国人作战，这可使不少人提心吊胆，三年也解决了，最后美国人只得在板门店坐下来签了字。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年提出来，三年后又进入社会主义了。现在感觉是快了点、粗了点，但当时

人们的心里是高兴的。1958年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出现“大跃进”的。这以前，每次许多人都觉得不可能那么快，结果都实现了。整个社会十多年来一直处在那样剧烈的、而且迅速见效的巨大变动中。这种惯性很容易引出一种思维方式：认为只要下决心去做，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很快创造出来。离开了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氛围，许多事就无法理解了。

第三个原因是缺乏经验。我现在读建国后毛泽东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记录，真有一种感慨，觉得是个悲剧。他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是满腔热情的，也是深信自己这一套想法是对的。但是，他依据的仍然是他自己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靠政治挂帅，靠群众运动。他认为过去我们不是遇到过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吗？只要政治挂帅，只要发动了群众，结果就解决了。他都是那么讲的，不知道经济工作有它的特殊规律。还有一条，毛泽东是无论如何不想照搬苏联经验的，他想闯出一条自己的路。可是，他不熟悉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结果吃了大亏。毛泽东以前讲过，春夏之交，秋冬之交，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要注意这个“之交”。如果不变换衣服，会闹出些毛病来。但他自己真碰到这个大的“之交”，也不清楚，还是用原来习惯了的办法去对付新问题，就出毛病了。

**访问者：**关于“文化大革命”，人们对周恩来议论较多，有的说他是忍辱负重；有的说他是不倒翁，是愚忠；更有甚者，个别人说他是软骨头。对于这些，您是怎么看的？

**金冲及：**“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一些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没有告诉他，这也是事实，当时他正

在忙着华北抗旱。《海瑞罢官》，他事先也不知道。后来成立工作组后不久，他又出国了很长时间。不过最初他对“文化大革命”恐怕是拥护的，实行反修防修，发动群众来消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阴暗面，这些在当时他不会反对。只是在方法上，什么人都打倒，他不会赞成。还有，他当时讲得很多的就是抓生产，生怕在这上面出事。其实，许多人在“文革”中被冲击、被专政，最初也还以为“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是对的，后来才慢慢觉得有问题了。大家都有个认识过程，我想这也包括周总理在内。

**访问者：**现在在人们心里有个结，毛泽东很信任周恩来，也只有周恩来才能和毛泽东说上话。可周明明知道毛有很多做法是错误的，又为什么不向毛提意见呢？

**金冲及：**这涉及我们如何理解周恩来的问题。举个例子，1965年，周恩来在审查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讲了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話。他说，即使是党的领袖犯了错误，只要没有发展到路线错误，提意见时，也要考虑到方式，考虑到效果，要注意党的团结。这时还没有搞“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人想到会有后来那样的事，这段话倒反映了周恩来处事方法的特点。从当时的情况看，要周恩来在会议上当场起来反对毛泽东提出的重要意见，他是不会那样做的，那样做也没有效。一般说来，他有不同意见时更可能的是在会下找毛主席单独交换意见。现在苦就苦在这里了，他单独见毛泽东的次数很多，这在他的台历上有记载。究竟谈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周恩来通常也不会把他有什么不同意见随便对别人说的。我只知道一件事，是王力讲给我听的。他说，周总理给毛主席讲过，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通，路线错误只有“左”或右，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次为什么讲出来呢？

因为周总理找王力了解《红旗》杂志的社论提出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怎么回事。可见周恩来单独找毛泽东，他会提出个人看法的。这是偶尔露出的一点点。其他的事，照我看，他如果给主席讲了意见，主席接受了，他下来贯彻时，只会讲主席说了什么，决不会说这个意见是我提的。反过来讲，他提了意见，主席没有接受，他下来还得贯彻毛主席的意见，决不会说，我是不赞成的，我已提过了，主席不赞成我有什么办法。现在也没有根据说，周恩来向毛泽东提了多少不同意见。反过来也没有证据说，周恩来就没有向毛泽东提过不同意见。谁也没有证据，因为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历史上总有些后人再也无法弄清的事情。

关于说周恩来是不是软骨头的问题，有一次我到某个大学给研究生讲课，就遇到过，是一个研究生递条于向我提问的。当时我讲了这么一段话。我说，现在有些年轻同志恐怕是不大理解、也不大懂得一个对国家、民族负有那么大责任的革命家、政治家，面对异常复杂的环境时，是怎样权衡利弊，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当时的环境多么复杂，存在着许许多多制约因素，对负有这样大责任的周恩来说来，并不是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以供周恩来选择的余地其实很小。某种程度上说，只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不赞成这样做，结果是什么呢？那只能是同毛泽东决裂，然后被打倒。另一种就是周恩来在“文革”中实际上所做的，要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时得违心地说一些话和做一些事，面在工作中尽量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并为以后纠正错误准备种种条件。如果采取第一种选择，决裂和打倒，在当时于事无补。而且我们国家当时处在那样

困难和混乱的情况中，林彪也好，“四人帮”也好，只是到处鼓动冲杀破坏。国家经济生活的维持、外交的联系、一些极端混乱状况的排除，甚至哪里没有煤了要用煤，哪里交通断了要疏通，全得要他在那里硬撑着。他身边的得力助手几乎都被打倒或靠边了。如果他下来，国家这些事怎么办？对“文革”中许多事（包括保护老干部和民主人士、制止过分的混乱状态等），当时也只有他说话多少还能起点作用。对党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怀有那样强烈责任感的周恩来，怎么可能不顾一切地任意采取行动？如果从个人来讲，他这样坚持着图的是什麼？他没有野心当主席吧，这谁都承认。他没有什么财产，也没有子女。到晚年的政治处境并不是那么好过，1972年以后又病得那么严重，可是他仍然一天坚持十几个小时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文化大革命’里，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他在前面两种选择中作出后一种选择，对他自己也许是一种最苦的选择，但只能选择这条路，忍辱负重，力挽狂澜，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尽可能减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另外在可能的情况下，一步一步地把一些被打倒或靠边的老同志扶起来，把五年计划重新制订起来，规章制度恢复起来，到最后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他的逝世，在全国人民中间产生那么大的反响，包括4月5日那样的事。所有这些，某种程度上讲是高度韧性的意志的表现。现在看，主席去世以后，我们党所以能够那么快地扭转局面，这里包含着总理在不为人谅解的情况下默默地准备下那么多条件所起的作用。所以在这两个选择之外，找任何一个选择，都不会比这个好。既要明确地表示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又能维持团结，这说起来而然痛快，事实上

却根本不可能。

**访问者：**林彪和江青一伙也是抓他的，在那么复杂的关系里，也就是周恩来能处理这些矛盾，维持这个大局面。

**金冲及：**我对那个递条子的研究生讲，陈老总是硬骨头吧？假如周恩来是软骨头，那么陈毅为什么还对周恩来那么尊重？就是因为陈毅能理解他，清楚地知道他有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一个伟大的肩负着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家，他在那里所考虑的问题，是不能用那种小市民市侩心理去猜测的。一看他没有倒，就想他是在保自己的什么，是在怕什么等等，所以就有“软骨头”之类的说法了。一个人不怕别人批评他，就怕别人误解他。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当然可以说周恩来哪一点做对了，哪一点做错了。他也不可能什么都是做得正确的。这些，后人自然都可以评论，但首先总得如实地理解他，决不能轻率地不符合实际地凭着自己的猜测去议论。

### **性格、出身的差异，……这不是主要的**

**访问者：**记得有一次听您说过，如果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出身、少年时的环境作些比较是很有意思的。毛泽东出身于一个上升的农民家庭，家庭内部的关系又比较紧张，在他身上反映出的“挑战”意识很强烈；而周恩来则出身于一个向下败落的家庭中，家庭内部的关系又比较融洽，这同他看重和谐、顾全大局的个性的养成很有关系。他们这些性格上的差异，对他们以后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

**金冲及：**这个话我说过。每个人所处环境的不同，包括童年的出身、经历，对于一个人的一生都是有影响的。周恩来出身于“书香门第”，他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比较正统的东

西多一点。而正统的传统文化里而不一定都是糟粕。

**访问者：**不好说温良恭俭让就完全不对。

**金冲及：**要作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否定。毛泽东在农村中长大，经常看到农民那种痛苦的生活，他从小喜欢看《水浒传》、《封神榜》一类的书，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而，他更欣赏带有叛逆性格的那些人物和学说。他在家里又是长子，父亲对他的影响不是温情脉脉，而是很严厉。反抗性格在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就表现得很突出。

周恩来出生在一个日益败落下去的家庭里，处处领会到生活的艰难，从小就有那么重的、几乎是他这个孩子力不胜任的生活担子要他担起来，养成他对集体一直有着一种特别强烈的责任感。他小时候过继给叔父，后来又由他伯父带出去，有时在一种“寄人篱下”的情况下生活。当然“寄人篱下”这个词并不确切，因为他伯伯待他很好，但总和在家里生活不同。他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写的作文中说到：有一年除夕夜，别的同学都回家了，他回不去，不仅家在千里之外，而且那么穷困，想到这些他很伤心，流的眼泪把枕头都湿了。所以，他很重感情，也很能忍。周恩来整风时在重庆一次党的会议上还讲到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他的性格也有影响。在他身上还有刚毅果断、总能以理智支配自己感情的一面。如皖南事变这样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就不说了。我举个小例子，1958年他的家乡搞农田基本建设，碰到他父母的坟墓，他就坚决要求把他父母的遗骨进行深埋。这在我们今天看来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周恩来身上并不是这样。他的留日日记上记有这么一件事：当他听说母亲坟上的砖头露了出来，心里十分不安，一夜都没睡觉，恨不得能立刻飞回家乡去料理。可见他对母亲的感情多么深。但在1958



年那个状况下，他毫不犹豫地要求把坟墓平掉，把父母的遗骨埋下去，其实也包括把他自己的感情深深地埋了下去。

**访问者：**这是一个很生动的故事。看来在周恩来这样的伟人身上，他的性格也有两个方面。那么，一个人少年时代的性格在这个人身上能起多大的作用呢？

**金冲及：**一个人大概到二十来岁，性格就逐渐形成了。这种性格是不是后来都消失无影呢？不见得。拿我自己的体会来讲，到现在已经做了四十多年的共产党员，但青年时代的朋友见面时，觉得你还是和做学生时差不多，性格好像没有怎么变。其实，变还是有变化的，变了什么呢？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当然和那时不一样了，有了自己的坚定信念，在实际工作的锻炼中学到了许多原来没有的东西，对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不再能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就是性格在有些方面也有很大的变化。所以，一个人早年的性格对他的影响要作一个适当的估计，不能太多的去强调。对一个人起决定作用的更多的还是他长期所处的环境和社会实践，不完全取决于童年养成的性格。今天我们研究毛泽东、周恩来也是这样，可以把童年对他们的影响作为一个角度去分析，但不要过分去强调。一个正确的判断如果过分夸大了，甚至把局部说成全体，也会变成谬误。

毛、周身上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就是对人类美好理想的追求、把中华民族从苦难中拯救出来的极大责任感，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宽阔的胸襟，顽强的意志，高度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巧妙结合，包括对克服困难、挫折表理出来的韧性等等，这些恐怕是主要的。

**访问者：**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进入青年时代后的经历也不完全相同，这些经历是不是对他们的以后有影响呢？

金冲及：我看这个问题比童年性格的影响更重要，更要注意到。从毛泽东来说，他基本上是在国内活动，只是在解放后去过两次苏联。但在国内，他还是到过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广州这些大城市，如果没有这一段，只是在韶山，他也不会成为后来的毛泽东。毛泽东坚持不出国，说他的任务首先是要研究中国。这一条，毛泽东是很高明的。对旧中国国情的了解，在我们党内谁也没有毛泽东了解得那么深刻、那么准确。不要说从苏联回来的那些留学生，甚至其他人解没有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熟悉。所以，在怎样推翻旧中国这个大问题上，任何人都不能和毛泽东相比。但反过来讲，他对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对世界范围内社会经济发生着的深刻变动，毕竟没有多少直接的接触。当我们需要建设一个新中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怎样再前进，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他的经验和知识渐渐不够用了。当然，毛还是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但这种经验和知识上的局限对他也不能没有影响。

有一次，我到乔木同志那里去谈到：把《论十大关系》重谈了一遍，跟周恩来在这前后的一些讲话相比较，觉得两人在思路上有点差别。《论十大关系》中没有着重谈知识分子问题，没有谈科学技术问题，他侧重于怎么能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理顺多种关系，热气腾腾地把国家建设搞上去。周恩来在总的方面自然是按毛泽东的主张去发挥的，但他比较注意到我们正面对着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巨大挑战，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科学技术是关键。他还讲到过搞建设不能光靠人多，也不能过分遍求超越实际可能的高速度。他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还特别强调高级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这一时期，从两人的思路上细看，是有差别，或者说是同中有

异的。

**访问者：**问题在哪里呢？

**金冲及：**我想，这跟他们的各自经历也有关。周恩来、邓小平，包括陈老总、聂老总他们在年轻时都曾长期在欧洲留过学，即使是陈云，也是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上海成长起来的，十二三岁就在商务印书馆当学徒，他们对科学技术、对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亲身感受比较多，这对他们理解问题和考虑问题都是有影响的。当然，并不是说毛泽东和他们在路线问题上有根本的分歧。总的说来，他们都是面对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中国实际国情，在想问题，在摸索经验的。在探索过程中，细看起来，各人考虑问题的角度和思路有差别，但并没有形成鲜明的两种不同主张，最后还是统到毛泽东那里，由他作决定，别人还是按照他的主张去做。

**访问者：**能不能这么说呢，毛泽东在国内的知识和经历，在民主革命时期显示了巨大的作用，别人在国外留过学的经验和知识则暂时没有多少用。建国后，毛泽东的经验和知识渐渐不够了，而他们的知识则可以用上了。所以就产生了思路上的差异。

**金冲及：**有这个问题，但起决定作用的，仍不是青年时代的经验，而是现实的社会实践。周恩来为什么在知识分子会议上讲那些话，这跟他当时的实际工作有关：他领导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一订计划，一算账，就发现我们的专家太少了，我们要达到什么指标，建设多少工厂，就需要多少技术人才，缺工程师啊。还有一个情况，这段时间周恩来到国外去了多次，1954年去日内瓦、去欧洲，1955年到万隆，他看到了国际上科技发展的势头，引起了思考，因此，他在讲话中谈到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些亲身的感受、

感触，决定了他对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

所以，这些后来的社会实践比他们的家庭出身等造成的早期性格关系还要大。今天我们回头来看历史，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中国正处在一个空前激烈的社会大变动时期，那个时期的主要斗争形式就是群众运动，一直到武装斗争，社会发展进入一个巨大飞跃的阶段，事情变化得那么快，这是长期历史积累下来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大显身手，总结出一套中国革命的经验，演出了一场场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按照量变和质变的规律，在一个飞跃实现后，又需要积累，经历一个渐变和部分质变的过程，不能凭主观而不断地采取大飞跃的方法。硬要那样做，即便是好心，也违反了客观规律，就会摔跤子，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我们今后的发展也是一样，要几年上一个台阶，波浪式推进，不能再用类似“大跃进”的方法。如果达成这个共识，既发愤努力，大胆地开拓前进，又严格按客观规律办事，我们的国家、民族是大有希望的。

1992年12月19日于北京前毛家湾

## 访张培森——

### 毛泽东和张闻天

张培森

张培森，1931年生，江苏镇江人。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和研究。1980年起进行张闻天研究。现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组长、研究员。主持编辑了《张闻天文集》、《张闻天研究文集》等。

在毛泽东的战友中，张闻天是比较特殊的一位，先不论他们的经历不同，单从他们的地位变化，也有不少内涵外延值得探究——话题也正是从这开始的。

**访问者：**毛泽东和张闻天都是我们党的领袖人物，一段时间内张闻天曾是毛泽东的上级，后来毛泽东又成了张闻天的上级。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特殊。既有很多事业上的接触，也有私人之间的交往，相互间还有些恩恩怨怨。

**张培森：**毛泽东长张闻天7岁，原来两人并不认识，直到1933年张闻天到中央苏区，他们才第一次见面。但有一个偶然的巧合，早年他们两人的名字曾一起排列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表上，原来他们差不多同时参加过少年中国学会，那

是建党之前的事情。

**访问者：**但两人并没有因此见面认识。

**张培森：**是的。少年中国学会是一个松散的进步团体，两人入会的时间基本相同，彼此未曾谋面是可以理解的。但从他们两人同时入会的情况来看，表明他们当时都是要求进步、锐意改造中国的先进青年。

## 成长道路的不同特点

**访问者：**从两人青年时代成长的道路来看，您认为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张培森：**我认为两人在成长道路上是有不同特点的。当然他们建立的理想都是走十月革命的路，都是实现共产主义，但个人成长的具体道路两人有很大不同，就这个不同来说，对他们后来一生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从毛泽东来讲，他师范毕业，教过书，搞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有过国共合作的经验，最后拿起枪杆子上了井冈山，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道路。他的经验非常丰富，可以说十八般武艺样样试过，党内没有人能比得上他。

张闻天呢？他基本上是一个文化人。他和毛泽东虽然都是五四时代的先进青年，但他走的是另一条路，是学者式的道路。五四以后，他写文章，写小说，搞翻译，这是他的主要活动。特别在文学方面，他从歌德到泰戈尔都做过研究，而且还有相当的成就。据研究歌德的专家评论，张闻天1922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论述歌德的长诗《浮士都》的文章，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一篇。一般来说，《浮士都》是很难看懂的，而张闻天那个时候就不但把它翻译了过来，还进行了系统的

评述，这很不简单。张闻天写的小说，茅盾备加赞赏。茅盾说他自己1927年才写中篇，而闻天比他早三年就进行创作而且是长篇，对此他自叹不如。如果闻天同志不是全身心投入革命斗争成为革命家，很可能在文化上占据一席之地。所有这些表明张闻天和毛泽东有着不同的经历。

**访问者：**他们两人的活动范围似乎也有区别。

**张培森：**是的。毛泽东的活动范围全部是在国内。张闻天在成长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国外。他1920年去日本半年，1923—1924年到美国一年多，入党后又去苏联五年，回国时31岁。应该说在我们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像张闻天早年到过美国这样的生产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只有他一个。从上而的情况来看，张闻天拥有大量的书本知识和广泛的阅历，眼界很开阔，但他的弱点是实践经验少。

**访问者：**张闻天从苏联回来就受到了国际的重用。

**张培森：**是的。国际把他放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对于一个缺乏实际斗争经验、不甚了解本国国情的同志，必然要照搬国际指示，这样就犯了错误。而从当时在苏区的毛泽东来看，因为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不同意照搬国际的条条，因而遭到打击。张闻天缺乏经验但受到了国际的重用，因而犯了错误。

## 从分歧走向合作

**访问者：**因为两人的经历不同，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也就产生了不同的认识。那么请问他们在苏区时有过正面冲突吗？

**张培森：**没有。应该说两人是从有分歧逐渐地走向一致。毛泽东无疑是正确的。从张闻天来说，他从苏联回来，先在

上海，对下面的情况不了解，自然就要盲目服从中央贯彻国际进攻的路线。他看到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贯彻的一套不一样，因面有人说毛泽东右倾，是富农路线，张闻天也这样认为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张闻天本人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表示他和毛泽东之间并没有私人成见，更没有仇恨，不过就是不了解毛泽东，不认为他是正确的。后来才看到他军事上有一套。

**访问者：**由于思想路线不一致，两人来往比较少。是吗？

**张培森：**事实上随着张闻天和苏区中央主要领导博古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之后，他和毛泽东的关系越来越好。虽然完全掏出心里话是在长征前夕，但这之前他们彼此比较尊重。当过毛泽东英语翻译的吴亮平，我曾访问过他多次，中央苏区时他是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东是他的上级，张闻天也是他的上级，应该说他是毛张关系的历史见证人之一。他对我们说：毛泽东、张闻天两人的办公室就隔一堵墙，我请示张闻天时，他总是说你去问问毛泽东。毛泽东病了，张闻天去看他，用手抚摸他的腹部，很关心他的病情。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得了一场疟疾，昏迷不醒，是张闻天派傅连暲星夜赶去抢救，才缓解了病情。所以对毛泽东这场病，从某种意义上说，张闻天起了救毛泽东命的作用。当然张闻天也从毛泽东那里学了一些东西，比如毛泽东善于调查研究，张闻天在苏区也搞了一些调查。张闻天说，我是模仿毛泽东。他们的思想是在实践中开始接近起来的。

## **遵义会议合作的历史作用**

**访问者：**这么说，经过战争的摔打、失败，张闻天醒悟了，他认识到毛泽东的英明，因此在我党历史上才留下了一



段毛张合作的历史。那么关于毛泽东同张闻天遵义会议合作的作用您是怎样估计的？

**张培森：**遵义会议是同李德、博古错误军事路线的斗争，王稼祥、周恩来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否认，但我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同张闻天所起的作用似乎更为关键。毛泽东就曾经说过当时只要能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事实上张闻天正是苏区中央局最高领导层中最早站到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的中央领导人，他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主席。这里书记处书记实际上就是中央常委。张闻天这个职务对遵义会议所发挥的作用可以从一件事看出来。过去人们只说毛泽东发了言，但不知道张闻天还有一个报告。事实是这样的，博古作正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然后是毛泽东发言。

**访问者：**反报告是什么意思？

**张培森：**反报告，就是张闻天把博古的报告批了一通，作为代表正确方面的报告。因为在党的高层几个常委里，如果一把手的报告被否了，那常委当中必须有人站出来讲正确的意见，当时的毛泽东还不具备这个条件，他还不是常委。那么这个人是谁？是谁站出来首先讲话了？正是张闻天。自然这个反报告主要也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搞出来的，是毛张合作的结果。所以为什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讲，没有洛甫和王稼祥，遵义会议是开不好的。从张闻天来说，这是其作用的表现之一。

**访问者：**我们想是否还有另一面，当时大家最信奉的是共产国际，张闻天是国际信任的人物之一，由他站出来批评是比较合适的。

**张培森：**这正说明毛泽东的高明。想想看，当时国际是

我们的顶头上司，权力很大，过去它让谁当第一把手谁就是，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信任的人轰下台来，国际派来的顾问靠边站，这样大的事情，如果没有国际信赖的教条宗派集团内部有影响的人出来讲话，那是很难办的。所以毛泽东团结了张闻天、王稼祥等。

**访问者：**那么您认为在张闻天向毛泽东靠拢同博古错误斗争中，是主动还是被动？

**张培森：**从事实来看张闻天的转变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1931年他回国以至后来到中央苏区，开始和博古的思想是一致的，后来在一些政策问题上明显表现出他和博古的分歧，不仅仅是分歧，而且发展到很尖锐的冲突。同时张闻天不只是认为博古推行的军事方针行不通，而且发现组织上博古从党的核心内部排挤他，所以在长征出发的前一天，他把心里的郁闷全跟毛泽东讲了，从此两人接近起来。想想看，张闻天的郁闷为什么不跟别人讲，而是找处于无权地位的毛泽东去讲？说明他信任毛泽东，认识了毛泽东的正确。

### **毛张合作克服了党的三次危机**

**访问者：**毛张合作的重要作用是否仅限于遵义会议呢？

**张培森：**不。从遵义会议召开前到六届六中全会前我们党实际上遇到了三次大的危机，一次是王明、博古“左”倾路线导致的军事失败，一次是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再一次是1937年王明从国际回来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而这三次危机过程中应该说毛张都进行了很好的合作，对克服危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就在此过程中从确立走向了巩固。

**访问者：**在第一次大危机中毛泽东、张闻天等合作反掉

了王明、博古。第二次、第三次又怎么说呢？

**张培森：**有的外国学者把张国焘看得比王明、博古还严重，不管怎么说，这应该算做一次大的危机。因为论资历张国焘是党内数得上的老资格，加上当时他仗着四方面军人多，所以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根本不把中央放在眼里。

**访问者：**据我们了解，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央领导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包括博古在内都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

**张培森：**但张闻天的位置很重要。因为张闻天遵义会议后已经被推举为党内负总责，而作为党的总负责人的张闻天是否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当时就非常重要。须知会师之后张国焘对遵义会议后的军事方针也是否定的，散布流言说是违反五中全会的进攻路线。对此毛泽东在沙窝会议上作了巧妙的回答，肯定我们在政治上是进攻的，但革命战争则要根据情况决定防御和退守。而张闻天则是在这次会议结论中作了同毛一致的说明，并以负总责的身分提出遵义会议决议“应在四方面军党的支部讨论”。可见张闻天对毛泽东讲话支持的重要。

第三次危机是1937年12月王明从莫斯科回来，指责中央的一套抗战方针，鼓吹他的一套右倾投降主义。他这一搅和使很多人一时弄懵了。尤其他当时是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加上当时是民族斗争环境，国民党也抗战了，所以就迷惑了一些人。这种情况下，党内首先顶住的就是毛泽东。同时毛自然也就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而这时毛泽东又一次得到了张闻天的合作和支持。现在找到1937年12月22日张闻天在中央一次会议上所作的一个“总的结论”，从讲话的口气来看实际是不指名地软顶王明的，而且明确指出统一战线中不能放弃基本原则，对八路军与新四军不仅要扩大，而且要保存党

的领导。“我们必须扩大三五十万党能直接领导的军队，统一战线才能更有力些。”这话实际上就是坚持了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原则。而毛泽东在当时困难处境中向华北发出的许多发展根据地和游击战争的指示就是以“毛洛”联署形式发出的。所以，毛泽东在“九大”时还没有忘记张在这关键时刻的立场，他说：王明回国以后张闻天没有站在王明一边，是站在我一边的。

## 毛张合作的历史地位

**访问者：**既然毛张合作有这样的重要作用，为何过去人们很少知道呢？

**张培森：**这里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张闻天这个人物长期在党史宣传上是被当成机会主义代表人物看待的，而1959年庐山会议又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像这个党史人物全面历史面貌的恢复，应该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路线的结果。因此毛张合作这个重大史实一个长时期内是被沉到史海里了，现在是钩沉，这一点也不夸大，就是两人的合作在党史上应该有足够的地位。王震同志1985年就在一个批示中向邓力群、胡乔木、胡绳建议：在修改党史时应该“待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特别是长征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史实载入史册”。

**访问者：**那么请谈谈您的看法。

**张培森：**从遵义会议后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个阶段里，毛是党中央领导的实际核心，张是中央的总负责人，他们两人的合作应该说是很好的。从这段时期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中央100多份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大部分会议都是张闻天主持，许多重大决策都是毛或张先作报告，并在讨论的基础上

张作总结发言，毛作结论。我在编辑《张闻天文集》时还做了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从1935年6月到1938年10月三年多的时间里，仅保留下来的洛毛或毛洛联署的电报就有338份，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直接关系到当时中央许多重大决定的贯彻。我给邓力群同志写报告时说到这件事，他认为很有价值，要我整理出来。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一段毛张二人的关系，可以说毛离不开张，自然张也离不开毛。

**访问者：**这个合作的重要历史地位是否还应该放到中国整个革命发展进程中来评价？

**张培森：**是的。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到1938年10月这三年，应该说，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相当重要的阶段，对我们党来说也可以说是困难和机遇并存。现在我们搞建设要抓住时机，那时也有个时机问题，如果不抓住，中国革命的大发展恐怕也是很难的。毛泽东曾经戏言要“感谢”日本人，这句话里包含着很深刻的道理。如果没有抗战，没有世界大战，中国革命的道路将会是更漫长的。红军长征虽然找到了落脚点，但毕竟处在陕甘一隅，其生存发展仍然遇到了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日本帝国主义入侵造成的民族矛盾这个突出矛盾，大力开展统战工作，终于推开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面。如果那时对民族矛盾的地位不认识，就很难扭转乾坤，打开局面。而毛张在这个主要矛盾问题上认识是完全一致的。须知这是在中央决策核心内两个关键人物战略思想的一致，对于开创革命新局面的我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历史决议所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然而单靠毛一个，没有中央集体中其他同志的配合，我想也是肯定不行的。而这段重要时期，张

闻天对毛泽东的配合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合作的一个特点

**访问者：**从我们所看到的陕北初期毛张的来往电报来看，他们完全采取互相讨论、互相切磋的方式来确定党的大政方针。例如1935年12月1日毛泽东从前方给张闻天的一份复电，告诉他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完全同意；同时在另外问题上也有不完全同意的，这就是同意张闻天提出的“红军靠近外蒙的方针”，却不同意张提出的行动时间与路线；还有的问题基本同意又加以补充，这就是关于转变对富农的策略。

**张培森：**你说得对。毛这份电报所说完全同意的反蒋抗日策略内容实际上就是后来构成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内容。至于电报中所说的红军打出去靠近外蒙在行动路线问题上，张与毛起初是有不同主张的，张的意见是占据宁夏背靠外蒙，而毛则主张先占领山西，后来是张接受了毛的意见，因此便有后来的东征。事实上也有张在重大问题上先出了好主意的，例如，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就提出了“尽量争取南京正统”的主张，这在当时是同毛的想法不一样的。想一想当时谁是南京政府的正统？除了蒋介石没有第二人。当然，后来党内很快统一了认识，最后还是毛做出和平调解的结论。从事实材料来看他们的这种合作，是坚持真理的合作。凡是毛正确的张就帮他论证并加以支持。而张错了的话毛可以指出，毛不正确的张也可以纠正。同时整个中央的民主气氛也比较好。正如林伯渠后来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评语：“在中央苏区时，表面上的组织生活很严，但怕一句话说错了要斗争。1936年保安的九月会议时，我感觉党是进步了，到‘双十二’时便感到

党更统一了。”总之这三年多中国共产党开辟了那么大的局面，首先是因为确立了毛的领导核心，同时也是与洛毛的通力合作、中央集体领导搞得比较好是分不开的。

**访问者：**据周恩来回忆，长征时博古下来换成张闻天，就是毛泽东提议的。这表明毛泽东对张闻天是好的。张闻天和刘英的红娘也是毛泽东。

**张培森：**这段时间他们的关系确实是比较好，毛泽东也尊重张闻天，认为张比较民主，戏称他是“明君”，刘英是“娘娘”。张闻天与刘英两人在瓦窑堡结婚，毛泽东打完仗回到瓦窑堡还去闹新房，关系比较融洽。

## 关系的变化

**访问者：**从你上面谈的可以看出毛张是从有分歧到走向合作，那么后来又如何从合作变成疏远，以至再发生分歧的呢？

**张培森：**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明白的，同时有些情况也不完全清楚，尚需要研究。这里只能向你们谈一点已经知道的情况。

先说一件事，是毛同江青结婚。结婚之前党内有些同志得知江青过去的历史就认为不合适，他们把意见集中到张闻天那里。张本人觉得个人私事不便干预，但是又感到大家意见有道理，考虑一番之后综合大家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写了一封信。结果毛大为不悦，结婚喜酒也没有请张。这在当时虽说算不了大事，但也多少看出一点两人关系的变化。

再一件事，是毛对张领导的马列学院的批评。延安马列学院成立于1938年，院长是张闻天兼任。1942年张响应整风号召去晋西北调查期间接到毛一封信，大意说，有人提出马

列学院方针是否错误问题，凯丰、弼时意见待你回来再讨论，我觉得不必等你，即指示是错了。信最后要张回电表态。事隔半个世纪，现在还健在的大部分马列学院的学员都不同意马列学院犯方针性错误的说法，认为张闻天在主持学院期间还是努力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方针的。只能说张对理论与实际关系的认识当时尚没有达到后来整风认识的高度，但不能简单说是教条主义。何况人不在的情况下就匆忙作出结论，也未免欠公允。张当时对毛发动的整风是衷心拥护的，但认为毛看人有偏向，这是他在整风笔记中坦诚说了的。这件事也多少表现出当时他们二人的关系。

**访问者：**那么张闻天党内负总责是什么时候不再担任的，从党内职务上说张毛党内最高职务又是如何交替的？

**张培森：**这个交替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对于张闻天来说有两点是表现非常突出的。一是不争权。他在1943年整风笔记中说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他曾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总书记一职”辞掉，但毛没有同意。尽管如此，张还是把自己的工作转移到宣传教育部门工作方面。二是不计名位自觉地要求到基层去，1942年3月他从基层应召回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正是这次会议推举毛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从这次会后张正式离开了书记处。不过张从中央核心中下来，只是工作中毛张的来往少了，中央许多重要的会议张那时也还都是出席的。抗战胜利后张又主动要求到东北去做地方工作，这时毛张地域上已经不在一起，自然也就更加疏远了。

## 庐山会议分歧的探究

**访问者：**众所周知，毛张建国后的明显分歧发生于1958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张因庐山会议发言而遭受打击，中央对于这段历史已有明确结论。那么为什么一向掌握真理的像毛这样的领袖这次却犯了错误，而过去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张却反倒头脑比较清醒呢？

**张培森：**关于毛这段错误，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已有全面分析。这里很重要的一条教训是共产党人千万不能与实际脱节。论及这个历史教训倒是用得上张闻天1943年调查回来写的总结报告中的两句话。“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因此，即使像毛这样的伟人，一旦脱离了实际也同样会犯错误。而张虽然过去犯过错误，然而却真正从思想上吸取了教训，从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反倒相对来说站到了真理的方面。历史的遗憾是当时我们党却并没有能够分清这个是非，以致张闻天这样真正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共产党人竟遭受打击而含冤终身。当然从整个党来说就不只是个人的悲剧，而是严重地损害了党的肌体，导致整个国家、民族都遭到了一场严重的灾难。

**访问者：**据说建国后是毛泽东亲自提议张闻天担任外交官的，这对于张可不可以说是人尽其才了呢？

**张培森：**张闻天转外交战线是1950年的事情。那时我们为了争取早日进入联合国，需要很快发表我国出席联合国首席代表的人选任命，时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亲自从莫斯科致电刘少奇，提议张闻天出任此职。由于时间过于紧急，此事事先都未能来得及同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张本人商量，征求他的意见。张虽然感到突然，但还是接受了中央的这项任命。后来由于美国的阻挠，我进入联合国的计划未能实现。而张却

从此开始了他 10 年的外交生涯。先被任命为我驻苏联大使，后又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若要论条件来说，张做外交工作自然也是很称职的。不过从张本人的心愿来说，似乎更愿意从事经济工作。

**访问者：**您是否认为张闻天更是一位适合领导经济的人才而没有得到毛的重用呢？

**张培森：**张闻天很早就对经济研究有兴趣，1923 年在旅美期间就写过纵论战后世界经济的长文，1931 年从苏联回国不久就参与并领导了与托派在中国经济性质问题上的论战，1933 年进入中央苏区后又直接接触并研究了苏区经济。他 1933 年在苏区发表的一篇批评“左”的劳动政策的文章中，明确提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发展苏区经济，这在当时毛的文章中也还没有这样明确。延安时期他深入农村进行了长这一年零两个月的调查。张不但一直对经济有兴趣，而且有相当的理论根底，他是我们党内少有的系统读过《资本论》的领导人之一。建国前，当毛泽东主要精力还在集中于战争的时候，张已经在东北研究解放后的经济问题。他 1948 年就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五种经济成分的最初蓝图，初步提出了国营经济为主、多种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受到毛的称赞，并被吸收到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之中。因此，张可以称得上是新中国经济建设道路探索的先驱者之一。他在东北领导经济过程中有不少好的设想，如果不是中央调他去搞外交，他肯定会在经济方面钻研下去。

后来据了解，他在担任驻苏大使期间还曾提出过回国搞经济工作的想法，但是毛没有同意。意见是由陈云转达的。这当然是个遗憾，但即使让张搞经济，是否就一定能得到毛的重用、充分发挥其作用也很难说，因为看来毛张在经济方面

思路是不完全一样的。

## 在经济建设问题上的不同思路

**访问者：**毛张在经济问题方面又如何表现出思路的不同呢？

**张培森：**要说不同，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毛强调政治统帅经济，搬用战争年代一套群众运动乃至军事领导的办法来领导和管理经济，而张则强调要尊重经济规律，按照经济本身的规律来领导经济。1959年庐山会议张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表达得最为清楚。张在庐山会议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是意义深远的，他说：“我们一定要研究、认识和掌握运用客观经济规律”，“中国的经济建设有其特殊性，但是普遍规律在我国的建设中同样起作用。问题在于要使普遍规律同我们的实际相结合，使马列主义理论得到发展”。毛认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走自己的路是对的，但是如果是脱离了或者违背了普遍的经济规律，就不可能真正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就是证明。

**访问者：**张闻天这里强调普遍经济规律与我们的实际结合，其意义又怎么看？

**张培森：**这在理论上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因为长时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根本不承认社会主义还存在有与资本主义共同的普遍经济规律，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实际都没有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实现突破。而真正在这个问题上突破的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张闻天当时虽然也没有完全搞通，但他却是把这个大的思路提了出来，应该说这是不简单的。正是在这个思路之下，他60年代初一方面理论上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学应该大胆

运用《资本论》中的某些经济范畴，另一方面则又在调查的基础上向中央提出开放全国市场的建议。可惜这种可贵的探索不久却被当作“修正主义”进行批判。

## 毛张关系的演变给我们留下的启示

**访问者：**从毛张关系的演变来看，您认为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吗？

**张培森：**毛张作为中共党的领袖人物，在党的历史上是值得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比如他们的合作是怎样建立的，后来分歧又是怎么发生的，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没有，好好总结对于我们改善党的领导会很有好处。从毛张关系的演变和最终的结局来看，我认为很重要的一条教训是党内的民主建设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样形成从上到下都是第一把手说了算，这从表面上看起来挺顺手，实际上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因为人无完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无论何人都不可能时时、事事正确，如果只听一个人的，必然走向失误。尤其是当第一把手威信不断升高的时候，把主要领导人的权威强调到绝对化，这就是个人崇拜，因此是很危险的。毛泽东最伟大的时候，也正是他广揽人才，注意吸取集体智慧的时候，像张闻天这样原来缺乏经验但有思想的人，也能跟他很好地合作，并没有因为他犯过错误而排斥他，而是一起共事团结奋斗，开创了新局面。所以党内民主，事业就兴旺发达。但后来不注意吸收集体智慧，不能容人了，特别是听不得反面意见了，因此就不断出现失误，走向了歧途。这是很大的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取。

1993年4月27日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 访吴正裕——

## 毛泽东和鲁迅

吴正裕

吴正裕，1935年生，江苏宜兴人。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毛泽东研究组副组长。长期从事毛泽东著作的编辑、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工作。主持编辑《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参加编辑《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是《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第二版、《毛泽东年谱》的副主编之一，还著有《毛泽东》传略（合著）等。

一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有口碑，有心碑，有史碑，用这三者来衡量中国20世纪的两位伟人，是不为过的。所谓伟人现象，也是因为他们对历史的巨大贡献的结果。

### 两颗璀璨的巨星

访问人：在中国现代史和革命史上，有两个人是人们有口皆碑的，这就是毛泽东和鲁迅。他们对中国革命、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进步，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毛泽东曾说过，他的心是和鲁迅相通的。能否就毛泽东和鲁迅的关系，谈谈您的看法？

**吴正裕：**毛泽东和鲁迅是现代中国人民的骄傲，无论站在什么角度看，他们都是中国思想史上和文坛上的两颗璀璨的巨星。

鲁迅长毛泽东 12 岁，可以说是长一辈的人，他上学较早，在现代中国思想界和文坛上出名也早，特别是到晚年，理论上、文学上的成就达到了他的巅峰，在中国和世界都有很大的威望和影响。毛泽东在鲁迅成就卓著之时，虽然也在中国出了名，在革命方面已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在理论上、在文章成就上还没有获得很高的成功，他的影响主要还只是波及部分地区和部分人群。他在全中国以至在世界，是逐步被人们认识的。应该说，是从斯诺写《西行漫记》后，世界对他才逐步有了了解。

鲁迅和毛泽东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共同的，总的来说他们都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鲁迅还是伟大的文学家，毛泽东虽不好说是伟大的文学家，但也是一个大作家和大诗人。作为文化名人，毛泽东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他对历史、文学以至书法的造诣都是很高的。

**访问人：**胡绳最近写了一篇纪念胡乔木的文章，称乔木同志是一个大作家。毛泽东当然也是一个大作家。

**吴正裕：**另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在青年时代就抱着救国救民的伟大志向，后来都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把他们的革命志向付诸实践。鲁迅为了改变国民精神，选择文学作为武器，他在中国文化革命方面是个巨匠、旗手，有很多的文学作品，如小说、杂文等，在中国文坛上有杰出的成就。毛泽东献身革命后，为了改造中国，不仅在中国文化上贡献巨大，而且还在中国革命、文化建设以及思想领域的各方面都有巨大影响，同时，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军事

家。

**访问人：**也就是说，毛泽东不仅停留在思想上，还付诸了实践。

**吴正裕：**是这样，所以他还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当然鲁迅也是革命家，他对旧社会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对旧制度、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作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也是大革命家。

**访问人：**刚才你说，他们之间有共同的，也有不同的，不同的地方表现在哪里呢？

**吴正裕：**不同的是，毛泽东做出的成就更全面、更辉煌。他不仅在思想文化领域有很大贡献，还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改变了中国的面貌，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如果说鲁迅是中国 20 世纪的一代伟人的话，毛泽东不但是中国而且是世界 20 世纪的伟人。

### 毛泽东同鲁迅见过面吗？

**访问人：**毛泽东和鲁迅都曾为改变旧中国而奋斗，他们又共同生活在为改变中国而斗争的年代，他们两人见过面吗？

**吴正裕：**毛泽东对鲁迅相知是比较早的，可以说很仰慕他，但现在没有文献记载足以证明他们曾经见过面。过去有人说他们见过面，是没有根据、不可靠的。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鲁迅日记》，鲁迅记日记从不间断，他把每天的重要事情都记录了下来，我们从《鲁迅日记》中查不到他们会面的记载。二是毛泽东的文稿和讲话，毛泽东的文稿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他也没有说过曾见到鲁迅的话。据冯雪峰回忆，1933 年底毛泽东曾对他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

见过鲁迅。”又据胡乔木回忆，1954年他审阅《鲁迅全集》注释时，曾询问毛泽东，是否同鲁迅会过面。毛泽东明确回答：早年在北京，是会过不少名人的，见过陈独秀，见过胡适，见过周作人，但没有见过鲁迅。许广平也曾回忆说，鲁迅生前虽然没有和毛泽东见过面，但他对毛泽东是倾心拥护的，对他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拥护的。我认为这些回忆是可信并且是可靠的，就是说毛泽东同鲁迅没有见过面。

虽然毛泽东和鲁迅没有见过面，但他们之间是互相仰慕的，心是相通的。

### 毛泽东读鲁迅的著作

**访问人：**那么，毛泽东是如何看待鲁迅和他的思想以及作品的呢？

**吴正裕：**毛泽东非常敬重鲁迅的人品，也很爱读他的著作。至于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读鲁迅的作品，早年是否读过，现在还没有文献可查。最早的记载是到延安不久，毛泽东曾从陕西一所中学图书馆陆续借了一些鲁迅著作的单行本，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读完了这些著作，并作了圈点。1938年1月12日毛泽东给艾思奇的信中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通过这封信，至少可以看出毛泽东在1938年1月以前已经读了一些鲁迅著作的单行本，但限于当时的客观环境，他还没有系统地读到鲁迅的著作。

**访问人：**这时《鲁迅全集》出版了吗？似乎要晚一些。

**吴正裕：**《鲁迅全集》是1938年下半年出版的，毛泽东信中既然提到《全集》，可能他已得到了消息。1938年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曾把已出版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专门托



人带到延安，送给毛泽东，封套是紫红布面的，装帧别致。毛泽东一直带在身边，转战南北，直到中南海，现在还在他的藏书室里。这套书留下了毛泽东的圈画、批注，有些著作还是多次圈阅。他1949年访苏时，还特别选出几本，抽空阅读。1958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鲁迅的《花边文学》、《为自由书》、《三闲集》等单行本，他把这些单行本放在床上，随时翻看。70年代初，毛泽东的眼睛患了白内障，动手术后视力也差了，他提出把《鲁迅全集》印成大字本，这套大字本也一直放在他的床上，有的地方还夹着纸条，有的书角折了起来。据他的身边工作人员说，当他读到鲁迅著作深刻的议论和犀利的笔锋处，往往赞不绝口。可以说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除了马列著作、文史古籍，读得最多的就是鲁迅的著作。

**访问人：**毛泽东读鲁迅的著作，最喜爱读的是哪些？

**吴正裕：**首先是鲁迅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毛泽东对外国小说和中国现代小说读得较少，他比较喜欢读中国明清优秀小说，如《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等，有的不止读一遍，对《红楼梦》，他曾要求党政军领导人至少读五遍。对中国的现代小说，从文献中，从他的讲话中还没有看到他读过谁的小说，但对鲁迅的小说，他全都读过，并且常在讲话和文章中引用。提得较多的是《阿Q正传》，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党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

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在党内的会议上，他还多次提到写文件要像《阿Q正传》那样通俗化、口语化，这是对《阿Q正传》的另一种赞扬。

在文艺思想上，毛泽东也受到鲁迅的影响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比如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他多次引用鲁迅的话，因为鲁迅对文化界长期存在的洋八股进行过严厉的批评，他说：“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这也是一种八股。”毛泽东运用鲁迅的思想和风格，针对当时存在的党风不正的实际情况说：“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样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为了搞好延安整风，毛泽东还亲自审阅编成《宣传指南》的小册子，其中收入了鲁迅谈创作的一封信（即《答北斗杂志社问》一文）。毛泽东非常赞成鲁迅的观点，像详细地介绍了鲁迅创作的思想，指出：鲁迅说，文章写好后“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宣传指南》是延安整风运动二十二个必读文件之一，并被编入《整风文献》。

**访问人：**鲁迅的诗，也是毛泽东非常爱读的。

**吴正裕：**鲁迅的旧体诗是鲁迅全部创作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他的诗同他的小说一样，有鲜明的个性和战斗精神，所以毛泽东非常爱读。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七卷中收入了一些旧体诗，毛泽东都用心读过。1959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鲁迅《集外集》《集外集拾遗》中的诗作，毛泽东得到后都认真读了并在题目旁作了圈点。1959年3月，文物出版

社刻印了一册线装本的《鲁迅诗集》，共收诗四十七题五十四首。对这本诗集，毛泽东不知读过多少遍，他不仅作了圈点，大多还能背下来。在这年的12月，他还改写了鲁迅的一首诗，原诗名叫《亥年残秋偶作》，将其中的“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改为“悚听自吹皆圣绩，起看敌焰正阑干”，表达了他那时的心境。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还亲笔将鲁迅的无题诗“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书赠来访的日本朋友，并说：“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

毛泽东有一段时间，每次练字，差不多都写鲁迅的诗句。书写得最多的是《自嘲》中的两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1942年5月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就引用过，他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45年10月在延安时，他就书写过这一诗句。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随团应邀为全会演出。演出结束后，在接见演职员时，红线女请求毛泽东给她写几个字，毛泽东高兴地答应了。当晚，他就书写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并在诗句前写了一段话：“1958年，在武昌，红线女同志对我说，写几个字给我，我希望。我说：好吧。因写如右。”

**访问人：**鲁迅的杂文是非常生动和有特点的，既有深刻的思想性，又有很强的战斗性，对鲁迅的杂文毛泽东怎么看？

**吴正裕：**鲁迅一生写了六百多篇约130多万字的杂文，先后共出了16本集子，这些杂文无情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和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给中国造成的黑暗和罪恶，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文苑中的奇葩。鲁迅的功绩除了他的小说，成就最大的就是杂文。对鲁迅的杂文，毛泽东有很高的评价，也曾多次称赞。1939年12月9日，他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大会上的讲演中，说到国民党文化“围剿”情形时说：“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的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1957年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片面性时，他又举了鲁迅的杂文做例子，他说：“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谈时讲到：报纸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对“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时，又举了鲁迅的杂文，说：“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在回答如果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鲁迅的杂文涉及面是很广的，政治、艺术、文学都讲，特别是后期杂文政治讲得最多。他的东西都是被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所以特别有思想性和战斗性。杂文还是鲁迅独创的一种文体，最能体现鲁迅的彻底革命的战斗精神，因此毛泽东称赞鲁迅的杂文，提出要理解它至少读两三遍才能懂，这也说明毛泽东对鲁迅

杂文读得很多，也理解得很透。可以这么说，毛泽东对鲁迅的作品，评价最高、论述最多、最推崇的就是杂文，他认为：“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

## 毛泽东评鲁迅：中国的第一等圣人

**访问人：**毛泽东是怎样评价鲁迅的？

**吴正裕：**在我们党内，特别是主要领导人，比如瞿秋白、周恩来、张闻天等，在他们的讲话中、文章中对鲁迅都作过很多很高的评价。但给予鲁迅评价最全面、最高的还是毛泽东。他对鲁迅的评价，是给予中国历史人物都难于比拟的最多最高的评价。他对孔夫子的论述是比较多的，但总的看是贬多于褒，1958年在武昌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他曾说：“我们共产党人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对中国历史上的好的帝王将相，如曹操、李世民、海瑞等，也有些肯定的话，但都是就某一方面，谈不上全面评价。对近代的孙中山，毛泽东曾作过很高的评价，1956年11月12日在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曾写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这是评价孙中山最集中的一篇。对其他历史人物也作过一些评价，但都是等而下之了。可以这么说，倾注着毛泽东全部感情的评价都是给予鲁迅的，对其他人的评价都是冷静的分析。

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毛泽东闻讯是很悲痛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给许广平发了唁电，电文说：“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苏区人民，为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谨以挚诚电唁。”10月30日，中

华苏维埃政府在保安举行了鲁迅追悼大会，毛泽东亲自出席并发表了讲话，倡议在延安创办鲁迅艺术学院、鲁迅图书馆和鲁迅师范学校，并发出了《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在鲁迅逝世一周年时，即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又发表了《论鲁迅》的讲话。这是毛泽东关于鲁迅的唯一的一篇专论，高度评价了鲁迅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指出：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他的思想、行动和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并概括了鲁迅的三个特点：一是政治远见，二是斗争精神，三是牺牲精神。认为这三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讲话强调指出，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具备坚决的心，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在这篇讲话中还称颂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建国以后，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也曾说到鲁迅是圣人，我们只能说是贤人，是他的学生。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些评价，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鲁迅的钦佩和崇敬之情。

**访问人：**毛泽东这么崇敬鲁迅，原因是什么呢？

**吴正裕：**从鲁迅方面看，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既有小说、散文、杂文，又有诗歌、翻译作品和研究著作。他的文章在近现代是独步文坛的，是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的。对他的文笔，毛泽东是非常喜爱的；对他的作品的深刻内容，毛泽东也是非常赞赏的。

**访问人：**对作品的喜爱是一个方面，恐怕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毛泽东所说他的心是和鲁迅相通的。鲁迅的斗争精

神、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不怕孤立的精神和敢于反潮流的精神，都和毛泽东的性格相吻合，他们两人在精神上、性格上很接近、很相像。

**吴正裕：**是这样。如果我们把两位伟人放在中国革命大舞台的视角上来分析，毛泽东对鲁迅的推崇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这样几点：

第一，他们两人都是文化巨匠，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人，毛泽东非常喜爱鲁迅的作品，包括他的文笔。

第二，毛泽东非常敬仰鲁迅的人品，钦佩他的奋斗精神。

第三，在中国的二三十年代，鲁迅成了反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旗手。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在军事上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而且在文化方面，组织了一批御用文人对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坛进行文化“围剿”。可以这么说，在反抗国民党“面剿”中，毛泽东是反军事“面剿”的统帅，鲁迅是反文化“围剿”的统帅。他们一个用枪杆子，一个用笔杆子，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战斗。这一点他们也是相通的。

第四，鲁迅的作品中包含了深刻的思想、独特的见解，所以，毛泽东在文章和讲话中常爱引用鲁迅的观点和主张。

第五，鲁迅具有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和硬骨头精神，是向敌人冲锋陷阵的空前的民族英雄。这一点是毛泽东非常钦佩的，所以称“鲁迅的骨头最硬”。

上述五点，不一定概括得全面，但至少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是不为过的。

**访问人：**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1993年11月7日于北京前毛家湾

# 访薛明、贺晓明——

## 毛泽东和贺龙

薛 明 贺 晓 明

薛明，1915年生，河北霸县人，贺龙元帅的夫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天津参加创办《天津妇女》。1938年到延安，先在中央党校、延安女子大学学习，后任延安县委组织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政治处主任。建国后任西南妇联福利部长，军委贺龙副主席办公室主任，总参谋部政治部顾问，中国人民解放军检察院检察长。是四届人大代表、五届政协委员、六届七届政协常委、中共十二大代表。

贺晓明，1947年生，湖南桑植人，贺龙、薛明之女。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曾在外交部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现任深圳商地置业公司董事长。主持编撰有《贺龙年谱》。

贺龙元帅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国人无不为之痛惜。他的家人却以宽大的胸襟，在毛泽东百年诞辰之际，畅谈了对毛泽东的缅怀之情，回忆了毛泽东和他们一家的交往和友谊。这种精神实在让人感动。

薛明：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你们搞了一项这



样的活动很有意义。我认为毛泽东是一位很伟大的人，他和贺老总的关系非常不一般。为了纪念他，把我所知道的毛主席和贺龙过去的交往情况讲一讲，以表我对毛主席的缅怀之情。

**访问人：**谢谢您！我们觉得毛泽东给后人留下了一大笔文字材料，这些对于研究他老人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全方位地研究毛泽东，他和战友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说，更能反映他的为人、品性和性格。

**贺晓明：**对毛泽东的评价，我觉得经历了几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因为很多人吃了“文革”的苦头，所以讲起毛泽东来，不免带有一些个人情绪，对他的批评也就多一些。后来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有一段又抬得高了些。现在我觉得是越来越实事求是了。总的讲，我认为对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要肯定。比如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就高不开毛泽东说的要独立自主，发奋图强。国家经济不发达，腰杆不壮，光喊、会喊，也觉得气短。现在对有些好的革命传统讲得少了，我觉得要搞革命历史教育。我们还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小时候写作文，第一句话除了爸爸、妈妈，就是毛主席。这绝对是有烙印的。

**薛明：**教你们学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

**访问人：**您这样教育孩子，一定是发自内心对毛泽东的热爱。

**薛明：**那绝对是发自内心的。我们觉得孩子应该知道毛主席呀！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贺晓明：**林彪说什么要融化在血液里，他是出于他的目的。但爸爸他们真是做到了。我的感觉，爸爸对毛主席的感情真是真诚。比如他到体委工作时，看到一篇署名 28 画生的

文章，如获至宝，兴奋得不得了。

**访问人：**是不是1917年毛泽东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

**贺晓明：**对。我亲眼看到的。爸爸拿起书还问我，你知道28画生是谁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你数数看。因为我不知道是谁，所以数也数不来，后来他让我数“毛泽东”（繁体）三字，果然是28画。爸爸说，这是毛主席最早讲体育的文章，而且讲得很精彩，我们要在体育界广泛宣传，让大家学习。在他们那种感情的熏陶下，我觉得，我对毛主席的感情也特别深。我每次到长沙，肯定到橘子洲头，因为那是毛泽东年轻时经常游泳、登山的地方。他年轻时的那种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真是给人以力量，叫人振奋！

**访问人：**这几乎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共同特点，他们是一群关心祖国、关心人民的热血青年，包括大姐也一定是毫不例外。请问大姐，您是哪一年到的延安，什么时候和贺龙同志结婚的？

**薛明：**我是1938年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先在中央党校、延安女子大学学习，后来到清涧工作。1942年和贺龙结婚，结婚时任延安县委组织部长。

**访问人：**你们结婚的时候，毛泽东一定去祝贺了？

**薛明：**结婚那一天没有。但是过了几天他来了，当时我们住在财经办事处延安南门外的山坡上。下而是徐特立办的自然科学学院。贺老总比较好客，再加上那地方空气新鲜，好多的中央领导同志都到我家里串门，经常是热热闹闹的。听说毛主席来了，贺老总就往山下跑，一会儿他们就有说有笑地上来了。后来人们把毛泽东看做神，其实他不是神呀！那真是实实在在的人啊！非常热情！他走进我们的窑洞时，我

很紧张，但又很兴奋，恭恭敬敬地向毛主席又鞠躬又问好。因为我们刚刚结婚，毛主席握住我的手问：“你姓什么？”我说：“姓薛。”他说：“你是薛仁贵的后代了。”我说：“不是，差得太远了。”他说：“贺师长有福气，讨了一个好老婆！”他还问我，过去干过什么。我说在天津搞地下工作，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七七事变”后，国民党不抗日，我们就到处宣传中国人不当亡国奴，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全面抗战。我们曾组织请愿团到南京请愿，逼蒋抗日。还到过山东，结果韩复榘不但不抗日，还把我们的同学抓起来了。我们到处宣传抗日，老百姓是欢迎的，但到官府和驻军附近的地方都碰壁。毛泽东说：“怪不得见了共产党的将军，你就爱上了。贺老总抗日可是最坚决了，最能打仗。人家说他有军阀主义，叫他去学习，我看不是。他有三条：对敌人狠，能联系群众，对党忠诚。贺老总这个对象你是找对了。”说得我们哈哈地笑，接着大家就闲谈起来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毛泽东抬头看看窗外的太阳，说：怎么着，给不给饭吃？贺总说，给，早就准备了。那次我们做了一碗红烧肉，还有一条鱼。在延安是吃不到鱼的，这是贺龙由晋西北回延安时，警卫员在黄河边抓的一条活鱼，这条鱼一直养着，给毛主席吃，贺龙还特别嘱咐厨师用辣子烧，那真合毛主席的口味。大家看着毛主席吃得很高兴，毛主席说真是香极了，今天来打打牙祭。是的，平时很难吃到这样的东西。

访问人：有别人陪他吗？

薛明：我印象里来的就毛主席一个人。还有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李井泉夫妇。那时的毛泽东可“自由”了，他经常到处走。在女子大学的时候，我们在延河边散步，还碰到过毛

主席，他对我们很亲切，还给女大上过课。他说中国妇女解放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毛主席的话博得大家热烈的掌声。毛主席特别关心妇女解放事业。

**访问人：**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是否经常去您家里串门？

**薛明：**当时毛泽东很忙，我们住得虽然不远，但常常来不可能。前面说过，我们结婚来过一次。第二次来的情况是这样的：东干篮球队打球非常漂亮，他们从冀南一路打来，没有对手。到了延安打得好精彩，大家都叫好。贺龙喜欢体育，他叫一二〇师战斗队和东干队比赛，贺龙、朱总司令每场必到，许多人都去看。双方竞争得很激烈，比赛结果战斗队赢了。赢球了嘛，大家都很高兴，就向贺老总提出，我们能不能见见毛主席？贺龙说，可以！他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也向他祝贺。贺龙说，战斗队的小伙子们有个心愿，要见见毛主席呢。毛主席说：“行啊！在哪儿见呢？就在你家里吧！”贺龙说：“行，就在我家里。”

一天下午，我看到有20人左右，排着队朝我家走来了，这些人也不说话，进了屋就坐下了。我有些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很快我就看到贺老总陪着毛主席上山来了。毛主席进了屋，战士们起立在院子里排好队向他敬礼。毛主席开口就说，同志们好！他说：“你们是一边打仗一边打球，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练就了一身好球艺，这很不简单。你们来延安打球，延安人民都去看，活跃了延安的气氛，我代表延安人民谢谢你们。平时你们在部队里打球，活跃了部队生活，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这是很好的事情。你们的贺师长在红军的时候就喜欢搞体育活动，现在又搞了战斗队，很好啊！以后不论多么艰苦，也要继续搞下去，还要搞得更好！”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有人写文章，说这次毛主席接见战斗队并讲

了话对他们来说是最高的奖赏！是啊！不容易的。那时的条件真是太艰苦了，打仗的时候没有球，就用布缝一个；没有运动鞋，就打赤脚干；再说山沟里哪有什么球场，随便找块空地，就坑坑洼洼地打上了。到了延安条件稍好一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家不忘娱乐，也说明同志们的精神状态是十分积极乐观的。

**贺晓明：**我看到有的故事片写着，敌人要活捉贺龙，就看哪里有打球的，哪里有打球的，哪里就有贺龙。

**薛明：**这未免太夸张了。我认为贺龙喜欢打球，更重要的他是从活跃部队生活来着眼的。

**访问人：**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平易近人，他和贺龙的交往一定很多吧？

**薛明：**那时贺龙任晋绥陕甘宁联防司令部司令员，林伯渠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高岗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毛泽东是党政军一起抓，主要抓住他们这几个大的单位不放，所以贺老总经常要到毛主席那里开会。他们相处得非常自然。

1944年我生第一个孩子，是男孩。这个事情毛主席知道了。晚上贺老总又到毛主席那里去开会。他一进门，毛主席就站起来，冲着贺龙说，恭喜你五十得子！说得贺龙都愣了，随即开怀大笑。毛主席这样一说，大家都向贺龙表示祝贺，并各自送了一点儿孩子用的东西。其中有康大姐用朱总司令夏天穿的背心做的衣服，还有关向应生病时吃的奶粉等等。

**贺晓明：**爸爸在部队里讲话说过，我50岁应该当爷爷了，因为和日本人打仗，和国民党打仗，把一代人都打丢了。

**访问人：**他们为了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富强出生入死，无私奉献，确实可敬。我们想贺老总和毛泽东的接触很多，一般说来，作为下级对上级总会存在一些不太尽如人意的地方。

贺龙当时对毛泽东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

**薛明：**服气呀！真心实意地认为他伟大，非常伟大的人物。像贺龙从1914年就开始闹革命，这中间他加入过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湘西护国军、建国川军、国民革命军，后又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建立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接触了很多，大到孙中山，小到地方的土劣，全都打过交道。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全都见过。相比较而言，他和毛泽东见面是比较晚的，是长征以后到了陕北才互相认识，当然这之前双方早已互相知晓。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当他见了毛泽东，就觉得不一般呀！觉得他想问题决策事情总是高人一筹，觉得这个人行，做共产党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所以从心底里佩服。他一直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延安整风时，他对王明气愤极了，说毛泽东方向，就是我们党的方向。王明是个学生，他懂什么？他要再骑在毛主席头上，我就打倒他。

**访问人：**贺老总的话在延安曾轰动一时，这充分表明了他对毛泽东的真诚和信赖。解放战争时期，贺老总离开延安到了晋西北，这时候和毛泽东还有交往吗？

**薛明：**有。这时毛主席还在陕北，贺龙几次到陕北开会。有一次贺龙血压高，我们建议他请假，他说，毛主席还在陕北，中央有什么决策我应该知道。就这样他还是去了。陕北生活很艰苦，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贺龙都是全力以赴地支援中央。1948年3月毛泽东过黄河，第一站就是晋西北的贺龙司令部。我们把司令部都腾出来，打扫得干干净净给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住。我们则住在外边一个小院子里。

一天毛主席来了，他说：“你们都挤在这个小院里啦，里边还很宽敞，让孩子们到里面去玩，别都挤在这里。”当时我

怀里抱着晓明，手里领着老大。他问大的叫什么，我说叫小龙（本来不叫小龙，大家都说他长得像他爸爸，就小龙小龙的叫开了），这个叫晓明。毛主席听了，说：“你们可能计划好了，将来是一排龙，一排明，老龙老明在当中。”他嘴里说着，脚上还踩着京剧的步子，大摇大摆地走起来，逗得大家全都哈哈大笑。然后他说：“好幸福呀！我祝福你们。”说完他还走过来，看到每个小孩都摸一下头，问问这个是谁家的，那个是谁家的，看看我们吃的是什么饭。当他发现我们吃的是小米时，就说，你们优待我们了，那不公平了。

**访问人：**看不到一点领袖架子。

**薛明：**没架子，不像是最高领导。那时真的没有那个感觉，觉得非常亲近、自然。

毛主席在晋西北住了一个礼拜，几乎每天晚上都看山西梆子。贺总征求他的意见，看什么戏，毛主席说，来到了山西，就看山西戏吧，我们不能轻视地方戏。看戏很简单，也没有戏院，连个戏棚也没有，演员就在土台子上唱。我们提着凳子、马札，顶多给毛主席背个椅子、带个炭火盆，提着个马灯照路。毛主席走在前面，其他干部跟着，一边走一边说。到了目的地坐在群众当中就看，好动人呢！回来时也是一边走一边说，七嘴八舌地议论今天的戏怎么样。他们在前面走，我们在后边就一溜小跑地跟着，听他们是怎样议论的。记得那一天演的是《打金枝》，就听毛主席说，山西梆子很不错。郭子仪是个老臣，金枝不和驸马丈夫去拜寿，驸马打了金枝，金枝回宫告驸马的状，唐明皇了解女儿的心理，不但没有惩罚驸马，反而给驸马连升三级。主席说，这说明老丈人还很开明啊！大家全笑了。

**访问人：**这一次分手之后，再见面就是建国后的事情了。

**薛明：**后来贺老总率部进军西南。全国解放后任西南军区司令员。1954年冬来到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到了北京，就和延安不一样了。在延安的时候，家家户户连个围墙也没有，大家来往非常频繁。这时候，一家一个院子，互相来往就相对得少了，规矩也多了。一般的工作，不该问的不问。

但是有一次他回来笑呵呵地说：“今天开会口渴，富春、谭（震林）老板在我两边，就我中间没水喝。每次去了都有一杯茶水，这次没有。我问富春，怎么你有水喝，我没水喝？他说，你给了钱没有？我说，没带。原来是开会时，每人丢一毛钱，服务员看着，谁给了钱就给谁水喝，贺龙没给钱，自然也就没水喝了。会议中间休息，贺龙又提起这件事，富春说，我给你垫上一毛钱后，不是给你茶喝了嘛！这时候毛主席走过来，问你们在说什么，他们说，贺老总没带钱，就没茶喝。毛主席说，唉呀！我也没钱，我身上向来不装钱。以后你再忘了带钱，告诉我，我让人给你垫上，先垫上一块，你可以来十次都不用想着开会要带钱了。

**访问人：**大家的关系很融洽，制度也很有效。首长去开会，忘了带钱，服务员就真的不给水喝，这表明上下级的关系很纯洁，廉政也确实要从上做起。

**贺晓明：**他们那个时候，确实是艰苦朴素。爸爸到毛主席家里去，看到他的床单、枕头、被子全是素白的，还看到主席家里都是书，连厕所里都有，爸爸就特别强调艰苦朴素和读书如何如何重要。有一年冬天他要不穿毛裤，问怎么回事，说总理不穿！

**访问人：**他们的来往很多，关系也不错。这种情况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薛明：**应该说是“文化大革命”前。1963年毛主席对贺龙说，林彪身体不好，他需要休息。林彪要是在家，军委就是他当家，他若不在，就由你贺龙当家。贺龙主持军委工作的时间是从1963年到1966年。他主持军委工作的时候反复强调军事练兵的重要性，所以他重点抓了军事训练。杨村练兵，贺老总连看了三次，最后一次他报告总理，说那兵练得真好，你去看看吧！他把总理、陈毅都拉去了，总理看得出神，说：“好！这是精兵。”以后毛主席知道了，就对贺龙说：“贺老总，人家都说你练兵练得好，都请去看了，怎么不请我？”贺龙一听，说：“行啊！咱们就在十三陵组织一次汇报表演。”所以1964年7月有了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的汇报表演，毛主席等中央领导都去了，整整看了两天。毛主席高兴啊！还用手捶捶沙袋子。看过表演之后，毛主席又召集贺龙他们开会，要求在全军推广。

**访问人：**后来的情况变了，贺老总遭受冲击，而且很悲惨，这使很多人感到困惑。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薛明：**“文革”的事情很复杂，现在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要向前看。1966年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知贺龙参加。贺龙一进门，毛主席就跟贺龙打招呼，请他到前面就坐，非常亲切。贺龙无论在什么样的困难情况下，对毛泽东始终是有信心的，认为毛泽东总有一天是要为他说话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讲的毛泽东是伟大的人物犯了严重的错误。我认为这个评价是公正的。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主席说：搞贺龙是演错了，我有责任。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偏听偏信了。贺龙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子，没有这面旗子不行，现在贺龙被陷害了，一定要给他平反。一边说着，还用手拍了桌子。后来中央举行

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总理带病讲话，他一边讲一边流泪，说我们没有把贺龙保护好！1982年中央又为贺龙彻底平反。我想这都是毛主席讲那几句话的结果！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毛泽东能作自我批评，能为贺龙讲几句话是很不容易的。“文革”中的毛泽东，他的处境大家也知道，他太难了，控制不了了。

**访问人：**“文革”当中您全家受了那么多委屈，还能敞开心怀去理解毛泽东，尤其在他百年诞辰之际，大姐一定要谈谈毛泽东，实在叫人感动！

**贺晓明：**我认为，毛泽东的错误归错误，功绩还是第一位的。他的廉政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他的民族英雄的气概等等，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我们看毛泽东不能仅从个人的角度去看，应该站在国家的、民族的立场上去看，这时候当你谈起毛泽东来，就会客观、公正得多。我想做人应该是端端正正的。

**访问人：**是的。在毛泽东和贺龙的长期交往中，在你们看来，他们之间有着什么共同的特点吗？

**薛明：**他们最大的特点，都是出身一般的普通农民家庭，他们心里装的都是普通老百姓，想的是如何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比如贺龙，他家里很穷，没有读过多少书，他之所以拿起枪杆子是因为被官府欺压无奈，才揭竿而起的。之后虽然他官越做越大，但他亲眼目睹了军阀之间的互相倾轧，根本没有人为百姓想想，纯粹都是为了个人的地盘、个人的地位在那里闹，所以他总是不满足，总是在找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当他了解了共产党一心为穷人、为国家的主张之后，他决定加入共产党。贺龙在湘西有很强的号召力，他手下的兵大多是湘西人，他们都是把贺龙当做一面旗子，跟着贺龙干。

在军阀倾轧当中，他也非常爱惜这支军队，因为这代表着他的实力。1927年在我们党最困难很多人纷纷脱党的时候，周逸群、谭平山介绍他加入共产党，他毫不犹豫地坚决地参加了，从此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没有动摇过。

**贺晓明：**我觉得爸爸和毛主席走上革命的道路，他们有相同的地方，两人的活动都是从民众中开始的；不同的地方，毛主席着重从思想上探索，当然也搞了学生运动等等，通过理论和实践的探索，逐渐成为马列主义者，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缔造人之一。毛主席读书多，学识渊博，他是文的。爸爸是用枪杆子探索。三博改编时，毛主席说贺龙两把菜刀起家。他是武的。这样两个人互相吸引，很早就相互慕名，最后终于走到了一起。爸爸之所以能成为国家脊梁，还是受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和教育。

**访问人：**他们都是为了革命，走到了一起，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业，虽然中间有些曲折，但友谊是长青的。今天薛大姐还有晓明同志谈了很多，您摔了腰，动弹不了，还躺在床上和我们谈，真是太感谢了。

**薛明：**希望你们的书尽快出版，这件事非常有意义。对我们以及青年人的教育都很大。

1993年11月29日于北京

# 访吴克斌——

## 毛泽东和陈毅

吴克斌

吴克斌，1927年生。四川合江县人。大学毕业。1949年由新华社转业入伍，从事新闻、宣传工作。60年代开始从事专业创作和党史、军史的研究。参加过《星火燎原》丛书、《决战淮海》等书的编辑，并发表有文学作品及论著数十篇，协助十几位老革命家撰写回忆录达百万字。现正从事《陈毅军事文选》的选编工作。

对南京军区《陈毅传》编写组副组长吴克斌，原先只闻其名而不识其人。忽一日，他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办事，要找的人没找到，却走进了我们的办公室。于是有了这篇颇具深度的访谈录。对此，他自己也有四个字，曰：自投罗网。

### 陈毅一生最具决定意义的 是与毛泽东的相识

访问人：1992年5月30日、6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丹淮的文章《红军时期：陈毅与毛泽东的友谊》，引起注意。《陈毅传》出版之后，也很受党史界及学术界的重视。毛泽东与陈毅的关系，从1928年朱毛井冈山会师到陈毅去世，延续44

年，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内容。您作为《陈毅传》编写组的副组长，一定了解很多情况，您能不能谈一谈您的看法？

**吴克斌：**丹淮是根据他自己对他父亲陈毅的了解，生动地写出了红军时期陈毅与毛泽东友谊的一面，是切题的。我还认为，这段时期陈毅与毛泽东的关系，既有基本的一致，也有分歧，有时甚至是原则上的分歧；他们的友谊是随着相互了解的增进而发展的。两人都是共产主义者，但性格不一样，两人的立身之道、做人的规范信条也不完全一致。比如这样的差别：毛泽东一开始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表现了他很强的革命性、斗争性，他强调的是“矫枉必须过正”。陈毅却认为“过犹不及”，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过”与“不及”同样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陈毅生性比较厚道，不肯做过头的事，也不愿强迫别人干什么。这也许与他自小生活在充满天伦之乐的家庭有关，与他留学法国所受的熏陶有关。他待人处事比较宽容，能“反躬自省”、“推己及人”。而毛泽东个性倔强、严厉，提倡斗争，是积极、进攻型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之类的对敌斗争手段，最能反映他的个性特征。有共同信仰的这两个人存在如此的差别，决定了他们交往中能有机配合，相辅相成，但有时也有某些矛盾。

我认为陈毅一生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与毛泽东的相识。由于有了毛泽东，所以才有后来的陈毅。怎么解释？就是说，如果陈毅没有遇到毛泽东，那他在红军初创时期的多种选择中可能会有更多的彷徨和失误；如果没有毛泽东，他对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觉悟不会如此明确，因而也无法把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得如此充分，也就不能成就他后来的事业。同样，也正因为有了毛泽东，陈毅也只能是现在的陈毅。毛泽东影响了他，改变了他，可以说对他人生道路的选择起

了决定的支配的作用。而反过来，陈毅对于毛泽东却不能起到这种作用。不是他没有试过，红军时期他曾经有两次想支配毛泽东，一次是井冈山上，一次是红军党的“七大”，但结果却证明不行。为什么？因为毛泽东抓住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他的那一套思路是与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道路相吻合、相适应的，而陈毅的认识在那时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陈毅自己说过，井冈山会师后，以朱德为领袖还是以毛泽东为领袖都还没有确定，是经过红四军党的七大、八大到九大，他才认识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1929年2月中央“二月来信”中提到要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四军。6月红四军“七大”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由陈毅继任，毛泽东一气之下到蛟洋养病。到“九月来信”以前，陈毅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这种想法：毛与朱两人最好都不走，如果中央一定要他们离开，或者走一个留一个，或者一前一后走的话，那么毛泽东可以先走。为什么？这里陈毅可能有潜台词，就是认为军事作战没有朱德不行，毛泽东的政治职务却可以由别人代替。这个想法反映了此时陈毅对毛泽东认识的局限，没有把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同中国革命的全局和前途联系起来。但到他起草“九月来信”时，他的认识改变了，加深了，由渐变而到质变，对毛泽东的认识在思想上有了飞跃，有了后来的几次请毛泽东重新出山回红四军军部主持前委工作之举。

### 怎么看毛泽东的三个“相”字？

访问人：1928年5月6日，毛泽东给陈毅写过一封很热情的信，其中有这样几句话：“相见恨晚，相慰平生，希遇事相商”，这是不是说明毛泽东对陈毅一见如故，早有定论？有了这

三个“相”字，又怎么理解您刚才谈到的他们之间的矛盾？

**吴克斌：**我认为这三个“相”字，与其说是对他们两人关系作出的结论，不如说是毛泽东当时迫切需要获得、并且开始获得陈毅支持的一种感情化的表达。陈毅说过，在党的“五大”前后，毛泽东的划分敌我阶级界限的主张和以后发动农民土地革命的主张，并未获得全党的公认，他在1927年末是“以孤独的情怀转入湘赣边界的农村”的。谁能给这种孤独的情怀以安慰呢？是井冈山会师。这一点，陈毅最有体会。远的不提，就说他们离开湘南上井冈山时，就受到坚决执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湘南特委领导人的反对和嘲讽，说他们离开城市上山是“右倾逃跑”。因为当时中共中央的路线还没有从“城市中心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这三个“相”字对毛、陈双方都是切合的。

井冈山会师，朱德、陈毅带来的是一支经过大革命洗礼的我党组建最早的部队，装备好，有战斗力，有现代正规作战的经验，可以和国民党正规军的精锐主力相对抗。而毛泽东秋收起义后带上山的部队主要是农民军，相对地说，装备差，军事技术、作战经验也不过硬，靠这样的部队加上袁文才、王佐的队伍，要粉碎国民党频繁的“进剿”与“会剿”，真正长期在罗霄山脉坚持、发展是很难想象的。所以朱德率队上山；对于坚持井冈山斗争的人们来说，意义十分重大。井冈山会师后，朱德、陈毅率领二十八团打了几个大胜仗，便迅速恢复和发展了湘赣边区的武装割据。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由于两支部队的成分和作风不尽相同，在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下，也产生了矛盾。比如，南昌起义部队有优越感，不大瞧得起秋收起义部队；而秋收起义部队则认为南昌起义部队旧军队习气重，纪

律差，因而不团结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是毛泽东感到棘手的一个问题。这时，陈毅及时向四军军委和毛泽东提出改编部队、两支部队干部相互交流的建议，受到毛泽东高度赞扬。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给在朱德部队做党代表的陈毅写这封信的。

毛、陈的相遇、相交殊为难得，但我以为，毛泽东之所以有三个“相”字赠与陈毅，他至少还考虑了这样两种因素：其一，他认为，只有朱毛两支部队一起，才能开创斗争新局面；其二，他认为，朱德部队作战主要靠指挥员威望维系的现状要改变，要削弱个人的威信以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因此，毛泽东很迫切地要发现能拥护自己主张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陈毅就是其中最好的人选之一。这是不难理解的事。陈毅在“九一三”事件后曾经回忆道，井冈山时期，在一次讨论群众工作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听到有一个人的发言很好，他就问陈毅，这人是谁？陈毅说，他叫林彪，是个连长。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好干部。毛泽东发现林彪是个人才后，就经常找他谈话。不能否认，林彪当时在基层干部中的确比较优秀，政治和军事都比较强，又年轻，能打仗，深受毛泽东欣赏。所以到红四军“七大”前后，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形：在秋收起义部队中有伍中豪这样与毛泽东意见不合的，而在朱德的队伍中也有林彪这样深受毛泽东器重赞赏而积极向毛泽东靠拢的。彼此交叉，互相做工作。这不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对中国革命认识上存在差异的表现。从这样的角度去看，毛泽东给陈毅写那封很热情的信就很自然了。有了这封信，并不能说毛、陈两人之间就什么矛盾、差异都没有了。在有了这封信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发生了如前谈到的红四军“七大”风波，就说明毛、陈之间的友谊受到了严重的考验。



## 井冈山会师，毛、朱、陈各有所长

**访问人：**井冈山会师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毛泽东、陈毅，还有朱德，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人物。同为优秀人物，并不说明他们之间的结识就一定是一见倾心，一拍即合。其间会有互相的欣赏，会有此消彼长的互相借鉴，但往往有更多的互相比照竞争。毛泽东的优势是早有定论的，那么，在形成毛、朱、陈三人关系格局的过程中，朱、陈那时所具有的优势又在哪里呢？

**吴克斌：**井冈山会师前，陈毅对毛泽东最早的了解是1920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听到蔡和森的介绍，而对毛的言论的直接接触，恐怕始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虽然没有见过而，毛的关于农民问题的主张，毛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分，陈毅还是知道的。但此时的毛泽东并不知道有陈毅这个人。而朱德也是到井冈山会师时才初见毛泽东。相比之下，陈毅与朱德的相交从1926年8月在四川万县就开始了。1927年9月，毛泽东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陈毅追赶上南昌起义军后，便随军南下，并参加了会昌攻击钱大钧部的战斗。11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部在崇义上犹地区整训时，地方党组织报告说附近来了一支工农革命军队伍。经联络，知道是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一师一团中的第三营，负责人是张子清、伍中豪，他们在遂川小汾战斗中被敌人截断，毛泽东带着团部与一营回了井冈山，三营回不去就南下活动了。了解井冈山的情况以后，陈毅他们就派毛泽覃前去与毛泽东联系。12月，由毛泽东派出的何长工辗转到达韶关的犁市，和朱、陈见了面，相互介绍了各自的情况和打算。1928年初，湘南特委又派人到井冈山，强令毛泽东率部南下，策

应朱、陈发动湘南起义。这些联系的延续，就有了1928年4月朱、毛两支部队在井冈山的会师。

会师井冈山，割据湘赣边，对朱、陈来说是有思想基础与条件的：

第一，朱德是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陈毅虽没有参加南昌起义，但赶上起义部队后随军南下，担任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团指导员。该部归朱德统一指挥，留守三河坝。当起义军主力于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后，他帮助朱德把溃散回来的人员收容起来，和二十五师一起进行统一整编，对部队的思想状况很了解。后来，广州起义即将举行时，广东省委通过北江特委指示朱、陈率队参加。部队已经到了韶关，准备好了车皮，得知起义已遭失败而中止，但又收容了一批参加广州起义归来的人员，因此，对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也有所了解。在辗转于赣粤湘边之时，朱、陈见到张子清和何长工，又了解了毛泽东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情况，所以这三个起义所说明的孤立的城市起义不能成功，必须使武装斗争与工农运动相结合进行土地革命这一点，朱、陈已有所认识。

第二，南昌起义南下的最后失败，使得起义军占领港口取得外援、以广州为基地进行第二次北伐的计划落空。朱德率部退出广东后，就曾指出，中国革命靠北伐不行，靠攻占城市不行，将来的方向，主要应该是把革命战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中国武装斗争的基本形式是农民游击战争。所以，1927年10月到12月朱、陈率部沿赣粤边西进时，就已经开始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从正规战转向游击战，还派干部、拨枪械，帮助建立地方武装，其中如在广东仁化就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独立第四团，在1928年1月举行湘南起义。所以，对在农村进行游击战，朱、陈有些经验。

第三，1928年1月的湘南暴动是在总结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之后进行的。关于这个起义，过去宣传不够。我实地调查过，规模很大，影响也很大，而且基本成功，不仅建立了县、区、乡三级的苏维埃政府，还在1928年3月20日成立了地区一级的湘南苏维埃政府，比湘赣边区苏维埃政府还早两个月。因此，朱、陈搞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并不是来自井冈山，而是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有自己的创造与实践。虽然湘南苏维埃政府存在的时间很短，前后不过二三个月，但朱、陈从其中摸索的一些经验为以后他们上井冈山，和毛泽东共同恢复和发展湘赣边界根据地打下了基础。从上面三点可以看出，毛泽东有建立湘赣红色政权的经验，朱、陈则有建立湘南红色政权的经验；毛泽东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及袁文才、王佐部队，朱、陈则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及数千湘南农军，可谓声势浩大。况且，革命目标一致，具体经验则不尽相同。因此，朱、毛井冈山会师，并不是朱、陈加入毛泽东的部队，而是几方面代表人物走到一起，几部分革命力量合成一股，是以毛泽东为主要领导人的井冈山武装力量的有机组合。在这种背景之下，毛、朱、陈之间有争论就是根为自然的了。

井冈山会师是现代革命史上的重要一页，也给陈毅的一生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开始认识毛泽东，了解毛泽东，把自己的思考和那一套经验与毛泽东相对照。这其中，有毛泽东的高明所在，也有陈毅的经验胜毛泽东一筹的地方（比如陈毅就有湘南根据地建设的某些成功的经验，如发行货币——劳动券，并一度为市场流通接受，这在井冈山根据地还没有过。据说还颁布了《土地法》等）。所以，要此时的陈毅像“九月来信”以后那样真正服毛泽东是不大可能的。

## 并进相长的最后结果：选择毛泽东

井冈山会师以后，陈毅经历了湘南八月失败，和红四军“七大”的风波，职务也忽上忽下几经变动。但不管怎样，陈毅始终踏踏实实地做事。他不拒绝做领导工作，也甘愿当副手，做具体工作，特别是做群众工作。从自己的失败之中，陈毅也是善于总结教训的。比如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这也是井冈山时期争论的一个问题。毛泽东主张要建立一支党的军队，党领导一切。陈毅通过湘南失败，也终于看到失败的一条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党的高度集中的领导和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制止不了流寇思想和家乡观念，致使官兵离队跑散。他提高了在党的领导问题上的认识，也就对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29年底，他协助毛泽东完成了古田会议决议的制定，也表明他自己对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的认识的飞跃。这个飞跃是与陈毅注意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行为从实践到理论的比照研究分不开的。从井冈山会师到红四军“九大”，是毛、陈关系史上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也正是人民军队初创并形成一定规模的时期，也是毛、朱、陈之间互相配合、支持、碰撞、了解，互相吸收对方优点，并进相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最后结果，便形成了一个代表人物。这个代表人物，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因为在他身上集中了党的正确思想，代表党的正确方向。

**访问人：**陈毅曾经谈到：领袖不是天生的，是在群众运动中锻炼成长由群众认识的。我就是这样，开始我并不认为毛主席是领袖，经过湘南失败，经过红四军“七大”，最后认识了毛泽东的正确。陈毅的这段话的确是他与毛泽东早期关

系的真实表露。

**吴克斌：**他是通过斗争的实践真正认识到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的。红四军“七大”前毛泽东辞职，“七大”上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之职被改选掉，这些事不论组织程序上是否合法，它们的存在是事实，不必忌讳。革命领袖要为群众所认识、接受，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况且在旧社会的汪洋大海之中，一小块革命根据地犹如一个孤岛，旧意识的存在对形成真正的革命关系干扰很大，政治上出现些宗派小动作，也不是不可理解的。

### 陈毅——朱、毛之间的一座桥梁

**访问人：**毛泽东与陈毅关系史上的这个阶段，也正是中国革命很重要的一段探索时期。那么，毛、陈关系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力呢？

**吴克斌：**毛、陈之间的关系是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急需寻找出路的探索过程中建立起来的。陈毅后来说，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反击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打的第一枪。但使这个起义终于获得结果，并成为人民革命胜利的最初出发点的是毛泽东领导工农武装向井冈山的进军。南昌起义后所保存的一小部分军事力量，是在和毛泽东直接领导的武装及根据地会合后，才得以发挥其在长期革命中的作用的。陈毅的这几句话说得很有分量。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陈毅与毛泽东关系的建立是很了不起的。老实说，当时朱德部队的官兵中多少还存在一点军事官僚的偏向，做艰苦的根据地的工作与群众工作，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的观点比较薄弱，而这恰恰是毛泽东所竭力倡导的。反过来，朱德也具有一些当时毛泽东还不具备的经验。毛泽东与朱德之间需要有个桥梁，这

桥梁就是陈毅。他把军、政两方面的代表人物连在了一起。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政治见解上的不一致往往很快会被上升为敌我矛盾，而敌我矛盾是要用非正常手段解决的。这在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在那时却屡见不鲜。因此，陈毅在毛、朱之间所做的沟通工作其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1928年5月至7月上旬井冈山出现一个全盛时期，就与毛、朱、陈三人的紧密配合分不开。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也对以毛、朱、陈为首的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政策和工作成绩作了肯定。在发挥桥梁作用的同时，陈毅自己也获得了思想上的进益。

### 毛泽东地位上升，定下毛、陈关系格局

**访问人：**如果说井冈山会师是把中国共产党有关方面的优秀人物推到了同一起跑线上，接受历史的选择的话，那么，毫无疑问，领先的是毛泽东而不是别人。以后出现了大的波折，但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终又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对于毛泽东与包括陈毅在内的他的战友们的关系来说，是否意味着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吴克斌：**毛泽东地位的上升是与陈毅对毛泽东认识的逐渐深化基本一致的。与此伴随的，是陈毅从认识毛泽东到紧跟毛泽东，到把自己自觉降到从属地位的过程。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陈毅越感到毛泽东的伟大，就越看到自己和毛的差距。1944年他到延安准备参加党的“七大”，与毛泽东有不少接触。1945年他去山东，见到舒同，舒同问他在延安见到毛泽东的情况，陈毅说，毛主席进步得很快，自己远远赶不上，真是“望尘莫及”。1948年陈毅从西柏坡回来后也跟大家讲过：“最近几年两次到延安、陕北，

与毛主席相处，均有可望不可即之感，即距离太远，自己进步太慢，多年的知识分子的习气纠正是太不够了。”

**访问人：**您上面谈到了从井冈山到红四军“九大”，毛泽东、陈毅关系形成的过程以及这种关系的基本特征。那么，从这以后，他们的交往是否就走上了平坦的道路？

**吴克斌：**从那以后，可以说他们关系的格局基本上定下来了。这种关系影响了陈毅以后三四十年的人生道路。成功也好，挫折也好，都受这种格局的制约。但是有一点须特别指出的是：在这几十年中，陈毅功勋卓著，却始终没有犯过路线性的重大错误。1930年7月以后，陈毅基本上做地方工作，比如搞扩红，筹粮草。而这阶段，中央根据地和红军大发展，毛泽东正处在上升较快的时期，先后担任第一方面军政委、总前委书记、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等等。三次反“围剿”的大胜利，更使他威名赫赫。虽然其后毛泽东也遭受些挫折，但陈毅与毛泽东已不再是正副手这样的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或上下级关系了。陈毅和毛泽东的接触也相对稀少了。毛泽东曾经提名陈毅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但未见中央批准。陈毅受到挫折，一度被怀疑为“AB团头子”，他的妻子肖菊英为此投井而死。那段时间，苏区打“AB团”打得很厉害，据宋时轮说毛泽东任命的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甚至还怀疑到毛泽东头上。在很危险的情况下，陈毅写信给毛泽东谈了自己的情况，毛泽东回了封信，说，我是支持你的。第三次反“围剿”之前，又把装有二十万元款子的几个洋铁箱和自己的文件托交陈毅保管，表示自己的信任。后来，对陈毅的“审查”不了了之。第四、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也被取消了指挥权。红军长征开始，陈毅受命留在苏区领导斗争，毛泽东的孩子小毛、岳父母，还有毛泽覃、贺怡的

去向，都是通过陈毅他们帮助安排的。在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托父托孤，这也说明了毛、陈相互信赖之深。

1934年苏区一别，直到1944年陈毅去延安才和毛泽东重逢。但10年的时间，不能说他们之间没有沟通。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陈毅通过遵义会议的精神，能感觉到其中毛泽东的重大作用，这对陈毅来说，使他能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下充满胜利的信心与希望。1937年抗战开始后，陈毅从一家香港刊物上看到有人引用毛泽东在5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就知道毛泽东出来了，也理解了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因此他有主动下山与国民党赣南军政当局谈判的举动。这说明，陈毅与毛泽东的心是相连的，而这种沟通则是建立在红军时期对毛泽东的认识与理解基础之上的。抗日战争时期，陈毅在新四军任职，坚定地贯彻了毛泽东的指示方针，特别是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理论著作推崇备至。在实践中，他身体力行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多所创造。对陈毅的工作，毛泽东是肯定的，对陈毅本人，毛泽东也是信赖的。毛泽东对1943年的“黄花塘事件”的态度，就是一个例子。

## 从“黄花塘事件”的处理 看毛、陈之间的关系

**访问人：**“黄花塘事件”很有名，到底是怎么回事？

**吴克赖：**这是在全党整风运动期间发生的。1942年3月刘少奇要回延安，16日下午，临行召集新四军军分会、华中局的负责人陈毅、饶漱石、曾山、赖传珠等人开会，说：“华中局、新四军的工作，应以陈毅同志为领导中心，他领导工作有经验，军队工作搞得很久。华中局书记和政治委员由饶



代理，实际工作还是要依靠陈毅同志。”此后从5月到9月，陈毅在饶漱石离开军部去二师检查工作期间，代理饶代理的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职务。这样，就有了对饶、陈这前后两位代理书记的议论。比如，刘少奇离开华中后，代理华中局书记的为什么不是陈毅而是饶漱石？比如，称赞陈毅工作的人比较多。这些议论对饶漱石是个压力。加上1942年9月1日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提出，要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更加使利欲薰心的饶漱石忐忑不安。1943年，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在黄花塘驻地，饶漱石策划了排挤陈毅的阴谋。他抓住陈毅在1929年红四军“七大”主持会议选掉了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的历史关节，以及陈毅心直口快对这些往事的随便议论，说陈毅早就反对毛泽东，一贯反对政治委员制度并排挤书记而代之以。饶漱石还借口离开军部，让陈毅主持整风，有意造成陈毅发动干部批评攻击政治委员的印象，并据此在10月16日组织开展了对陈毅的斗争会。他致电毛泽东、刘少奇，挑拨他们与陈毅之间的关系。这在《陈毅传》中已经讲到了。

**访问人：**那么，制造黄花塘事件，把陈毅搞得灰溜溜的，除了过去的历史事件，到底饶漱石抓到了陈毅的什么“把柄”？陈毅的随便议论是些什么？

**吴克斌：**其实事情也挺简单。有一天，陈毅在军部处理公务，其他人都走了，就随便地和秘书聊天，看到桌上放着一叠中央规定的整风必读文献，他就问，你这些书都读了吗？接着他随口感慨说，这些书都是好书，可是不要看这些书讲得头头是道，执行起来就不一定真这样，我看得多了，在井冈山就看到了，有些事情就不是照样执行的。这些话，当时听来显然不太恭敬。秘书很单纯，吓坏了，回去也不敢和谁

讲。过了些日子，上面再次强调整风要敞开思想，秘书就着急了。那天他看到饶漱石一个人在黄花塘边乘凉，就走上去谈了这件事。饶说，行了，知道了。表面平平淡淡，实际如获至宝，认为抓住了陈毅过去反毛、现在还反毛的“把柄”，可以在这上面大做文章。

陈毅有理说不清，无法解释，只好走。陈毅1943年11月25日动身，第二年3月7日方到达延安，行程数千里。到延安后，陈毅与毛泽东的交往，毛泽东给陈毅做思想工作的种种情形，《陈毅传》中写了许多。但陈毅初见毛泽东的情景宋时轮同志给我讲过：陈毅因为“黄花塘事件”，心中惴惴不安。虽然他一路上写了不少诗，其中也有像“众星何灿烂，北斗住延安。大海有波涛，飞上清凉山”这样歌颂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诗句，但毛泽东和中央究竟会以什么态度待他，他心中无数。因此，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毕恭毕敬。公事公办的谈话后，毛泽东忍不住发了脾气，他说，你这个陈毅，我们十年不见面了，老战友，老朋友，你怎么这个样子！有人说了什么，大家交心嘛，你这样子我还敢跟你说话吗？陈毅听了毛泽东这席话，很感动，放下了包袱，两人用在井冈山时期建立的那种感情交流谈话。陈毅原本是准备到延安“请罪”的，但毛泽东给他做思想工作，他感到越来越亲密。1944年12月1日，毛泽东就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写道：“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他为“七大”起草的《建军报告》，总结了1927年至1945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年军事斗争的历史和经验。这个文件虽然后来没用上，但他在其中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军事学派”这个命题，并有较系统的研究。在“七大”上，陈毅作为新四军代表发言，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此后又被任命为中共

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这都是与毛泽东的信任分不开的。“七大”之后，陈毅回华中工作。临行前毛泽东与他谈话，陈毅关心自己同饶漱石的关系，说：回华中局恐怕没有事做，不起作用。毛泽东说，怎么不起作用？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起作用。陈毅就答应了。为此，中央发电报给华中局，其中说陈态度很好，一切问题均谈通，并分工饶漱石为华中局书记及新四军政委，陈毅为新四军军长及华中局副书记。1954年，野心家饶漱石被揭露，陈毅并没因此忘乎所以，而是写诗《手莫伸》等以自惕自励。后来，毛泽东看到送来的陈毅在华东传达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报告之后，叹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呀！”似乎对此事打了个句号。

**访问人：**原来中央是把陈毅和林彪作为主持东北工作的人选的，后来林彪去了东北，陈毅回了华中。这也说明毛泽东是信任陈毅的。

**吴克斌：**陈毅和林彪、萧劲光是乘一架飞机于8月25日离开延安的。26日那天，军委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外，还任命林彪和萧劲光为山东军区正、副司令员。可是走到冀鲁豫军区，就收到中央的电报，叫林、萧到冀东去，命陈毅不去华中而直接到山东接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的工作，以便罗去东北，陈毅就这样到了山东。不久就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了。

### 毛泽东的哀悼之词， 是对陈毅的最后结论

**访问人：**陈毅与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是显而易见的。那么，那段时期两人的一些摩擦是否也给他们后来三四十年的交往投下了些阴影呢？

吴克斌：我想还是有的。“黄花塘事件”的处理说明了毛泽东对陈毅的信任与工作能力的肯定，但这个事件的由起也正说明红军时期他与毛泽东之间产生摩擦的影响仍然存在着。毛泽东的感情非常丰富，常常是爱亦深恨也深，他看人全面而又深刻，但同时他的脑海中也记存某个人的历史档案，这种档案并不一定产生成见，但会产生对人的基本印象。“文革”中，陈毅的这块“伤疤”也屡屡被人揭开，中共“九大”时张春桥说他是“右派代表”；“九大”后，在一个专案小组会议上康生还说到陈毅在红四军“七大”时要夺毛泽东的权，把毛泽东的枪都给缴了。康生为什么要说这个话？也还是他揣摩毛泽东记得这事，想迎合毛泽东。陈毅也是个敏感的人，他的心里也明白，毛泽东在其他方面都会对自己好，但这个事的疙瘩没解开。但这并不影响毛泽东始终如一地对陈毅怀有很深的个人感情，不影响他们彼此间的欣赏。1971年冬，陈毅在病榻上已难以言语，但还是设法叫家人去做寿面吃，说是毛主席的生日到了，他要祝毛长寿。相应的是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亲临陈毅追悼会。这是意味深长的。他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他是我们党的一个好党员，好同志”。我想，这是哀悼之词，也是毛泽东与陈毅自1928年结识以来，交往44年作出的最后的结论。

1992年8月30日于北京总政招待所

## 访黄瑶——

### 毛泽东和罗荣桓

黄 瑶

黄瑶，1933年生，江苏扬州人。长期从事宣传工作和编辑工作，著有《罗荣桓传》（合著）、《在战斗中成长的罗荣桓》、《罗帅最后十五年》（合著）、《罗荣桓元帅的故事》、《碧水苍山》、《罗瑞卿传略》、《一个大写的人》等。

毛泽东吊罗荣桓，一句“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道出了许多感慨。人们自然会问：毛泽东为什么这么看重罗荣桓，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交往和关系？

#### 相识在秋收起义

**访问者：**毛泽东对罗荣桓评价很高，在元帅中是少有的，那么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

**黄 瑶：**据我了解，他们开始接触的时间是秋收起义以后，大约在文家市。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罗荣桓同叶重开率通城农民自卫军参加秋收起义。9月19日部队到达文家市集合。次日清晨，毛泽东对全体官兵讲话，提出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部队要找个地方休养生息，回来再打长沙。毛泽东讲了很多道理。这对于当时为起义失败不知如何是好的

罗荣桓来说，感到像久渴之后饮进了甘泉。这是罗荣桓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访问者：**这之前罗荣桓知道毛泽东这个名字吗？

**黄 瑤：**知道。他早就听说这个名字了。还在1919年毛泽东搞驱张运动的时候，他就知道了毛泽东是湖南著名的学生领袖，当时的罗荣桓正在长沙读中学。过去只闻其名，现在见到了本人，听了他的讲话，觉得毛泽东有办法，是可以信赖的人。

**访问者：**那么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接触呢？

**黄 瑤：**据杨勇回忆，可能是通过朱建胜认识的。当时起义军准备从文家市撤退到萍乡，派朱建胜和罗荣桓探路打前站。朱、罗发现萍乡街上和车站驻满了军队，所以起义军改变了行军方向，未到萍乡。估计这期间和毛泽东可能发生了联系。

以后是三湾改编，起义军由师缩编为团，下辖七个连，支部建在连上，罗荣桓任特务连党代表，是当时七个连党代表之一。这个时候毛罗之间应该有接触了。再以后就是前往井冈山的途中，有件事可以说一下：10月22日部队在江西遂川县的大汾宿营。次日清晨，战士们还没有醒，突然枪声大作，四周都是敌人，队伍遭到了敌人的袭击。这时罗荣桓和连长曾士峨带着特务连迅速撤退，一口气跑到黄坳，一路上只剩三四十人，里面就有毛泽东。停下来了，战士们稀稀落落地坐在地上，又渴又饿。搞点饭吃吧，结果呢管伙食的也跑丢了。大家就凑点钱到老乡家买饭吃。买来的是一些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大家就用手捧着吃。毛泽东穿着长衫，就用衣襟兜着，用手抓着吃了。当时的他们未免有点狼狈。吃过饭，毛泽东首先站起身来，向空地走了几步，双脚并拢，身

体笔直，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了，我站头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罗荣桓立即入列，自动向毛泽东看齐。曾士峨也双手握拳，跑步走到指挥位置，下达了“立正”的口令。战士们被感动了，他们抬起头来，纷纷提枪入列。后来张宗逊带着一排人也赶到了，罗荣桓要张宗逊护送毛泽东先走了。这件事是罗帅自己回忆的，因为当时的情景非常艰难，所以他印象很深。

**访问者：**上了井冈山，毛泽东和罗荣桓接触就多了。

**黄 璠：**印象深的是八月失败。这时朱德和毛泽东已经会师，组成工农红军第四军，其中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是全军主力，罗荣桓任三十一团第三营党代表。八月失败后，毛泽东到桂东接朱德、陈毅回来，率领的就是第三营。一路上从井冈山下山很不好走，有的地方坡比较缓，长着又高又厚的草。这种草叫野萆茅，走路时特别容易绊倒，红军就想了一个办法，坐在草上往下滑，结果又快又省力。

**访问者：**毛泽东《吊罗荣桓》的诗中，“记得当年草上飞”是否就指这件事呢？

**黄 璠：**这句诗是毛泽东借用的，相传是唐朝黄巢《自题像》诗中的第一句。既然是借用到这里，又有这回事，可能是毛泽东想到了当年的这种情景才用的。

下山途中还有一件事，一天夜里部队正在行军，突然遭到敌人袭击，队伍被打散了。但因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比较稳固，部队很快就集合起来了，各连清点人数，发现只丢了一个担架兵。当部队回到井冈山时，这个战士已先他们到达井冈山了。这次罗荣桓领导的三营远征湘南，行程几百里，打了好多仗，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创造了巩固部队的新纪录，真正成了拖不垮、打不烂的红色铁军。这年 11

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里对连党代表的作用评价很高，当然这里也不一定仅仅指罗帅这个营，但起码包括进去了。

**访问者：**毛泽东提出的一些建军原则，如民主制度，尊重士兵人格、不打骂士兵、反对军阀主义，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军事民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都是从这时慢慢积累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罗荣桓起了什么作用？

**黄 璠：**我认为罗帅是实践者，当然党代表还有其他人，但大部分后来都牺牲了，而他是幸存者。这一时期他们之间的交往比较直接。1929年下山的时候，红军十分被动，敌人一直尾追不放，当时的前卫部队也是罗荣桓的第三营。到了大柏地，后卫二十八团的萧克那个连和敌人接触了，敌人追得很紧。这时的三营突然不走了，要求和敌人打。据江华回忆，当时军队的民主气氛很浓，用现在的眼光看，可能是过分了。罗荣桓和营长去军部向朱毛反映，朱毛决定不走了，就在这里打伏击，结果打胜了，并扭转了被动局面。

### **毛泽东说：罗荣桓是个人才， 我们对他发现晚了**

**访问者：**红四军七大时期内部产生争论，这似乎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几十年之后的1966年毛泽东同外宾谈话时还提到这件事。他说，七大时，遭到内部同志的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那时林彪同我一道，他赞成我。他是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的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这里面包括罗荣桓吗？

**黄 璠：**对于这段历史，罗帅所持什么态度，没有材料



说明。但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分析，这里面不包括罗荣桓。红四军召开“七大”时，毛泽东所领导的秋收暴动部队是第三十一团，下山后不久改称第三纵队，司令是伍中豪，党代表是蔡协民，罗当时是这个纵队中小支队的党代表。古田会议时，据冯文彬（他当时从上海到闽西不久）回忆，古田会议前后有次毛泽东和他散步聊天，这时罗荣桓从旁边走过，毛对冯说，这是个人才，我们对他发现晚了。这恐怕是毛泽东对罗荣桓的真情流露。我认为这话也符合罗帅的性格。罗平时沉默寡言，不张扬，不露锋芒，很少说话。因为毛泽东认为罗荣桓是个人才，红四军“九大”选举前委委员，罗帅当选了。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里讲有几个人做基层工作，因为“观念正确，斗争积极，经前委介绍而当选”。这里面就包括罗荣桓。

**访问者：**能否说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发现了罗荣桓，重用了罗荣桓？

**黄 璠：**前面已经说过，毛早就认识了罗，但发现他的才华可能经过几次反复的认识。在黄坳搞饭吃是一次；打遂川是一次；八月失败后第三营去桂东，“记得当年草上飞”，是一次；大柏地战斗前罗到前委请战是一次。到古田会议前的调查会，毛对罗的认识可能经过几次反复，而产生了认识的飞跃。古田会议后罗升任为二纵队政委，这段时间毛泽东一直随二纵队行动。到1930年6月，罗帅代理红四军政委，军长是林彪。待打长沙时，罗正式担任四军政委，又是四军军委书记，比林彪的职务还高。当时的红一军团是主力，军团长和政委分别由朱德、毛泽东兼。红一军团的主力是第四军，可以说四军是主力的主力。那么担任这个主力最高职务的是罗荣桓，可见毛泽东对他是十分信任和器重的。

**访问者：**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军委书记换成林彪，罗荣桓只当政委，是怎么回事？

**黄 瑶：**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不是很大，其中有一仗打成对峙了。打的过程中我们的一些伤员，敌人的一些俘虏，都归后方管，打完仗部队就撤走了，伤员和俘虏来不及转移。当时的敌情犬牙交错，我军刚走，敌人就来了，把俘虏又抢回去了，我们的伤员也被抓走。罗荣桓作为政委，承担了责任，所以军委书记改由林彪担任。

### **罗荣桓曾跟着毛泽东倒霉**

**访问者：**后来朱毛不兼任一军团职务了，军团长由林彪担任，政委聂荣臻，罗荣桓是政治部主任。第四次反“围剿”后，罗又离开前线，调到江西省军区任政治部主任。这里面有些什么说法没有？

**黄 瑶：**1963年毛泽东说：“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跟着我倒霉。”这个话是王力回忆的。据王力说是1963年12月16日他陪同毛主席去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时讲的。王力的话虽是孤证，但联系当时的情况，我认为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1931年底，毛泽东就慢慢地离开了工作岗位，罗荣桓也就越来越不行了。罗荣桓对当时王明路线是不满意的。就这件事我访问过江华、宋任穷等。江、宋分别和罗聊天，都发过对王明“左”倾路线的牢骚。

**访问者：**主要是什么呢？

**黄 瑶：**关键就是山沟里有没有马列主义的问题，他们有看法，想不通，说是不是必须吃洋面包的才叫马列主义？

**访问者：**这几个人都是没有吃过洋面包的了？

**黄 瑶：**是的。实际上罗帅到江西军区当政治部主任时间也不长，不久就调到总政当巡视员，没职务了。然后仅任命当了一段军委动员部部长。长征初期，罗帅到八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原来都是罗荣桓的下级。八军团时间不长就打散了，几乎没有什么工作，一直到出了草地，任命他为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是宣传部长。这一段罗邓关系比较密切，他们一起行军，一起宿营，邓小平回忆当时他们是无话不谈。

**访问者：**这个时候的罗荣桓对毛泽东怎么看呢？

**黄 瑶：**经过中央苏区的曲折经历，长征路上的痛苦磨难，他对毛泽东应该说更加信服了。仅举一例就可说明问题。1936年毛泽东在红军大学讲革命战争战略问题，这个讲义是用敌人的传单反过来印的。敌人的传单正面是光的，反面是毛茬，红红绿绿的，印出来模模糊糊不太好看。但罗帅一直珍藏着，后来又带到山东，告诉他的秘书要保管好，他一有机会就拿出来读，里面作了很多圈点、批注。如果他不信服毛泽东，对此书决不会如此认真地反复研读。

**访问者：**据说毛泽东也曾向罗荣桓发过脾气？

**黄 瑶：**是有这回事。那是1937年，一天有个外国人要到延安来。当时罗帅任后方政治部主任，他看到毛主席的被子太破太脏，就让供给部的人换个被子。毛知道后发了脾气，责问罗荣桓，为什么要换被子？我们就是这个条件，吃的是小米、高粱米，还是带壳壳的，穿的就是破旧的衣服。为什么盖旧被子就不能见洋人，要另搞一套？毛泽东在电话中的声音很大，连在一旁的林月琴都听到了。罗帅想想毛泽东讲的也有道理，就把原来的被子换回来了。

## 毛泽东重用罗荣桓

**访问者：**毛泽东向罗荣桓发脾气，也恰恰说明毛泽东对罗荣桓的感情很近，他觉得用不着客套，后来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抗战时期罗荣桓调往山东和毛泽东有关系吗？

**黄 瑶：**这个事说来就话长了。1937年抗战开始时，红一方面军改编为——五师，师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1938年3月，聂荣臻留在了晋察冀五台山，——五师就没有政委了。不久林彪又因负伤被送回延安，师长也没有了。这时对——五师一天有两个命令。一个是毛泽东下的，时间稍晚，一个是集总下的，时间稍早。毛泽东的命令是任命罗荣桓代理师长，集总的命令是由三四三旅旅长陈光代理师长。两个命令打架了，因为集总的命令早了几小时，就以集总命令为准。从这件事来看，毛泽东对罗荣桓是器重的。同时在这件事上毛泽东对集总也有些意见，这大概也是事后毛泽东对彭德怀不满意的原因之一。

**访问者：**后来罗荣桓还是当了一——五师师长。

**黄 瑶：**大约是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后，是政委，不是师长，代师长是陈光。六中全会后罗帅带着部队到山东，这段时间集总和中央来往电报较多，主要是商量——五师干部的配备问题。这时集总和中央还是有分歧，当时集总感觉——五师拿不起来，在山东开展工作有困难，所以在——五师上面成立一个单位叫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是徐向前（1940年6月回延安），政委朱瑞。意图是把山东的地方部队和——五师统一领导起来。1940年9月——五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朱瑞（第一纵队已不存在，朱当时任山东分局书记）一方面发电报给中央告——五师的状，一方面在会上对——五

师做了严厉的指责。结果罗荣桓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请求离开山东，回延安学习。这时毛主席来电报说：“一一五师有极大的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均应继续安心工作，目前没有可能提出学习问题。”这时中央已知道了山东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毛泽东在延安也找了一些从山东去延安学习的干部，还有一一五师的干部了解情况；1942年毛泽东又让刘少奇从苏北回延安时路过山东，解决山东的问题。当时的分歧主要反映在对形势的看法不同。朱瑞估计较高，认为我军对顽固派已占优势，对敌伪也走向优势，所以打仗就偏于搞运动战；罗认为不占优势，我们是劣势，所以主张游击战。刘少奇来后，经过调查研究认为朱瑞的看法不对。在这个过程中，刘和毛往返有很多电报。1943年初任命罗荣桓为一一五师政委兼代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后来又任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回延安了。这样在山东便实现了一元化领导。

**访问者：**能否说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对罗帅的第二次重用？

**黄 璠：**能不能这样说，还可研究。总的说来毛泽东对罗帅比较重视，而且山东的工作也搞得确实不错。1943年到1945年，实现了一元化领导以后，山东的一盘棋就活了。抗战后期我们比较完整的根据地，山东就算一块。抗战结束后，我们同国民党谈判要求出任四个省的省长，其中就包括山东。山东出的兵相当多，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部队大部分是从山东去的，三野部队的老底子有一半是山东的，二野杨勇部也是山东部队。

**访问者：**关于罗帅在山东的工作，毛泽东有过评价吗？

**黄 璠：**正式的文件没有看到。据王力1985年回忆：1961年毛泽东曾找他谈过半天话。因为王力曾长期在山东工作，当

谈到山东党史时，毛主席谈了他对罗帅在山东工作的看法。毛泽东说：“山东只换了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活了。山东是执行中央十大政策的模范，他（指罗荣桓——引者注）把山东所有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起来了。当时，只有山东一个全省是我们党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可以抢占东北，南可以直到长江，这都是主要依靠山东。罗荣桓在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地区，做好了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事业。”

“罗荣桓同志他到山东的第一天，想的就是谁领导谁、谁团结谁、谁统一谁的问题，也考虑到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当时建设根据地的中心任务，就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所以，他一到山东就想着要把山东全部拿下来，而且要为把全国拿下来尽义务。”

**访问者：**看来毛泽东对罗荣桓的评价是很高的。王力的这个材料可靠吗？

**黄 瑶：**据王力讲当时有个笔记本，这个本子抄家时被抄走了，1985年只能根据记忆来回忆了。不过王力的记忆力还是很好的。当然这只是孤证，只能供参考。

**访问者：**您认为毛泽东对罗荣桓的评价准确吗？

**黄 瑶：**根据上面我谈到的情况，我认为是恰当的。

**访问者：**罗荣桓到东北任四野政委也是毛泽东的提议吗？

**黄 瑶：**1943年4、5月间罗荣桓得了肾病。1945年夏天，病情更厉害了。他致电中央，要求派人接替他的工作。8月26日，毛泽东致电山东分局，决定派林彪、萧劲光到山东，林为山东军区司令员、萧为副司令员，罗为山东分局书记兼政委，“如罗因病必须休养时，林代理罗之职务”。当时，在毛泽东心目中，罗比林更重要。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林刚到，不熟悉情况，需要罗带一带。

抗战结束后，中央要他去东北，而且立即动身。罗帅提出去东北可以，但不要当主要负责人，中央同意了。所以罗帅刚到东北时担任的是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在东北检查身体，诊断为肾癌，到莫斯科进行手术治疗。回国后毛泽东任命他为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林彪是司令员。

**访问者：**延安分手以后，毛泽东和罗荣桓的再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呢？

**黄 瑀：**是1949年1月初，在西柏坡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商讨1949年作战的基本方针。罗是由平津前线去参加会议的。他们一别就是11年。因为罗帅身体一直不好，北平解放后在天体看病休养，这期间毛泽东还专门派黄树则代表他去看望罗，毛泽东还专门写了封信，有“既来之则安之”的话。建国后毛泽东任命罗荣桓做总政干部部部长时，还嘱他要少开会，注意身体。

### 毛泽东说，罗荣桓是老实人

**访问者：**在毛泽东的戎马一生中，他周围集聚了很多的战友和同志，他们一起出生入死，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从这些战友去世的情况来看，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延安时期张浩去世时，毛泽东亲自为他抬棺送葬；一个是陈毅去世时，他拖着病体去参加追体会；再一个就是罗帅了。罗帅去世时，第一，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毛泽东提议大家默哀三分钟。第二，他到医院向遗体告别。这些似乎还不能排遣他心中的悲哀，又作诗一首，来抒发他对罗荣桓的痛惜和怀念。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您能讲讲其中的原因吗？

**黄 瑀：**毛泽东对罗荣桓的确非常看重，他曾两次对罗

帅的夫人林月琴说罗荣桓是老实人。毛泽东还举例说，高饶事件中，高岗到处活动，曾找了小平与陈云，他们报告了毛主席。高岗自己说，罗荣桓是党内圣人，他不敢去找罗乱说。此外，中央政治局会议为罗荣桓逝世默哀时，毛泽东还讲了话，说罗荣桓这个人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这恐怕是他看重罗帅的原因之一。其二在井冈山、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对罗帅有很深的感受，他真正的好感恐怕也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第三，罗帅在山东时工作出色，前面已经讲到了。第四，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第五，罗荣桓任总干部部部长时注意搞五湖四海，调动各个山头的积极性。比如1955年授衔时，大将以下的名单都是他主持提出的。整个授衔绝大多数都感满意，甚至有的要求往下降，像徐立清上将，因名额有限，主动要求降为中将；许光达大将要求当上将，有意见的很少。所以毛主席说他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

### 关于毛泽东《吊罗荣桓同志》

**访问者：**罗帅从参加秋收起义一直到他去世，从没有因为工作和毛泽东产生过不同意见，也就是说从没有发生过正面冲突，也不无关系。请问您对毛泽东《吊罗荣桓同志》这首诗是怎么看的？

**黄 璠：**这首诗表明了毛泽东对罗荣桓怀有很深的情谊，对罗荣桓的逝世十分痛惜和悲伤。具体到诗的内容，首先要弄清它的时间，才能说明它的含义。现在把它定为1963年，是根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定的，但从字体上看不像1963年的。1963年毛泽东的书法相当潇洒漂亮，而这首诗的字迹手有些抖。王力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毛泽东每天睡前



要吃三遍安眠药，吃完第二遍安眠药后，他写字手就抖了。因此仅从字体也不能证明这不是1963年写的。现在找不到其他根据，所以只能以毛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为准。比如：“战锦方为大问题”一句，很多人理解为是打锦州中林彪动摇。其实打锦州时，林彪一度犹豫，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如果是别的老帅的事，可能就不公布，确实也有很多没有公布。因为毛泽东批评其他老帅的电报也不少，有的批评得更严厉。为什么打锦州中林彪一度犹豫不是个什么事呢？林彪率大部队南下后，听说敌人在葫芦岛增兵，他有个思想活动，像《辽沈战役》影片中说：做了一桌菜来了两桌客，他有些犹豫怕打不下来。因为1947年打四平没打下来，后来我们撤了；打长春试了一下，后来决定长困久围；现在打锦州，敌人在葫芦岛增兵，我们的机械化部队都开来了，用汽车拉着大炮，锦州打下来就可以补充汽油，那就好办了；如果打不下来汽车开不走怎么办？没有回程的汽油。出于这些考虑，林彪给中央发电报，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打锦州，一个是回去打长春。这只是他的一种设想，并没有变成行动。就在他发电报的同时，部队也没有停下来，还在继续往锦州开。当然，如果变成行动，那就糟了。因为唯有打下锦州，才能把蒋介石的军队封闭在东北予以歼灭。如果回去打长春，可能把东北敌人驱赶入关，就会增加下一步作战的困难，所以毛泽东着急了，一连两封电报要林坚持攻锦。在毛泽东批评电报尚未到的时候，罗荣桓劝他还是打锦州，于是，他又发一个电报，下决心打锦州。这对林彪来讲，前一封电报只是向毛反映他的一种思想活动。他把这种设想报给军委，从组织原则上讲并不错，当然他这个想法本身是错误的，可是并未成为事实，几个小时就纠正了，因此也不是个了不得的事。为什么成了问

题呢？这是林彪折戟沉沙后揭发出来的。对林彪叛逃，人们当时都很气愤。而在那个时代，翻老账是经常可以见到的。林彪集团整人时也常用这个方法。林彪垮台了，人们“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这件事就公布出来了。

**访问者：**那么毛泽东“战锦方为大问题”怎么理解呢？

**黄 瑤：**我为什么说打锦州中林彪犹豫不是什么大问题呢？还有两件事可以说明问题。第一件事是就在罗帅逝世的同一天，毛泽东给林彪、贺龙、聂荣臻等写了一封信，指出：“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理论化了。”毛不可豫在同一天又表扬林又斥责他是“斥鷃”和“昆鸡”。另一件事是就在毛泽东写怀念罗帅诗的先后，毛泽东还为林彪写了一首《龟虽寿》，书法特漂亮。按当时的情况推理，毛一方面为罗去世很悲伤，一方面希望林保持健康。由此可见当时毛泽东对林彪还是很信任的。如果“战锦方为大问题”是指打锦州中林彪犹豫，把林说成了“斥鷃”和“昆鸡”，那么这首诗就不是1963年写的，起码得在“九大”以后；如果是1963年写的，就不会是批评林彪。在当时，毛正信任林的情况下，不可能用写诗的方式算林这个老账。因为林当时动摇的时间并不长，关于“战锦方为大问题”这句诗，如果确认是1963年写的，似应放在当时国际国内历史大背景下来理解。“战锦”当然是打锦州，这是三大战役中第一个战役的关键一仗。“战锦”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种象征，即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及巩固这个胜利的象征。诗无达话，对不对，仅供参考。

**访问者：**毛泽东在诗中谈到“国有疑难可问谁”，这个话

表明罗荣桓在毛泽东心里的位置是很重要的，评价相当高。罗荣桓生前是否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呢？

黄 璠：这可能和毛泽东当时的心境有关。1963年中苏论战白热化，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深恶痛绝。在国内他和党的第一线领导人如刘少奇等有着意见分歧，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心情可能比较复杂。也正是在这种时候，罗荣桓去世了，当他想到罗帅的老实、本分、能干，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当然并不是说处在第一线的刘少奇等当时有何不对。历史也证明当时是毛泽东已开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而他自己并未认识到这一点，反而认为别人不对，所以才产生一种孤独感，对第一线领导人的不信任感。当然，历史是不可重复的，不可能“例如”。例如我们“例如”一下，罗帅60年代如果没有病，也处在中央工作的第一线，由于他非常实事求是，他也会引起已经脱离实际的毛泽东的不信任感的。罗未在第一线，而且逝世了。有些事物失去了往往才会感到更珍贵，这也许是毛泽东写下“国有疑难可问谁”的缘故。

1993年5月9日于北京羊坊店

## 访陈明——

### 毛泽东和丁玲

陈 明

陈明，1917年生。江西波阳人，1937年到延安，先后担任过陕甘宁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大队长、延安文化俱乐部副主任等职。1937年与丁玲相识，1942年结婚。建国后曾任中央电影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有民间叙事诗《平妖记》、电影《六号门》等作品。现为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常务副会长。

陈明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家门。他人很诚恳、健谈。当他拿出珍藏多年从未发表的丁玲给他的信，一字一句读来时，我们被打动了。访谈将结束时，他还一再告诉我们，要在有生之年把丁玲所有的文字整理出来交给读者。

#### 在延安——毛泽东对丁玲说， 你要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

访问者：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作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他与文艺界许多人士有交往，在这些交往中，毛泽东也展示了他自己的审美情趣和个性魅力。毛泽东和丁玲的关系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过去一些报刊也有所记载。您和丁玲同甘苦共患难几十年，您能不能再谈一谈这方面的情

况？

**陈明：**从哪里说起呢？几十年前的往事了，回忆起来还是很有感慨。我从丁玲到延安的时候说起吧！

1933年，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1936年从南京逃出后往上海见冯雪峰，她决定到陕北去。这次见面，冯雪峰主要与她谈起了两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对鲁迅，丁玲比较了解，毛泽东的名字，20年代在湖南她早听说过，但从未见过面。冯雪峰对她谈起这两个伟人，特别是毛泽东，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访问者：**到了陕北，在保安由中央宣传部开的欢迎会，毛泽东参加了，这是不是丁玲和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呢？

**陈明：**是第一次见面。那天，毛泽东披着一件棉大衣，很精神。大家和毛泽东开玩笑，说他漂亮多了。当时人们的关系包括上下级的关系都是很融洽的。这是丁玲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第一次和毛泽东谈话。

**访问者：**1936年毛泽东写有《临江仙》一首词赠丁玲：“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描写的是不是这次欢迎会？是不是丁玲到前线的事？

**陈明：**毛泽东写这首词时，丁玲已经在定边前线了。这首词是用电报发去的，由聂荣臻转交给丁玲。为这事我托人询问过聂帅，问他还记不记得这事。聂帅说不记得了。丁玲记得是聂帅转交她的。

**访问者：**不过的确有毛泽东这首词的手迹。

**陈明：**那是1937年1月间，中央机关从保安搬到延安，丁玲陪史沫特莱一起从定边前线回来后，毛泽东写给她的。原

件我还保存着。这之前，毛泽东曾问丁玲打算干些什么，丁玲回答说，想当红军。毛泽东说，好，马上就可以去，现在还有最后与胡宗南的一仗，赶快去，赶得上。于是丁玲就去了定边前线。这次，她回到延安，毛泽东又一次问她想做些什么工作，丁玲说还是当红军，毛泽东便亲自安排她去中央警卫团当政治部副主任。这是一个主要负责部队文化生活、后勤给养、包括战士家属安排事宜的工作，这对一个一下子从大城市到部队、农村的作家来说，也许不是最合适的。丁玲一时很难习惯，也感觉力不从心。一方面，那些长年随部队征战南北农民出身的战士，比如部队的管理员、司务长，和知识分子是有些隔膜存在的；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想接近他们，却也不知如何做起，显得格格不入。这种隔阂与彼此间的不理解后来有了大的改观，但初时的确存在这些现象。丁玲做这项自己不熟悉的工作，抱了极大的热忱。这时期她有些作品，并不一定深入，但却可以看出她内心的这种真诚。只是她的特长是写作，她不会处理当时那个环境下的各种人际关系。所以，当后来丁玲要去“西北战地服务团”之前，毛泽东曾这样对她说：你以后到一个单位，要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这句话是从侧面对丁玲的批评，对丁玲的影响很深。当时她没有掂出这句话的分量，但越往后，甚至几十年，这一辈子下来，她就越感到它的重要和深刻。这番话，是刻在她心里的。对丁玲，毛泽东那时还说过这样的话：我看你还是习惯同知识分子在一起，你看抗大的学生一群一群地去找你。这也是毛泽东对丁玲婉转的批评。丁玲不是抗大的学生，也没在抗大讲过课，毛泽东去抗大讲辩证法，每次都有警卫员跑去告诉丁玲，丁玲每次都去听毛泽东讲大课。1937年抗战开始后，“西北战地服务团”搞起来，丁玲就去了那里，和我

在一起。“西战团”的人员是以军委的名义调动的，但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宣传部。

**访问者：**丁玲在延安和毛泽东有很多接触吗？

**陈 明：**是的。丁玲经常到毛泽东窑洞里谈闲天。去毛泽东那里的人，包括一同长征走过来的战友，和毛泽东谈的多是工作问题，或请示，或汇报，能和他谈闲天的人不多。丁玲是一个。丁玲很敬重毛泽东，头脑中也没有上下级关系的概念，又是搞文化工作的，所以谈起来无拘无束，海阔天空。毛泽东每到这个时候也很松弛，两人还时不时开些玩笑。有一次，丁玲开玩笑说，我看延安就像个小朝廷。毛泽东接着话茬说，好么，那你得给我封官啦。丁玲就说到几个人，其中说林伯渠可以做财政大臣，彭德怀可以做国防大臣什么的。毛泽东又笑着说，你还没有给我封个东官、西宫呢！丁玲说，这我可不敢封，要是封了，贺子珍还不跟我打架啊！两个人都说得热闹开心。谈闲天，开玩笑，他们的关系的确很和谐，也很融洽。毛泽东一直很关心丁玲。“西战团”成立，还没出发，毛泽东就打了两次电报给山西（那时是阎锡山的统治区），告诉那边丁玲带团大概什么时候过黄河、什么时候到，要他们沿途负责接待。

**访问者：**毛泽东发出的那两封电报是给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彭雪枫的，第一封电报说丁玲带领的“西战团”要由延安过黄河经吉县到太原，第二封电报说由延安动身，在平渡关过黄河经吉县、平阳到太原，要求彭雪枫派人迎接。

**陈 明：**“西战团”在山西活动一段时间后，1938年春天，奉命到西安，宣传八路军抗日的胜利消息，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那时，国民党在西安查封了十几个进步群众团体，搞摩擦。“西战团”它不敢封，但另外要花

样，要求我们即刻到战区去，不准留在大后方，如果过时不走，就逮捕负责人。为此，我们商量过对付的办法。丁玲为此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主席指示我们说，要针锋相对，磨而不裂。丁玲回西安后，我们就是遵照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去做的，影响比较好。

1938年8月间，丁玲从“西战团”回延安，此后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1939年丁玲已经到马列学院学习。康生是中央党校的校长。他在一次党校学生会议上说，丁玲要是想到党校来，党校不会要她，因为她在南京自首过。曾经在“西战团”工作过的一个同事把这话讲给丁玲听，丁玲很生气，康生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说我自首过？她去找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也去找毛泽东。主席对她说，你不要生气，我相信你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但要作结论，是组织问题，你得找陈云同志。主席还说，你也可以找找康生嘛！丁玲找了陈云，但没去找康生。她这么想，我和康生毫不相干，干吗要找他？

**访问者：**那么是什么时候作出书面结论的？

**陈 明：**是1940年10月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作出的，有陈云、李富春的签名。通过对丁玲1933年5月被捕至1936年离开南京这一段历史的审查，中组部结论认为，丁玲曾经自首的传说并无证据，不能凭信。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把这个书面结论交给丁玲本人时，陈云还告诉她，最后一句话“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是毛主席加的。我记得，这个材料是用复写纸抄的。

**访问者：**这期间丁玲发表过哪些作品？

**陈 明：**发表过一些。比如《在医院中》，发表在1941年



延安的文艺刊物《谷雨》上；还有一篇是《三八节有感》，发表在《解放日报》副刊上。这些作品在当时引起了一些批评，有不同的意见。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组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后，问题就严重了。现在看来，这些文章并不存在什么反党的问题，只是批评我们内部存在的一些消极的不健康的东西。

**访问者：**王实味的问题已经弄清楚了。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有一个关于他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给予平反。

**陈 明：**但当时主持《解放日报》副刊的丁玲很紧张，思想负担很重。其实她写的那些东西是有感而发。《在医院中》写的就是她生病住院期间的亲身感受。1981年我们在庐山遇到当年那个医院的院长，和他谈起《在医院中》这篇作品，他也觉得没什么不妥。但在1958年对丁玲的不公正的批判中，把她的这些作品，还有一篇叫《我在霞村的时候》统统又翻了出来，说她是“反党集团”的人。

**访问者：**我们看到过1979年中国作协对丁玲右派问题进行复查后作出的撤销1958年划定的“右派分子”的结论。1984年7月14日，中央组织部又有为丁玲恢复名誉的通知，对“丁玲反党集团”、“右派”、“叛徒”的错误结论作出改正，恢复丁玲的党籍和政治名誉，推倒一切不实之词。

**陈 明：**是啊！1979年作协对丁玲的结论是很不够的，所以才才有了1984年中央组织部的这个“通知”，对丁玲的不公正终于有了结论。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到1984年接到那个恢复名誉的通知时，丁玲已是80岁的老人了。她说：“现在我可以死了。”

**访问者：**在延安，丁玲因写《三八节有感》受到一些批评，批评得厉害吗？

**陈 明：**其实那个时候的批评也只是提出意见而已，并不像后来 1958 年的批判运动那样来势汹汹。那时批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是在一次高干会上，这个情况丁玲自己写过。这次高干会是毛泽东主持的。第一个站起来发言批评丁玲的是曹轶欧。丁玲开会回来跟我说起时还感到奇怪，曹轶欧又不领导文艺工作，怎么第一个起来批评我？曹轶欧发言后，又接二连三有七八个人发言。只有徐特立徐老发言没有批评。贺龙批评说，我们将士在前方打仗流血，你们在后方骂我们。贺老总的性子是很直的，话说得也直。会上总司令朱德老是抬着眼镜望丁玲。博古是《解放日报》的社长，本来坐得比较远，后来也挪到丁玲近处来，事后问丁玲一句，感觉怎么样？丁玲笑嘻嘻的似乎并没觉得有什么难堪。贺老总那么批评她，她并不往心里去，只是想贺老总误会到哪里去了。她和贺老总在性格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第二天，她去看贺龙，说：不打不相识，你误会我批评我，我就来看看你。贺老总第二天也到文协来看丁玲，丁玲留他吃中饭，那次我也在，就在窑洞里开了一个客饭，加了个菜“土豆炒肉丝”。所以尽管高干会上那么批评，彼此间还是诚恳相待的。

**访问者：**善意的批评，善意的帮助。

**陈 明：**那时他们高级领导人之间彼此也是相处得很好，会上争得面红耳赤，散了会照样在一起甩扑克，无私无间。

**访问者：**丁玲受到些批评，毛泽东关注过这件事吗？

**陈 明：**丁玲跟我讲过，毛泽东还是保护丁玲的。那次高干会开到最后，毛泽东出来讲话说，丁玲和王实味不一样，王是托派（尽管后来证明这样划是错的），丁玲还是我们自己人，她在文章中还有积极的建议：女同志要自强、自尊、自爱，还是积极的。不过，虽然毛泽东讲了这番话，王实味问

题提出出来后，丁玲的思想负担还是挺重。特别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散发了她的文章，更是她意想不到的。但在她心底，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觉得毛泽东是了解她的，她十分敬重毛泽东的感情丝毫没有变。

**访问者：**在整风运动之后，丁玲写过一篇文章叫《田保霖》，发表在1944年6月30日延安的《解放日报》上。这篇文章是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模范人物的，它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都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陈 明：**毛泽东1944年7月1日写信给丁玲和欧阳山，信中说他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了他们的文章，说：“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他还约他们两个来叙谈叙谈。这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后对丁玲的鼓励。毛泽东在别的会上也替丁玲说过话，说丁玲还是个不错的同志，为了写文章，深入生活到农村去，和老村长的那个生了大骨节病的婆姨住在一个炕上也不嫌弃。这是参加会议的同志回来后告诉我们的。所以整风时期对丁玲的批评和帮助还是诚恳的。

**访问者：**这个时候丁玲又有所创作吧？

**陈 明：**丁玲是非常热情、非常努力创作的人。自从毛泽东跟她讲生活中要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她就想自己也要把在生活中认识的人一个一个地写出来。写战士，写带兵的营长，写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指导员，写边区的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人。她计划用不同的笔法，写出十个不同的人物，作为自己今后写人物、写长篇的练习。结果完成了三个，一个民间艺人李卜，一个红军营长袁广发，还有一个就是田保霖。因为形势的变化，另几篇都来不及写了。1945年七大召开以后，总政治部约了几个作家准备写我们军队的几

个将军，分配给丁玲写的是陈毅，陈毅为这事还专门到我们家里来过。

**访问者：**这事没听说过。动笔了吗？

**陈 明：**没动笔，刚开始接头。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延安南门外的边区文协，陈毅爬很高的山来与丁玲见面。但正准备访谈的时候，日本投降了，形势转变，将军们都得赶紧去前方，我们也要离开延安，为将军立传的计划就搁下了。丁玲写十个边区人的计划也只完成了三个。

**访问者：**丁玲采访陈毅有文字记录吗？

**陈 明：**没有，刚开始接上头嘛！

### **在西柏坡——毛泽东说， 几十年才能看出一个人**

**访问者：**抗战结束后你们去了哪里？

**陈 明：**本来我们是准备去东北的，但没多久全面内战开始，交通断了，就留在华北搞土改了。在土改期间，丁玲创作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送给乔木、萧三、艾思奇看，请他们提意见。

**访问者：**萧三的夫人甘露1986年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一篇文章，其中讲到他们三人看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1948年5月在平山县西柏坡。他们三人陪毛泽东外出散步时，在一边讨论丁玲的小说，毛泽东问起，乔木说：“小说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就可以发表。”毛泽东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后来甘露把毛泽东的这个话讲给丁玲听，丁玲很高兴。

**陈 明：**丁玲把初稿先给周扬看过。丁玲写完这部小说

后，接到中央通知，要她参加妇女代表团出国出席世界妇女大会。她就经华北局驻地城南庄往西柏坡。在城南庄把稿子从周扬手里拿了回来，周扬什么意见也没说。不过，当时却有过一些关于丁玲这部小说的传说，虽然没有指名，但意见是说她写地主家如何干净漂亮，写贫下中农家就都是苍蝇屎，以此证明作家中也有人有地富思想。我们也猜到这个传说的来源，丁玲心里是很生气的。到西柏坡，听甘露告诉她毛泽东怎么怎么说，她当然很高兴。乔木组织萧三、艾思奇等人重新看稿子，还告诉丁玲，你是个作家，出国访问，应该有一本书的，我打电报给大连，叫大连帮你出这本书。你先走，有一些文字上需要修改的这边给改。后来毛泽东也答应看一看这部作品。

**访问者：**丁玲在西柏坡时，和毛泽东有过接触，甘露回忆说丁玲去看望过主席，还一起散过步，谈得很多。

**陈 明：**是的。1948年6月间，丁玲在西柏坡有一封长信给我，那时我在正定。这封信从没发表过。因为你们今天要来，要谈毛泽东和丁玲的交往，昨天我特意找了出来。我来读给你们听：

“伯夏：

我昨晚到了这里(6月15日)。我现住妇委，住在杨之华大姐房间，但是我们还未谈话呢。我要先告诉你我昨晚干了些什么。车子刚从×××出发，到×××时，对面来了汽车。我下车未走，看见两个穿黄衣的走来，是谁呢？我认出未了，是主席！他也看见我了，对我在笑，我赶忙跑过去。主席说，哦，好得很啦，看见你，几年没见面了。江青也走过未。

主席很胖，身体很好的样子，江青也还同以前一样，或者稍微老一些。主席即要我和他坐汽车，一道散步去。汽车上同去的有十几个小娃娃，他们的女儿和别人的儿女们。半路上又上来了傅钟夫妇和他们的儿女，挤满一汽车。主席告诉我收到了前年我给他的信，他说我已经到了农村，找到了‘母亲’，‘写母亲’，我了解土地。他问我的作品，并答应我读我的原稿。”

**访问者：**这是不是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原稿？

**陈 明：**是的。信中的“车子”，是丁玲他们坐的胶轮大车；信里的地点因为当时考虑保密，隐去了。

（接着读）“后来我们在野外坐下来又谈开了。主席两次重复着对我说，历史是几十年来看的，不是几年来看的，要几十年才能看出一个人是发展、是停滞、是倒退，是好、是坏。（陈明插话：这话丁玲后来给我讲过多少次。）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多么地在鼓励着我。他还怕我不明白，第三次在他院子里坐时，又重复了这句话，并且拿鲁迅作例子。他并且说我是同人民有结合的，我是以作家去参加世界妇女大会的，我是代表，代表中国人民。……他又问我搞土改的情形，还问了你，并且说我已经农村十二年，可以够了，以后要转向城市，要转向工业，要学习工业，要写工业，写城市建设。我们天快黑时又坐汽车到他的家，在他们家里吃晚饭，他又同我说我的名字是列在鲁、茅、郭一等的。我说我没有成绩。……吃过饭，江青就陪我去找小超。你

看我多幸福呀！我第一次就做了他的客人，就听了他给我这样多的鼓励。我想着柯仲平为着见不到他而喝酒，喝醉了酒骂人，我是多么地有运气呀！我并且同他约好，以后我要找他时，就在他散步时来，他也高兴地答应了。”下面写的是别的事，就不念了。

**访问者：**这封信真是太珍贵了！似乎感觉他们的一举一动就在眼前。

**陈 明：**我很珍惜这封信，为了保存，我把原稿裱了起来。

**访问者：**毛泽东对丁玲的评价很高。

**陈 明：**丁玲不会想到以后它会发表。她给我写这封信，是为了把她感受到的幸福同我分享。的确，毛泽东一直是很关心很相信丁玲的，丁玲对他的感情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所以1979年给她摘去“反党”、“右派”帽子后，她回到北京，在重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的前言里就说，“过去毛主席在的时候，我不愿意多说这些。倒是现在毛不在了，我应该说了，我当时是带着一种什么心情写这本书的，我就像一个战士在战场上喊着毛主席冲锋。”

## 艰难岁月——最后一次看见毛泽东

**访问者：**这段文字给人的印象很深。

**陈 明：**有外国记者也问过她，说共产党那么整你，毛泽东对你那么不好，你为什么还对共产党、对毛泽东那么有感情？丁玲回答，毛主席晚年确实犯了错误，但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无论是长征，还是抗战，还是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他的历史功绩是在那里摆着的，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丁玲对毛泽东的敬爱感情是始终如一的。所以，1955

年丁玲开始受批判，1958年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我与她两人心里有一点非常清楚，就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也许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正确的，但在把丁玲打倒这个问题上，他是百分之百错了。我们也有不理解的地方，就是毛泽东为什么会这样做？丁玲就想过，难道毛主席不了解我吗？中央那么多领导同志不了解我吗？后来想来想去，觉得是毛泽东的威信太高了，偏听偏信之后他一说什么别人就不能再说别的了。这是过去我们党内民主生活的缺陷。我想，民主生活的缺陷，从被领导者角度来看，就是主动接触领导少了，向领导反映群众不同意见的机会少了，这就可能影响领导者在重大决策时由于狭仄而造成失误。1944年在延安时，曾有人劝说丁玲，应该接触中央领导，如实、全面地反映群众意见，否则，领导只能听到一种意见，难免偏听偏信，走着独木桥，那会是危险的。

**访问者：**独木桥？

**陈明：**丁玲有一种脾气，遇事不愿出头露面，就是我搞我的写作，没留什么心眼去走上层路线、搞人际关系，组织上分配给我什么任务，我就去做。1958年丁玲被批判后，并未想到要去找中央领导解决问题——这不牵涉到对中央的信任问题。我们只想赶紧承认错误算了，承认了就能赶快下去离开北京，到群众里面去，专心创作。当时我们考虑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北大荒林区，一个是贵州林区。

**访问者：**结果去了哪里？

**陈明：**去了东北，去了北大荒。那时我被株连，划为右派，到北大荒监督劳动。我只得跟丁玲商量我先走，看情况，创造条件，她也去。以后我们在北大荒呆了12年，在秦城监狱呆了5年，又到山西农村3年多。



**访问者：**整整 20 年的时间。

**陈 明：**在这期间，我们都盼着能尽快解决我们的问题。1961 年我的“帽子”摘了，丁玲的不给摘。“文革”刚开始时，我们心里想，说不定有希望了，结果却证明我们想得太简单了。老干部、老同志接二连三都被打倒了，形势很乱，本来已摘了“帽子”的我又被重新戴上了“帽子”。那时丁玲在一个队劳动，我在另一个队里，我很怕她听到这个消息受不了，就写条子给她，捎《红旗》杂志、棉褥子给她，暗示我平安无事。

**访问者：**这期间丁玲有没有想到写信给毛泽东，把自己的情况说一说？

**陈 明：**没想过。

**访问者：**1958 年 1 月，《文艺报》刊登了一个批判丁玲、陈企霞等人的专辑，编者按是经过毛泽东修改的，有许多段落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不知道丁玲本人知不知道这件事？

**陈 明：**当然知道。

**访问者：**是别人告诉她的吗？

**陈 明：**不是。毛泽东的笔法看得出来，除了他，没有谁的文字写得那么有魄力，一看就知道，不用别人讲。

**访问者：**丁玲是不是很伤心？

**陈 明：**当然伤心。当时报刊上登载这些东西太多了。为了减轻她的精神压力，减少对她的刺激，这一类的文字，我尽可能瞒着她，我把材料收起来，只就一些重大的告诉她有这么一件事，跟她说，别看了，还不就那么些个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想，我们就不要再说什么了，换个地方重新从零干起吧！我们有一些党内斗争的经验，所以心存希望，希望迟早能给我们平反，如果闹得党籍都没有，就更不好办

了。结果，偏偏就把我们的党籍开除了。当时，我哭了，丁玲也哭了。

**访问者：**建国后丁玲和毛泽东有过交往吗？

**陈 明：**比较少了。

**访问者：**我们知道这么一件事：1951年夏天毛泽东曾顺路去颐和园看望过你们。

**陈 明：**哦，是这么一回事，那会儿丁玲正在颐和园的云松巢写一篇文章。因为丁玲和我从外地回来后，看到《文艺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李定中的文章，批评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丁玲就把萧也牧的这篇小说拿来看了，觉得李定中的批评文章言词激烈，有点过分了，她就想也写篇文章，谈些自己的看法。她还专门把她这篇文章给萧的朋友康濯看过，请他们到家里来，我们四个人边吃边谈，气氛很友好。文章写完了，丁玲和我，还有丁玲的母亲就准备回城了。那天收拾东西，正等车，忽然跑上来个警卫员，说你们等一等，有中央首长要来看了玲。那天萧三的夫人甘露也在，大家都奇怪谁会来。一会儿毛泽东上来了，因为出汗，穿着的黄绸子衬衫湿了半截，我赶紧上前扶他，又连忙叫勤务员去买西瓜。陪毛泽东来的人不少，其中有罗瑞卿。

**访问者：**谈了些什么？

**陈 明：**当时我们无心，没有记录下来，毛泽东一行也没有带记者。具体怎么讲的不清楚了，只记得丁玲与毛泽东说到自己正在写的这篇文章，并告诉他萧也牧这篇小说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说，那是在吹他自己，作家捧作家自己。然后他就从中国有几百万知识分子这个话题谈开去，谈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改造问题。

**访问者：**这是丁玲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吗？

**陈 明：**不是。丁玲 1958 年出事后，她的作协副主席职务就被撤了。听说由于周总理说了话，作协理事一职才保留下来。1960 年作协召开第三次代表会议，拍了个电报通知丁玲，大意说作协开会你可以来，也可以不来。我们商量了一下，还是去。丁玲就去参加会了，还作了书面发言。就在这次会议期间，丁玲见到了毛泽东。

**访问者：**说话了吗？

**陈 明：**没有。是大家照相的时候，丁玲看见了毛泽东，她没敢过去，站得远远的。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那个时候，她那个身分，怎么敢走近去同毛泽东说话呢？照像时，丁玲老天真，拍了前面一个熟人的肩膀一下，那人回头一看是她，赶紧跑到另一边去了。

几十年过去啦，毛泽东不在了，丁玲也不在了，我岁数也大了，今天我与你们谈的都已经是旧事了。我现在想的就是要尽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有关丁玲的事办好，包括帮她出版一套全部的《丁玲文集》，把丁玲的所有文字都交给读者，让他们去认识丁玲这个人。

**访问者：**我们搞这样的访谈录也是为了让人们更加深入地去了解毛泽东。我们祝愿您早日完成这项工作。

1992 年 6 月 15 日于北京木樨地

# 访王行娟——

## 毛泽东的三次婚恋

王行娟

王行娟，1930年生，广东人。南京金陵大学毕业。长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热心妇女事业，现与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间的妇女研究所、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电话。著有《贺子珍的路》、《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

毛泽东先后与三位女子成婚，度过56个春秋，他是如何对待她们的？她们各自对他又有着怎样的情感？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涉及较少，但家庭生活却是毛泽东不可缺少的一个侧面，为此我们走访了注意研究毛泽东婚姻的王行娟女士。

**访问者：**研究一个人，除了他的政治生涯、学术著作之外，他的出身、甚至婚姻状况也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学术界对毛泽东婚姻状况的研究比较薄弱，您一直搞妇女问题研究，又发表了《贺子珍的路》、《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等著作，您能不能就此谈谈您的一些看法？

**王行娟：**毛泽东一生遇到过四位女性，第一位是他父母给他娶的罗氏。按旧俗说，这是毛泽东家里给他明媒正娶的，但对罗氏，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曾这样提到过：“我

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这反映了毛泽东所具备的反抗性格，以及反封建的思想意识。

**访问者：**罗氏的命运也是很苦的，她20岁到毛家，22岁就因病去世了。在毛家的几年她上敬公婆，下田劳作，个人生活抑郁不幸。其实毛泽东对她并没有完全忘记，50年代毛泽东在一封书信中就曾提到过她的家人。

**王行娟：**除罗氏之外，毛泽东实际上前后有三个夫人。第一位是杨开慧，他们于1920年结合，直到1927年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时分开，一起生活了七年。杨开慧在1930年牺牲。第二位是贺子珍，他们于1928年结合，到1937年贺子珍去苏联，在一起有十年。第三位就是江青，他们于1938年6月结婚，直到毛泽东逝世。

**访问者：**在对这三位女性的选择上，是不是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婚姻爱情观里一些共通的东西？

**王行娟：**毛泽东是一个革命家和政治家，他不是一般的学者，也不是一般的政治家，因此，他的婚姻生活是和他的职业生涯、革命生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认为他选择生活伴侣，首先是看能不能和他志同道合。这一条在他身上非常突出，他的三次婚姻选择都是革命伴侣，如果没有这一条，其他条件再好、再漂亮，他也不会干。

**访问者：**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以前，曾有一位女友和他关系比较密切。杨开慧的自述里曾婉转地提到这一点，当时杨开慧很难过，但最后毛泽东还是选择了杨开慧，自此两人关系的发展走了坦途。大概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们有着共同的信仰。

**王行娟：**所以，毛泽东在婚姻问题上视志同道合为很重要的一条。他和杨开慧结婚时，正处在共产党孕育过程中，杨开慧全身心地信服毛的主张，不仅他的政治主张，而且还包括他的体育锻炼方式等生活习惯，始终都是他的最热心的追随者，这就是他们的感情基础。后来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有时还携着母亲，一会儿上海，一会儿武汉，一会儿广州、长沙，风里雨里，颠沛流离，始终跟着毛泽东。到最后，白色恐怖那么严重，还要坚持守在板仓。杨开慧说过一句话：我不能离开，因为润之没有给我这个指示。可见杨开慧对毛泽东感情非同一般。

**访问者：**用“崇拜”这个词形容杨开慧对毛泽东的信服程度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杨开慧在她的自述里谈到对毛泽东的感情时，这样说：“我党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而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如他被人提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去共一个命运！”可见，后来军阀何键声称只要杨开慧宣布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便可放她出狱，而杨开慧却选择了死这一点并非一念之差的选择。

**王行娟：**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结合也能说明“志同道合”这个问题。毛泽东上井冈山时，贺子珍已在山上，她和杨开慧不同的在子还不是追随毛。当时毛泽东的声望并不像后来那么高，而且这时贺子珍也有较高的地位，她是永新县委员会委员、青年部副部长，仍然是他们的志同道合使他们走在了一起。

**访问者：**在遇到毛泽东之前，贺子珍就知道毛泽东这个人吗？

**王行娟：**也许知道，因为毛泽东搞农民运动也是有名的。

大革命时她阅读了大量的革命报刊，毛泽东早期的文章就刊登在一些杂志上。在未遇见毛泽东之前，贺子珍是有心上人的，这个人是永新县的欧阳洛，他引导贺走上革命道路，而且后来发展她入团、入党。欧阳洛长得一表人才，是永新县最早一批到南昌求学、入党的人，后回到永新建立党组织。可惜这个人在参加南昌暴动后回武汉任湖北省委书记不久，便被叛徒出卖被捕就义。贺子珍一直留在永新，永新暴动后仍坚持革命斗争，她的同学纷纷离开革命队伍，而她上了井冈山，和袁文才等在一起。对这些“土匪”，人家都是不齿的，从这也看出这位年轻的女共产党人突出的个性光彩。这深深吸引了毛泽东。共同的信仰和追求，不屈的斗争性格，这也是他们能结合在一起的前提和基础。

江青也是和毛泽东在革命队伍中认识的。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她毕竟没有留在上海，也没有跑到南京、重庆这些大城市，而是到了延安，延安的生活相对于那些繁华都市来说是很艰苦的，江青能千里迢迢跑到延安，说明她当时还是倾向革命，向往进步，这一点，也是毛泽东能和她结合的最起码的条件。

所以，能不能志同道合是毛泽东进行婚姻选择的最重要的也是最起码的一条。

第二，毛泽东在婚姻上表现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他主张婚姻要两厢情愿。他对待父母给他娶的罗氏的态度，就很说明问题。他和杨开慧的恋爱是很浪漫的，在当时也算是站在前沿的，用今天的话说，是特别“新潮”。那时杨开慧是教授家的千金小姐，能跟随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弟，非常不简单。贺子珍也是他自己寻找的。甚至包括对江青，也体现了他在婚姻上的自主性。有的书把他和江青的关系写得那样被动，这

完全不可能，任何人也不可能强迫他的婚姻，毛泽东怎么能那么随便被人拨弄来拨弄去，特别是他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作出这种选择，肯定是他觉得对方值得爱，可以爱。

第三，是他的反潮流反传统的做法。他的婚礼都是非常具有革命家的特色。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时是1920年冬。他们的理想是要为人民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他们把结婚作为反社会潮流的象征。所以，他和杨开慧实行的是同居，没有举行什么婚礼，过了一段时间，才请来一批人吃饭，吃到最后宣布他们结婚了。

**访问者：**那个时候，毛泽东在和朋友们的通信中就建议过要成立“拒婚同盟”，他对向警予、蔡和森的爱情关系——“向蔡同盟”表示了特别的欣赏。这种“爱情同盟”几乎成了那一代青年冲破旧的礼教束缚，争取幸福自由的一面旗帜，一种典范。毛泽东是用类似于“向蔡同盟”的“毛杨同盟”（姑且这样说）去实践自己的爱情诺言和理想的。经历了和罗氏的旧式婚姻，这种爱情的结合就更显得神采动人了。

**王行娟：**这种爱情的理想表现在：我爱我爱的人，我只选择我爱的人，而且用我的形式实现这个爱的结合。

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结合也是这样。他们能走到一起，完全是一种彼此倾慕的结果。有的书说毛贺结婚，是谁请了酒，我曾经问过贺子珍，贺说，没有这回事，别说请酒，连喜糖也没有，在那种情况下，到哪去买糖？身上没有钱，也没有可能举行婚礼。

**访问者：**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合时，杨开慧还在板仓。那么，贺子珍是否知道杨的存在？对毛、贺的关系又有影响吗？

**王行娟：**贺子珍是知道杨开慧的。而她对毛、杨关系的态度从1929年1月她不肯随红四军下山这件事就能看出来。



当时贺子珍认为红军下山后，毛泽东会有更多的机会和杨开慧相遇，她愿意把位置空出来让他们夫妻团圆，而自己留下来坚持地方斗争。但最后她还是随部队行动了。

**访问者：**贺子珍关于杨开慧的消息是不是从杨的堂兄杨开明那里了解到的？有史料表明，杨开明上过井冈山。

**王行娟：**在和贺子珍同居之前，毛泽东就对她讲过自己在湖南老家已有妻子和三个孩子，关山远隔，路途遥远，也不知他们的情况，甚至有传言说杨开慧已不在人世了，也不知真假。毛泽东说的一点不假，白色恐怖下生死两茫茫，这不难理解。1928年，杨开明作为湖南特委特派员上了井冈山（贺子珍回忆说是杨开慧的哥哥），从他那里，毛泽东和贺子珍了解到杨开慧还在湖南板仓隐蔽着。这样，贺子珍以后就总把她自己的衣物装在一个包袱里，单放着，从不与毛泽东的衣物混放。包袱里除了换洗衣服，一双草鞋，一双布鞋，还有一把外出防身用的刀子。贺子珍对毛泽东解释说，她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你什么时候把开慧姐接来，我什么时候离开你。”可见贺子珍这人是独立自主的，也真诚。她很爱毛泽东，愿意为他献身，也愿意为他的幸福而离开他。而毛泽东当时也确实为贺子珍所吸引。从特定的角度来看，他的婚姻方式的确是反潮流而不合世俗的。

**访问者：**毛泽东和江青是不是也深受形式的约束？

**王行娟：**在延安，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与江青的结合是经过政治局批准的。这是必要的组织程序。但这次仍没有什么婚礼。江青提出过要像样地请次客把自己的身分公开一下，毛泽东不肯，江青则觉得不这样自己就名不正言不顺。

**访问者：**除父母包办的罗氏那次婚姻之外，毛泽东的后三次婚姻都没有婚礼。

**王行娟：**第四点，毛泽东选择配偶是爱才也爱貌。他有很高的精神境界，他要求他的配偶也具备这样的境界。杨开慧在当时是一位很出众的女子。可能不一定有倾国倾城之貌，但富子青春，有个性有追求，也很有才，自视甚高，不是什么人都能放在她眼里的。贺子珍被称为永新一枝花，还有古文根底，会写诗，并非只会弄枪弄棒。她的一些诗可能被保存了下来，但我还没有收集到，也没有看到过。

**访问者：**那么，江青呢？

**王行娟：**客观地说，江青也是才华的确出众，读了很多书，字也写得好，不仅草书好，楷书也好，毛泽东就曾让李讷临摹江青的字。李敏也说过江青能看英文原版小说，口语也不错。有些古诗词，毛泽东念上半首，她经常能接着吟出下半首。她的才华无疑也会吸引毛泽东，特别是在延安那个地方，那个年代。说到江青的漂亮、风度，那就更不用说了。

**访问者：**您能对毛泽东与他这三位夫人的关系分别作一下描述与比较吗？

**王行娟：**毛泽东不是一般人，是职业革命家，他的革命生涯决定了他的选择。他是一个个性非常强、具有钢铁般意志的男人。虽然他不乏柔情的时候，他才需要女性的爱来温暖他的心，但他鲜明的个性始终是贯穿于他的婚姻生活中，影响着他和三位夫人的关系。相对而言，他和杨开慧之间是最融洽的。开慧是一种献身型、忘我型的女子，她的确做到了把自己的所有一切都融化在毛泽东的生活中，为他的事业服务，甚至不惜性命。这对毛泽东这样的人来说，是最合适的配偶。

**访问者：**杨开慧是很有个性的。从她的自述里，甚至能看出她有些骄傲。但她融入了毛泽东的生活中，为毛泽东而活。在认识毛泽东之前，杨开慧抱了独身的想法。以身相许

毛泽东后，她就把毛泽东的生活当作她全部的生活；她的自我，体现在毛泽东的事业和生活中。试想，一个大家闺秀，名教授的女儿，在父亲去世失去生活来源后，嫁给毛泽东这样的农家子弟所感受的生活压力有多重！六年中，她为毛泽东生了三个孩子，不仅在恶劣的环境里承担着繁重的家务，还辅助毛泽东工作，做文字记录，整理材料，在家乡农民中搞识字运动等等，站在毛泽东的身后，她真是任劳任怨。

**王行娟：**是啊！毛泽东那时四处奔波搞革命，而且不管家。杨开慧生产时他都无法在她身边。尽管她辅助毛泽东做了不少工作，但她的身分始终是家属。国共合作，毛泽东到广州，担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杨开慧带着母亲、孩子伴随，也是家属身分。我们经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的奉献，那么，毛泽东的背后就是杨开慧，杨对毛初期革命事业的扶持是不可磨灭的。

**访问者：**如果不嫁给毛泽东，以杨开慧的学识能力，她能做到哪一步？如果她身为毛泽东的妻子，不被军阀何键杀害，那她后来又会有怎样的命运？

**王行娟：**按照贺子珍的做法，她会义无反顾地离开毛泽东，而让他与杨开慧团圆。贺子珍对毛泽东也是一往情深，以身相许，但她同时并不甘于扔下自己的革命工作而仅仅照料毛泽东的生活，给他剪报抄稿。她不甘心仅仅作为毛的夫人存在。她有别于杨开慧。杨开慧是书香门第出身，而贺子珍出身于永新县破落了的大户人家，在见毛泽东之前，她已经在井冈山立住了脚，锻炼了坚强的意志和倔强的独立性。因此，在和毛泽东的近十年的生活中，她一直在心理上难以适应。但毛、贺之间的感情是很深的，毛泽东在晚年还用画圈的手势叫李敏照顾好她妈妈。他们之间在感情上有许多共同

的东西，而悲剧就在于，他们在1937年就分手了。

**访问者：**贺于珍在心理上难以适应只当毛泽东的“家属”，是不是导致他们最后出现裂痕的重要原因？

**王行娟：**贺于珍和毛泽东关系最融洽的一段就是长征时期，那时十分艰苦，面对生死，其他一切都抛开了，生死与共，相濡以沫。但不能否认，贺于珍不甘愿只当毛泽东的“家属”，想独当一面工作的想法，一直是有的。条件稍好一些，她的这个想法就冒出来，这样就跟毛泽东闹些别扭。贺子珍是非常上进、好学的人，而毛泽东就希望她能安心地做一些剪资料抄书稿的辅助性工作，同时照顾好他的生活。其实到延安后，毛泽东已经有了自己的秘书办公室，许多事务性的工作已经用不着贺子珍去做了，贺仅仅照料毛泽东的生活而已。对毛泽东来说，他需要这些，而对贺于珍来说，就不甘心，不甘心仅仅做个夫人，在毛泽东这棵大树下乘凉。矛盾就是这样产生的，最后贺非要去苏联学习不可，便离开了毛泽东。

至于“后来居上”的江青与毛泽东的婚姻，我把它归为功利型。江青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希望在革命中得到自我发展，这点没错。但她这个自我发展不像贺于珍的一心要为党独立工作，她是想捞取更多的东西。贺于珍和毛泽东相差十几岁，贺子珍同毛泽东结合的时候，毛在井冈山还没有出人头地。上井冈山，是由于秋收起义的失败，毛泽东带了一支很小的部队挑着枪枝，一身破烂地上来就是想在山上找到庇护所。贺子珍对毛泽东一无所求，是因为爱而献身于他。江青呢？比毛小二十多岁，毛泽东在延安已经确立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江青自己就说过她和毛泽东是政治婚姻，如果不是政治上的原因，年岁相差那么大是无法成夫妻的。这就说

明江青更看重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地位。江青是个功利心非常强的不甘寂寞的女人，我们可以再次把她和贺子珍的为人作个比较。毛泽东在延安曾经对贺子珍说过，我现在有发言权了。意思是说我在党内的地位不会让你像以前那样跟着我受苦。这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但当时贺子珍听不进去，她不想因为毛泽东地位的上升而给自己捞些什么，只想能独立地为党做工作。在我采访收集写作材料的过程中，那些不喜欢贺子珍的人也承认，贺从来没有因为是毛泽东夫人而盛气凌人，无论何时，她都以一个普通干部的身分出现在大家面前。到毛泽东确立了党内最高领导人地位之后，她还会离开他，这本身就说明她和毛泽东之间的婚姻关系是很纯洁的。

**访问者：**事实上，后来江青和毛泽东的婚姻感情距离也越来越拉越大，不仅两个人饭吃不到一起，而且发展到毛泽东看到江青就烦。这对江青来说也是件痛苦的事。刚才我们都是从三位女性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婚姻生活，那么，从毛泽东的角度呢？他的个性对于她们又意味着什么？

**王行娟：**毛泽东在感情问题上可以说也是矛盾的组合体。我们可以把他同周恩来比较一下。他和周恩来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周恩来很儒雅，对人对事包括对自己的妻子都是这样。而毛泽东这位农家子弟出身的领袖，成长过程中经受了来自教条主义的打击和排挤，历经沉浮，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斗争性。这种强烈的个性和自尊表现在他的婚姻生活中，就是一方面他有着丰富的情感，有时非常温存，但另一方面而就有农民式的大男子主义思想。毛泽东自己也曾表示过很羡慕周恩来家庭生活中的那种平静与和谐。的确，这种宁静对于他来说并不总有，他的个性也决定了这种宁静本来就不属于他。

访问者：其实，我们不妨设想，接二连三地为他生孩子，做他的家属，又岂是杨开慧所真正心甘情愿的？对杨来说，她做到的是泪眼相向，欲言又止，最后默默忍受。那种难过与委屈表现在杨开慧身上，不是大哭大闹，而是默默地把它埋在心底。要说宁静平和，最多的还是在毛泽东和杨开慧之间。1923年春，毛泽东去上海，再去广州，杨开慧想跟着去，毛没同意，两人产生矛盾。当时杨开慧快要生岸青，毛又顾不上她，这是一个原因。后来误会解除，两人1924年在上海“重比翼，和云翥”。误会消除了，但毛泽东恐怕也没能充分理解当时杨开慧的心情。杨开慧的牺牲，是毛泽东心灵难以愈合的创伤，一句“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复杂的心情尽在其中。

王行娟：贺子珍和毛泽东一样，个性比较倔强，所以两个人的碰撞也就比较多。江青也常常和毛泽东吵，特别是后来。郭化若从长征一直到延安，都在毛泽东左右，贺、毛吵架，江、毛吵架他都见过。延安那么小的一块地方，谁家吵架马上就知道了。毛泽东有时很柔情，有时很暴烈，吵起来嗓门也老粗，发起脾气雷霆万钧。有一回在延安，贺子珍见一小碗辣椒馊了就倒了，毛泽东回来发火，正洗着脸连盆带水一下子就向贺子珍摔过去，贺子珍赶紧跑出去。有时候贺子珍也跟毛泽东打架。但他们打架主要还是生活上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张闻天夫人刘英就回忆过，弄到一只鸡，毛泽东的牙齿好，要炒来吃，贺坚持要炖着吃，说这样营养好。就为这点小事，两人吵得要死。其实都不是为自己争什么，而是为了对方好。江青就不同了，她和毛泽东吵多数还是要毛泽东顺从她，替她去办什么事。而毛泽东往往原则性很强，不顺从她就吵，吵得跑到周恩来那里哭，周恩来就老给她劝架做工作。江青是想从毛泽东那里获得点什么的。反过来，毛

泽东也没有从江青那里获得多少幸福。愈是这样，他就愈加怀念他的前两位妻子——杨开慧和贺子珍。杨开慧已过世了，而贺子珍远在苏联。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怀念我了解得更多一些。贺子珍后来对自己那时非要离开毛泽东去苏联很后悔，而毛泽东对她也一直抱着负疚的心情。庐山相会，贺子珍恍惚的精神状态，使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他用专机将李敏送到她母亲身边，不放心，又让身边工作人员跟着专机去。他不断地回忆着他和贺子珍一起在井冈山的那段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争吵不和的恩恩怨怨已经烟消云散，留下的是他们共同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

**访问者：**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杨开慧之于毛泽东，是青年时代的纯真缠绵；而贺子珍之于毛泽东，是硝烟战火中的激情遭遇；而江青填补的是贺子珍之后毛泽东感情生活中的一段空白。

**王行娟：**这感情上的空白是非江青所能完全填补的，而江青本人虽然由此一跃而为第一夫人，但她的政治野心也并没能很快得到满足。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这一相当长的时间里，毛泽东严格要求江青做好仍然是事务性的辅助工作，安排好生活，不抛头露面，不参政议政。江青本人似乎也努力这样去做过。直到1962年，那一年我记得毛泽东接见苏加诺总统，报纸上登了大幅照片，照片上江青赫然在目，这是她第一次以第一夫人的身分在新闻媒介而前展露自己。

**访问者：**这或许表现了毛泽东的一种无奈吧，就像他对自己这次婚姻结局的无奈心情一样。

**王行娟：**只能这样解释。

1993年2月21日于北京前门东大街